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秦基伟回忆录



秦基伟回忆录

第一章走向革命

童年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湖北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区秦罗庄。父亲秦辉显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除了种田，还会一点篾匠手艺，母亲周氏，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除了父母之外，家庭里的长辈还有我的伯父。伯父终生未娶，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同父亲相比，伯父是一个更地道的农民。我的父亲读过几年书，又会点手艺活，田间劳动相对少了些。伯父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

平辈中，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因为是个儿子，父母和伯父对我自然多了些疼爱。哥哥姐姐凡事也都让着三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庭生活是温暖的，虽然并不富裕，却洋溢着劳动之家纯朴和睦的气氛。

我的家乡秦罗庄，在黄安县的北部，是片风景秀丽的丘陵。村庄座落在岗坡上，北倚老君山、天台山、雨台山，面朝阳台山，西有龙王山，东眺光字山。四周可谓群峰竞秀。在我家门前不远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溪，常年流水潺潺，春夏之交，梅雨连绵，水涨溪宽，鱼游虾戏，给我们这群乡野伢子带来不少新奇和乐趣。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小溪河往东走，便汇入了稍大一点的盐店河，而盐店河流到七里坪，则融进了纵贯大别山区的倒水河。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倒水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和摇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就是在七里坪镇倒水河的河滩上成立的。在几十年的腥风血雨中，从倒水河畔走出了一批又一批革命的优秀儿女。

家乡不仅水好，山色也是很美的。

越过村庄南边的小溪，再往前走几十步，就是一座小山坡，与村庄遥遥相对。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山坡上那大簇大簇的映山红。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清早起床，打开院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沐着朝阳的像云霞一样燃烧的映山红，那情景真是激动人心。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就是这样一方水土养育了我。

到我长到稍明事理的时候，父母和伯父商议，让我去邻村的学校读书。我们庄户人家送子女读书的目标很简单，能识得官府布告，能记个帐，春播秋种能算个丑寅卯就行了，穷人家孩子读书的目的基本上是为劳动服务。

小时候的我是比较顽皮的，生性好动，好奇心强，尤其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坐在学堂里，摇头晃脑啃书本，感觉很不自在，所以我总是找机会逃学，或到山坡上和放牛的小伙伴们嬉戏，或到附近的河沟里捉鱼摸虾，眼看封了放学时间，才装着放学回家。后来，逃学的事被老师发现了，他罚我下跪，用戒尺打手心。但越是挨罚挨打，我就越不愿上学。就这样，我小学上了不到一年，读过《百家姓》、《三字经》，但终究激发不起学习兴趣，再加上我的哥哥身体不好，做工种田都显得层弱，所以经父母和伯父商量，不再勉强我上学，而集中财力保障我哥哥多读几年书。他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我们兄弟两个，一个读书，一个劳动，文武都全了。长辈们希望我和哥哥也像父亲和伯父那样，永远不分家。

现在想来，那时候真是幼稚，只知道劳动能出成果，哪里知道读书学习会给人带来那么大的益处。就因为小时候没能坚持上学，在此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在学文化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有八亩水稻用，十来亩坡地。依靠自己的劳动，温饱不成问题，还略有节余。休学之后，我便跟随伯父下田干活。那时候我还

不到十岁，但没过多久，农活一套我便基本掌握下来，耕田耙地，插秧施肥，渐渐地得心应手。伯父很喜欢我，他觉得我热爱劳动这一点很像他。他常常对我讲，一个人从小就不要偷懒，有力气就要劳动。饭里有了自己的汗，吃起来才格外香。

我的母亲也是非常勤劳能干的，除了在家操持家务，农忙季节一样下田参加劳动。

庄稼人衡量一个孩子低劣优秀的标准，多数要看这个孩子是否爱劳动，劳动得怎么样。这一点，我很快就得到了乡亲们的赞赏。再加之我性格活跃，爱唱爱跳，不腼腆不怯场，所以在村里一般大小的讶子中，我算得上是个“领袖”人物，经常把他们组织起来，模仿戏班子演大戏、或者玩打仗游戏，应该说，过得还是很快的。那时，我也有痛苦，那就是受着疾病的折磨。我从小有哮喘病，犯起病来，一点不能活动，人躺在这间屋子里，隔壁屋子里的人都能听见我的喘声，找村里、镇里的医生看过，都没看好。一天，村里来了一位牵骆驼的江湖医生，我母亲请他给我看。他给了六包红色粉状药，让我们找六个绿壳鸭蛋，再从尿缸里刮些尿硷放在瓦片上用火焙干研碎，每天往一个鸭蛋里灌进一包红粉药和尿硷，封住蛋口后把蛋放在火里烧熟后吃。我母亲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在我每天放牛回来后就按这个办法烧个鸭蛋给我吃。蛋的味道是极难吃的，但为了治病，每次我都硬着头皮把它强咽下去。结果，吃完这样六个蛋后，我就真的再没犯过哮喘。我算很幸运，当时我们村子里有三个得哮喘病的人找这位医生治，只有我一人治好了。治病这件事是我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哮喘病治不好，我就不能参加红军，踏上革命的征程。

我的病治好了，全家都很高兴。可是，没想到，紧接着却是一连串的不幸袭击我家。

由于连年灾荒，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黄安县，瘟疫流行。我十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候根本谈不上医疗。母亲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丧母之痛尚未平息，第二年，我的父亲和伯父也相继撒手离开了人间。眼泪还没哭干，我的哥哥又于第三年病故，而姐姐又已经出嫁。

亲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如同一阵又一阵的晴天霹雳，抽打在我幼小的心上。如今回过头来想那几年，有时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孤独一人，居然活下来了，并且独启担起了一个家庭的全部责任。

祸从天降，这对自己的成长既是沉重的打击，也是一次很大的磨练。死的已经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活着的还要在生活的路上坚定地往前走下去。

短短几年，我像长大了十几岁。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偌大的一个家，只剩下我一个人，白天还好过，一把铁锁挂上门，我操起家伙下田去，农忙时还和别家换工。夜里就难熬了，我家住在山坡靠山根的地方。庄户人家老鼠多，到了夜深人静，便是老鼠的天下，一群一群绕着房间吱吱乱叫。鬼妖神怪的传说听过不少，老鼠一叫，就瞎联想，仿佛真的看见青面獠牙的鬼怪，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想打不敢打，想逃逃不掉，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用被子把脑袋蒙起来，在心理上多了些安全感。一睡着，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当初，我家长亲都健在的时候，衣食自给，并有节余。因此父母和怕父在村里说话都有一定威信。可是如今撑梁柱都散了，可以说人亡家破，全家

只剩下我一个小孩子，百

事不懂，丧事办了一大串，田也大部分卖了，家也空了，还欠下一连串的债务。

家道一落千丈，三里之外都能看见房顶上呼呼直冒的穷气。这样一来，过去那些亲热的笑脸就很少见了，连故亲远戚都少了来往。话又说回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乡亲们都是穷人，自己糊口尚且勉强，谁有能力收养我一个一身债务的穷小子呢？

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儿。

过去，大人都在，我最盼着逢年过节。因为逢年过节有好东西吃，还有赏钱，村里镇上还可能有演大戏的。乡下伢子们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过年过节。可是，自从亲人们一个个离我而去后，我最怕过年过节，怕听爆竹声，怕见别人家的灯光。

从前，我曾听老人说过，人死之后灵魂要升天。我常常在心里想，我的父母会在天上看见我在受苦，会从天上走下来看我，可是，这种奇迹却从来没有发生。

“马克思鞋”的启示

由于家庭的变迁，使我提前结束了儿童少年生活。从十一岁开始，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命运对我来说实在是过于残酷了。然而，苦难打不垮人，却能造就人。我不敢说苦难如何造就了我，但苦难确实没有把我打垮，反而使我在意志和胆量方面得到了很大的磨练。同时也迫使我学会了基本的谋生手段。

成为孤儿最初的日子里，我想的最多的当然是我的父母。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父母死而复生的稚想也一天天淡下去。处在一个贫困孤儿的位置上，我想的问题要比别的孩子多得多。我不仅要把劳动和过日子的一系列问题想得周全，同时我的思路还能触及到一些简单的社会问题，譬如，为什么有些人过去对我家很好而如今却对我冷眼相待？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穷有富？有时候心里想，这个世道不公，应该改变。至于怎么改变，自然心里是不明白的。

说到这里，就要回顾一下故乡的政治风貌了。

湖北省黄安县，是中国革命的最早策源地之一。早在“一大”之前，酝酿成立“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倡导者就是黄安人董必武。在我整个青少年生涯中，黄安县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十岁那年，我听村里的人摆龙门阵，说是县城里学生乱哄哄地起事了，要造地主土豪和军阀的反。又说县城里大街小巷都贴着两幅画，一幅是蓄鹅头的画像，一幅是蓄平头的画像。蓄鹅头的画像是个姓列的俄国人，叫列宁，他帮助中国穷人。蓄平头的是个日本人，叫帝国主义，他提出二十一条，要灭中国。

我们这些伢子虽然不懂更多的道理，但我们是中国人这一条是不含糊的，爱国之心是与生俱有的，正义感也是与生俱有的。我们从心眼里爱戴那个姓列的俄国人，而痛恨那个名叫帝国主义的日本人。并且在心里暗暗使劲：狗日的小平头，要是到秦罗庄，让我撞见了，非唾他一脸唾沫不可！

随着外面世界革命浪潮的不断兴起，乡下也开始动荡起来。或许是早当家的缘故，我比别的孩子又多了一份机灵。我敏感地发现，村里的一些大人除了忙着种田以外，还忙着别的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我还注意到家乡一带，偶尔会出现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总是那么行色匆匆。

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情。一天清晨，我照例同几个小伙伴一起到对面山坡放牛。在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件让我们惊奇不已的事情。

头天夜里下了一场雨。我们家乡是红沙地，雨水一浸，又板实又平滑。我们就在这又板实又平滑的路面上看见了一些奇怪的鞋印，里面有弯弯曲曲的图案，经络非常清晰。这种鞋印，绝不是我们家乡那种线纳的、麻搓的鞋底踩的，过去我们根本没见过。

可以肯定，这样的鞋印是有来头的。

后来，我们从路边，从草棵里，从盐店河畔又发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鞋印。还有一些标语贴在墙上，写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之类。

不久，村里就传得沸沸扬扬了，说有共产党的队伍往南边去了。那种鞋子，是胶鞋，也被人叫作“马克思鞋”。乡下人传得活龙活现，说穿“马克思鞋”的都是共产党，共产党打土豪，把田地分给穷人，他们走的是一条革命路。

这些话像一团火苗在我心中点燃并越燃越旺。我决心丢掉这个家，穿“马克思鞋”，走革命路去！

很快，革命运动在家乡一带也公开开展起来了，村里组织了农会、自卫队。农会不时组织农民游行，高呼“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革命歌曲也流传得很快很广，不仅青年人会唱，连小孩子也会唱几首。我记得我最早学会的是一首《发动歌》，歌词大意是：叫声农友，快快觉醒，为什么世上人吃人，这样不平等？不是命注定，不是我无能，全是统治阶级剥削者一手来造成。叫声农友，快快觉醒，劳苦大众要出头，只有闹革命。大家团结紧，奋起作斗争，一心跟着共产党，才能得翻身。

我自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很快当上了自卫队员。我也知道，革命是有危险的，弄得不好，不仅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脑袋搬家也是极有可能的。不久前到七里坪赶集，就见到过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的事情，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们在倒水河的沙滩上挖个坑，把捉来的共产党员放下去，再用沙埋，埋得人只剩脖颈和脑袋露在外面，然后往沙里浇水，水渗进沙里，越浸沙越紧，人就活活地被窒息了。那些残忍的刽子手如同禽兽，他们把燃烧的纸烟放在被埋的人的耳朵上，烧得皮肉滋滋地响，他们则开心大笑。

这一幕惨景，并没有把我吓倒。恰恰相反，我反而从另一角度想了许多问题，革命是怎样一回事呢？那些官老爷和富人为什么这么仇恨革命呢？富人们越是仇恨，就越说明这是桩穷人的事业。还有，国民党反动派拼命地抓呀杀呀，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人不顾一切地去闹革命，这就说明，这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业。那些死去的人难道不知道革命是要担风险的吗？我想是知道的，知道风险而不畏风险是为什么呢？因为值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

不能否认，我对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最早曾寄予一种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希望，甚至在我迈上革命之路的时候，也多少有一些行侠仗义的动机，但是，我参加革命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还是由于阶级压迫所产生的反抗意识。

参加黄麻起义

一九二七年秋，我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豫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安）麻（城）起义。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机会穿上“马克思鞋”，却毫不含糊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扛着一根红缨枪，跟着本村农会的乡亲们，赶到了首集七里坪。

我已经记不清是谁负责指挥我们了，只记得暴动的口令是“暴动，夺取黄安城！”，暴动的口号是“暴动杀尽土豪劣绅！暴动夺取政权，组成农民政府！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武汉政府！农民革命万岁！”

当天夜里，我们从七里坪出发，经打鼓岭、火连畈，直达城北三里岗。沿途人山人海，刀枪林立。到了十四日天快亮的时候，我们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起义军已将黄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李先念、詹才芳、吴焕先、王树声等人率领群众，四面出击。

当时的情况，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天快亮的时候，总指挥潘汝忠和吴光浩指挥部队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三十余支，活捉县知事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还有改组委员会的三个人以及十几名土豪劣绅，收缴了一大批钱钞物资。

后来由于敌人援兵压境，起义军处决了贺守忠、王治平等人，退回了大后方七里坪。

这次参加黄麻起义，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外面的世界一下子打开了。革命，不再是街谈巷议，也不再是凭空想象。我不仅亲眼看见了，而且亲身参加了。回到七里坪后，我那份热情再也冷不下来了。当时已经成立了鄂东革命委员会，县里还成立了农民协会。有位姓曹的先生（后来知道，他就是共产党员曹学楷）在台子上对群众宣传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交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者被土劣贪官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是证明我们革命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

这一席话，说得真好。我觉得他真的说到我心坎里了。对于革命，对于武装斗争，我有了真实的感性认识。

不久，黄麻特委将参加暴动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编为中国革命鄂东军。我因年龄太小，未能正式参军，就留下当自卫队员，在斗争土豪劣绅时，维持大会秩序，喝令地主老财，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督促他们为参加斗争会的群众烧开水。

为了表示革命的坚决性，我把剩下的一两张土地契约，拿到农会当众烧掉。为了革命，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那一阵子，我们干得好开心。

可是，我们哪里知道，在秦罗庄千里之外，一块阴险的乌云，正在慢慢地向我们移动。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急忙调兵遣将，积极策划对黄麻起义军的军事进攻，企图消灭鄂东军，扼杀刚刚诞生的红色力量。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鄂东军撤走黄安，转战木兰山地区。黄安县城被敌人占领了。

起义军转移之后，黄安、麻城人民又遭殃了。敌人向起义地区疯狂反扑，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纷纷返乡，勾结国民党军，重建各级反动政权和反革命武装，进行“清乡剿共”。他们不仅要抓共产党员，还大抓“共产党嫌疑分子”。

事实上，他们追捕杀掉的“嫌疑分子”比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多得多。七里区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也是根据地，敌人认为这是“匪区”、“没有一个人好人”，见人就捉，由土豪劣绅随意指认，而且不需要审判，一句“看你不像好人”就能作为杀人的依据。我不仅参加过“黄麻起义”，而且是自卫队员，自然也是敌人要捉要杀的对象。田地是没法种了，家也不能回了，成天东藏西躲，夜里就往山上跑，带着铺盖、蓑衣，选个荒岗坟地，倒头便睡。

到一九二九年年底，七里、紫云、仙居等地都建立了赤卫队，县里成立了赤卫大队，赵赐吾担任大队长。我也在本村参加了赤卫队。赤卫队比自卫队又进了一步，不单纯是自卫性质，还要主动出击，寻机打击敌人，消灭反动民团。

这几年，通过接触革命，并参加一系列武装斗争，我知道了穷人要想过上富日子，就必须拿起武器去斗争。这期间，鄂东军先是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一九二九年春，原师长吴光浩牺牲，由中央军委派到大别山的徐向前接替指挥。

这年六月，国民党反动军队罗霖部和土匪联合起来“会剿”红三十一师，徐向前指挥两个大队，发起反击，接连五战，毙敌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活捉并处决了反动派的红枪头目戴五爷。与此同时，我们七里坪和周围的赤卫队也对罗霖部队和夏斗寅师补充团展开了广泛袭扰活动，使敌军食不成、睡不稳，疲惫不堪，没过两天，不战自退。

当上了“红小鬼”

自从鄂豫皖地区有了自己的红军队伍后，穷苦的庄户人也有了盼头。对于革命，老百姓未必懂得很多，我们是从红军的身上理解革命的。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撑腰，所以，红军也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了扩大红军，在根据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参军热潮，出现了许多母亲送儿、妻送丈夫、姐送兄弟甚至儿女送父参军的景象。有的青壮年入伍了，不够条件的小脚女子和少年儿童，也找苏维埃干部要求参军。参不上军，回来还痛哭流涕。

我记得当时根据地里流行这么一首歌曲：

正月里来正月正，我劝我郎当红军，现在革命高潮起，切莫留恋在家庭。
二月里来是阳春，当了红军莫担心，跟着红军打天下，家中事务我承担。
三月里来是清明，我送我郎参红军，送郎送到大门外，眼望郎去转回程……

当时，参加红军是乡亲们心目中最光荣最了不起的事情，更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还不满十五周岁，跟本村的伙伴一起，到乡里苏维埃政府软缠硬磨，终于磨到了一张介绍信。拿着这张介绍信，我们一路疯跑，找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成了红军的一员。

有件小事，说起来挺有意思。当时，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有七个人，乡里乡亲，半大伢子，在一起玩熟了，参军了也不想分开。于是我们就商议：分兵排队时站到一块儿，最好分到一个班，哪怕分到一个排也行。谁知分兵的干部精得很，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故意跟我们过不去。集合之后，他让我们报数一二三、一二三。报完之后，又让报“一”的上前一步，报“三”的后退一步，报“二”的原地不动，这样一来，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分成了三行，每行到一个团。这下倒好，本想分在一起，却偏偏各奔东西了。

我被分到三团机枪连当战士。

在红军的幼年时期，相当数量的指挥员都是从俘虏中改造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们搞训练基本上还是按国民党那一套，军阀作风十分厉害。动作不规范，有时会受到体罚。一天正步拔下来，两条腿僵得就像木桩，解大使都蹲不下去。要说苦，那可真苦。虽然是红军战士了，可那时我才十五岁，也偷偷地哭过几次。

还不光是训练场上军阀作风盛行，平时，有些干部也很霸道，对战士骂两句那是小菜一碟，打耳光都是常有的事。有的单位营长连长发毛了，可以拿枪随便打死人。这一时期，正是军阀主义现象最严重的时候，个别战士受不了，就开小差，抓住后压住脑袋打屁股，这一套带兵方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直到后来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出废除肉刑、反对打骂，这种情况才逐渐改变。话又说回来了，军队毕竟是武装集团，不同于乌合之众，只要方法对头了，严一点是应该的，而且是应该提倡的。作为我个人，苦也好，累也罢，哪怕是屈辱，我都能忍受。来当红军的时候，连死都想到了，死都不怕，还怕这些吗？我抱定了一个信念，你训我受，骂我听着，打我不走，这个红军是当定了，我是一定要当到底的。

军队的生活，一个连队就像是一个家，我那时候把炊事班长看成是这个家的家长。因为炊事班长掌管着全连的伙食，同时炊事班长的年龄也大，比连长指导员都大，被全连尊称为“老班长”。当然，这个家同由父母兄弟姐妹组成的小家庭大不一样，譬如吃饭，一个班一桌，一个值班员，把大家的

热稀饭都盛好。饭前要站队，还要唱红军歌，然后吹哨解散、全班围坐，坐好了只能看着不能吃，值日排长又吹一遍哨子，这才一齐端饭。红军吃饭绝不会有人说话，满屋子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喝稀饭的吱溜声，可以说是争分夺秒。等值日排长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啾”一声哨，不管吃炮没有吃饱都算完事，放下碗后就得去集合。红军的饭实在不是好吃的。刚开始根本吃不饱，更谈不上品尝味道了，谁慢嚼细咽，那就非挨饿不可。后来就动脑筋、琢磨要领，为了提高速度又避免烫伤，先转圈吸碗边，边吃边用筷子搅，大吹气，小吸溜。就这样，我逐步养成了快吃快咽的习惯，最后想慢也慢不下来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是当军长、司令，还是国防部长，只要不是外事活动，我吃饭的速度一般是跟不上的，东西一到嘴里转眼就下肚了。

我在机枪连当了四个月的战士，赶上了第一场战斗，是同郭汝栋第二十军的部队作战，地点在麻城县的城门岗。敌人是一个团，未能把他们全部消灭，只是杀伤了一部分，其余的跑了。那时候，我连枪都没有，舞着一根梭标跟着部队在前冲，什么也没有多想，只想着赶紧冲到前面去，缴一支枪回来。这一仗我果然实现了愿望，缴了一支枪，单套筒，虽然比捷克式大盖差点，但终究比梭标强。背起单套筒，顿时觉得精神了不少。

打完这一仗，根据战斗表现，我被提拔为副班长，并被保送到随营学校去学习，随营学校是跟着部队行动的，有点像现在的教导队，又不完全是。主要的课程是学打仗。有时候课堂干脆就是战场，边打边学。

进随营学校的条件是：一看战斗表现，二看发展前途。能带兵但怕死，那就不行。不怕死但死脑筋也不行。

七个月后，我从随营学校毕业了。此时已建立了红一军，军长是许继慎，副军长是徐向前。我原先所在的三十一师也被整编成红一师。我被分配在军部经理处监护连任排长。后来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军长是邝继勋、政治委员是余笃山、参谋长是徐向前。此时，我又被调入军部手枪营二连任排长。

我是一九三一年四月入的党。在此之前已经当了几个月的排长，排里有好几个战士都是党员了，而我这个排长还居然不是党员，党员开会我不能参加，有些事他们悄悄地商量。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我能当排长却不能入党？于是，我主动去找营政委汇报思想。营政委对我进行了一些解释，肯定了我的优点，说我作战勇敢，工作认真负责，对个人要求严格，入党只是个时间问题。但营政委也说了两点意见：一、你的家庭成份是中农，对中农，要用更长的时间考验。第二，你政治上还不成熟，好打抱不平，爱提不同意见，需要改正。

营政委说的这两条，第一条毫无办法。我是中农成份，可这不是我自己能够改变的。那时候，部队非常强调成份。贫雇农，特别是雇农，最吃得开，一个一无所有的雇农，一参军很快就会得到重用。至于营政委说的第二条，我嘴上虽然接受了，心里却不以为然。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的确是这个性格，遇到看不惯的事，就要发言，遇上不合理的现象，就要提意见。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生中，有不少不好的毛病都改掉了，唯独爱提意见这个毛病没有改掉。话又说回来，就是能够改掉，我也不打算改了。我认为提意见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而不是对某个人过不去。作为共产党员，爱提意见，怎么说也不是一桩坏事。

尽管营政委说了我两条，但我还是很快就入党了，连队指导员郭世进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第二章在战斗中成长

莫名其妙的降职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上台。

这年四月，蒋介石调集 11 个师的兵力，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鄂豫皖特委决定集中四军主力迎击来犯之敌。

这时，中央派遣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人已到鄂豫皖地区，成立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张国焘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担任省委书记。

这次反“围剿”，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就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因此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即取得了胜利，先后共歼敌 5000 余人。

反“围剿”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广大红军本该兴高采烈，可是，还没待将士们举起庆功的酒杯，一场灾难又降临到红四军的身上，那就是著名的白雀园苏区大肃反。

肃反运动最初是怎么酝酿起来的，我们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背景好象很复杂，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很难一言以蔽之。这么大的运动，恐怕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利用党的幼稚，把运动推向极端，那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最先挨整的是政委余笃山，接着军长邝继勋被降职。

一九三一年六月底，围绕东进还是南下问题，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同张国焘彻底闹崩了。

当时，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人主张抓住敌人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主张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并形成方案。

不料，就在这一方案付诸实施的时候，张国焘推翻了原来的南下决定，要红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并限一个月内完成小这个决定，是很不切合实际的，说白了就是以卵击石。

由于原军长邝继勋被降职，徐向前升任军长。徐向前与政委曾中生积极配合，厉兵秣马，率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五个团，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 1800 余人。

仗是打胜了，下一步，红四军往何处去却成了问题。

在英山，徐向前军长和曾中生政委踌躇再三，权衡利弊，觉得进攻安庆实不可取。

一是路程太远，中间要穿过四百多里的白区，且是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

二是兵力有限。

三是地形生疏。

鉴于以上考虑，军首长最后决定，放弃攻占安庆的计划，趁势进攻蕪（春）、黄（梅）、广（济）县城，并且决定，一边行动，一边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

在徐军长、曾政委的指挥下，我们红四军主力顶着烈日，分两路南下突袭蕪春，进浠水，围困广济，奔袭黄梅，一路势如破竹，不仅给敌人以重创，还收缴了许多财物，光鞋就达 1800 多双，黄金 20 余斤，大洋 7 万多元。我们后来听说，金子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它财物，用于解决部队的吃穿，这真是空前的胜利。

可是张国焘却对此大力恼火。他并不看重胜利，却过份地看重了他个人的意志。据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就在红四军准备继续乘胜进击之际，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甚至还说徐向前、曾中生等人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九月初，部队奉命北撤，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政委组织召开了一次支部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瞎指挥和家长作风提了很多意见，并起草通过了一项声明，决定派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

应该说，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太高明，但的确是正当的。恰好是这件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便成了一桩大罪，并引出了一连串的冤案。

九月十三日，陈昌浩到达六安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的决定，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气

接着，肃反开始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 20 余人相继被捕。没过几天，十一师师长周维炯、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也先后被捕。肃反从军到师到团，层层抓人，用陈昌浩的话说：“蒋介石、汪精卫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勾结了红四军中的两个师长、六个团长、五个团政治委员，十个团政治处主任、三分之二以上的营长、连长及连指导员……准备马上暴动把红军拖到国民党方面去，根本上消灭我们红四军与鄂豫皖赤区。”（见陈昌浩著《红四军中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师长到团长政委到医院院长，竟有这么多敌人，那么剩下来又能有多少好人呢？等连长指导员抓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该我们这些小字号的倒霉了。

那些推行极“左”路线的人们自然也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红四军干部战士全部打成反革命。仗，还是要靠人去打的。我倒是没有被拉去杀头，但把我从一排长的位置上撤下来，让我去当二排长。

如果按现在的眼光看，从一排长到二排长当然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然而在红军时代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的一排长，人称“大排长”，作战时是紧跟连长指导员的，相当于副连长，而且是连长的当然代理人。

可是二排长就不同了，甚至可以说，二排长在连里的地位往往还不如三排长。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主

要活动就是打仗，提着脑袋干事，方方面面格外精细。在一个连里，先锋是一排，后卫是三排，不说信不过，至少可以说，二排的力量相对弱些。这层意思虽然没有文件规定，但在有些兵营里，这往往是约定俗成的事，大家心照不宣。

我至今也不清楚，是谁告了我的密，把我从大排长的位置移到二排长的位置上，等于被降了一职。以后我推测，

可能是在连长指导员那里出了点问题。

那时候，职务称呼比较随便，由于战斗中变化大，有的干部互相之间甚至只知绰号不知姓名。我因幼年出过天

花，脸上有几颗麻子，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本连还有一个三排长，也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三排长曾经对肃反说了几句风凉话，可能被连长指导员供了出去，于是保卫局就来找“麻子排长”的事。因为三排长是雇农出身，比我的家庭成份好，所以没怀疑他。那么，除了他，犯错误的“麻子排长”自然就是我罗。好在我才是个排座，又沾了个工农干部的光，脑袋才没有搬家。

张国焘有一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

我有幸成了“党可原谅三分”的人，脑袋没掉，后退一步，当起了二排长。而那些知识分子们可就遭殃了，短短几个月，几乎全被杀掉。

意想不到的提升

从一排长到二排长，虽然心里也犯过嘀咕，但并没有多想。那时候人的思想很透明，只要还承认我是红军战士，当什么都行。我想，二排长就二排长，我要带着二排把仗打好，到时候，请我到一排我还不呢！

憋着这么一口气，我对排里的要求十分严格，训练抓得格外紧。那时候部队成份比较杂，排里有些老兵很有经验，但也有一些人，昨天还是工人农民，今天就是红军了，连枪都不会放。

我是进过随营学校的，单兵战术那一套受过相对正规的训练，进攻时利用地形地物比较灵活，懂得隐蔽接敌，善于运用匍匐和跃进相结合的冲击方法。姿势好看不说，重要的是科学。

训练的时候，我把全排集合起来，现在想起来很有趣，那时我也才十六、七岁，但既然是排长，就得拿出排长的样子。我学着那些老一点的干部，昂首挺胸，双手插腰。这个派头还挺能镇住人，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在队列里一齐瞪眼看我，大气都不敢出。

我问大家，我参加好多次战斗了，每次都往前冲，可连汗毛都没伤一根，这是为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等他们议论差不多了，我就给他们做示范表演，首先在前方选好隐蔽物，计算好时间，然后冲击开始。什么时候跃进，什么时候匍匐，什么时候正面猛跑，什么时候隐蔽观察，什么时候侧身接敌……这一套做得从容利索，看得大家都很服气，再训练的时候，不用我多说，积极性都上去了。

记不清具体日子了，有一天正在操课，扬子外来了几个人，也不靠近，老远地看了一会，指指点点。从手势看，像是徐向前军长。因为手枪营是跟着军部的，对军首长还是比较熟悉的。但隔得较远，又有点雾，没十分看清。

这个情况，我起先并没有介意，我们训练，首长观看，是正常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却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那天我照例同排里一起操课，来了两个人，挎着盒子枪，没有同营连干部打招呼，径直走到场地中间，问：“谁是二排长？”

我一看，阵势不对。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又挎着盒子枪，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心里顿时一紧：坏了，保卫局来抓我了。

当时肃反还没有结束，本连三排长前几天刚被抓去。掰着指头算，再往下，怎么也该轮到我了。

这样一想，心就灰了。参加红军就是革命的，要是被当反革命杀了，那真是天大的冤枉。可是既然人家找上门来，躲是躲不过的。

我牙一咬，心一横，对那两个挎盒子枪的人说：“我就是二排长。”

我见他们两个对视一眼，不知什么意思，心里估摸也许要下我的枪。

但他们并没有下我的枪，而是让我跟他们到军部走一趟。

一路上，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他们究竟要于什么。那时候的样子肯定是挺悲壮的，就跟上刑场差不多。我也盘算了，如果说我是反革命，我就要向他们要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杀我。硬要栽赃杀我，逮住机会我就跑。

到了军部才知道，是徐向前军长召见。

徐军长先问我，老家在哪里，家有几口人，有多少地，多大年纪，什么时候参军的，怎么参军的。问得很细。

我一条一条，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徐军长听完我的回答，看了我一会，然后微笑着说：“行啦，你回去吧，到手枪营二连当连长。”

我一听，懵了。

直到徐军长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才醒过神来。哎呀我的天哪，吓了老半天，原来是提升呀。我在心里直怨那两个挎盒子枪的同志，干嘛不早说呢，吓得我差点跟你们动家伙。

以后听徐向前身边的同志说，军长看过我组织训练，认为我军事素质好，有战术意识，是个好苗子，所以给予重用。

当了连长，感觉就不一样了。

连是独立单位，作战、生活，各方面的问题都得连长拿主意，不像当排长，胳膊窝里过日子。那时候，除了行军就是打仗，没别的事。没仗打，我就组织训练。

徐军长教导我们要爱兵，怎么个爱法呢？提高他的技术，战场上发挥他的技能，减少他的伤亡，这就是最大的爱兵。这一点我认识得很明确，从当连长起直至后来的整个军队生涯中，我都特别注意抓部队训练。

红军幼年时期，部队成员军事素质七上八下，没有专门训练时间。我不管那么多，抽空就组织训练，经常考核。不客气他说，谁动作做得太差，骂人发脾气也是有的。

大约是看我训练抓得紧，要求严，那套程序又挺像回事，比较正规，再加上我的嗓子洪亮，底气足，口令清楚，所以其他连队有时还请我去当教官。我也不推辞，谁请都去，去了就训，同训自己连队一样。这段连长生活，为我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当军事教官，独立组织游击队，可以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战四捷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部队有红四军和刚成立起来的红二十五军。我们四军手枪营也到了方面军总部。我仍在二连当连长，负责总部首长的警卫工作。

早在这年秋天，蒋介石就策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四方面军还没成立，周围便有大兵云集。

但由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敌人内部也出现了分歧。这就使蒋介石新的“围剿”计划受到影响，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根据这一有利形势，在红四方面军成立的同时，总部首长便作出决定，趁敌尚未布置就绪，主动出击。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等同志的指挥下，我军积极开展外线进攻，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首先谈谈黄安战役。

黄安县是我的家乡，也一直是鄂豫皖红军的重要活动地区。县城是一座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古城。明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年）三月建县，于原麻城县的姜家畝设县治，因春秋时属黄国辖地，为求“地方宁谧，生民安妥”，定名为黄安。黄安地处鄂豫交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部将，清朝的太平天国都在这里屯过兵、打过仗。

自一九二七年黄麻起义之后，黄安经历了国民党军队的数次浩劫，但黄安县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从没间断，一直是后方坚强的基地。

当时，驻守黄安城的是国民党杂牌部队赵冠英的六十九师，辖两个旅四个团。该敌接防不久，人地生疏，城内粮食不多，而且处于孤立突出的地位，这是我军攻城的良好条件。但赵冠英部的侧后还有几个师。可以互相策应，即驻麻城之敌的三十一师，驻宋埠之敌的三十师，驻黄陂之敌的三十三师，互为犄角。黄安之敌对我军进攻也早有防范，在城外修建了许多工事，可谓碉堡林立，火力发射点星罗棋布，加上蛛网般的堑壕、交通沟，密密层层，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徐向前总指挥的主持下，红四方面军总部对敌情作了认真细致的研究。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人，皖西有六个师、豫南有五个师、鄂东有四个师。我军当面的这几个师，虽然可以互相支援，但黄安位置突出，易一举攻破。

方面军首长根据我军装备差、攻坚力量薄弱的特点，决定放弃强攻，而采取“围城打援”的方针。这一着很高明，我军十一师、十二师、十师三十团以及黄安独立团，共八个团，把黄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把声势造得震天价响，吸引宋埠、黄陂和麻城等地的敌人来援，争取在运动中加以消灭。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夜，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四天，黄安战役的枪声打响了。

经过十多天的战斗，到二十四日，我军全部肃清了城外八个独立据点，把县城紧紧围困起来，胜利完成了“围城打援”的第一步。

十一月二十五日，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黄安城东南仅五公里的郭受九地区，加强了火线指挥。我们手枪营也跟着首长，抵进了黄安城。

黄安城守敌多次寻机突围，都被我围城部队打了回去，敌三十师两次增援，也都被我十一师打援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十二月二十日拂晓，敌纠集其三十师大部和三十一师一部兵力，并组织“敢死队”向我十一师三十一团元嶂山阵地进行急袭。由于五连前卫排一时疏忽，我阵地被敌人突破。敌人爬上嶂山顶峰，直逼我十一师指挥所。

天亮以后，敌人又集中兵力和火力，在炮火掩护下，拼命向我攻击。到下午三点多钟，敌人进至离黄安城仅十里的地方，逼近到我打援部队固守的最后一个山头。

情况十分危急，我十一师王树声师长亲率师直手枪队和通信队协同三十一团，与敌展开了肉搏战。

外面打得热火朝天，可我们手枪营的干部战士却被憋在总指挥部内动弹不得，当时的情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心里急得冒火，手里痒得出汗。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手枪营平时跟着首长，方方面面都比其它部队优越，人家也没有意见。可是打起仗来，你也得优越呀，上面发的一长一短两支枪，可不是为了摆样子好看的，关键时候不见血，那还不如烧火棍。当兵的不打仗，就像母鸡不下蛋。

外面在拼命地打，里面在拼命地吵，战士吵班长，班长吵排长，层层请战，人人磨拳擦掌。

我又何尝不想打呢？可我知道，上面没有动我们，说明仗还没有打到那个份上，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不能动，必须坚守现有岗位，保护好方面军首长。

眼看战场态势向着不利红军的方向发展，被围困在城内的赵冠英，也得意忘形起来，又开始突围。到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在总指挥部驻地已经能清楚地听到两面敌人的枪声，而且愈来愈近，愈来愈密集。显然。如果让敌援兵和城内敌人汇合一处，整个战役就将随之失败。

紧急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亲自下令了，把手枪营拉上去！

仗打到这个份上，可以说，我们手枪营是首长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了。经过几次战斗，手枪营的人员有很大的调整，多是精悍勇猛的小伙子，武器也“鸟枪换炮”了，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外加一耙马刀，战斗力是很强的，不到关键时刻，徐总指挥是不会轻易动用的。

我们全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地看到徐向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响得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大家一下嚷开了：“快跑，总指挥又出发了！”“加油，赶到总指挥前面去。”

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峰的背后。山的前面，我军打援的十一师正与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跟随总指挥的一位参谋命令我们在山坡上隐蔽。这时候，我才看到总指挥带来的参谋和警卫人员都隐蔽在山坡上，唯有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的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了望。

枪弹越来越密。我转到总指挥的一边，爬上山顶，想看一下地形。来到山顶一看，只见敌人已攻到了半山腰，并且正在拼命地向上攻击。烟火笼罩着整个山坡。我不安地看了总指挥一眼，他仍若无其事地站在山顶上观察着对方。

我赶快爬了回来，向各排长传达了情况。战士们听说敌人攻到了半山腰，更为总指挥的安全担心。正在这时，总指挥放下望远镜，转回头来，对他身

后的参谋说：“命令二十八团和手枪营，准备冲锋。”说完，又转回头去观察。

总指挥的命令传下去后，部队就动了起来。掌旗员拉掉了旗套，战士们抽出了马刀，在我们右侧的二十八团，开始向敌人发起冲击。

当我从徐总指挥身边冲过去时，忽然看见他身子一震，向右侧晃了一下，右胳膊上顿时血涌如注。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见我了，左手向山下一指，高声喊道：“坚决把敌人压下去！”

亲眼目睹了总指挥负伤，那还了得呀，战士们的眼睛立马红了，哇哇一阵吼叫，情绪像火星沾油，哗一下烧起来了。

我们手枪营从正面，二十八团从右面，十一师从左面，像决了堤的洪水，呐喊着向敌人压过去……敌人开始动摇了，溃逃了。

我们一步也不放松，拼命地追赶，无数面红旗迎风飞舞，驳壳枪上的红穗子、马刀上的红绸子，在战士手臂下伸展开来，冲锋的呐喊声惊天动地。敌人像被打懵了的狗，东一个西一头地向松树丛里钻。有个敌人，跑着跑着，转身向一个战士举枪射击，那个战士几步窜过去，一刀把他的枪砍落在地上。掌旗员高举着红旗，哪里敌人多就向哪里前进。红旗指向哪里，战士们就杀向哪里。有的同志负伤了，包一包伤口，又继续追击。有的同志子弹打光了，捡起敌人丢下的枪继续向逃跑的敌人射击。逢山爬山，遇河涉水，一口气追出十五里，收复了我们的第一道防御阵地桃花镇。

敌人的第三次增援受到沉重打击，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企图突围的敌人，也被打退到城里。

又过了几天的围困，敌人已接近粮尽弹绝的地步。敌人的多次增援，也被粉碎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通知：“我们的飞机要来黄安城轰炸敌人，散发宣传品，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这个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振奋了。有的战士高兴地说：“他娘的，过去它黑天白日跟着咱瞎嗡嗡，欺侮我们，现在也叫他们尝尝我们的‘鸡蛋’吧！”有的指着黄安城的敌人骂道：“等着吧，不投降，就‘慰劳’你们‘鸡蛋’吃。”

“列宁号”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关于它的来历，我是听总部的一位参谋介绍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中午，国民党军第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因故障在罗山县宣化店西南二十五里的陈家河附近河滩上降落，一区十乡放哨的赤卫队员很快包围了飞机，驾驶员龙文光当了俘虏。经过教育后，龙文光同意驾机为红军服务。飞机修饰一番，机翼两端添上了两颗闪闪的红星，机身上写了“列宁”两个大字，并命名为“列宁号”。

十二月二十一日，天阴沉沉的，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首长和驾驶员龙文光一起，来到城南的一个高地上，勘察了黄安城的地形、敌六十九师司令部的位罝，以及城内敌人的兵力部署。

对于“列宁号”参加黄安战役，以后徐向前元帅也说起过，主要是讲陈昌浩同志的事情。

那天白天，陈昌浩坐上飞机到黄安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骚扰敌军……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陈昌浩智坐上它穿越白区，走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二十七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这次，飞机到

达黄安上空后转了几圈，敌人以为是给他们空投物资来了，纷纷跑出工事，准备抢东西。万万没想到，来的却是红军的飞机。撒了些传单，还丢了两颗大炸弹，搞得敌军愈加慌乱不堪。我黄安独立团乘机猛攻得子山，守敌一个营大部分被歼

赵冠英在外援不济，突围不得，又遭到我飞机轰炸之后，动摇了。为了做最后的挣扎，保全他个人的生命，他以冲出去“官升一级，兵升一官”为诱饵纠集一部分军官和士兵组成了“敢死队”，当我二十三日晚十点发起总攻后，乘夜色从南门突围。此时，我们手枪营正同敌人巷战，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整队追击残敌，捕捉赵冠英。我们当即尾随追去。沿途的赤卫队员和老乡们，也自动地拿起了长矛、梭标、铁铲、木棒，高喊着：“活捉赵瞎子！”从四面八方拥过来。我们二连一直追到高桥，才全部消灭了逃跑的敌人。仅我们一个连就活捉了二百多俘虏。

与我们追歼逃敌的同时，黄安城也被解放，全歼敌人万余名。

第二天，有几位老乡，抬着一个身穿大褂、负了伤的大烟鬼来到总指挥部。一位老乡掀掉盖在这个大烟鬼头上的东西，指着他的一只死羊眼说：“他就是赵瞎子，他就是赵冠英。”

原来赵冠英在突围时，叫他的副官扮成他的模样，骑着他的大自马，给他当替死鬼。可是哪里想到一突围这位副官就负了伤，被俘后就揭赵冠英的底。赵冠英使尽了所有的伎俩，左藏右躲，更衣换装，仍没有逃出天罗地网。

说起黄安战役，就不能不提到黄安人民。在战役过程中，全县有一千二百多人参加了红军。除县独立团交红四方面军指挥外，又组织了大批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为了抢运红军伤员，不仅妇女上阵，连不少老弱病残都参加了担架队。另外，在物资上也给予了无私支援。据统计，仅一周之内全县就捐献棉衣 1920 件，布鞋 2476 双，肥猪 42 头，另有糍粑、小菜、花生等不计其数的物品。诚如歌谣唱的那样：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人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黄安战役，是人民的战役。黄安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为了纪念黄安战役的伟大胜利和表彰黄安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决定，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全国解放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再次将“黄安”改名为“红安”）

黄安战役胜利后，为了给予北路敌人以有力打击，夺取商城，把鄂豫边和皖西根据地连接起来，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商潢战役。

商城、潢川均为豫东南地区军事重镇，敌之重兵集结地。国民党军曾万钟第十二师主力驻扎潢川城区，一部则布于城南商潢公路上的北亚港；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第二师及唐云山独立三十三旅，布于北亚港东南商潢公路上的傅流店、杜甫店、江家集一线；陈耀汉第五十八师主力驻商城以北、潢川以东的固始地区，与商潢之敌成为犄角。国民党军计划以商、潢、固地区为阵地，在商城与麻城之间，构成一条隔离地带，以分割鄂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企图在“围剿”中对红军各个击破。

根据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红四方面军总部制定了商潢战役计划：第一步，“腰斩”敌第二师，控制商潢公路，切断商、潢两城敌军间的联系；第二步，相机夺取商城。为实现此计划，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四军第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北进，并调动在皖西活动的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西进，配合四

军行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我军四个主力师合力作战，向国民党“围剿”军发动攻势，先后在北亚港、傅流店歼敌一部，占领了杜甫店、江家集、仁和集、何风桥等地。敌第二师、第十二师仓皇逃往潢川，红军完全控制了商潢公路，并切断了固始与商城之间的联系，使商城之敌第五十八师处于红军包围之中。鉴于商城城坚难破，而逃往潢川之敌第二师、第十二师尚未遭受创伤，方面军总部决定围点打援，对商城仍然采取围而不取的方针，诱敌援兵，寻机在商潢公路附近运动歼灭来援之敌。北面固始之敌戴民权第四十五师兵力少、装备差，且屡遭红军打击，该师出援商城的可能性极小，敌援商城的力量主要来自潢川方向。据此，总部决定，以地方武装监视固始之敌；以红军一个团抵近潢川诱敌，红军大部队则隐蔽集结于商潢公路两侧。

敌人果然中计。

一月底，敌出动第二师、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共十七个团，沿商潢公路东进。方面军主力连夜冒雪行军，集结于杜甫店地区，抢筑工事，布好阵地，准备迎敌。我们手枪营在黄安战役中略有伤亡，但建制是完整的，战后兵员和武器都得到了补充，仅我们二连就补充了十二名新战士。这十二名新战士都是黄安人。我们大别山区有句俗话：近亲不如远亲，远亲不如近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大别山的人是很看重乡情的。我当时想，我是一连之长，连队的战士有麻城的，有黄陂的，有黄冈的，还有皖西的，对黄安籍战士，我不仅不能有丝毫的特殊，还应该更加严格要求。我参加红军时，我的指导员詹才芳就警告过我，不要以为自己是黄安人，是指导员的乡亲，就可以放松要求自己。指导员不认乡亲，只看战斗表现。我把这十二个新战士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讲，黄安是革命的黄安，身为黄安人，只能英勇作战，绝不能贪生怕死。我当时是很严肃的，并且说：“谁要是战场上筛糠，给黄安人丢脸，就算我秦某认乡亲，它也不认乡亲！”我边说边拍了拍腰间的驳壳枪。

我这一番话，把那十二个新战士震住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好样的，在以后的战斗中，没有一个装孬，先后都牺牲在战场上。

二月一日上午，我军与敌第二师交火。该师装备好，战斗力强，向我军阵地数次猛攻，双方激战了好几个小时。下午，我十一师、十二师从左侧迂回，抵刘寨包围了敌第二师和十二师两个指挥部，并抢占了傅流店渡口，切断了右路敌人的后路，迫敌军心动摇，全线慌乱。我正面和左翼部队乘势对敌发起猛攻。数万敌人向北溃退。

我军追至潢川城郊，歼敌四千余，缴枪两千多支。

商城守敌见援军溃逃，即弃城突围，逃往麻城。我军于二月三日夜不战而克商城，至此，商潢战役胜利结束。

黄安、商潢两大战役，在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很大的不安，急催在皖西“围剿”的陈调元部，进占六安、苏家埠和青山店地区，这股敌人有十二个团，以苏家埠为枢纽，从六安城至霍山城沿河东岸，企图阻止红军向东发展。

为了打击皖西之敌，向东扩大根据地，方面军总部决定，留红十二师在商潢地区牵制豫东南之敌，红十师、十一师两个师东进，发动苏家埠战役。

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方面军首长决定此战役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我主力分割包围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之敌；第二步，围困苏家埠、韩摆渡，诱打六安、霍山来援之敌；第三步，解放苏家埠、韩摆渡，迫使守敌全

部投降。

第一步围困计划于三月二十一日晚开始实施，很快便完成了。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被我三个主力师团团围住，固守待援。

这时候正是初春季节，南方春雨绵绵。好在这一带是丘陵砂石红土地，雨后道路不算泥泞。青山店等三个据点寨高壕深、工事坚固，强攻难以取胜，方面军首长决定围困守敌，吸引六、霍敌人出援。霍山敌兵较少，出援可能性要小一些，所以以少数兵力布于霍山以南监视该城敌人，而以红十一师的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布于六安至韩摆渡、苏家埠之间的平岗头、樊通桥一线，准备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打击六安方向出援之敌。

红军时代，由于装备差、兵力弱，机械化程度更谈不上，所以，我们同敌人作战，取胜与否，很大程度要取决于指挥员的智慧和决心，靠指战员的英勇善战。战术成份所占比例很大。在苏家埠战役之前，我们也创造过不少围城打援的战例，但像苏家埠战役这样，周困敌人之多、历时之长、手段之硬、效果之佳，都是红军史上少见的，堪称是我军当时成功战役的典范。

我军不仅把敌人团团围住，切断其粮、水、弹药等一切来源，而且昼夜抢筑工事，挖了许多交通壕、掩体、盖沟、碉堡等繁杂浩大的工事体系，里三层、外三层，层层相连，层层相接。还有许多盖沟，为防止敌人飞机轰炸，从地下掏洞，弯弯曲曲，向城内延伸。

工事挖得实在很精彩。

更精彩的是，我们围住敌人，又不动手打，组织官兵蹲在工事里学文化，还开展娱乐活动，又是唱又是笑。这些声音传到敌人的据点里，对他们的刺激很大。他们困在里面，坐吃山空，粮食没有，水也不多，由每天三顿干饭，变成每天一干二稀，再变成每天一干一稀，后来干脆每天只吃两顿稀饭，而且稀饭越来越稀。

我们只要开饭，就要大声嚷嚷，“哎呀，这馍馍蒸这么大，怎么吃得完啦！”，“怎么又吃干饭啦，撑得上火啦！”我们的战士也能咋唬，这一咋唬，据点里敌人的日子更难熬，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吃，听着我们唱，口水直往肚里流，一点办法也没有。

困的时间一长，敌人的飞机就来了，也落下很多笑柄。飞高了，投不准，飞低了，又怕我们机枪打。慌里慌张投了一点东西，又大部分落在我们的阵地上。

我们的战士开玩笑说：“国民党也有表现好的时候，该发个电报表扬老蒋一下，花钱雇我们打他，还管吃管喝，真不赖。”

我记得，有一天徐向前总指挥从他工作的那间草房里出来，很疲倦的样子，到院子里活动身体，见我也在院子里，就跟我聊了起来，问了问部队的情绪。我跟总指挥诉苦说，在手枪营，别的都好，就是打仗的时候老轮不上，外面打得热火朝天，我们老是在这儿站岗，战士们有想法。

徐总指挥很惊讶，说：“怎么轮不上呢，黄安战役你们不是上了吗？我手里总得有只硬拳头，重要的时刻还是你们上呵！”

我说：“重要的时刻，也往往是最后时刻，我们一上，战役就快结束了。”

徐总指挥笑了，说：“嫌不过瘾啊？”想了想，又说：“秦基伟，给你个机会，你嗓门大，再挑几个嗓门大的，做几只洋铁皮喇叭，给我到前沿喊话去！”

一听这话，我很高兴，又问了一句：“到了前沿，可以开火吗？”

徐总指挥说：“叫你去喊话，就是攻心，一般不要开火。”他踱了两步，像是运了一口气，又抑扬顿挫地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你明白

吗？”

我回答说：“明白！”

我那时虽然不懂古代兵法，但徐总指挥说的那段话的意思还是知道的。通俗地说，就是开展政治攻势呗。

按照徐总指挥的指示，我们从政治部领来了传单，我上过一年学，识得几个大字，连队还有几个识字的，凑在一起，句子念得囫圇了，于是到前沿扯起喉咙喊起来：

老乡老乡，不要打枪。

本是穷人，理应反蒋。

为蒋卖命，为的哪桩。

上有父母，下有儿郎。

一年到头，难见妻房。

长官待你，何处一样。

他们洋面，鱼肉鸡汤。

你们吃糠，树皮啃光。

更有兄弟，饿死床上。

飞机运粮，有啥指望。

红军围城，铁墙一样。

起先，我们到前沿喊话，还有臭硬的国民党军官命令士兵开枪，并且打坏了我们的一个土喇叭，三排的一个副班长差点儿负伤。我于是召集了几个枪法比较好的战士，这边一喊话，那边就瞄准，据点里哪里有火光，就往哪里打，

专打敌射手，一打一个准。打完之后又喊。并且加了新词

儿：

红军喊话，不许开枪。

谁敢冒犯，没好下场。

你打一下，还你三枪。

弹无虚发，去见阎王。

老乡老乡，快快交枪。

放下武器，红军有赏。

若不交枪，困饿死光。

来当红军，前途明亮。

愿回家乡，发给光洋。

这些阵前喊话，结合神枪狙击，既能打动人心，又有很大的威慑力，对瓦解敌人起了较大的作用。

我刚刚参加红军时候的连队指导员詹才芳同志，当时

在三十团当政委。他后来对我讲，有一天，他正在前沿同

战士们共进午餐，忽然听到对面吵吵嚷嚷。抬头一看，原来是几个国民党士兵听到红军阵地喊开饭，坚持不住了，冒着危险钻出据点来讨吃的，哀求红军战士不要开枪。十师师长王宏坤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叫战士去传话：

“我们不打枪，过来给你们饭吃。”果然就有几个人，放下枪，连滚带爬跑

过来，当真大吃一顿。据点里其他敌人一看，不仅没挨打，还有饭吃，于是都往红军阵地跑。有的士兵干脆早、中、晚三餐都赖在我们的阵地上，有情况再回据点。一旦打起来，保证枪口朝天放。

两军对垒，跑到对方阵地上赖饭吃，这也算是战争史上的一桩奇闻。

那次战役，我们围得轻松。但上面就不同了，徐总指挥他们很紧张。

苏家埠被围，就好比一把钩子挂在蒋介石的身上，要是一把扯下来，他猛疼一阵也就过去了。可我们偏偏不扯断，就那么挂着他的肉，时不时地扯一下，让他解不开，挣不脱，疼不完。四月下旬，蒋介石委任国民党军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第七师、十二师、五十五师、五十七师等部共十五个团两万余人的兵力，从合肥老巢出动，分两路向西南扑来，为苏家埠、韩摆渡被困之敌增援解围。那压力是很大的，皖西本身就有很多敌人，我们之所以围而不打，就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这回敌人又来了那么多，气势汹汹的，张国焘一看不对劲，都不想打了。还是徐总冷静，有大将风度，分析了利弊，认为敌人虽多，但大部都曾遭过我军打击，士气不振。而且，敌远道而来，疲惫不堪。而红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兵力虽少，胜敌一筹。皖西又多为丘陵地带，便于发挥红军野战、近战长处。徐总的意见，得到了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支持，张国焘也只好同意。

实践证明，这个决心是正确的。

为了迎敌，方面军总部调整了部署：以红七十三师于樊通桥以东地区迂回包抄；七十三师一个营和六安独立团在陡拔河以东佯作抵抗，诱敌深入，红十师第三十团和十一师三十二团及地方武装担任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的任务。

五月二日，敌先头部队第七师十九旅，冒险冲过陡拔河，向红七十三师阵地猛扑。我军发起反击，敌十九旅大部被歼，后续部队急忙抢占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顽抗。我军两翼部队又将敌包围，歼敌两万余，活捉敌总指挥厉式鼎。

同日，苏家埠、韩摆渡守敌以为外援来到，数次突围，均被我军打退。敌援军被消灭后，我红十师等围困部队对苏家埠、韩摆渡之敌发起总攻。徐向前总指挥亲率直属部队参战，浩浩荡荡杀向苏家埠。苏家埠和韩摆渡之敌外无援兵，内无粮弹，在红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于五月八日全部缴械投降。

在整个苏家埠战役中，我们手枪营二连毙敌七十余人，俘敌一百零二人，缴获长短枪四百余支。

说起苏家埠战役，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比较深。国民党军队到底历史长些，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投降也讲究个礼节。缴枪的时候，还举行个投降仪式，在大广场上把枪炮摆得整整齐齐，列队欢迎我们，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前些年，有个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反映苏家埠战役，里面出现了我的镜头，还很醒目，子女们都问我，要我谈谈苏家埠战役。

我看了这部电视剧后，也有一点感想。说起苏家埠战役，我确实参加了，打得还不错。可那时候，有多少部队参加打啊，有围困的，有诱敌的，有打援的，还有地方武装。我才是个连长，能起多大作用谈不上！

苏家埠战役之后，红四方面军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属红二十五军建制；留皖西活动。当时，中央根据地有个少共国际师，红四方面军也模仿中央根据地，成立了一个少共国际团，

主要是手枪营升格而成，补充了教导团的部分兵力，陆续吸收了一些十多岁的少年积极分子。团的架子，营的结构，五个连直接归团领导。

不久，又发动了潢光战役。

就在我们进行苏家埠战役时，国民党军第二十路军张钦部乘我军无暇他顾，疾进南犯，进占鄂豫皖根据地南部的潢川县，在双柳树、仁和集地区修筑工事据守，并准备继续向前推进。

为了歼灭进犯之敌，恢复潢川、光山南部根据地，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潢光战役。

这次战役从六月十二日开始，我们少共国际团配合七十三师进攻仁和集。由于战斗发起突然，敌人的防御体系被迅速割裂，我军各师进展都很神速，机动歼敌运用自如，仅五天时间，战役就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围剿”军八个团以及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七千多支，收复并扩大了潢光南部根据地。

血溅陡坡

由于我军连续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并夺取了长期被国民党占据的黄安和商城，使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地区连成一片，根据地在巩固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出现了极盛局面，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东迄津浦铁路，西达平汉铁路，北临淮河、南濒长江，地处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与国民党南京政权隔江相峙，既惊惧南京，又威逼武汉，被国民党视为心头之患。为了实现“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计划，蒋介石亲抵武汉，将“围剿”军组成左、中、右三路，以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万人，另有四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显然，在国民党新的“围剿”计划中，我们鄂豫皖根据地首当其冲，面对这种形势，应该收紧力量，谨慎迎敌才是，而且，我军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连续作战了七八个月，人困马乏，亟待休整。

但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和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却不顾部队实际情况，严令部队西出平汉路，进逼罗山，向信阳、广水段出击，而后伺机南下，进逼武汉。

不得已，方面军首长只好强打精神带着我们南下，表面上情绪还是满高的，一边急行军，还一边做动员：“攻下麻城，攻下宋埠，攻下黄陂，打到武汉去！”

那正是伏天，骄阳似火，南方的水稻田，太阳一晒，像开水锅似的蒸人，不少指挥员患烂脚病，忍着疼痛，拖着红肿的脚强行军。

以后，徐向前同志曾经感慨地说过：“部队过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叫南下就南下，不管多么疲劳困苦都挺得住，没有任何怨言。”

麻城为鄂东重镇，是敌人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县城北面的长岭岗、黄土岗、福田河；南面的中驿、宋埠、岐亭、新洲等镇构成点线，是插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内的一个顽固堡垒。敌人死守麻城，是出于蒋介石的一个重要战略考虑。即：一方面可以牵制红军主力，另一方面，又可以东西相援，配合进攻作战。为此，蒋介石下达了固守麻城，拖住红军的命令。

守敌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将所辖的三十、三十一师及一个特务旅分驻于麻城、宋埠和黄陂等地，遇与红军作战可以互相支援，但其重点是加强麻城防守，并筹集了充足的粮食和弹药，作坚守准备。由此可以看出，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围攻麻城”的决定，实际上是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就在我军陷入麻城之战不得脱身之际，蒋介石得以乘机从从容容地部署和指挥大军从三面向我根据地逼近。

我着重谈谈“围攻麻城”中的陡坡山战斗。

陡坡山是麻城到宋埠和岐亭之间的小山包，四周都是水稻田，陡坡山突兀地耸起，顶底高差为几十公尺。视野开阔，易守难攻。

守敌原是一股土匪，十分凶顽，后被国民党军招安，整编为三十一师的一个团，在山上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成为麻城西南角的一个重要据点。

七月七日至八日，我军相继占领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梅花塢、邓家竹园等地。十一师路过此处，王树声同志认为有必要把陡坡山打下来，于是派了一个团去打，但他当时没估计到敌人会有那么大的兵力，再加上敌工事诡奇，冲锋地段又都是水田，部队前进受到很大限制。

这个团去打了一阵，久攻不下，伤亡一百多撤了下来。

王树声同志本来就没把陡坡山放在眼里，一听说派去一个团居然没攻下，气得暴跳如雷，二话不说，又派一个团去打。结果，照样没打下，伤亡更多。

当时，十一师的任务是围攻麻城，没有让他们打陡坡山。王树声同志虽然窝了一肚子火，但也不敢恋战，即率部队围攻麻城去了。此时参加围城的有王宏坤的十师，王树声的十一师，陈赓的十二师。还有一些地方武装。

麻城虽然陷入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但守敌凭借城坚壕深，固守不出。我军屡攻未克。遂留下黄安独立师继续监视麻城守敌。主力向西南出击，占领仓子埠，进逼黄陂县城。武汉为之震动。敌人急忙调兵遣将，企图在宋埠、岐亭、祁家湾之间地区阻止我军前进。

在徐向前、陈昌浩的指挥下，我军突然回师反击，出其不意地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于七月二十六日在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线，重创敌三十师两个旅，歼敌一个团，其余敌人溃退至宋埠、岐亭等据点。

此时，敌我重兵都集中在麻城西北方向上，陡坡山的问题再一次从次要地位上升到重要地位。

经过一番侦察，徐向前总指挥定下决心要拿下陡坡山。仍由十一师担任主攻，我们少共国际团协助。

战斗任务明确后，我们将陡坡山四面围住，十一师打三面，我们打一面。陡坡山有东西两个门，十一师负责南、西、北三面，这三面中，只有一个西门。

我们少共国际团负责打东门。东门方面又以我们二连为第一梯队。团长跟着我们。围攻麻城时缴获了两门 92 平射炮，徐总指挥把它调过来支援我们。

仗打得非常残酷，冲锋地段全是开阔地，完全暴露在敌火力之下。我们武器差，压不住敌人火力。没有什么高招，勇敢加速度，一股热血往前冲。我和副连长带一个排率先出击，指导员带一个排在翼侧吸引敌人火力。

还不错，我们一次到位，虽说倒下了几个，但三分之二都冲到了工事下面，钻进了射击死角，当时就搭起了人梯。

这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肉搏战，谁离死神都只有一步。这时候，别的也顾不上想了，只想到连长是连队的第一个，顾不上喊也顾不上动员，人梯搭上去后，我第一个攀了上去。我这么一上，副连长和排长，还有几个党员都上来了。

工事虽然坚固，但并不高，没等敌人回过神来，我已攀到了豁口。我的手里举着顶上火的驳壳枪，眼见一个敌人瞄着我，我刚一出枪，叭的一声，他先打响了，一枪打在我的右胳膊上，我的盒子枪也打掉了，当即从豁口上滚了下来。我还想上去，却被通信员扑上来按在了。

那一仗，打得好苦哇！虽然最终把陡坡山打下来了，并歼敌一个团，但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单我们二连，我负了伤，副连长牺牲了。三个排长阵亡了两个，随本连行动的团长也牺牲了。

团长临死的时候指定我为他的代理人，上级也有让我当团长的意思，但因为我需要养伤，改提我们二连的指导员郭世进为团长。郭是老指导员了，我当排长时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但他军事素质不行，不会组织指挥打仗，意志也比较薄弱，以后开小差脱离了部队。

这一仗打完，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全面铺开了。形势顿时恶化。蒋介石的精锐之师陈继承纵队、卫立煌纵队快速开进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见势不好，这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不得不在八月十日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疲惫不堪的红军昼夜兼程，回师根据地中心地区。

我负的伤虽然不是要害部位，但很致命，动脉被打断了。多亏了我的通信员，他好象很有经验，用白布把我的胳膊捆得完全失去了知觉，到医院根本解不开，手插不进去，只好用剪刀剪。要不是这么捆，动脉流血，几分钟就没命了。

以后的七里坪战斗，我未能直接参加。战后听说，打得十分悲壮。我军与敌反复白刃格斗，甚至昼夜厮杀，双方血流成河。八月十六日傍晚，红军正面突破敌人阵地，向前推进，敌第二师全线崩溃，师指挥所也被占领。此时若能继续前进接近陈继承司令部，敌有全线崩溃之可能。可惜我军兵力不足，四个主力师全部投入战斗，后继突击力量缺乏，力不从心，不得不停止攻击。这场战斗，我军虽然浴血苦战，但由于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所以没能使整个战局发生根本变化，也未能扭转从反“围剿”开始以来的被动局面。

第三章转战鄂陕川

追赶队伍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敌人紫迫不放，我军被动迎战，又进行了胡山寨战斗、新集战斗，虽然给敌以很大杀伤，但终不能扭转大局，鄂东北、豫东南地区最终为敌人控制。枣阳、新集战斗之后，回鄂豫皖的希望几乎彻底破灭，我军不得已转向皖西。

自从陡坡山战斗之后，我就成了一名伤员，跟随医院行动。部队老是打不了翻身仗，医院的困难可想而知。要药没药，要医缺医，轻伤拖成了重伤，重伤死了好多。我的伤，子弹是从胳膊内侧钻进去的，从胳膊外侧穿出来。由于缺药，卫生条件差，伤口已经感染，烂出臭味，疼得钻心。枣阳、新集一仗下来，伤亡很大，硬是把少共国际团活活拆散了，补充到其他部队去，主力要继续西进，走的路线全是白区。医院里伤员又增加了一大堆，根本没法带，只有动员疏散，藏到老百姓家里养伤。

我记得是一个下午，有两个人到我住的老乡家里看我，问这问那，很关心。他们没说主力要走，也没说要我做什么，就是让我好好养伤。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两个银元宝。

他们一走，我就犯开了嘀咕。

这段时间仗打得不顺，卫立煌纵队、陈继承纵队紧紧咬住我军主力，皖西的徐庭瑶也赶过来对我军夹击。这些情况我是知道的。我分析，主力肯定要走。而且，不可能把伤员带走。主力要快速摆脱敌人纠缠，必须轻装，轻重伤员窝在一起谁也走不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想到这里，我就警觉了。下午来的那两个同志，分明是代表组织向我告别的，虽然没有明说，但给我那两块银元宝就能说明问题。

一个下午，我坐卧不安。

我知道上级的难处，留下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可不管

怎么说，我也不甘心被丢下。

我已经是红军了，而且入了党，当了连长，可以说，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红军了。现在不要我，让我到哪里去

呢？这里全是白区，群众还不是很觉悟，把我们留在老百姓家里，要药没药，凶多吉少。敌人来了只好束手就擒。再说就算安全地养好伤，下一步又该往哪里去呢？

我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黯神，想到最后，我抱定了一

个主意，追上去，跟上部队！虽然胳膊负了伤，但腿是好的，照样可以行军。

部队不是要轻装吗？那好，我什么也不要。

不是怕伤员拖累吗？那好，你们前面走，我后面走，你们该打照打，该跑照跑，我能跟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什么时候走不动了，就地倒下，也算革命到头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留下。

我的推测没错。太阳落山，天色暗下来之后，村子里有些动静。我从门缝往外看，医院晾晒的绷带已经收了，骡马驮子都披挂就绪，一些红军战士正在挖土填行军灶，还有些同志，把那些缴获的重火器拆散，能毁的毁，不能毁的埋掉。看这阵势，主力马上就要离开。

那当儿，许多伤员根本就不知道，有的在睡觉，有的躺在门板上瞪着大眼看屋顶。我心里想，对不起了，同志们，我没按组织的要求做，你们好好养伤吧，革命胜利那一天咱们再见。

主力前脚刚走，我后脚就离开了村庄。

这一路，可真是心酸。

刚开始，不能跟紧了，怕让部队发现了撵回去。走了一段路程，估计不至于往回撵了，就往前追。追上了也不敢走大路，大路给主力走，部队成建制有单位，不能乱插，插进去了也要挨刮。只能走在一边，逢山过山，逢水涉水，有路没路，自己想办法。到了部队宿营吃饭，我就藏在一边等，等同志们吃完了，我就跑去帮炊事班收锅，顺便捞两口吃的。那时候生活差，同志们都吃不饱，能剩下多少呢？饥一顿饱一顿，完全没保障。

到了河南境内，我的伤口严重化脓，散发出很强的臭味，但是不疼，烂得麻木了。我想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便找到总部医院，医院的同志也很为难，但最后还是说，既然追上来了，那就跟着一路走吧。他们给我洗了洗伤口，上了点药，我这才觉得又回到了家了，心里踏实了许多。

可是不久，情况又起了变化。

一九三二年十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路艰苦征战，从敌人的围迫堵截中杀开了一条血路，沿西北方向往河南西部进发。沿途人烟稀少，荆棘丛生，田园荒芜，满目苍凉。当地居民大多迁居外逃。部队找不到吃的。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饥。

此时已是初冬季节，干部战士穿着单薄，衣衫褴褛，真是饥寒交迫。

十一月上旬，我们到达鄂、陕边界的漫川关地区，杨虎城的三个团已在这里布下阵势挡住了去路。胡宗南的两个旅也由鄂西赶到漫川关东南一线，占据了有利地形。敌人四十四师在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线构筑了工事，六十五师和五十一师也尾追至漫川关以东大沟口。第四十二师则经漫川关以北的窑子向南压过来。也就是说，我军一到漫川关，即陷入了重围。敌人共动用五个师加三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漫川关以东十余里长的悬崖峡谷之中。

当时的情形是十分严峻的，围绕集中突围还是化整为零，徐向前总指挥和张国焘又费了一番口舌，陈昌浩政委支持了徐总，这才避免了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

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指挥下，部队经一夜苦战，于天亮突出了包围圈，如果天亮前还没突围出来，红四方面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自从麻城围而不克之后，我军状况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老被敌人东追西击，走到哪里，就被围在哪里。红军疲于奔命，今天突围，明天突围，后天还是突围。打一仗，减少一大批战斗成员；突围一次，丢下一大批伤员。什么样的军队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的方面讲，当然是王明、张国焘“左”倾错误路线所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这样被动，主要是因为离开了根据地，没有人民支援，没有了情报，没有了地方武装的配合，没有了担架，没有了物资保障。无后方作战，真是寸步难行，处处挨打。这也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军队是鱼，人民是水，鱼离开水，只有死路一条。

漫川关一仗，虽然突围出来了，可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增加了一大批伤员。可是部队还要走，没有个家，就只好流动作战，不知道哪里能安住脚，在战斗中寻找根据地。

部队一行动，伤员还是没法带，我又差点第二次被丢下了。

这一次，医院里把我们十个人安排在一个山沟小庙里，也是给钱，说是

让我们养伤。我是老伤员了，当然知道给钱是什么意思。

这一回，我干脆去找部队领导，向他们表态：我秦基伟当初参加红军，就是抱定一个信念，要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死了算。现在我还有口气，就不算革命到底。眼下部队很困难，我也知道。但我伤的是手不是腿，可以跟部队走，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绝不会成为负担。

领导见我说得很坚决，想了一下，同意了。

因为我伤的是右手，吃饭、解手都有些困难，组织上派了个小鬼跟着我，沿途在生活上料理一下。记得这个小鬼有十四五岁，黑黑的，瘦瘦的，背了个洋瓷盆。这上路上，我们吃饭用这个盆，喝水用这盆，洗脸洗脚也用这个盆。这个小鬼话不多，可是心挺细，一路上帮了我大忙。但由于在一起时间短，到四川后就分手了，所以没能记住他的名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从陕西到四川，这一路上我胳膊没换过药，干睁着大眼看着它一点点地烂下去，硬是没一点办法。行军休息和宿营的时候，我解开绷带，任脓血往下淌，那个臭味，连我自己都受不了。然后，还是用那条绷带，再把伤口捆结实。这样对付，焉有不烂之理？我的右小臂烂了半边，如果不是到四川，中草药多，这条胳膊恐怕早没了。

立足于巴山蜀水

红四方面军从漫川关突围出来后，总部最早的设想是出秦岭，据汉中。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旬，我军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平原，跟杨虎城和赵寿山的部队又打了几仗。于十二月十一日进入汉中平原的城固地区。因为那一带正闹饥荒，回旋余地小，不好搞根据地，总部又决定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

大巴山位于陕西和四川交界处，海拔两千多米，山高路险。是横卧在我们南下入川途中的拦路虎。

过大巴山的时候正是严冬，大雪封山，我们身上穿的，别说棉衣，单衣还是破的，许多人还穿着草鞋、有的甚至打赤脚。

过山之前，各部队领导动员，每人背一捆稻草，晚上宿营就靠它，垫是它，盖也是它，还可以缠在脚上当鞋穿，一可以保暖，二可以防滑。

据当地人讲，翻越大巴山，上七十，中七十，下七十，合计要走二百一十里路。尤其是山顶上的七十里路，寒风像刀子，雪打在脸上当当地响。在山上宿营一夜，人挤人搂在一起，白天还稍微好些，半夜里狂雪飞舞，人都成了雪人。天亮上路，一清点人数，许多人没有了。扒开雪，人都在里面。已经硬了。有的同志不明就里，看见一个角落里蹲的有人，以为可以避风，也想去歇歇脚。结果，蹲在那里就起不来了，用不了多久就冻僵了。那个艰苦，如今想起来，心都寒。那样严寒的冬天，穿着单衣、草鞋，肚子又是空的，真不知道当时怎么过来的。

回过头来想，那段时期，红四方面军虽然被敌人反反复复包围追击，厮杀了一次又一次，可是，这支军队硬是挺过来了，没有被打垮，也没有被打散，照样还能走，照样还能打，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越是残酷的环境，越能锻炼人，越是从苦难中熬炼出来的军队，越是过硬。一九三二年底，我们终于越过了巴山天险。

一九三三年元旦，徐向前总指挥随十二师先头部队进入四川通江，不久七十三师攻占了甫江，不久又进占巴中。这样，我军在川北终于有了落脚之地，从此，进入创建川陕根据地时代。

通江县城是川北的一座小城，人口不多，只有几百户人家。红军的到来，使这个偏僻的山区小县空前热闹起来。从地理上看，小县城一面傍水，三面临山。公共设施不多，只有一座小小的公园，我军进驻后将其命名为“列宁”公园，张国焘就在列宁公园里办公。红四方面军总部机关则设在一座天主教堂里。

有了根据地之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得到了改善，我住的医院设在通江苦草坝（今通江县北永安乡）的山沟里。我在这所医院里住了八九个星期，中间得了个伤寒病，头发全掉光了：好在四川中草药多，我记得，当时用的是一只大土碗，每天早中晚各一次，喝一大碗汤药。就靠那只大土碗，伤寒治好了，头发长起来了，伤口也慢慢愈合了。

通江本来是一个县，但我军进占通（江）、南（江）、巴（中）以后，成立了川陕省委和省军区。为了方便工作，扩大根据地，又把通江分成了几个小县，各县成立了县指挥部。

我出院后，组织上根据我原先的作战表现和地方缺乏军事人才的实际情况，把我分配到红江县（即通江县平溪区），当县的指挥长，参加县委，除了指挥一个县独立团以外，还负责本县的其它武装。

原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同志，搞不清犯了什么错误，听说是在小河会议上提了张国焘的意见，被降职到我们那个县当县委书记。

我们入川之前，四川打得正热闹。一心独霸四川的刘湘，同刘文辉展开争夺成都的大混战，全省大小军阀多被卷入。我们在大巴山同风雪搏斗之时，“二刘之战”再次爆发，以川北为大本营的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帮凶刘湘，倾其主力30个团西出成都参战，后方仅有十几个团防守。红军长驱直入通南巴，就是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直到我军在川北扎了根，军阀们仍然腾不出手来打我们。同时，他们也没把红军放在眼里，认为我们不过是股流寇，等他们打出高低分清座次之后，再回过头来收拾也不迟。

蒋介石眼看红军入川，且无人过问，又气又急，但也是干急无汗。四川军阀本来就跟蒋介石有矛盾，如今老大老二都没确定，正打得大汗淋漓，哪有功夫理睬老蒋哟？惹急眼了，他们敢连老蒋一块打。所以蒋介石的几支部队，追到四川边上，都退了回去。未经允许，蒋介石的军队也进不了川。

打一次电话上一堂课

一九三三年，经蒋介石多方努力再加上内部调整调解，四川军阀之间的火并终于暂告段落，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向红四方面军发起了“三路围攻”。

在这期间，为了适应战斗需要，总部把一些地方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总部警卫团，由我任团长，负责方面军总部和首长的警卫工作。

警卫团一成立，便立即投入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的作战。这次反“三路围攻”战斗，是在徐向前总指挥的领导下进行的。我军采取“收复阵地，积极防御”的方针，运用“诱敌深入”、“节节抗击”等战术，历时四个月，歼敌一万四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总部警卫团。除了警卫工作以外，还要负责总部的一些勤杂事物。司政供各部门的首长都能调遣警卫团，尤其是后勤供给部门，事情最多。当时的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使用警卫团十分频繁。我在他手下，曾经闹过一个笑话。

那是一天上午，我看见团部外面有几个红军战士拿着线绳子在那里忙忙碌碌，这里拴一下，那里挂一下。也不知道忙什么，所以没过问。

停了一会，这几个战士一直把线绳子牵到我住的那间屋子里，其中一个战士递给我一样东西，两头弯弯的，黑黑的，光光的，手榴弹般大小。我问这是什么东西，一个战士说，你放到耳朵边上就知道了。

按他说的，我把一头放到耳边，这下可了不得。吓了一跳。这黑咕隆咚的玩艺里怎么会有人说话呀？

我以为这几个战士变戏法开我玩笑，板下脸来要训人。

他们说：“秦团长你先别发火，这是电话，郑部长正在里面跟你说话哩。”

我将信将疑，但又不敢马虎，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那么大个首长，要是真在里面说话，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疑疑惑惑地又把那东西放在耳边，听了一会，可不还真是郑部长在里面说话。音是听见了，话却没听清，连听带猜，好象是让我带人执行一项任务。

郑部长讲完后还问我：“明白了吗？”

我只好回答“明白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明白。

放下那玩艺。我就吆喝警卫员备马。

在我的经历中，领导交代任务，从来都是面对面，说得细，听得清，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再问。这下倒好，郑部长钻到这个黑魆魆的玩艺里，跟我耍起把戏来了。那里面吱吱啦啦的，杂音大，再加上他那一口河南侉腔，我压根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况且，他说要带部队执行任务，这么大的事，怎么光凭那玩艺说了就算呢？万一是特务作法糊弄我，岂不是要上大当？不行，得去见郑部长，当面受领任务。

三十里路，我带着警卫班骑马飞奔，一会就到了通江县城方面军总部，找到郑义斋部长。他一见到我，很惊奇的样子，说：“咦，你咋又来了，不是让你去福阳坝吗！”我说：“我得听你当面交代”。

他说：“我不是在电话里跟你说清了吗？”

我说：“我没听明白，再说我对那玩艺也信不过。”

郑部长听了，哈哈大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笑完之后对我说：“那不是玩艺，是电话。你现在是团长了，为了联系方便，团长都安了电话。以后

下通知报情况，大多要用电话，你要习惯。”

他那样一笑，我心里好难受。这件事虽然是个笑话，却使我在思想上受到了震动，引起了思考。我是农民出身，家乡又偏僻，没见过世面，这本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但如今我是红军的团长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子，只知道甩帽子，挥大刀片子喊冲锋。肩上的责任更大了，就必须学习，只有学习，才能适应新的职责。现在学文化没条件，但是可以学别的，学习新的指挥技术。不加强学习，闹笑话事小，贻误了战机纰漏可就捅大了。

这以后，再去总部，我就有意识地往参谋处跑，去看新装备，学新武器，看地图，学地形学。一句话，对新鲜的东西都比较感兴趣。

在川北的几起几落

一九三三年夏，川北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红四方面军将四个师扩编成第四、九、三十、三十一共四个军，后又将川东游击纵队改编为三十三军。四方面军共辖五个军。

一九三四年初，我由总部警卫团调到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四团当团长，这个团是有名的“夜老虎”团，在四川的悬崖陡壁上作战很有神通。由警卫团团调到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团队当团长，可以说是对我的信任和重用。

可是，我调来没多长时间，一仗都还没打过，又把我调走了。这次是张国焘亲自接见，搞得我很紧张。

木门会议之后，原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此时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仍然是主席。这么大个人物亲自跟一个小团长谈话，非同小可。表面上看，张国焘还是很和蔼的，问这问那，家庭状况，参军后的经历，对党的认识等等。

实际上，这就是审查。那时候，四川又在肃反，不知道是谁又检举了我。

张国焘找我谈完话，我就调出了二七四团，到方面军总部当参谋。他也没说我犯了什么毛病，为什么把我的团长拿下了，我也没想到要去问个明白。干革命不在乎当官不当官。但较起真来，当参谋和当团长当然大不一样。红军在通南巴地区发展得相当快，部队建设很有点正规派头，当团长的时候，身边有一大帮人，有一个专门文书，有警卫员，有公务员。团部有一个骑兵排，团长一出门，就有一个班跟着。每人三大件，一把盒子枪，一支马枪，一把大刀，盒子枪和大刀的柄上都系着红绸子，漂亮得扎眼。我在前面策马，后面就有十余骑扬鞭，那马都是钉了铁掌的，踏在四川鹅卵石的街面上，嗒嗒嗒，嗒嗒嗒，火星子乱迸，那真叫八面威风。

可是一到总部当参谋，别说警卫员，连马都没有了，背包得自己扛。

红军时期，好就好在能上能下。我参加红军的时期压根儿就没想到过什么官不官的。我没有怨言，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接到命令，我二话没说，就背起背包报到去了。

在总部我先后当过侦察、通讯、训练、作战、管理参谋，受到的锻炼是全面的，使我基本上掌握了司令部的全部业务。

那时打仗哪像现在这么方便，那时候的电话线就是铁丝，临时拖一条，中间顶多架根杆子。我们活动地域是山林地带，碰上雨天，又是水，又是泥，铁丝从泥水里拖过，效果差极了。

这时候，就全靠我们这些参谋了，背个电话机，在火线与指挥所之间建立中转站，上传下达。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实则要求极高。

首先必须有相当的军事素质，常识性的概念、术语、数据、密码、代号等等都要烂熟于心，同时要对整个战局有所了解，才不致传出错误。

其次必须有一定的语言辨别能力，指挥员来自五湖四海，说起话来南腔北调，如果不会辨别口音，就往往会闹出笑话。有些指挥员打仗打急了还往往把骂人的口头语连同口令一起往外放，这就要求我们这些参谋有冷静的头脑，善于在纷乱的传呼中理清思路，掌握到真实的情况。总之，当参谋这一阶段，使我受益匪浅，为我以后的军事指挥生涯，做了比较厚实的技术准备。

不久，总部成立了一个妇女独立营。我记得当时的营长是个叫苏风的女

同志，政委是曾广澜。参谋部派我去当过一段时间的军事教官。

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以后，总部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我又被调去当师长。

到了一九三五年，过草地之前，部队减员大，该补充的都补充到部队了，补充师便解散了。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是个知识分子，不大懂军事，他对我指挥作战、管理部队那一套比较赏识，几次要调我。加上总供给部机关庞大，人多事杂，行政管理一直是个薄弱环节，所以待补充师解散，郑部长立即把我调到供给部协助郑部长做行政管理工作，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后勤参谋长。

第四章浴血长征路

雄关漫道

正当我四方面军奋力征战，冲破敌人“川陕合剿”之际，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因王明、李德等人“左”倾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战略转移。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向川黔边的赤水河进军，拟从泸州至宜宾一带渡江北上，并给四方面军发来电报，提出一、四方面军协同作战，要求四方面军“要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方面进攻。”为了摆脱受敌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方面军首长决定我方面军主力向川西北发展，在川康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

三四月份，我军强渡嘉陵江。

从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就开始了。徐向前总指挥带领九军、三十军经北川、墩上、土门，攻占茂县，部队士气高昂，满腔热情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过草地时，总部机关分为两个梯队，总供给部那一摊子好大呵。有机关本部、医院、兵站、妇女独立团等，总共有几千人，编成一个梯队，我当梯队长。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要离开川陕根据地，同一方面军会师究竟是个什么背景，为什么合而又分，南辕北辙，当时对全局方面的情况我不太了解。我记忆比较深的是过草地，来回折腾了三次。我这个梯队长，是很费心血的，要计算路程，一天走多长时间，每人带多少粮，每人每天定量多少，都得心中有数，做出规定。所谓粮食，就是糌粑面，把青稞炒熟，推成面，搁点盐巴，有水就用水泡了吃。没有水就干吃。就这东西，还不能随便吃。分配到个人，自己背，但消耗权不在自己手里，由我统一掌握。休息的时候，互相监督，每人每天二两，绝不能超量。因为当时粮食极度匮乏，如果不这样控制，让战士们放开肚皮吃，有些同志几天就吃完了，剩下的只能等死。就这样互相控制，还照样有超前消费的，被领导知道了就要挨处分。因为超量吃粮，枪毙人的事都是有的。现在听起来未免残忍，可是当时的环境，不这样做不行。爱护部队，保护同志，有时候也需要采取断然措施。这样一来，大家受到震动，都不敢再多吃了，也明白了我们的用心良苦。

由于我们管得细，管得紧，虽然同样吃不饱，但保证了本单位绝大多数同志走过了草地。我管的那一砣，过草地时饿死的不多。

除了饿就是累。人困马乏，加上严寒，许多同志又被夺去了生命。特别是爬雪山的时候，顶着风就像顶着刀子。

第三次过草地，从丹巴至道孚，要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折多山，主峰党岭矗入云霄，终年积雪不化，上面空气稀薄，严重缺氧。当地有首歌谣：党岭山，离天三尺三。雪似刀，风如剑。鹰过此山脱层皮，人过此山难回返。党岭山每天下午都要起风暴。风暴一来，狂雪漫卷。有的同志走着走着，走不动了，看见一个避风的旮旯，往里一蹲，想缓缓劲。谁知就这么一蹲，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又累又饿又冷，来回折腾，今天往北，明天往南，心里也没个支撑。那时候的人，身体非常虚弱，有的一头栽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但另一方面，从那个环境里过来的人，真可以说比钢铁还硬。几十年后，徐向前元帅在总结红四方面军战斗作风时，概括了五个字，即狠、硬、快、猛、活。我尤其认

为四方面军的“硬”是比较突出的，是在特殊的环境里熬炼出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于中国军人意志的锤炼，是任何一个军校也培养不出来的。如今想起这段特殊而又伟大的历史，心里依然感慨不已。

一九三六年十月，经过一番曲折，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又在会宁会师了。

我们到达时，会宁县城已是焕然一新，充满了节日气氛。

两军会师犹如失散多年的兄弟又回到一起了，老战友新同志，有的拥抱。有的热泪满面，场面激动人心。

可是会宁会师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抗日，我党正在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欢迎国民党官。和红军联合抗日”、“国民革命军与抗日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

也就是说，我们要同仇人蒋介石善罢甘休，甚至还要以礼相待。这个弯子，实在不好转，尤其是基层的干部和战士们，一听说要同蒋介石联手抗日，有的当时就愣住了，说了许多难听的话。

我一方面做他们的工作，一方面自己心里也憋气。

维护大局的道理是懂的，就是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记得为这件事我还找了郑义斋部长，抽了他大半包烟。他反复地讲，从大道理讲到小道理，讲得口干舌燥，我就是不吭声，闷头吸烟。

他有些奇怪了，说：“你这个人，平时挺会用脑子的，这次怎么钻进牛角尖里硬是出不来呵？”

我说：“你讲的那些道理，我都跟下面讲过好几遍了，我才不是死脑筋呢。”

他更奇怪了，问：“那你咋老不吭声，像有好大思想问题似的。”

我说：“道理我懂，工作我做，就是心里憋气，下面干部战士冲我骂娘发牢骚，我找谁发去，还不兴到你这里来出口气吗？”

他先是楞了一会，然后咧嘴笑了，说：“哦，原来是这样，你这个办法好。”又说：“其实，我心里也老不痛快，跟你差不多，但咱得做出痛快的样子，不然下面情绪更大。”

那天晚上，我和郑部长一夜没睡：谈了很多，谈工作也谈个人问题，还谈到将来革命成功了，有什么打算。

郑部长说，革命成功了，他要办一所财经学校，培养会计人才。又说：“到时候你也去，帮我招呼管理一摊子。”我说：“郑部长，别老抓我了。革命成功了，赶紧给我找所学校，我要上学了。”他说：“那就等你学完了再去。”

我说学完了也不去，我要回到鄂豫皖搞粮食工作，让乡亲们都吃饱肚子。

“打通国际路线”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了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建立强大的后方基地，争取苏联的支援，中央决定发起宁夏战役，控制河西，接通苏联，这在当时叫做“打通国际路线”。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中央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明确规定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一是向西宁、兰州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的防御，拦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过黄河，攻打宁夏。

月底，我军克服重重困难，一举渡过黄河，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攻打宁夏”的口号鼓舞下，展开英勇进击，先后在双龙寺、打拉池一带消灭马家军的守卫部队。

可是，渡河之后，形势又起了变化，宁夏战役推迟，河西部队要准备单独进攻宁夏，到定远营去取苏联援助的物资，原定主攻宁夏的一方面军则留在河东与敌相持。

十一月上旬，中央军委又提出了《作战新计划》，放弃进攻宁夏，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十一日，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

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以上情况，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上面天天宣传“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红军援助”，那当然鼓舞人心啦。

可是，要走多远，困难多大，后果如何，那只有天知道了。

陈昌浩政委做动员也说得慷慨激昂。“同志们啦，掰着指头算一算，马家军有多少人啦？再掰着指头数一数，我们每个人带了多少子弹啦？一颗子弹消灭一个马家军，还剩多少子弹啦？”

咦，乍一听，他这个算法还挺鼓舞人心的。是啊，我们也有几万人呀，每人少说有十发子弹，那不就消灭他几十万了吗，青海、宁夏两省的马家军加起来也不够消灭呀。我们可以消灭他几次。

可是，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不想对当时的决策者评头论足，只是从一个军人的角度，认为当时的策略是出于对形势估计不足造成的。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当时这几个“知”都是一知半解。合而又分，是兵家大忌；孤军深入，也是兵家大忌。这些忌我们都犯了。

首先是马家军打我们，开始跟他打运动战，打了不少好仗，消灭他不少。到后来就运动不了啦。我们是两条腿，敌人是骑兵，四条腿。我们白天也走，夜里也走，不停地走，拼命地走。敌人夜里舒舒服服地睡个觉，天亮骑上马，仍然是舒舒服服的，一会就把我们追上了。

西北的村子外面都是圩墙，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气还没喘匀，就赶紧在墙上凿洞（射击孔），组织防御。我们紧张得要死，敌人在老远处慢腾腾地看着你，等你忙了一半，他就打来了，于是前功尽弃，又得跑。部队没水喝，没饭吃，被拖得精疲力竭。

过黄河时，我们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粮食，如今向西，沿途人烟稀少，缺

粮少水。大军一过，风卷残云，地里找不到一片菜叶子。奔定远营去，要通过腾格里沙漠。我们进去是秋天，打到冬天。一走起路，尘土飞扬，眉毛胡子都是白的，像下了一层雪霜。无所谓路，往哪里走哪里就是路。以后在军事学院学习，学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看这几个字眼，一下就胡思乱想起来，联想到我们西路军过去的路，那可不是抽象的进一步退两步，在那软巴拉叽的沙地上，步子迈得很大，落实下去就小了，又退回来了。再一个问题是缺子弹。情况远不是像陈昌浩同志说的那样，一颗子弹就能消灭一个马家军，那种可能微乎其微。他是骑兵，运动速度快，不晓得多少子弹才能打中一个，打中了还不一定死，他负伤了还照样拿马刀砍你。

我们渡黄河时还是秋天，穿的都是单衣。到了河西走廊，已是冬天了。西北的冬天，气温相当低。打仗跑起来

一身汗，隐蔽时停下来就是一身冰。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孙子就有告世警言：“军无辎重则亡，无委积则亡，无粮食则亡。”我们当时的处境，不幸恰好被先人言中。

环境实在太险恶了。首先没饭吃，没饭吃的人，劲头还不如饱食的狗。其次没子弹，没子弹的步枪还不如梭标好使。三是无后方，孤军深入，裸体跳舞，无策应，无支援，真是寸步难行。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四方面军迅速向西，总部派红九军进占古浪城，却没料到，红九军行动失利，在古浪遭敌包围。一仗下来，兵力损失达三分

之一，给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利影响。

九军被创，徐向前同志痛心疾首，提出要重新分析形

势。可陈昌浩仍然头脑发热，继续提虚劲，说：“马家军基本上被我们击溃，形势大好。在永凉地带建立根据地的条

件是具备的，不相信这一点，就是夸大敌人的力量，灭自己的威风。”

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二十四日，军委

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并云：“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方面军首长尤其是徐向前总指挥，接此电报后，振奋异常。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被马家军穷追不舍，危机四伏。能往东去，不论是主力会合，还是同张学良联系，都能从根本上改善处境。因此，在收到军委主席团电报不久，即发出了一份“万万火急”的电报：“……为尽量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新的战斗，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分炮骑兵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速详复。”

可是，一天之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信息送达中央，情况有了变化，中央对西路军的行动又做了重新考虑，最后决定，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月底，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撤离永凉地区，继续西进。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冰雪覆盖的祁连山麓，开始了英勇而悲壮的征程。

苦战临泽

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我军连占高台、临泽两地，部队就地筹粮休整。总直机关及五军一部驻扎临泽。

当时中国的局势变幻莫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西安事变”虽然已经和平解决，但因蒋介石背信弃义扣压张学良，国内形势转眼间又变得风波骤起。随着蒋介石的获释，马家军一改踌躇，迅速调集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共2万余人，尾随我军，叫嚣“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进”、“消灭共匪于河西走廊。”

一月十二日，敌人向高台发起猛攻。孤守高台的红五军团在董振堂军团长的指挥下，浴血奋战，坚持了十几个

日日夜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高台于二十四日晨沦陷。

高台失守，敌人便掉头转攻临泽。当时，驻守临泽城的主要是总部直属队，里面有驮着全方面军经费物资的辎重部队，有全方面军唯一能造手榴弹和子弹的一个小兵工厂，还有医院。城内除了仅有的一个警卫连外，剩下的便是一个妇女独立团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

总部转移之后，城内最高首长是总供给部郑义斋部长，当时他的爱人杨文局同志也在城内，在供给部政治处工作，在我印象中她还在妇女独立团里兼了职务。杨文局同志以后写了一篇纪念郑义斋部长的文章：《红色好管家》，其中有一段是记述临泽保卫战的：

……临泽突围战是我们后勤人员所经历的一

场罕见的恶仗。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敌人以五个多团的兵力围攻临泽县城，城内红军，除了一个警卫连之外，只有我们供给部、卫生部的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大部分是女同志，战斗力很弱。在危急关头，义斋委托富有战斗经验的秦基伟同志担任守城前线指挥。把城内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修械工人、炊事员统统组织起来，按战斗需要统一编成班、排、连。男同志负责守城，女同志负责送饭、救伤员和运送弹药……

据我记忆，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女同志还多了个任务：拣石头——没弹药了，我们就用石头砸。

我受命负责指挥这次保卫战之后，立即召集战斗连队和勤杂单位负责人一起看了地形，将警卫连的两个排放在城墙的几个要点上，另一个排作为机动，由我亲自掌握使用。

当天夜里，我带着机动排沿城墙巡逻。临泽城不大，还比较坚固、整齐，利于防守。城外是一片开阔地，不远就是戈壁滩。这时敌人已把我们围得铁桶一般了。骑兵在城墙外耀武扬威地游弋，骑兵后面是步兵。他们在开阔地搭起不少帐篷，燃起许多篝火，那阵势很有点像古代的部落战争。

入夜，许多同志都提议杀出去，突不了围，也要拼他一场。陷此重围，我又何尝不想拼呢？可是，城里只有我手里抱着一挺机关枪，子弹还不多。其它武器最好的也就

是冲锋枪。如果往外冲，在那片没有依托的开阔地里，很难冲出去。再说，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争取时间，等待三十军主力增援。如果冲出去，人财都要受到很大损失。广当夜，我坚持按兵不动，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各个方面的战斗准备工作。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攻击开始了，他们先用山炮猛轰城墙，几分钟后，城墙的胸部出现了几个豁口，敌人快速搭上梯子、挥着马刀往上冲，敌指挥官还在后面拍屁股大喊：“弟兄们冲呵，城里都是女红军，冲进临泽城，一人一个老婆！”还有人喊，说城里是红军的经理部，有金有银有白面。这个话一喊，真像激素一样管用，一听说有黄金有鸦片还有女人，敌兵们一个个都拼命往上冲。

敌人是拼命地冲，我们是拼命地打。集中所有的长枪、短枪一齐射击，手榴弹、石头、砖头、劈头盖脸地打过去，那时候也不顾那么多，见什么用什么。身边有顺手的家伙，抄过去砸哟！他们进攻时还想着黄金白面和女人，那是在保命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的。而我们是抱定一死了之，什么也不在乎。所谓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这时候一点不假。我抱着一挺轻机枪，打一阵换一个地方，一是为了指挥，二是给敌人造成错觉，好象城内到处都有轻机枪。就这么你来我往，你进我打，从拂晓打到中午，敌人伤亡一大堆，也没有打进临泽城。我军驻在城外的一股部队自己突围后，又朝县城方向打了一阵子，敌人不知就里，恐怕遭我前后夹击，丢了一大堆尸体，鸣金收兵了。

夜里，我把白天的战斗情况向郑部长作了汇报，部长说：“打得好”，又说：“明天是关键的一天，要顶住，再没人增援，夜里就突围。”

离开郑部长后，我连夜对人员做了调整，修补城墙，布置了第二天的防御。经过一天战斗，我们虽然伤亡较大，但大家仍然情绪很高。这时候，人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接下来的第二天，敌人虽几次冲锋，仍没奏效。

第三天，敌人从几个方向，同时向我们发动了更疯狂的冲击。整个临泽城，在枪炮声和喊杀声中颤栗。我亲眼看见一个战士拎着我们自制的马尾手榴弹后面的长绳，像抡节鞭一样，打向正爬梯子的敌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头上缠着绷带，双手擎着一块大石头，追打攀城之敌，其状英勇至极。一个马家军军官在三十米外向她瞄准，被我看见了，横起机枪一个点射，这个马匪军官当场毙命。

数次攻城没有得手，敌人真是恼羞成怒了，也不再喊“一人一个老婆”了，组织了督战队在冲锋队伍后面，架起

了机关枪。尽管如此，临泽城仍岿然不动。后来，为了节约子弹，我们很少开枪了，主要是用大刀和石头。警卫连的战士守在薄弱环节上，眼见敌人架上云梯也不理睬，等他上来了，上多了，一起出动，同时掀翻。妇女独立团的同志手中的石头随之铺天盖地倾泻而下，敌人后来的几次冲锋，差不多全是这样打退的。

战斗中，我负了伤，敌人的子弹打在我的机枪上，弹起来，削伤了我的四个指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浑身都是别人的血，自己流了血，也没有察觉。我抱着机关枪，哪里敌人最密集，我就往哪里打。战后有同志问我那

次战

斗打死多少人，我老实地回答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机关枪点名点了几天，谁能数得过来呵？

我们在临泽守了几天，敌人由猖狂到泄气，最后甚至有点奇怪。他们简直闹不明白，小小的临泽城，里面多是勤务人员，在他们看来都是乌合之众。结果攻了几天硬是没攻下来，最后还是我们根据总部的指示，自己放弃的。那天夜里，狂风呼啸，大雪漫卷，能见度和能听度都很差，是个行动的好机会。我们把骡马的蹄子绑上棉花，人员和辎重悄悄地集中起来。留了一个班在北面，咋咋唬唬，造成北面突围的假象。待敌人注意力集中到北面了，我们从南面趁夜暗人不知鬼不觉地溜了。直到半夜敌人才发觉，追到城东南沙滩间，又打了一阵，我们最终突围了。

临泽保卫战，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有些情景记忆犹新，但难免有错记漏记之处。那次参与包围我们的马元海部团长刘呈德曾写过一篇文章，叙述他的经历和见闻，现摘引部分，作为反证。

……同月中旬，马元海亲自督促我团、马步奎团、马禄旅及大批民团进攻临泽城，临泽城虽小而整齐坚固，四周都是开阔地形，进攻极其不易，可是马元海说：“这样一座小小城池，怎么攻取不下呢，哪怕花费十天半月的功夫，一定要攻破。”就在他的严令下，展开了攻势，利用两门山炮的轰击和周围部队的掩护，令我团和马步奎团分头猛攻。守城的红军以密集的枪弹和炸弹迎头阻击，以致涌进城根的我军部队死亡枕藉，虽经后部在炮火烟雾中三番五次地激烈攻城，终未得逞，死伤了不少官兵。其间旅长马禄曾对我说：“临泽城虽小，好似铁皮包扎一般，我们部队已经死亡不少，真不容易攻取了。”马元海虽遭到两次惨败，仍不甘心，旋即改变方略，从西城角进攻，先用山炮轰开了城头的一处垛口。我方五六十人乘机爬上城头，亦被红军推倒云梯，以致多数人当场死伤，在这前后的几次攻城战中，我团营长韩得明、营副马希中、团副官马成龙都受了伤。连排中受重伤的也有20多人，士兵被击毙的约100人左右，受伤的亦不下300余人。其它各部队官兵的死伤也为数不少。其后城内的红军，在一个晚上，乘我军夜间不常进攻的空隙，退出了临泽城，直至当夜夜半，我方始行发觉，即将稀稀拉拉留作掩护的红军20多人击溃，大部队随之入城，将未及走脱的一些工匠和伤病员，以及骆驼200余峰俘获，解交马元海，他又向马步芳、马步青报捷说：“红军势穷力竭，我军攻克临泽县城。”并令各路骑兵团继续追击，即在城东南河滩间，双方混战了一小时，大部分红军冲出了包围圈，经往甘州南乡倪家营子，与第三十军会合。

另有陈秉渊追忆如下……

……二十二日马元海以马步奎团、刘呈德团、骑兵第五师马禄旅为主力先向临泽河西北城南各庄堡分头进犯，继有城红军机枪击退，复行硬攻，爬上城头的又被红军击附于城根。这时混乱中红军多用石块拒击，势如雨发，有些女战士在战斗中英勇异常，不稍退让，尤为马元海所惊叹，明

知守城红军弹药已缺乏，可是铁墙铜壁，可望而不可及。随之仍退原驻地。当夜十时许，风雪交加，马元海乘夜暗苍茫，又迫令部队民团攻城，城头仅放出一阵枪声，即行沉寂。得以又搭云梯爬城。这时红军正由西南门撤出，临泽已成空城，遂落于马元海之手……

我们退出临泽城之后，敌人一部追了过来，多亏夜暗加上风大雪大彼此看不清面目。老天爷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且战且退，天还没亮就赶到了倪家营子。当时总部首长都在这里，陆续集结起来的部队有一万二千余人。

倪家营子位于临泽东南方沿山地带，分上、下营子，是个较大的自然村，东西宽约三至四里，南边毗邻祁连山脉。在倪家营子我们坚持的时间比较长，又打了几仗。在那种情况下，粮食没了，弹药没了，精锐部队也没了。好在红军骨头硬，不死就有士气。敌人在倪家营子先后投入围攻的兵力有六个骑兵旅和大量反动民团，共七万多人。我们以寡敌众，血战了四十天。击退敌人大规模进攻八、九次，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以下万余人。但我们自己损失也很大，兵力已不足万人，彩病号占三分之一。中间突围了一次，击溃了紫追我们的马步芳骑兵旅，并将他的一个宪兵团全歼，缴获了一千多支枪和一批军用物资。按说，应该乘胜东进，向我河东策应部队靠拢，但是因为没接到中央的命令，总部主要领导人离开倪家营子又有顾虑，突围的部队只好又返回倪家营子。

就在我们返回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家军又对倪家营子发起围攻。连续七个昼夜，方圆十里的黄沙地带马蹄声碎，尘土飞扬。马家军的骑兵部队高举马刀，像潮水一样，一浪接着一浪袭向红军阵地。可以说，我们是用最后一口气同敌人作战。除了意志和拼死的决心，别的几乎是一无所有。倪家营子约十几个屯庄，转眼之间差不多全成了废墟。

眼看部队将被马家铁骑斩尽杀绝，总部终于下了决心，组织剩余力量再次突围。突围后我们转移到临泽以南三道流沟地区，喘气尚未均匀，大批敌人又蜂拥而至。

三道流沟是由三条低洼的古流水沟形成的一段狭长地带，稀稀落落地散布着为数不多的几座房屋和寨堡，流沟两边都是戈壁滩和沙漠。前无出路，后有追兵，我军近八千人被围困分割在三条流沟里。从三月八日至十日，被马家军的马步奎旅和刘呈德团采用“狼驱羊群”的战术，轮番进攻。在那样一片苍凉荒芜的沙漠地带里，连续几日，金戈铁马纵横奔突，硝烟弥漫日月无光。至今想起那一幕，悲怆之中仍有壮烈之情在胸中奔突。

第五章 风雪祁连山

冰天雪地里的游击队

西路军在三道流沟同马家军激战十一天后，眼见待援无望，弹尽粮绝，徐向前总指挥再次组织突围，向祁连山里转移。三月十一日晨，我军从南柳沟突围，至梨园堡集结。十二日，马家军猛攻梨园堡地区。总部，加上我们那一砣，跟三十军一起行动。

到了祁连山口，就听到梨园堡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一会儿就听说，九军政委陈海松壮烈牺牲。这个消息，令全军将士黯然。陈海松是河南光山人，是囚方面军著名战将，牺牲时才二十三岁。

陈海松牺牲了，九军也完了，没进祁连山就垮了，只有三十军还剩一点部队，约一千多人。不多时，敌人越过九军的防线，追上我们，于是又在梨园口摆开阵势。我们那个方向，就三十军一个团，也没几个人，顶着打。郑义斋部长要我把总部机关包括供给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这些人员仅有的武器全是手枪，没有步枪。手枪打完，还是老武器，用石头砸。我的老首长，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就

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

梨园口战斗之后，逃出来的人就往祁连山里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没有了建制，没有指挥员，真成了散兵游勇。

我们进山的时候，李先念同志正等在山口上，他身边还有千把人。这时候才知道有个石窝会议。因部队局面无法维持，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脱离部队，回延安汇报。留下李先念、李特、王树声、李卓然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进了祁连山，就悲惨了。地上两尺多厚的雪，树上几尺长的冰凌。冰天雪地，别说棉衣，单衣还是破的。打仗时拼命，觉不着冷。战斗停下来，就感到冻得要死。手一挨上石头就冻上了，再拿下来得粘掉一层皮。

进山后没走多远，遇到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李卓然和保卫局长曾传六，他们三人找我和红九军政治部民运部长何柱成同志谈话，把当前情况通报了一下，然后交给我们二十七个人，让我们组织游击队，我当队长，何柱成同志任政委。还给了几个伤员，一个是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另有几个团级干部。那二十七个人当中也多半是缠着绷带的。这样一支队伍让我怎么打游击啊？往哪里游，去击谁，全是未知数。张琴秋他们也是没办法，才把伤员交给我们。在祁连山里，根本见不着人影，连野菜也吃不上，也没个地图，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们饿着肚子光着膀子在雪山里转了一个礼拜，转得眼睛发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喇嘛庙，进去东翻西翻，翻出点大米，可稀饭还没煮好，敌人又找上来了，我急忙组织应战，让人保护熊厚发等同志先撤，我和几个轻伤员掩护。一仗下来，刚成立的游击队被打散了。拼死突出包围圈，我身边只剩下三个人。

身陷囹圄

西路军被打散之后，马步芳就在辖区内下了通告，逮住我们一个人，给多少多少钱。山里很少发现住有人家，但山沟里有淘金的，那些人也不知红军是好人还是坏人，但钱是好东西他们知道。冰天雪地里淘金不容易，他们就把红军当金淘，发现了就报告，领赏钱。这样一来，困难就更大了，盼见到人弄点吃的，可一见到人，行踪也就暴露了。

我们四个人又在山上转悠了两天。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我们几个人商议，意见很一致，都同意下山，与其饿死，不如闯闯试试，横是死，竖也是死，万一能闯过去，还可以活着干革命。

记不清是在祁连山的第几天晚上，我们带着武器，摸下了一条山沟。没走多长时间，就看见一处火光，大家顿时振奋起来，顾不上多想，甩腿下了沟底。

沟底是一家游牧民的棉帐篷，样子有点像蒙古包。我们进去时，只有一个男主人出来招呼。因为是少数民族，有很多禁忌，所以我们也不大好进去东看西看，这一家到底有几个人，是些什么人，都拿不准，这就留下了纰漏。

我们钻进去，连讲带比划，向主人说明了借他帐篷暖和一下，又掏出钱，买了一只羊，主人表现得还可以。语言不通，我们也很少交谈，他一边杀羊，我们就在一边烤火。帐篷里暖和得很，不多会羊肉炖出了味道，咕咕咚咚的香味直往鼻子钻，又暖和，又有肉香，就象进了天堂，我们都有些晕乎乎的了。

羊肉煮好后，我们不用教就学会了“手抓羊肉”。四个人围坐在火塘边，你扯一块，我撕一砣，一顿狼吞虎咽，转眼间一头整羊便找不到踪影了。

吃完了羊肉，天已经快亮了。冻饿了这么多天，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天堂”，谁也不想走，都想迷糊一会。我虽然也对这个帐篷难舍难分，但是知道此处绝不是久留之地。我连商量带命令，硬是把他们三个人催起来了。

岂料尽管我们有警觉，但还是迟了。刚刚钻出帐篷，周围的枪就响了，随即传来喊话声：“把枪放在地上，不要乱跑！”

抬头一看，天啊，一圈子都是马家军，帐篷已被包围了，枪全是冲天打的。看来，他们在此等待多时了，压根要抓活的。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想。敌人说不跑，可我哪能听他的。枪膛都是顶上火的，我们擎出来就打，边打边往山上跑。可是跑到山上，后面也是敌人，仍然不紧不慢地喝令我们交枪。

在这种情况下，突围是不可能的了。我扫了一眼，另外三名同志也在看我。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抓活的，我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举起驳壳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枪膛里还有最后一颗子弹。

然而，就在我即将撙火之际，一位同志一头撞过来，把我撞了个趔趄，另外两个同志也扑过来，一边一个架住了我的胳膊。大家意见一致：无论如何咱们不能自杀，只要活着，还可以斗争，自杀就什么都完了。

同志们这样一说，我也觉得有道理。首先是活着，然后才能谈得上革命。这次被俘，未必就死。只要不死，总有办法。当时，我的枪已经被他们下了，想死也死不成了。就在瞬间的功夫，敌人已经涌到跟前，几十条枪对着我们。抓我们的时候要搜身，我反抗了一下，被抽了两鞭子。

抓我们的是马元海部的马禄旅。被押解的一路上，我琢磨，我们是夜晚下山的，敌人怎么知道得这么快？后悔进牧民帐篷时没有查清他家人数，一饿一冻，只顾温饱，放松了警惕。估计就是那家主人派人溜出去报了信，拿

我们几个换洋钱了。

我们被绑着双手，在沙漠和沼泽里走了一天多。

第二天到了一所兵营。

我们这几个人，都很乐观，没有那种打败仗的沮丧和阶下囚的恐惧，饭端上来，管他娘的，稀哩哗啦吃了一肚子。

要杀要刮，随他的便。可是，一连等了几天，既不审讯，也没被杀头，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才知道，我们这次被抓，不幸中又有大幸。

马禄旅是马家军进攻西路军的一支重要部队，我们多次打过交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马禄旅在进攻我军时被我九军包围在锁阜堡，困了半个多月，差不多也弹尽粮绝。当时党中央有指示，要求多做马家军的统战工作。经过一再宣传，马禄表示愿意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我军于是网开一面，放了他六百多人一条生路。后来马禄在马家军的大趋势下，虽然又继续同我们作战，但有一条，不杀红军俘虏。如果我们是被其他的“马”抓去，那是定死无疑。马家军同西路军作战，伤亡很大，对红军的仇恨也大。“西安事变”后，我党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要他向马家军施加压力，不杀红军俘虏。马家军虽然表面上同意了，但下面的人照样杀，杀得一堆一堆的。

智斗马家军

不久，我们被层层送到了张掖，又从张掖送到凉州。凉州是西北一个有名的地方，唐朝诗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描写的就是这里的苍凉景象。我们在这里坐了四十多天牢。

审讯的时候问我身份，我回答是红军士兵。审讯人不信，说：“你是南方人，该是老共党。”

我说不是，南方人也有新当兵的，我是跟着别人才跑出来的。

问我为什么当红军，我回答说当兵吃粮，别的不为什么。

审讯的人见我说的没什么破绽也就相信了。可是后来出了个叛徒把我出卖了。他对敌人说“那个团长好凶噢，过草地时又打人又骂人。”

敌人又审讯我，说我不老实。我说：“老实说吧，我当过连长，但真的没当过团长。当连长时负伤了，后来就负责训练新兵。一大堆新兵在一起，嘴上叫新兵团，其实也没个委任状，怎么能算团长呢？”

我说得振振有词，敌人半信半疑，但也不再追问了。

没过多久，又出了个叛徒。他不供我是团长、师长，也不供我是总供给部的处长、梯队长，而供我是徐向前手下的参谋。

这一下可不得了，在马家军的眼里，总指挥部的参谋那是高参。这以后，连看守都喊我“秦参谋”。

虽然当了阶下囚，但当时国共合作呼声正高，加上马禄同红军多少有点默契，所以没怎么折磨我们。有些审讯都是象征性的。对我们的行为也有些睁只眼闭只眼的意思，所以我们吃的苦头并不多。

当然，伙食很糟糕。一天两顿饭。吃什么呢？打下的小麦简单地碾一下，鼓皮子也不筛掉，放点盐巴，煮成稀饭。一人一个大土钵子，每顿饭一钵子，像喂猪。

住了几天牢，环境适应了，我们的革命工作也开始了。

当时住在一个狱里的有徐立清、方强、卜盛光等人，我们利用放风晒太阳的机会，经常凑在一起商议。后来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徐立清牵头。

支部工作的重心就是两条：第一，就是做好牺牲的准备。死，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但要死也得死出个红军姿态。一旦敌人杀我们，要昂首挺胸喊口号，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不能装孬。要让群众看见我们的形象。等将来红军打回来，就会知道，某年某月某日，马家军在这里杀了红军的人，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怎样就义的。第二，如果敌人暂时不杀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带领大家逃跑，逃出之后，能找到部队更好，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队伍扩大了，再去寻找主力。

以后又出了个大叛徒，这个人当过三十军的参谋长。

有一天，马家军把我们全体囚犯集合在大操场排队，让这个叛徒来认，谁是红军指挥员。由于我们支部的几名成员都不是三十军的，与他不认识，因而没被他认出来。这个无耻之徒还发表了一通讲话，内容不外是反对共产党，拥护国民党那一套，要我们“换脑子”。这以后，就经常有军官陪着叛徒到牢房里转悠，吆喝：“脑子换过来没有？”

南方话的“脑子”和“老子”发音差不多，所以我们也不含糊，连讽刺带挖苦，说：“你老子好好的，不用换！”或者说：“妈的个不孝东西，老子一穷，就要换呵！”

监狱虽然是马家军的，但蒋介石的手也插得很深，常派政治教官来给我们上课，大讲什么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只能有一个主义，只能有一个军队，只能有一个领袖，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及委员长如何如何等等。还诬蔑说什么共产主义是外来货，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共产党应该取消，红军应该改编，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等等。对这一套，我们一般是不予理睬。有时我们还有组织地一起喊口号，把他轰下台。

我还记得，有个马家军的军官来给我们上政治课，开始是一问一答，他问我答。他问我共产党跟国民党比，谁有前途，我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上了一堂课。

我说了一通，他听得很服气。他又问我喜欢跟谁打，我说喜欢跟胡宗南打。

他反而愣住了，问为什么。

我说胡宗南是蒋的嫡系，武器好，缴过来管用。我猛给他吹一通，吹得他五体投地，临走时还竖起了大姆指，说我要是在国民党里，可以当将军。

狱中生活，有苦有难也有乐。只要意志坚强，信心饱满，则可乐在其中。

在凉州坐了四十多天牢，又把我们往兰州押送。兰州驻军不是马家军，而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到了兰州，住在市东一所兵营里，临近黄河，挨着一个飞机场（即现在兰州军区空军所在地）。

那时人就多了，一千多囚犯，早晨出操，白天修马路，看管得很严。

十多天之后，延安派了代表张文彬同志来给我们讲话，讲统一战线，讲国共合作。并说已经跟国民党达成协议，要放我们出去抗日，目前正在办手续，让我们耐心等待。当时，大家的激动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归队

但是，张文彬代表讲话之后，却总不见动静。

国民党联合抗日本来就不出于真心，当然不甘心“放虎归山”，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刁难、拖延，企图践踏诺言。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国民党军队把我们往西安送。听说还要把我们这些干部送到南京感化院去“换脑子”。

在路上，党支部又找机会开了个碰头会，大家意见十分一致，还是要跑。这回，敌人是一个营押送我们的。

被俘人员共有一千多，我们这些中上层指挥员被编成一个“军官队”，有五十多人，当然是重点防范对象。夜里看守得尤其紧，一到宿营地，让我们挤在骡马店里，外面要放很多哨，很难行动。相反，白天则有机可乘。

我们一千多人的队伍，老弱病残都有，还有二十几个女同志。敌人的一个营分前、中、后配置，不是分散看押，而是以连为单位整队前进，原因也是害怕，怕我们中途零打碎敲地收拾他。

这样一来，就方便了我们。我们事先向大家交代，走的时候前面的快走，后面的故意磨蹭，把队伍拉长。长到什么程度呢？敌人跟在中间的那个连，差不多看不见前面和后面的连队，中间那个空档子，就是我们自由活动的天地了。再加上马路两边修有很多碉堡，路边的山包也多，走不多远就可以看见一个，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遮蔽物。

大约是到达桑园子之前，我们还在往前走，不知什么时候路边多了几个戴草帽的人，骑着车子在马路上来回跑，一边跑还一边小声嘀咕：“我是三十一军敌工部的。过河朝庆阳方向走，就是三十一军。”有个叫赵瑛的女同志以后回忆说，这个人还给了她一把钱，她分给大家做盘缠了。

我们支部几个人按照分工，给“军官队”的每个人都打了招呼。从平凉到泾川之间，除了不到十个人不愿跑以外，想跑的都跑了。这些不愿意跑的，有的是年龄大了，想回家。也有的考虑国共合作了，国民党不会杀头，到南京也没什么不好。

我是假装解手溜到路边的。裤子假模假式地脱了一半，瞅瞅前无兵后无丁，裤子一提，溜之大吉。

一脱离“囚犯”队伍，心情就大不一样，沿途问路，找到了三十一军接待站。敌人什么时候发现我们逃跑的，就不知道了。听人说：我们逃跑后，敌营长十分紧张，把队伍带到泾川，再不敢往前走了，正突击审讯要犯，要他们供出逃跑的组织者。

我在三十一军接待站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就被送到援西军驻地靖原县。当时，中央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凡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要参加学习，在招待所里住了个把礼拜，刘伯承司令员给我们讲话，讲张国焘的错误，讲西路军的失败。记得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

刘司令员的本意是说明张国焘的流毒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要肃清流毒。但是，我们都是下面工作的，也搞不清上层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一听刘司令员这样说就害怕了，有些同志于是胡思乱想，不知该怎么挨整了。当天晚上就跑了两个团干、一个营干。

这一段，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斗争，也有些顾虑。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跑的，既然干，就要干到底，我没做对不起党的事，我不害怕，就是

斗争我也没啥，无论如何我不能离开革命队伍。

此后不久，李达和宋任穷两位同志找我谈话，详细地了解了我在西路军和被俘后的情况，特别是开展狱中支部的情况，宋任穷同志还做了记录。李达同志认为我军事素质较好，要调我去司令部当参谋。由于国共合作，正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许多新问题我都不懂，我感到思想落后于形势，于是向李达同志提出了学习的要求。李达同志批准我住进援西军教导团（即后来的一二九师教导团）学习。

第六章 奔赴抗日前线

单枪匹马的游击教官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成立了八路军总部，下辖三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九师、一二九师。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九军、第十五军骑兵团等部合编而成。我们西路军突围的指战员，除李先念支队到达新疆以外，其余大多数人都是先找到援西军而后编入一二九师。

部队变化番号，开往前线抗日，都是没二话可说的，但我们又面临到一个现实的问题：换帽子——由红军帽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

天哪！过去国民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见了戴青天白日帽的我们就打。虽然我们也知道跟国民党合作是为了抗日，但感情上还是不能接受。刚开始的时候，许多战士都拒绝戴国民党的帽子，有的还用脚踩。一个命令下来，没办法，还得戴。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一二九师在三原县城以西的石桥镇召开了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近一万人雨中伫立，由陈赓同志主持“换帽子”，帽子戴在头上，眼泪流在脸上，那会功夫，部队哭成一片。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三个师的大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我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和张浩政委的率领下，徒步行军至山西，由侯马转乘火车到达山西平定县，在县城休整，准备挺进到晋中太行地区。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还决定了以下内容：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

民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

在平定，张浩政委找我谈话，先讲了一通抗日形势，再讲了一通发动群众的政策，然后给了我一张开给太谷县县长的介绍信，让我到太谷县去当游击教官，实际上就是去组织队伍。

从内心讲，我更愿意留在主力部队。但既然组织决定了，当然没有二话。

张浩政委还告诉我，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建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师部将陆续派出一批军政素质好，能独当一面的干部。我们是第一批，除我之外，还有师部民运部长赖际发以及秦武山等同志。赖际发同志先行到达榆次，在纱厂工人中做工作。张浩政委最后交代，队伍拉起来之后，如果太谷不能蹲，就把队伍拉上太行山。

我没有想到，这次同张浩政委见面，竟是最后一次。就在我奔赴太谷县不久，张浩政委就因病回了延安，一二九师政委一职由邓小平同志接任。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张浩政委。直到我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后，才听到张政委去世的消息。在当时，首长的话我全记住了，可是太行山在哪里？队伍又在哪里？全是抽象的。这样说，并非底气不足。对于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武装，我是充满信心的。回想从甘肃到山西，特别是到山西境内，当时太原、忻口一线国民党军正与日军鏖战，娘子关告急，汤恩伯的军队抵挡不住，兵败如

山倒。严峻时刻，我军主力由南向北迎敌而上，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激起很大的反响，从侯马到平定，火车只要停下，学生就往车厢里扒，一看我们穿的是草鞋，就知道是老红军，就要我们讲时事，分析形势，许多人都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这时已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了。

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上午，我从阳泉车站上车，下午三四点钟到了寿阳车站。

一到寿阳，情况就复杂了。一方面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的部队从娘子关潮水般地往下退；另一方面，川军邓锡侯的部队一窝蜂地往上涌。车站上有军队、有伤兵、有家属，乱糟糟的。几道铁轨上，摆满了火车，目标大得很。敌机隔一会就来投一次炸弹。

针对这个情况，我当机立断，跳下火车就跑。我还没跑出车站，又有三架敌机过来扔炸弹。飞机飞得很低，眼见炸弹就像是冲着自己的脑壳扔的。后来我跳进车站附近的一个掩体里。飞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一共九架次，轮番轰炸，炸了我一身泥巴，但没伤着皮肉。

这次轰炸完了，再回到我原来乘坐的车上一看，连人带车都是稀烂，惨不忍睹。我的行李也被炸得无踪无影了。

我索性不坐车了。白天开动“十一号”徒步，到天黑了，就守在路边扒火车。正太路路况不是太好，两边都是山，火车走得较慢，我扒起来得心应手。兵荒马乱的，也没人检票，扒上去一觉睡个痛快。天亮跳下车，继续步行，很快就到了太谷县。

张浩政委的介绍信写得很详细，说秦基伟是红军时代的团长，参加过多少多少次战斗，指挥战斗如何如何。太谷县的县长杜任之看了介绍信，十分重视。（后来才知道，杜任之虽然在阎锡山手下干事，但实际上是我党党员、山西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跟张浩政委有单线联系。）恰好这天邓锡侯的火车到了太谷县，当晚杜县长邀请本县各界头面人物为邓接风，但邓锡侯推说他太疲劳了，不愿下车。这样，一顿丰盛的接风筵席就由我来消受了。

太谷县的县衙门是正儿八经的县衙门，我当时的印象，太谷县政府还是富丽堂皇的。长了这么大第一次参加这样花里胡哨的筵席，又是主宾，我感到有点拘谨，怕出格，怕丢红军的脸，连菜都不敢随便吃，不知道哪道菜是看的，哪道菜是吃的。绝大多数菜从前连见都没见过，当然不懂吃法了，只好看杜县长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他怎么吃，我也怎么吃。

此次县衙赴宴，可以说是在交际方面受到的第一次锻炼。

我去太谷之前，太谷县已经组织了一支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有二百来人，多数是本县铭贤中学（后改名为民先中学）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平津流亡来的学生。自卫队住在县城的白塔寺里。杜任之把我带去介绍说：这是老红军团长，自卫队的游击教官。介绍完了，他领我跟另外的几个负责人见了面，然后对我说：“我事太多，也不懂行，往后，自卫队就交给你了。”

这下倒好，我不单纯是教官，还成了这支队伍的主管家。我这个大老粗，管了一帮学生娃，缺文化的，要教育一帮有文化的，下面的戏该怎么唱，我的肩膀上是有一定压力的。

当然，我有我的法宝。

在一二九师教导团受训时，我的成绩是很好的。毛主席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我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联系以往的战斗实际，讲出一些生动的

战例来。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教官，当然讲不出更多深奥的军事理论，但我毕竟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有亲身经历，有真实感受。我把理论原则与战斗故事结合起来，敌进我退是怎么退的，敌住我扰是怎么扰的，哪一次敌人拖累了再打，打得怎么样？哪一次敌退我迫，追得他如何……

这样一讲，效果出奇的好。既深刻又通俗，既形象又生动，那些学生娃坐在台下眼睛瞪得老大，听得入迷。我这个教官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渐渐地就有了地位。

除了上军事课，还必须在队伍中建立军事生活秩序，这支队伍刚刚从老百姓中脱胎出来，对军事生活完全陌生，站队、吃饭都是乱糟糟的，形同乌合之众。我首先从一日生活秩序入手，起床、操练、吃饭、唱歌、就寝……按照我在红军时期学的那一套，一项一项地来。

成立太谷游击支队

我到太谷之后不久，形势就紧张起来。娘子关方向日益吃紧，杜任之同志也因有人告发他是共产党员而被阎锡山撤职。

为了组织力量，坚持抗战，我们于三七年十一月初在大谷县城白塔寺内宣布成立了“太谷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由我担任指挥长，地下党县委书记侯维煜同志担任政治委员，杜润生同志任参谋长。游击支队有二百八十人。

几天后，日军占领了太原。

太原失陷、太谷顿时没了遮挡，阎锡山的县政府稀哩哗啦跑得没了踪影，接杜任之同志任县长的刘钰携带两千元现款私逃了。

十二月六日，我们集合队伍于夜间摸进县政府，那里已是空荡荡的没有人了。但尚有一批武器，还有阎锡山存放在大谷县没来得及运走的棉被和军衣，我们满满地装了几马车，浩浩荡荡出了县城。也不知太行山在哪里，反正东边有山，就向东边走。

第二天，队伍经惠安村抵达东峪山口。就在这天中午，太谷县城沦陷了。当天晚上，支队部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支队改称“八路军太谷游击支队”，我任司令员。之后，连夜行军，径奔太行山中心榆社。当时，赖际发同志正在榆次组织工人游击队，我派人跟他取得了联系，请他向师部报告我们的情况。然后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榆社县城附近的下武村，在那里休整待命。

队伍是拉出来了，我的任务算完成了一半。但是，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这支队伍最终能不能跟我进太行山，都不是一下能说明白的。

在下武村住了十多天，前前后后的故事就多了。

我们的队伍成份新，大部分是学生，也有少数工人、农民和小商。别看干革命是头一遭，革命的理儿他们却知道得不少，不光是中国革命的事，连苏联是怎么闹革命的他们都知道。队伍里是高度的民主化，你说今天下午干什么，他们就要开个会，研究一下能不能干。你要批评一个人，弄不好他们也要开会，斗争你。山西有些地方也是睡大炕，男男女女都挤在一起，女同志早晨起床又是洗又是梳又是抹，这一套我很看不惯，一张口说两句，他们就群起而攻之，要改造我的封建旧脑筋。他们还把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工人农民集合起来，给他们讲政治经济学，当然是乱弹琴。

吃饭也是个问题，有民主就有自由，这种自由在吃饭问题上体现得尤其充分，根本不像部队统一就餐，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伙房做的，也有自己做的，还有跑到老百姓家里换东西吃的，五花八门。这怎么行呢？我于是亲自下手，院子当中挖个行军灶，烧大锅饭菜，做好之后，一桌一桌摆好，统一号令，所有人员一齐就餐。

大家普遍反映，老红军做的饭菜味道就是好。没吃好的还给我提意见。提点意见我接受，再给他们做。但吃饭那一套规矩他们必须按照我的来。

偶尔有人外出执行任务，那更是洋相百出，让人哭笑不得。这帮学生娃，夜间行军一是害怕，二是看不见，要打火把。那我当然不能允许，之所以夜间行动，就是怕暴露目标，一打火把，那跟白天行动有什么区别呢？

火把虽然是没打成，但他们斗争我也斗争得不轻。他们斗他们的，我则坚持我的，只要有夜间行动，我就必须要走在前面。

过去在一二九师教导团的时候，每月发一块大洋的津贴，我攒着没花。在下武村，我让警卫员买了一只鸡，我们两个人炖了吃。这一下，又惹了纰漏，学生们开会斗争我，说苏联革命艰苦时期，列宁连面包都舍不得吃，留

给伤员吃。你这个司令员倒好，买鸡自己吃。大家七嘴八舌，批得我直想发火。

那时候，带那样一批知识分子，真是艰难得很。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尽管如此，我仍然很喜欢他们，他们拥护共产党，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爱国热情和积极性都很高。他们有文化、有思想、有朝气、有热情，优点是很多的。他们的缺点是暂时的，一旦走上了革命的正轨，他们会比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同志更有优势。而且，他们从骨子里还是尊敬我的。一方面，我是老红军，另一方面，在接触一段时间后，他们对我的胆量和魄力也服气。

这里举一个例子。

太原会战期间，从娘子关退下来的汤恩伯部散兵，到处骚扰老百姓，谁见谁怕。

有一天，我们正在外面训练，有一个群众向我报告，说某某地方又来了国民党军，正在欺负老百姓。那些学生娃一听，吓得赶紧要溜。

我说：“你们不要怕，跟着我看热闹去！”

那时候，我穿着八路军军服，佩戴八路军臂章，腰里还插着一把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八路军不光在老百姓心中有威信，在国民党官兵眼里，也是了不起的，因为跟日本人打仗他们不如我们。

我带着几个人到了一个巷子，果然看见几个国民党兵在找老百姓要东西，老远地见到我，便立正了。

我很严肃地问他们是哪部分的？干什么的？姓甚名谁？然后不客气地教训他们一顿，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又讲了一通抗日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的道理。他们始终是洗耳恭听，一口一个“是，长官！”不敢马虎。

这样一来，学生们就打心眼里佩服我。不服不行呀！那些国民党伤兵，散兵成群结队，仗着跟日本人打过仗，是很野蛮的，老百姓都视为祸害。他们躲都躲不及，而我敢找上门去训他们，还训得服服贴贴，那当然了不起。

另外，虽然从表面上看，我成天板着脸，卡着腰，一副威严的样子。但从心眼里讲，我对这些知识分子是敬重的。我的年纪比他们大，又是老红军，带兵要先爱兵，这是必须做到的，所以我很注意从生活上关心他们。不仅吃喝拉撒要操心，衣食住行也要管，行军走累了，脚打泡了，这些学生娃们叫苦连天，就是没办法。我就烧热水给他们烫脚，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挑泡。

那时候枪不多，我的二十响快慢机还是用小米从汤恩伯的卫兵手里买的，物以稀为贵，那些女孩子，平时没枪吵着要枪，一到行军，有的又把枪扔给我。我这个司令要扛好几支枪。那也是没办法的事。那些女孩子年龄都很小，多数是铭贤中学的学生，最小的是侯维煜的妹妹侯春煜（后改名为侯群英），还是个小学生，只有十二、三岁。

这些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又是另外一番感慨。

我这样一个工农干部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可以说是陷入了文化人的重重包围之中，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跟他们在一起，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是行不通了，那种光凭热情帽子一甩大喊一声“冲啊”的指挥作风不灵了。你只要做错了，他们就敢批评你，你开始不能接受还发两声脾气，批评次数多了，问题挑明了，你就没脾气了。俗话说，近朱者赤。那么，你周围都是有文化的人，你能不受到感染熏陶吗？他们强迫你动脑筋想问题。

坦率地说：那时候我表面上昂首挺胸，实际上心里是有压力的。

我想，他们现在尊重我，服从我，是因为我是老红军，有作战经验。再过些年，他们经过实战锻炼，胆量炼出来了，经验也有了，再加上有文化，就是栋梁之材。而我们这些人如果继续没文化，仅凭匹夫之勇，那不是要被时代淘汰吗？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对学文化就有了紧迫感，坚持学文化，写日记。我学会了查四角号码字典，凡是遇到不认识的字，我都要查个明白。经我翻破的字典就有两三本。我最初记的日记也拿给有文化的同志看，请他们帮我找错别字，找出后我再查字典加深记忆。我也有意识地练习讲话。我记得，就是从下武村待命那段时间开始，在给大家讲话或作报告前，我经常一人钻到树林里，面对树木杂草讲几遍，借此练讲话要点，练语气，练姿势。

渐渐地，我和这些学生兵之间的感情融洽了，大家觉得我这个司令员严是严点，但人情味挺浓，尤其是我的学习精神，使他们挺感动。我诚恳地向他们学习。我是这样认为的，虽然我是上级，我有我的长处，但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他们要向我学习，我也要向他们学习。我只有把他们的长处都吸收过来，才能更好地领导他们。

这样一来，大家就看出来了，我这个司令员不是一般的工农干部，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不足，接受新事物快。这以后，共同语言便多了，该严肃的时候严肃，该活泼的时候活泼，训练的时候大眼瞪小眼，娱乐的时候我不再是司令员，打扑克钻桌子也跟他们一样，玩得热火朝天。

把队伍拉上太行山

我们在下武村待命期间，听说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打了胜仗，朱德总司令带着部队要到榆社休整，将路过下武村。我听到这个消息，赶紧宣传。

游击队里谁不知道朱德总司令呀？大家都很振奋，都想见到总司令。我于是把队伍集合起来，夹道等候。果然，不多一会部队过来了，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又是凯旋之师，当然威风啦。朱总司令骑在一匹缴获的大洋马上，看见路边有游击队伍欢迎，也很高兴。他不认识我，但我不管那么多，等总司令走近了，我大步踏上路中央，给总司令敬了个礼，向他报告说：“总司令，我是一二九师派到太谷的游击教官，现任太谷游击支队司令，我的部队想见总司令。”总司令当时就翻身下马，同我和支队其他几个领导握了手，还给部队讲了话，临别时送给我一把东洋战刀，还有两支枪。

见到总司令，对部队是个很大鼓舞。

不久，我们接到师部的指示，要我带领队伍去破坏白（圭）晋（城）路。

严格地说，这支队伍虽然已经成立了几个月，但还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参加过战斗。成员又多是学生，第一次接受八路军一二九师的破路任务，许多同志不情愿。他们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军人必须执行命令，这一条他们还没养成习惯。当我把任务宣布之后，不少人有畏难情绪，并且抱怨我不该把他们当老八路指挥，七嘴八舌地提意见。我的态度很明确，既然我们是“八路军太谷游击队”，就得像个人路军的样子。执行命令这一条绝不含糊。这是师部第一次交给我们的任务，必须完成，没有别的选择。

我又同其他几个负责同志和党员商议，请他们出来做工作。他们本乡本土，在一起工作时间又长，说话还是起作用的。这几个同志不错，做了一些工作，这才带着队伍开往洪口参加了破坏白（圭）晋（城）路的行动。破路之后，我又接到指示，要我把队伍带到石拐。这一下问题又来了。前面我说过，破白晋路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不乐意呢？这里面有个背景。

我们游击队里的党员大都是山西地下党的，接受薄一波同志的领导。但我不知道这些情况，只知道薄一波是牺盟会的，知道牺盟会是阎锡山的外围组织，这当然是误会。部队离开太谷的时候，就有两个同志提出要去的沁州，我没同意。我们住在下武村的时候，又有人提出来，要把队伍带到沁州去。我还是没有同意。因为一二九师要我把队伍拉到太行山，我要是去了沁州，不是没完成任务吗？无论如何不能去沁州。

但是，当时支队几个负责人有去沁州的倾向，许多战士也嚷着要去沁州。这一下我急了，也是急中生智，我想了一个“假传圣旨”的招数。

在太谷时，跟我接头的地下党员是侯维煜，他接受晋中特委陶希晋同志的领导。当时榆社有八路军的一个团，团长好象叫杨洪民。我跑去找杨团长，把情况说了，然后请他帮我造了一封“晋中特委陶希晋致八路军太谷游击支队司令秦基伟和政委侯维煜”的假信。信中指示我们二人立即把队伍带到和顺县石拐镇。

信造好之后，我先回到支队。第二天，杨团长就派人把信送来了，先送到侯维煜手里。侯维煜接到这个信后很重视，找我商量。我装着什么也不知道，说：“既然是特委有指示，我们就按指示办吧。”侯维煜马上集合部队动员。其他同志更没话说了，执行特委的指示，谁敢含糊呵？

就这样，我把队伍“骗”到了石拐镇。

当时谁在石拐呢？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率领王近山同志为团长的七

七二团，就住在石拐镇。徐副师长是我的老首长了，这是西路军失败之后第一次见到他。别后重逢很有感慨。我把组建游击队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又请他给游击队讲话。七七二团还跟我们游击队搞了文艺联欢，因为我们游击队的知识分子多，女同志也多，所以节目大部分是我们出。朱霖和一个男同志上台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得台下嗷嗷叫，有的战士拉枪栓要打台上的坏蛋。当然没让他打。最后七七二团的老八路和我们这群新八路还联合唱了一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我还记得歌词大意：

炮火连天，战号频吹
决战在今朝
我们是抗日先锋队
英勇地武装上前线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坚决与敌决死战

这首歌唱得非常气势。开始我们游击队不大会唱，主要是老八路唱，唱了两遍，游击队的同志全会了。以后，这首歌也成了我们的队列进行曲。

在石拐开展的这些活动使游击队很开眼界。特别是主力部队严谨的战斗作风和紧张的生活秩序，给游击队很大促进。

“秦赖支队”威震太行

在石拐住了有半个月，赖际发同志领着榆次游击队也赶到了，他的队伍主要是晋华纱厂的工人，有一百多号人。

根据一二九师命令，我们这两支游击队再加上阳泉煤矿工人游击队，合编在一起，从此诞生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的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支队”。

“秦赖支队”共分三个大队。一大队即原来的平定阳泉煤矿工人游击队，大队长是尹立海，政治委员糜镛；二大队是赖际发带来的榆次晋华纱厂工人游击队，大队长齐开宏，政委李承文；三大队就是原来的太谷游击队，大队长成德发，政委侯维煜。全支队共有五百多人，我任司令员，赖际发同志任政治委员，朱效成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秦赖支队”时期，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当时的势力范围是十分可观的，管辖有辽县、和顺、平定、寿阳、榆次、太谷、祁县、榆社、徐沟等县，县长、县委书记都由我们委任。

从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三九年初，不到两年时间，秦赖支队就发展到五千多人，翻了十几倍。我们一边同敌人开展游击战，向敌人要钱要枪，一边组织生产。我们自己筹款、自己收税。赖际发住的那间房子，堆满了箱子，大箱子小箱子都是钱，这些钱都上交一二九师。赖际发的队伍从榆次出发的时候还带了许多布匹，码了一间房子，也

上交师里做军服。

赖际发同志负责领导地方工作和经济工作，我只负责

战斗，瞅准机会就干它一家伙。大规模正面集团作战不干，

主要是小打小闹，特别是拔据点锄汉奸，干得最有声势。我

一声令下，十个县一起行动。一夜之间能杀上百汉奸。所

以那时候汉奸们吓得嗷嗷叫，到处传说秦司令在石拐镇有个万人坑。那时候，秦赖支队在太行山区真是声名大振，拿

我的手令，到辖区内任何一个县政府要东西，要什么给什

么，没有的要说清楚。现在到晋中，七十岁以上的，许多人还知道八路军有个秦司令。几十年后，我在北京军区当

司令员期间，又专程到太行山去了一趟，我的老房东听别人喊我秦司令，感到很理解，拉着我的手问我：“怎么还

当司令呢？那时候就当司令啦，把日本鬼子打败了，把蒋介石打跑了，几十年也没进步一下？”我开玩笑说，我是个落后司令嘛。

第七章敌后抗战

“桂秦赖三个英雄各自为战”

在一二九师的统一指挥下，秦赖支队先后参加了粉碎日军“六路围攻”、“九路围攻”、东寨阻击战等战斗。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在辽县成立晋冀豫军区，军区按各基干支队活动地区，划分五个军分区。我们即为第一军分区，我任分区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分区部队实际上就是“秦赖支队”，对外仍称“秦赖支队”。

到了一九三八年六月，秦赖支队活动范围已达到晋中、晋西几十个县。为适应这一新的情况，一二九师及晋冀特委决定扩充兵员，壮大力量。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相当于团）。各大队设立政治处，营设党总支部，连队建立党支部，

自上而下健全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

一九三九年初，根据战斗形势的需要，晋冀豫军区决

定将秦赖支队和桂（干生）张（南生）支队合并为“八路军独立支队”，由桂干生任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独立支队归属晋冀豫军区指挥。

一月二十二日，驻正太线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在汉好的协助下，共出动六千余人，由阳泉、昔阳、平定等地

出发，分三路大举扫荡和顺、辽县地区。二十三日，日军占据和顺县城，又分三路向我根据地进犯。其中路沿和顺经寒湖镇至辽县公路，东路经松幡镇至辽县，西边还有一路。显然。敌人采用的是“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兵数路，齐头并进，互为策应。

我们支队几个负责人研究后决定打敌人的侧翼一路。因为我们的任务是阻击迟滞，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他们。打其侧翼一路，另外两路必然增援，这样他原定的战斗队形就被打乱了。而且我们无后顾之忧，进可攻，退可守，打了就走。待他恢复队形，游而再击。我们的方案是合理的，是符合毛主席和朱老总游击战争原则的。但不知为什么，军区首长坚持要我们打中间一路。我们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

一打，打出个麻烦。中间那一路是敌人的主力，两边的部队是保驾的，带有警戒的性质。中间一开战，两侧的队伍拉圈一样哗地一下就收拢了。就像一个大河蚌，敞壳晒太阳，你往中间一戳，那两扇蚌壳就合上了，弄得我们腹背受敌。没挡住敌人，自己还差点被包了饺子。

好在地形熟，我们左冲右突，费了很大劲才跳出包围圈，电台都丢到山里了。直到夜晚敌人开走了，才把电台找回来。

仗打完了，做总结，大家都有一肚子意见，部队也有情绪。我们三个主要领导合计了一下，仗打得这么窝囊，要向部队说明呀。谁去讲呢，桂干生不吭气，赖际发嘿嘿一笑，说：“还是请老秦讲吧。”

我讲就我讲，当时没往别处想。

在营以上干部会上，我发了言，首先是代表支队领导做检讨，找教训。检查完了忍不住放了一炮，我说按游击战争原则，敌分路合击，应打侧翼一路。这次我们打了中间是个失误。

这话一出口，可不得了，不知怎么就传到军区。军区主要负责人火冒三丈，当即给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发了个电报，扣了天大的一顶帽子：“桂秦赖三个英雄各自为战”。

不久，我们三人就被调整了工作。军区通知，我和桂干生同志到延安学习，赖际发同志调到军区政治部工作。

桂于生接到通知后就走了，我到军区转关系时，被黄镇同志留下来。他平时对我印象不错，认为我能打仗，说：“老秦，不要走，我们一块工作。”

我说：“组织上已决定让我去学习，我得服从，我这个工农干部，也需要往脑子里加点新材料。”

黄镇说：“我看还是边打边学吧。”

他态度这样诚恳，我也不好再争，经组织批准，我留下来当了军区司令部的作战科长，实际上等于除了职。这事我有点想不通，后来见到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我又把向军区提意见的经过讲了一遍。朱老总对我说：“坚持原则是对的，但方式欠妥。提意见要注意场合，要维护上面的威信。你在营以上干部会讲上级指挥失误，对军区威信有一定影响。”

朱老总一席话，讲得我心服口服。

还是那句话，共产党员不计较职务高低，叫干啥就干啥。

我又愉快地当起了晋冀豫军区的作战科长。副科长是

陈明义同志，还有一个参谋是黄以人。

作战科长当了不到半年，又任命我为参谋处长。当时没有参谋长，司令部一摊子业务都是压在我这参谋处长身上。

不久，为准备“百团大战”，一二九师在地方武装的基础上编了三个新编旅，我被调到新编第十一旅任副旅长。旅

长是尹先炳，政治委员是黄振堂（未到职）。

参加“百团大战”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下达了大举破击正大路战役预备命令。这次战役发动后被称之为“百团大战”。我们新编十一旅担负

邢台、内邱、临城这一段铁路的破袭任务。除此之外，也打了一些小仗。

说起来，跟日本人打仗很有意思，小鬼子比伪军汉奸

要难打得多，他死也不投降。有时候你追他追急了，他索性不跑了，回过头来跟你决战，弄得骑虎难下。如果撇开其他因素光讲打仗，那还是跟日本人打仗过瘾。他们军事素质好，武器也精致。特别是小口径迫击炮，我们习惯称它为“小钢炮”，体积不大，精度很高，威力也相当可以。落地开花一片，弹片到处飞射，杀伤力极强。而且专打机枪阵地，你机枪才响两声，他的小炮就掉过来了。我们游击队怎么能比呀？跟他们打，我们就依靠黑夜，特别是当他们处于优势的时候，我们就十分希望太阳赶快落下去，到了黑夜，就是我们的天下了。黑夜里，他的飞机下不了手，钢炮也看不见。我们不跟他摆开阵势打进攻防御，尽量避免正面交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打，披头散发，神出鬼没。打得他防不胜防，毫无办法，直骂我们土八路不懂科学，不按规矩，乱打一气，谁跟他按规矩打呀，你侵略到人家的国土上那算规矩吗？我把你打跑打得你叫饶为原则。

从七月下旬到十月底，在一百天的“百团大战”中，新编十一旅并率各县的独立营、民兵和参战群众，在南起沙河、武安，北至石家庄以南的数百里铁路线上，展开了全面大破击，先后攻占邢台、官庄、镇内等车站和临城县冯村、磁县渔阳等据点；炸毁铁路桥、公路桥多座，火车数列。在部队的掩护下，五、六千参战民兵、群众对邢台、内邱段铁路进行大破击，将六十里铁路全部破坏。

“百团大战”后，敌人对太行山就更加重视了，加紧了扫荡。

为了避免敌人的锋芒，新编的野战旅也分散了。我带领三十一、三十二两个团到了赞皇县黄北坪，组建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我任分区司令员，高扬同志任分区政委，胡震同志任副司令员，王远芬同志任参谋长，郭峰同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杨克冰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

这一时期，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

日本侵略者在“百团大战”中受到严重的打击后，重新估价各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力量”，针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策略和措施，确定了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

从一九四一年三月起到一九四二年秋季，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和整个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规模一次甚过一次，手法一次比一次毒辣。

一九四一年，日军对太行山区进行了三次较大的“扫荡”，至于小的扫荡，那就无计其数。他们还在根据地周围大量修筑公路、碉堡、封锁沟、封锁墙，在平汉路两侧构成两道封锁线，把这两道封锁线之间的大片地区廓成“无人区”，割断了太行区与冀南区的联系。

到了一九四二年，日军对太行山区的“扫荡”更为疯狂，五千人以上的“扫荡”即达四次，总兵力四万八千余人。在“扫荡”中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晓行夜袭”等战术，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梳篦式”清剿，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

的“三光政策”。

日军华北方面军对所属日、伪军下过这样的命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

有了这个政策，太行山遭的殃就可想而知了。

什么叫梳篦战术？日、伪军人挨人排着队，一遍一遍地搜索。别说人，就是只耗子也跑不掉。见人就杀，见粮就背，见牲口就牵，见房就烧。几梳子梳下来，太行山上找不到一只活牲口，统统搞光。为了保存骨干，中央决定将太行山的干部，有计划地送往延安。我也接到了去延安的命令，但军区把我卡下来了。不能都走哇，前面得有人啊。

当时留下来的干部，人称“咬牙”干部，就是硬着头皮咬着牙坚持。

留下来就得活下去。首先得解决吃的问题。我这个司令员，一天也只有半斤小米。

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就挎个篮子到田野里挖刺儿菜，自己洗净交到伙房。第二天，伙房就把这筐刺儿菜连同分给我的半斤小米一起，煮成稀饭，一天两顿。

战士们还拣玉米芯，碾碎了吃下去，拉不下大便，就互相用手抠。

整个太行山区还开展了开荒运动，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和政委李雪峰都上山挖地，还得砍柴。我一次能砍一百五十多斤柴禾，挑上能跑五十多里山路，在分区机关是第一名。那些参谋干事，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把柴交给伙房，一分钱一斤，司令员和战士都一样，没有一点特殊化。

大约一九四一年春，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同志到一分区检查工作，他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胳膊，肠胃又不好，我们千方百计地搞了一点粮食，保证他能吃得上烤馍馍片。我还几次带领警卫员到黄北坪的河沟里搬石头，摸鱼捉虾，用油煎了，给蔡主任下馒头。

说起来也是祸不单行，在日本鬼子残酷扫荡、洗劫的

同时，老天爷也来帮凶，连续两年，特大自然灾害侵袭太行山。

一九四一年秋冬两季，太行山一反常态，雨雪出奇地少，导致一九四二年春的干旱，这场干旱旷日持久，为历史上罕见，水井干涸，河流断源，土地龟裂，寸草不生。

伴随旱灾，其它灾害与疾病也蔓延起来。特别是虫灾，

空前厉害，蝗虫就像乌云，铺天盖地，发出巨风卷石般的

可怕声响，所到之处，跟日本鬼子一样，剥光吃光啃光，连

小孩都咬死好多。到了四三年三月，一场大雨又猛泻不止，清漳河、浊漳河猛涨，冲破堤岸，毁坏两岸良田一万五千

多亩。一九四三年太行区秋收平均只有三成左右，军需民食濒临枯竭的边沿。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对敌斗争，实在是困难重重。

勒紧裤带反“扫荡”

在最严峻的时刻，我们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克服了重重困难。我记得是在四一年四、五月，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指出：敌人从各方面加紧对我们进攻，国民党顽固派夹击，固然是形成根据地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工作上也有弱点。一些同志对局势麻木，在困难面前不知所措，有听天由命的思想，这对党的事业是极其有害的。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全区同志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性，用一切努力来克服目前的严重局面。”“谁要是忽视了这个事实，那不仅是麻木，而且是罪过！”

小平的口气是严厉的。他的这篇文章，在当时震动很大，因为天灾人祸，太行军民生存环境十分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意志稍微薄弱一些，就可能出现消沉、畏难情绪。小平的话，震聋发聩，断喝一声，让这些同志一个激灵清醒过来，振作精神，投入到克服困难、打开局面的斗争中去。

自从张浩政委因病去了延安，刘邓首长就走到了一起，我们也就从此在刘邓手下工作了。对于小平同志，那时直接接触的不多，但听说的不少。他是一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也是一个充满智慧并有着高超艺术的领导人。虽然严厉，但是可亲可敬，在警醒的同时，还教给我们方法。太行山局面当时那样严重，要打开局面，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同时，要围绕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具体地说，一是要加强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工作，贯彻党的各项政策。二是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加紧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三是要积极开展文化斗争，启发人民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戳穿敌人的奴化教育和造谣宣传。四是要加强锄奸斗争，严厉打击敌探奸细。五是要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采取一切有效步骤，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共同对敌。

现在回想起来，小平同志这一手是很硬的，有武打，有文打，有明的，有暗的，对于我们太行军民振作精神，树立坚强意志，克服困难，打开局面，的确起到了很大的鞭策作用。

小平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伟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在他的一生中，严于律己，也严于要求自己的

部队。一贯顾全大局，勇挑重担，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友邻。我还记得一件事。在敌后抗日时期，整个北方抗日军民都很困难。特别是贺老总所在的晋西北，那里

自然条件本身就on不好，再加上敌人“扫荡”、封锁，日子就更苦了。中央也没有明确提出来谁支援谁，只是把晋西北

的困难情况发了一个通报。刘邓接到这个电报后，心领神会，向太行山军民发出号召，要我们的军队、地方勒紧裤腰带，节约一点粮食支持晋西北。这件事使我们很受教育。因为我们本身也在饿肚子，在那样的情况下，尽管支持数量有限，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可以看出刘邓的心胸。也正是由于他们从来都是大处着眼，通览全局，所以才有了以后解放战争中的“千里跃进大别山”。也正是在刘邓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坚定不移地渡过了“百团大战”以后最艰苦的岁月。

那时候，我们坚信一条：我们困难，敌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也没有粮食吃，靠派部队去抢粮。我们就开展反抢粮斗争。还发动群众性的军事、政

治攻势。组织小部队进入敌占区，拔除敌薄弱据点，打击敌小股武装，镇压汉奸特务，伏击抢粮队伍。并警告伪军和伪职人员，不要帮敌人抢粮，为自己留条后路。

铁道游击队不光是山东有，我们分区里也有，不过我们没有正式取名为“铁道游击队”。我们也派出了许多小分队，扒火车、卸粮食，并组织群众搬运。

在虎口夺粮的同时，我们还组织部队抗灾自救，尽力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分区机关还搞了个赈灾义演，唱京戏，不卖戏票，来看戏的要交一点粮食。红薯、小米、包谷、什么都行，多少不限。实在拿不出粮食的，也欢迎白看。得到粮食用于救济没有粮的老乡。

我也上台演节目，扮演文天祥。司令部的参谋温锡扮演小皇帝，军务科长王乐天拉胡琴，电台台长曹泽远敲鼓。

帮助群众搞生产，我这个司令员也是首当其冲，挑大粪我比参谋干事都挑得多，不亚于农民把式。

那时候虽然艰苦，但我们不叫苦，也不光是消极地吃苦，总是在积极想办法改变这种艰苦的状态。军队嘛，要的就是那么一股气。

环境再苦，指挥员不能叫苦，邓小平政委要我们打开局面，我们不能睁眼看着部队成天被苦水泡得无精打采，被个“苦”字压得抬不起头。要让部队吃糠咽菜还得精神饱满。冻得直打哆嗦，你让他唱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马上就是一身热汗。

还是在当游击教官时，我就深深体会到活跃部队文化生活的重要性。现在生存环境越来越艰苦，更需要加强文体活动。我们开展的活动很多，篮球、单杠、双杠、木马，我们都有，室内有象棋，我喜欢玩篮球，在一分区当了多年的篮球队长。

搞自行车比赛，看谁能在尺把宽的地埂上如履平地。解放后有的电影拍武工队骑车进城玩绝技，杀汉奸取情报的镜头，这并非胡编乱造，是有生活依据的。我们的武工队员大多来自农民，原来只会玩锄把子，但是后来把自行车当马骑，骑得确实腾云驾雾，牛气得很。

还有一种活动是打棒球，玩这玩艺是我们跟俘虏过来的日本人学的，到最后他们还打不过我们。

我们收缴的物品中有一架老掉牙的照相机，我和陈明义找人教照相，学会了，自己拍照，自己配药洗照片，都是土办法，太阳底下曝光，读数记时，这在一分区堪称一绝。

我的观念是，军人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玩。能吃能睡能打能玩，这也可以算是革命的乐观主义。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三日，日军步兵第一旅团七十三大队一千余人，携钢炮三门，重机枪二挺，轻机枪数十挺及掷弹筒等重火器，在近腾大队长的指挥下，分两路向一分区驻地将军墓、营头发起突然袭击。一路由梅花经龙门、土门至宋家庄；另一路分为两股包围下坡子，以大腿从河里乡以北山地控制下坡子后山，小股顺立羊河西进，这一路共三百余人。

两路敌人于上午进至上坡子盖家嘴北山高地。当时分区主力三十一团已去邢台运输物资，家里只剩下分区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少量兵力，分区多数领导同志也因开会和参加地方工作而不在家。

情况十分危急，我和在家的政治部副主任杨克冰同志带领特务连仓促迎

敌，以一个排赶到两店牵制宋家庄之敌，并掩护分区医院转移。我自己带领另一个排在专署警卫队二十余人配合下，占领下坡子制高点阻击敌人，掩护机关及群众转移。

敌人以几十倍于我们的兵力和绝对优势于我们的兵器，向下坡子发起数次冲锋。我们则凭仗有利地形和灵活的游击战术，坚决抵挡，直至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完毕。

这次战斗，敌众我寡，人人参战。我和杨克冰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我们的武器差，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我自己垄断了一门迫击炮，专打敌人机枪阵地，杨

克冰则帮我寻找目标，并报告射击效果。我一边打，她一边喊：“司令员又打掉一个火力点，鬼子小队长不见了！同

志们要打准啊！”杨克冰同志虽然是个女同志，但临危不惧，协助我指挥，对鼓舞士气，稳定军心起了很大作用。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要为克冰同志这位巾帼英雄写上几句。

杨克冰同志原先在平津做兵运工作，是知识分子干部，虽然是女同志，但非常勇敢泼辣，为人耿直，原则性强。在分区领导层中，她年长几岁，所以，把我们都当弟弟看待，谁有缺点，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副司令、副政委，她都直言不讳，毫不客气地批评。我们工作取得了成绩，她心里高兴，嘴里却不断叮嘱：“不能骄傲呵！”部队上没有喊她名字的，一律喊他“杨大姐”，包括上级有些首长也这么喊，刘伯承司令员都这么喊。“杨大姐”成了她的名字，我们喊了五十多年还在喊。全国解放后，克冰同志一直在辽宁工作，但我们之间联系不断，彼此都关心着。去年我做手术，她每三四天就要来一次电话询问病情。

一九四二年春节前后，我奉命去北方局参加为期不长的学习，因政委郭峰同志还兼着地委书记，所以我们交待参谋长王远芬同志主持分区工作。

就在我走后不久，分区接连发生了几件事。

当时由于条件艰苦，部队必须自己想办法改善生活，分区的主力团三十团的两任团长，都因为到野草湾河沟里炸鱼，被手榴弹掀飞的水下石头砸死。

接着，又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战斗失利。

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份开始，敌人集中一万二千人，向太行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企图“捕捉”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机关。在一次战斗中，我们基干团七连为了掩护机关转移，从外地驰援黄北坪，但半途遭敌伏击，大半牺牲。

短时期内，连失两员战将，还有一个能攻善战的连队受到重创，我是很痛心的。当时王远芬同志的精神压力也很大。我从北方局党校回来之后，对上述几件事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结果表明，王远芬同志不应负主要责任。后来我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分析事故和失利的原因，实事求是地做了结论。

为了打消王远芬同志的顾虑，让他总结经验教训，放手工作，我向太行军区汇报时主动承担了责任。我认为两起事故虽然是在我离职期间发生的，但苗头早就有了，用手榴弹炸鱼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作为，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作为司令员，没有对此引起警觉，应算失职。

关于七连受损失，仗虽然是最近才打的，但部队在此住的时间长了，暴露了目标，有些规律被敌人掌握了。同样，作为司令员我早应料到而没有料

到，缺乏应有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也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我这样做，并不等于无原则的庇护。我的想法是很明确的。仗打输了，事故出了，原因也查了，那么就应该有结论。该枪毙的枪毙，该撤职的撤职。但调查的结果表明，主持工作的同志没有失职，他还要工作，既然要工作，就要为他创造工作的条件。我是个老同志了，多承担点责任算得了什么呢？

我对这件事的处理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赞同，王远芬同志也很感激，工作中更大胆更放手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人在前几次扫荡失败后，更加疯狂，发动了规模更大的“五月扫荡”。五月十七日，日军出动二万五千余人，向平定东的测鱼镇、赞皇的黄北坪、邢台的浆水、将军墓一带连续合击，于二十四日控制了太行区北部制高点峻极关。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滕代远带领的一部分机关干部和部分抗大学员被敌人包围在浆水镇一带，恰遇我分区电台队长曹泽远从涉县执行任务回来，遇上扫荡，也到了浆水镇。

罗、滕身边几乎没有战斗部队，而总部机关和抗大正是日军重要目标，情况十分危急。罗主任和滕副校长急中生智，指示曹泽远开机与分区联系。当时我们已跳出了包围圈，分区压力逐渐减轻，接到曹泽远的报告后，我们立即为总部和抗大的同志们选择了转移路线，组织部队接应，以一部突袭进攻敌军，调动敌人注意力。连夜把罗、滕及所属人员“枪”了出来，化险为夷。直到建国后，我在北京见到罗瑞卿和滕代远两位首长，他们谈及此事，仍然感激不尽，说：“那次不是一分区损失就大了。”

我说，“在那种情况下，一分区挺身而出，是责无旁贷的事，谢什么呀。为了总部和抗大的安全，一分区拼光也是值得的。”

“格子网”里抓鬼子

一九四二年六月，为了扭转严重的局面，太行军区结合反“扫荡”斗争，部署了全面的反“蚕食”斗争。我们组织边沿地区的县区游击队、武工队、敌工站、公安局等一起参加，声势浩大，效果显著，使接敌区域的许多维持会土崩瓦解。

日军离开本土，远道侵入中国，兵力严重不足，许多据点都是伪军守的，只有重要的城镇、桥梁、关隘才是旧本人守。

伪职人员都知道日本人兔子尾巴长不了，都想为自己留条后路。所以他们一面敷衍日本人，一面为我们的武工队、游击队和民兵提供方便，传递情报。

我们一分区基干武装及临城、内邱民兵，不仅打击向根据地修路之敌，而且组织县（区）游击队、武工队，跳到敌人“蚕食”的格子网中开展游击活动，培植与发展了各种形式的秘密群众武装，对敌开展了隐蔽与公开的斗争。使深入敌后的武装成为第一线，而在正面抑制敌人前进的武装为第二线，正面坚持与敌后游击相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蚕食”。

在一次反“扫荡”的前夕，为了获得确切情报，太行军区李达司令员号召各分区抓俘虏，而且明确说了“要抓

日本人，最好是个官。伪军抓了没用。”日本鬼子不好抓，我们抓了一个多月都没抓到。我接到报告后，很不服气。我就不相信日本人有三头六臂，决心抓个活标本回来给大家做动员。

我带了基干团一个排，到井陘和获鹿一带等待时机。这两个县都是日本人的模范县，鬼子的统治比较严密。我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还恰恰地冲着“模范县”来的。一是“模范县”里敌人往往麻痹；二是因为从模范县里抓个活的

回去更有说服力。

到了井陘后，我就把当地抗日政府的领导和敌工干部、武工队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听他们介绍情况。他们在介绍

的情况中，有一点引起了我的重视，这就是日本人的通信方式。他们各碉堡之间没有电话，但每天有两次定时联络，靠的是人工传递。因为都是他们的天下，所以他们有些不在乎，出来联络时，有时两个人，有时一个人，骑着毛驴，倒背大枪，从这个碉堡到那个碉堡。

情况摸定，我的决心也定下了：就抓他的联络兵。

当然，这一计划必须渗入到敌人腹地才能实施。孤军深入，大纵深，远距离，敌情复杂，地形生疏，行动起来是很危险的。

话说回来了，不危险能叫打仗吗？我当然希望四平八

稳坐在家从天上掉下来个俘虏，但那是不可能的。

决心已定，我让人准备了两副绳子，一根木杠，挑了三个人，交给排长带着。为什么要带上绳子和杠子呢？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很厉害，死不投降。日本兵身体强壮，又训练有素，有的还会柔道和空手道之类。你去抓他，既要对付他拼命，还要防止他自杀。我跟排长如此这番交代清楚，行动便开始了。

那是秋天，大约就是八、九月间，高粱还没熟透，青纱帐正好藏身。我们的捕俘小组一直钻进快跟元氏接壤的一个镇子旁边，在敌两个据点的必经之路上潜伏下来。

果然，当天就有一个日本兵骑着毛驴，摇头晃脑地向另一个据点走去。

一走进设伏点，我们的四个同志从天而降，他还没回过神来，脚就被捆住了。就这样的神速，我们那位排长的手还是被他咬下一截手指。

这个日本兵撞到我们手里算是倒大霉。用脏袜子把嘴一堵，两只手捆在一起，两只脚捆在一起，大木杠子中间一插，抬猪一样抬回来了。那种姿势，他想放个屁，恐怕都放不出来。我们本以为联络兵身上应该带保密文件，但抬回来一搜查，什么都没有。他们这种联络是口头的，审问他，拒死不讲。后来这名俘虏被送到延安反战同盟了，听说表现还不错，抗战胜利后被放回日本。

第一次做外事工作

在一分区工作期间，除了对付敌人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扫荡外，我们一般不主动与敌正面交锋，而是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加强抗日武装建设，开展普遍的群众性游击战争。

尽管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但也使我抗日军民更加坚强，更加成熟。这一时期，除了指挥作战和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工作，分区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放在地方武装建设上。

在最紧张的环境里，我也没有放弃学习，记日记仍然坚持不断。警卫员心眼也够用，挎包里背上日记，每晚睡觉前，便把日记本送上来，在老百姓家里的炕桌上，借着油灯，一条二条，一件事两件事，原封不动地记下来。过了些日子就进了一步，日记由原来的单纯记录，发展到写对事物的思考、见解，后来又发展到总结经验教训，有时也抒发一点感情。在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建设的同时，我比较注意对细节事物的思考，尤其注重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根据切身体会，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前提下，我就地方武装的特点撰写了一篇文章，从地方武装的群众性与地方性、坚持性与顽强性、全面性与复杂性、分散性与广泛性几个方面阐述了我本人对地方武装建设的见解。这是我第一次把实践经验同理论结合起来，系统地全面地阐述自己在某一领域里的思想。这篇题为《地方武装的特点》的文章后来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受到上级机关和部队的好评，认为论证充分，材料翔实，对当时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漫长的抗日岁月里，曾经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还有其他国籍的一些朋友。直接参战的有美国空军。有些飞机在作战中被击伤或坠毁，飞行员均得到我太行抗日军民的救护和照顾。

一九四四年后，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即将度过最困难的时期，黎明的熹微渐渐地显现在太行山的上空，我们由敌进我退转变为局部的反攻，并且已初步具备了全面反攻的条件，根据地的形势一天好似一天。

十二月下旬，太行军区通知我们，有个美国朋友要到一分区来，一是为了向曾经救护过美国飞行员的抗日军民表示感谢；二是作为盟军观察员了解我根据地抗日斗争情况。

到一分区来的惠德赛先生是个中国通，大个子，高鼻梁，说话叽哩咕噜。大半中国话夹点洋文，性格比较豪爽。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和第一专署专员杨维同志、分区政治部主任王大任同志会见了惠德赛，我就本区周围敌情和我军斗争情况向他作了介绍，杨维和王大任同志作补充发言，主要谈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和军民关系等情况。惠德赛对分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得以顽强生存并连续不断地打击日军，表示由衷的敬意，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正式介绍完了，我们又给他讲故事，讲怎样钻进格子网里抓俘虏，讲怎样把布纳的旧鞋底卡在铁轨上颠覆敌人的火车，讲怎样割敌人的电话线又不致于影响群众，讲得惠德赛眼睛瞪得老大。讲一段，他就大叫一声“好！”故事讲完了，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接待的条件自然有限，东西全是土产，但我们把朴素的宴会办得很热火。说来饶有趣味，我用我们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把这个洋大哥灌得人仰马翻。开始我们只是劝酒，什么“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干杯”啦，什么“为打败法西斯

取得最后胜利而干杯”啦，为他“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而干杯”啦，这些话一说，他高兴得嗷嗷叫，“呵-噢-干！”“嗯-欧-干”，脖子一仰一杯下去了，做个鬼脸又是一杯下去了。

这个美国朋友确实很豪爽。我说一句他喝一杯，绝不含糊。我当然也不含糊，拿大碗跟他碰。不多一会，他就酩酊大醉。

惠德赛先生在一分区住了好几天，我还陪他打篮球。那时我们打球成癖，星期天就组织机关干部比赛。跟外国人打，大家更来劲。

除了打球，我还给他照过像，用的就是那架缴获的“卡得尔”。那机器恐怕也有一把年纪了，到我手上使唤起来不怎么灵便，但我仍然爱惜得要命。

分手的时候，惠德赛送给我一支袖珍手枪。他说，在一分区这几天，是他在整个敌后之行中所度过的最愉快最受启发的日子。他把我们看作他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我们一分区的干部战士对惠德赛先生的印象也很好，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助是真诚的，对中国人是友好的。

让人痛心的是，惠德赛先生离开我们之后，在二分区遇上了敌人的扫荡，不幸牺牲了。后来听说，他的日记里有他在一分区时的观感以及对我个人的印象。

第八章长缨在手

千军万马下太行

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华北敌后军民开始向日军发动局部反攻，这标志着敌后战场已经居于对日反攻的重要战略地位。我抗日根据地军民抓住日军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和正面战场的有利时机连续发起攻势作战。

一九四四年初，太行山抗日军民向敌人发起声势浩大的春季攻势，我分区部队踊跃出动，仅在二月份前半个月，就收复了伪军驻守的二十八个据点，一举摧毁了敌伪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其他分区部队也分别获胜。

春季攻势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太行区军民发动局部反攻的信心。

五月，太行军区又发出保卫麦收的命令，要求各分区部队和县大队、独立营、民兵，全力以赴保卫麦收，并乘势向敌占城镇据点发动夏季攻势。

我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向临（城）内（邱）段的第二道封锁线发起攻击，拔掉十四个据点。经过春夏两季攻势，平汉路两侧敌人包围太行山根据地的第三道封锁线大部分被摧毁。

一九四五年，我分区乘胜进击，不断扩大战果，纵横征战，连战连捷，进入了抗日战争的辉煌时期。

一月，分区部队主力和昔（阳）东独立营围攻昔阳县城东南三十余里处的凤居据点，经过了三天激战，于二十六日收复凤居村，俘虏伪军中队长以下四十六名，缴枪四十六支。

四月下旬，在太行军区的统一指挥下，我分区和二、三分区联合作战，发动收复和顺、辽县等据点的攻势。我分区十团、昔（阳）东独立营、和（顺）东独立营，攻击和顺县城，于四月二十八日收复和顺县城。

六月初，我分区部队在二分区的配合下，发动元（氏）获（鹿）战役，攻克了元氏、获鹿、赞皇境内几十个据点，歼敌四百余人。

自从进入反攻以来，我分区部队所向披靡，积小胜为大胜，大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为进一步出击平汉线，夺取太行山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强的基础。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八月九日，毛主席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武装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八月十日，朱总司令发布了进军命令，要求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对日伪军发出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抵抗则坚决予以消灭。八月十二日，太行军区政治部发布紧急政治命令，立即在全区进行紧急政治动员，向敌伪军发起政治攻势，严防敌人的阴谋，揭露和打击一切窃取人民胜利果实的阴谋诡计。军区司令部同时发出通牒，命令太行山区周围日军立即停止抵抗，缴出全副武装，命令伪军立即反正听候编遣。

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日军大本营在下达“停止战斗行为”的命令同时，又命令日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自己可以采取战斗行为”。由于日军宣布投降又不放下武器，所以我们的反攻作战仍然继续进行。

八月十七日，太行区党委和大行军区指示各分区迅速动员，将现有小团一律扩编为甲种团，并将较强的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

抗日战争形势急剧好转，反倒令蒋介石措手不及。他以“最高统帅”的名义，令我军“就地驻防待命”，企图垄断受降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风风火火地调兵遣将，占领要道。

我们当然不买老蒋的帐。

我党的方针是，寸土不让、寸土必争。

大旗之下，我分区部队奉命出击平汉线。

此时，分区领导有了很大变化，郭峰、杨克冰等同志已先后调走，冷楚同志任政治委员，胡震同志任副司令员，王远芬仍任参谋长。

八月十七日，我们在赞皇县的李川沟进行了一次阅兵，由十团团长向守志担任阅兵指挥。我向部队做了反攻动员，主要是给大家勾画了大反攻的形势：日本法西斯完蛋了，蒋介石却不肯罢休，一面邀请我党代表到重庆谈判，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但由于他们当初“溜得太快”，“向后转”需要时间。敌人现在是锣齐鼓不齐。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近水楼台，所以抢先登场。胡宗南要从陕西抽身赶来抢夺果实，还有一个过程。孙连仲远离华北，鞭长莫及。根据这种态势，刘邓首长决心集中太行、太岳主力，先打阎锡山，挫其在晋锐气。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已带七个团的西进支队出发，其中包括我们分区的三十一团。一分区在家部队的任务是出击平汉线，由北向南，收复失地，开辟战场，准备对付蒋介石更大规模的内战。

会场气氛热烈，口号声此起彼伏。当我最后宣布首战赞皇时，战士们一片欢呼。阅兵完毕，部队和民兵、民工分成数路，浩浩荡荡杀下太行山。

赞皇县城是日伪设在太行山区当面的一颗钉子，在大反攻初期，一分区军民收复了该城周围的据点，残敌退守赞皇城。其时，城内敌人有日军一个加强小分队五十人左右，伪军六百人左右，另有联庄会的敌伪其它人员五百人左右。

在解放赞皇的前两天，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将朱总司令下达的反攻进军命令送进城里，并于八月十七日给伪军小队长以上的军官发出了劝告投降的书信，向他们指出，投诚者前途光明，抵抗者死路一条，我军最后胜利在即，敌伪末路已至。

八月十八日，我军包围赞皇，十团和分区特务连在城西南，临城独立营在城西，赞皇独立营在城东北。部队兵力有八百人左右，另有三千多民兵、自卫队散布在城周围各处虚张声势。

我们首先对敌进行了一昼夜政治攻势，组织数十名伪军家属喊话。母亲唤儿子，妻子喊丈夫。规劝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诚。

这一手很灵，当时的场面也很感人，几十名老人、妇女站在据点外，声泪俱下，钦石心肠的人也难免为之动情，再加上眼看日本侵略者大势已去，我军又兵临城下，四面楚歌，使敌军心严重动摇，甚于惊弓之鸟。

八月十九日下午，城内日军钻进城北高粱地向元氏逃窜。傍晚，我指挥部队进行了半小时火力攻击。此举并没有完全消灭敌人的意思，主要是敲山震虎，再吓唬他一下。果然，伪军大乱，溃不成军。晚十点左右，又有一部分伪军向元氏逃窜。

我军城内敌工站的同志，由南城墙攀绳跳下，向我报告：“伪军已乱，正在逃走。”我当即指挥部队由南门登城，拿下了城东南敌人核心地堡，同时，兵分两路追歼逃敌。

二十日，逃敌全部投降，至此，我军完全解放了赞皇。

解放后的赞皇城，到处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拥护抗日民主的县政府！”“欢迎解民倒悬的八路军。”一位白髯老翁作为人民政府的第一批客人，乐呵呵地坐上县长的“交椅”，说：“世道真是变了，穷人能看见这样

的世面，死也不冤枉！”几个年轻妇女感激地对我们的哨兵说：“现在走路可不用再担心啦！”

进攻进攻再进攻

解放赞皇，首战首捷，我分区部队士气大振，稍作休整，即于九月上旬挥戈南下，直逼临城。

就在我们解放赞皇的当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并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原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由我接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李雪峰任政委，黄镇任副政委，黄新友，赵辉楼任副司令员，何正文任参谋长，袁子钦任政治部主任，辖一至八分区。我因担负出击平汉线任务，未去太行军区报到，仍以一分区司令员身份指挥一分区作战。

临城驻有伪军警卫队、警察队、特务队共约七百人。赞皇被我军解放后，兔死狐悲，临城的敌人也陷入恐慌之中。伪县长寇宏漠，伪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吴荫溪，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他们一方面对“国军”北进抱着幻想，一方面又

拿不准何时祸从天降。整天提心吊胆，有的请算命先生为其面卜凶吉。伪政府的官吏白天还硬着头皮呆在机关，一到晚上就钻进炮楼，以防不测。

我分区参战部队有十团、五十团（原昔阳独立团）、临（城）内（邱）独立团和分区特务连、工兵连、侦察队，共两千余人，另有民兵两千余众。

九月八日，我军分路疾进，直逼临城。

曾几何时，我们在这一段路上，只能小心翼翼地隐蔽游击，夜行晓宿，行踪飘忽。如今，我们作为胜利之军行动，一路行军一路歌，威风凛凛，势不可当。干部战士心中好不得意。

下午三时左右，部队和尺兵均到达黑城，在黑城戏楼前集合。我向部队作动员讲话，历数日伪军和汉奸卖国贼们对临城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要求部队奋勇杀敌，为民复仇。

八年之中，晋冀鲁豫人民被杀、被残害、被奸淫、被抓劳工的人数达二百多万，无村不带孝，四处是狼烟，这些铁的事实激起了干部战士的深刻仇恨，会场上啜泣成声。

十团有个连长，声泪俱下地表示决心：“冤有头，债有主，不为老百姓讨还血债，我们就白吃了人民的小米，请领导批准我们连为攻城突击队，活捉吴荫溪！”民族仇、阶级恨，如同澎湃的浪潮，大大地激发了部队的士气。十团和五十团还提出展开战斗竞赛，看谁先登城，先突破，先解决战斗。

九月八日下午，部队将临城四面围住，具体部署是十团主攻城北，五十团主攻城东。

晚九时四十分，战斗先在北关打响，十团部队通过火力威逼和政治瓦解，迅速拿下城东死角普利塔附近的炮楼，守敌全部投降。

紧接着，五十团也登上了东城墙。

虽说地方部队武器装备很差，攻击能力不强，但指战员们都有一种为民复仇、义无反顾的使命感，作战非常勇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刚刚补进来的新战士，有的连枪都没有，揣两颗手榴弹就跟老战士一起爬梯子登城。有的同志直到牺牲了，还没穿过一套八路军军装。正是凭着这种压倒一切的气势，战斗进展比较顺利。

两个团突破后展开激烈巷战，歼敌大部。残敌退守城西南角和西北角两个炮楼。

西南角是个核心炮楼，砖石结构，比较坚固。寇宏漠、吴荫溪带着百十人据此负隅顽抗。

九月九日拂晓，我带着几名参谋，沿着掏成洞子的民房，运动到距离这个炮楼三十米的地方，抵近指挥。我的嗓门大，操起铁皮喇叭筒向里喊话：“你们不要打了，给你们自己留条后路吧！继续与民为敌。我们就彻底消灭你们！何去何从，快快选择！”

寇宏漠、吴荫溪拒不投降，煽动伪军拼死效命，并且以钱买鬼，规定一个手榴弹的拉火环可领十元伪币的奖酬。敌人竞相往炮楼外投手榴弹。霎时，硝烟弥漫，弹火横飞。

这一下，战士们被激怒了，我也有些冒火，抄起一挺轻机枪，瞄准炮楼的射击孔，一梭子打出一个哑巴。

我已记不清楚是谁最先把民房的墙壁扫出窟窿，形成了我军运动的通道，但是这既成的事实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它能使我军隐蔽接敌，避开在开阔地上冲锋时可能遭受的杀伤。说起来，这要算是我部最早的“近迫作业”。当时我们工兵就是利用这些墙洞和断壁残垣，隐蔽接敌，一直抵进到敌人的炮楼下面，安装炸药包，把敌人的炮楼炸了个大窟窿。吴荫溪见势不妙，企图夺路逃命，被当场击毙，寇宏漠和其余敌人缴枪投降。

随后，城西北角的炮楼也被我军用炸药轰开。

到八时三十分，战斗结束，我全歼守敌一千余人，其中生俘六百多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至此临城县全境获得解放，八万人民重见天日。

全城鼓乐喧天，市民箪食壶浆，夹道欢迎部队入城，还用民间小调编了一支《八路军打临城》的歌，歌中唱道：“九月八日夜，八路打临城。大炮咚咚响，机枪咯嘣嘣。好象那过新年，放炮起五更。……战士们真勇敢，个个逞英雄。活捉寇宏漠，吴荫溪丧了命……八路进了城，民众来欢迎。送来牛羊肉，犒劳咱子弟兵。抗日战争大胜利，百姓得太平。”

大反攻也是大发展。

我们以自己的义举感召群众，群众也用自己的真诚追随我们。黄河之水上来，人民的军队从群众中诞生、发展、壮大。刚下太行时，十团只有五百来人，打完临城一下子就扩大到两千八百人。不少稚气未脱的侦察员、警卫员，此时都迅速成长为基层指挥员了。

队伍越打越兴旺，我们的攻势也就越来越凌厉。

九月十六日，五十团和临内独立团以及部分民兵合攻内邱。攻击发起二十分钟，部队就从两处登城突破，不到一个小时解决战斗。我军共毙、俘伪军三百余人，缴枪两百多支（挺），掷弹筒两具。

九月二十日，临内独立团遣一部兵力北上与高邑独立营包围平汉路东之高邑县城。攻城部队和打入敌人内部的敌工人员互相接应，兵不血刃，轻取该城，缴枪二百余支。

这样，我们兵锋所向，连下四城，并顺势收复鸭鸽营、冯村、镇内、官庄等车站，基本上扫清了分区范围内的敌伪残余据点。

此后，我们根据中央和晋冀鲁豫军区关于彻底破除所有铁路，以迟滞法西斯分子北犯之行动的指示，发动赞皇、临城、内邱、高邑四县十三万群众，

对平汉路元氏至内邱段进行大破袭。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不分男女老幼，整村整村地出动，分段包干，把铁轨抬进山里，把路基挖成大坑，扔弃碎石，焚烧枕木，炸毁车站设施和桥涵……整整五个昼夜，这段铁路被搞了个天翻地覆，面目全非，再想修复那可真是太难了。

我们一分区的这段反攻行动，既是在上级总的意图下实施的，又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当时主力西向，三十一团抽走，我们手头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利用了日军回撤石家庄，各县伪军依托孤城收缩自保，互不应援的有利形势，乘胜席卷，抢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前面。其意义不仅仅是光复四县全境，而且为发动群众，组训军队，开辟战场和准备应付新的战争局面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部队由分散到集中，逐步熟悉新的作战形势，不断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也使我们拥有了捍卫胜利果实的更强大的物质手段。

出击平汉线

就在我军大反攻步步开展之际，国民党也在紧锣密鼓地争夺抗战胜利果实，阎锡山悍然抢占了上党六城。为避免日后蒋军大举北犯时我可能陷于两面作战，刘邓首长毅然发起上党战役，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剪除心腹之患，然后挥师东向，堵截平汉方向的敌人。

蒋介石督阎力战，企图把我们的主力旷日持久地拖在坚城之下，从而加快他抢占平津，运兵东北的战略步骤。

局势变化很快。西边胡宗南趁我太岳部队无暇西顾之际，在同蒲路上全速推进，先头已出正太路逼向石家庄。南边孙连仲的三个军已侵入新乡、汲县，并与孙殿英部汇合，伺机北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主要机动走廊的部署基本形成，咄咄逼人，平汉线方向顿时成为牵动全局的关节。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为了先机制敌，尽管上党战役方兴未艾，刘邓首长还是日夜兼程，从西线赶回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涉县赤岸村，首先组织以邯郸为主要战场的邯郸战役。刘邓号令“将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加强平汉线作战。”并指出：“集中意志，集中大军是争取胜利的关键。”

在这种背景下，由我率领一分区十团、五十团和六分区二团共同组成太行一支队，我任司令员、六分区司令员何正文同志（已下命令为太行军区参谋长，同我一样未到职）任副司令员，率部队继续南下，会合冀南部队共同解放邢台。

邢台是平汉路上的一个中等城市，向为重镇。兵书上说，此地“西带上党，北控常山（今石家庄正定一带）”是“河北之襟要，河东（山西）之藩蔽。”一九三七年沦陷后，邢台成为伪顺德道尹公署所在地。日本人和大汉奸、伪华北治安军司令高德林狼狈为奸，在此经营多年，修筑了碉堡、兵营、仓库、机场，甚至还搞起了一个能生产步枪、手雷的兵工厂，抗日战争时期，邢台是日伪“扫荡”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基地。

抗战胜利，日军撤出邢台，高德林也被蒋介石委以石家庄先遣军司令重任，于九月十日至十三日率部开拔。抗战期间躲在外地苟且偷安的国民党河北第二十二区督察员任晓敏浑水摸鱼抢了这个空档，成了邢台的“接收大员”，他网罗了附近九县的逃亡伪军三千多人，编成四个旅，成立了所谓“保安司令部”，自任司令。并将一些杀人如麻，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充任各旅旅长。就这样变戏法似地，邢台又换汤不换药地成了国民党的地盘。

九月二十日，我太行一支队和冀南军区四分区司令员胥光义率领的冀南二、四分区部队协力廓清了邢台外围。

之后，为了协调攻城动作，两支部队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开了碰头会。我当时虽然尚未报到，但已明确是太行军区司令员，自然而然地担负起牵头指挥的责任。碰头会决定统一调整部署，分头组织实施：太行一支队从北门突破；冀南二分区部队从东门突破，同时攻南门；冀南四分区部队从西门突破。

几个不同建制的部队，来自于太行、冀南两个军区，为达成一致的作战目的而主动协同，充分体现了革命军队毫无私念、团结战斗的风格。这件事，后来曾多次受到晋冀鲁豫军区领导同志的表扬。

邢台城防坚固。砖石砌成的城墙高三丈六尺，城头筑有明碉暗堡。四面都有三道城门组成的“瓮城”。护城河两丈多宽，水可没人。护城河外布有鹿岩、铁丝网。城内粮弹充足，守敌有恃无恐。

为了确保攻击顺利，各部队按照统一部署，认真进行了攻城准备。指挥员多次勘察地形，选择突破口和攻击路线。根据攻打临城得来的经验，我让部队构筑出发阵地，向敌挖掘地道，组织登城演习，进行爆破试验。

文工团每天晚间在城外演唱节目，宣传胜利形势，鼓舞群众情绪。政工人员向伪军家属交待政策，鼓励他们配合我军做瓦解工作。附近各县地方党和政府全力支援，仅邢台一县就动员了两千名民兵和一万多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帮助部队造云梯、挖地道。军民同仇敌忾热火朝天的宏伟场面，代表了不可违拗的历史趋势。

九月二十三日夜十一点，总攻开始。

太行一支队十团主攻北门。

北门上有敌人的一个连。战斗发起前，部队已经在接近城门的地方绑好了炸药包。进攻战斗打响后，三连九班十名战士头顶着用水打湿的棉袄，冒着炮火，及时地送上去一百公斤梯恩梯炸药。那时候我们缺乏科学知识，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多厉害，破坏直径有多大，恐怕是因为算得不精确，导火索太短了。很快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烟雾冲天而起，直上云霄。只觉得脚下的大地猛地往上一跳，偌大个邢台城都颤抖起来。

城门炸开了，整个城楼炸飞了，砖石瓦块连同敌人的尸体被气浪甩出几十米高。但是九班的战士也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用自己的头颅和热血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路。想起这一幕，我至今仍感痛心。

当时，我和向守志同志就在十团的指挥所，距离城门只有七、八十米，目睹战士们的壮举，我们泣然仁立，沉默了很长时间。

北门的爆破，来得突然猛烈，把敌人吓懵了。十团的勇士们像潮水一样冲了进去，一口气打到高德林的公馆，基本上没遇到有组织的抵抗。

十团团长方守志同我一道实施跟进指挥，随部队突入城内。当我们走进作为指挥部的高德林公馆时，已见不到敌人一个人影了。房子里电灯虽然还在亮着，但满地都是公文杂物，可见逃跑敌人之狼狈。

之后，我们随搜索部队来到天主教堂，看到教堂的玻璃全部粉碎，大约是三连九班那一百公斤梯恩梯的杰作。修女们不知我们是什么人，吓得要命，我们又解释安慰一番，她们才放下心来。

四十二团由北城墙两段发起攻击，扼守之敌是内邱的土匪，装备甚好，有不少日本人的歪把子机枪。四十二团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登城。尖刀排的战士每人提一篮子手榴弹，一边攀梯子，一边向城墙上甩手榴弹，前仆后继，终于占领了城头。

冀南二分区部队在火力掩护下，竖起十多架云梯，与城东头的敌人开战，迫其溃退。冀南四分区部队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全部控制了西城墙。

这时，北门、东门、南门都燃起了漫天大火，邢台城硝烟弥漫，机枪、手榴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敌人在我三面夹击下，已成乌合之众，纷纷向南门溃逃。但是，南城门早已被他们自己用麻袋装土堵死，短时间内根本打不开。城上又有冀南四分区部队居高临下。

两千多伪军欲逃不能，只好挤在不足六百平方米的南门洞内听天由命。我军随即展开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欢迎弟兄们反正！”枪声、炮声、喊话声交织在一起，山穷水尽的伪军被迫放下了武器。

九月二十四日四时，晨光熹微，战斗全部结束。除任晓敏等少数头目缀城逃跑外，其余守敌悉数被歼，俘获大汉奸何梦久以下官兵二千三百余名，

缴获轻重机枪三十二挺，迫击炮一门，长短枪二千一百多支，汽车十辆，战马百余匹。

邢台解放当天，建立了邢台市人民政府，全城一片欢腾，市内各建筑物插上了鲜艳的红旗，张贴出喜庆的标语。

位于市中心的中国大戏院，免费为八路军演出三天。

各澡堂停止接客，专门优待部队洗澡。电灯公司、面粉公司和九十多家工厂先后开工，上万名失业工人重新就业。铁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纠察巡逻，维持社会秩序，保卫胜利果实。

这座千年古城开始了新生。

邢台解放后，我们面前只剩下一个最大的敌伪据点邯郸了。

邯郸是平汉线上的重镇，华北的南大门，是古代赵国的国都。当时赵国“东邻燕、齐，西边秦，南界韩、魏，北迫匈奴，数拒四方之敌”，被称为四战之国，古往今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且文化底蕴深厚，有颇多的历史典故，如“邯郸学步”、“黄粱美梦”等。

在邯郸北面有个“卢生庙”，这就是传说中“黄粱梦”的古迹。据唐代沈既济《沈中记》载：卢生在邯郸一家客店昼寝入梦，历尽荣华富贵，一觉醒来，店主炊小米（黄粱）尚未熟，由此得“黄粱美梦”一说。

历史似乎在捉弄蒋介石，他也在做黄粱美梦，想从这里打通平汉路，那当然免不了要受到一番嘲弄。

为了先敌控制要点，闭锁战场，保障平汉线战役的顺利实施，刘邓决心集中冀南三、四、五、六等分区的部队和太行一支队迅速夺取邯郸，作战统由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同志指挥。

邯郸守敌主要是在我大反攻中由大名、临清、鸡泽、曲周、武安等县落难来此的伪军和顽匪，共三千多人。这伙民族败类在原国民党中将师长、大汉奸郭采芹策动下，改换门庭，与国民党中央通电联络，得到了“冀晋豫边区挺进军第三纵队”的番号。伪军头子郭化民充当司令，伪冀南道尹王冠英充当副司令。他们突击整修城防工事，屯积作战物资，组织“督战队”、“敢死队”，分区防御，企图固守城池，策应蒋军北进，继续助纣为虐。

十月一日夜，天穹墨黑，伸手不见五指，王宏坤副司令员率冀南部队在夜幕掩护下，悄然而至。

黎明时分，秋雨浙沥，我军出其不意突然占领了车站和城廓西角的商业区。十月三日，我带太行一支队加入战斗。至此，冀南和太行部队近万人，将邯郸城包围了个水泄不通。

邯郸城区的面积不大，东西约一华里，南北约三华里。敌人的防御重点在南关、西关及东北角的丛台。

我军的攻城部署是：以素存“夜老虎”之称的冀南十九团主攻南关，以善于土工作业和爆破的太行十团主攻西关；冀南部队一部埋伏在北门外，同时向城东派出警戒，防敌向肥乡方向逃窜。

十月四日黄昏，三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枪声鼎沸，火光闪烁，我军发起总攻。

西门外，我十团集中了两个营的轻重机枪和三十多具掷弹筒，组成了强大的火力队。掷弹筒集中向城内打曲射，一次三十发，从敌人头顶飞过，在他们背后的支撑点上开花。

敌人本来就是惊弓之鸟，身后的爆破使他们产生错觉，以为被我军抄了

后路，乱糟糟地瞎喊一气：“不得了啦！八路军从背后杀上来了！”

有人这么一喊，阵脚就全乱了。爆破组的战士们把湿被子蒙在八仙桌上，两个人顶着朝城门处送炸药，登城组抬着几架云梯，迅速抵近城墙。

火光中，我亲眼看见一个挂了彩的大个子战士，裤脚都被烧着了，仍顽强地顶着被炸断一截的梯子，直到登城的战友们翻过城垛，他才倒在血泊之中。随着一声巨大的轰响，西城门被摧毁了。十团指战员一跃而起，裹挟着烟火，突入城内。

与此同时，冀南部队也顺利突破，两路大军并肩扩大战果，与敌展开激烈巷战，直逼市中心敌司令部，炸毁了敌人的核心工事。

退守丛台的敌人眼见即将陷入我军重围，纷纷用绳索从台上缒下，企图涉护城河逃命，刚好被我设伏部队堵截，全部当了俘虏。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我军胜利解放邯郸，除伪军司令郭化民等少数人漏网以外，其余敌人全部被歼。其中生俘王冠英以下伪官兵一千七百余，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三十一挺，粮食四十多万斤，食盐百万余斤，布一万余匹，以及装满三间房子的各种药品。

解放邯郸后，我军仍未停止战斗的步伐。经短暂休整，即回师临铭关将敌包围。临铭失守敌为土匪头子许仲琪（绰号许铁头，也叫铁磨头），所部残匪和伪军四大队石振江部约三千人左右。

十月十七日，由冀南胥光义和孔庆德同志的部队为主攻，激战一夜，敌拼死抗拒，未能攻下。十月十八日晚再次发起攻击，我分区十团由西门主攻，在火力掩护下架云梯登上城墙，终于将城攻下。

许铁头见势不妙，带伪军从北门沿铭河向永年城逃窜，我分区和冀南部队的战友协同作战，尾追歼敌一部。许铁头等五百余人漏网，逃进永年城。石振江率部投降。

至十九日天明，我军解放临铭关。共毙伤敌三万余人，俘敌二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缴弹药和军需品一部。

自从进入大反攻以来，从八月十七日李川沟阅兵到十月十九日，仅两个月时间，太行军区一分区（欠三十一团）先打赞皇，再战临城，轻取内邱，智收高邑；又在友邻的配合下，攻克邢台，参加解放邯郸和临铭关，一路上可谓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无论是对于我本人还是对一分区部队来说，这两个月都可以说是最为扬眉吐气的日子。从晋冀鲁豫全局来说，在这个时期里，太行一分区以及后来的太行一支队不过是一路偏师，但是我们却能动地贯彻了党中央和刘邓首长的战略意图，与友邻密切配合，打出了超越最初目的的水准，这次出击平汲线，可以说意义非同寻常。

首先，我们的作战行动为平汉战役的实施准备了战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利用平汉线上的伪军残余据点作为内应，以孙连仲和胡宗南的部队南北对进，尽快打通平汉路，开辟机动走廊，造成发动全面进攻的有利态势。但是，由于我们行动积极，攻势凌厉，连战连捷，北起高邑，南到磁县，三百里铁路，包括两侧要点全部为我控制，这就彻底切断了华北与中原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联系，关上了华北大门，使北犯蒋军视为畏途，为我军主力在漳河以北组织歼灭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次，出击平汉路作战还使我太行、冀南两片根据地连成一片，加强了晋冀鲁豫作战地区的整体性。

抗战期间，日军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实行“囚笼”政策。

太行和冀南经常被平汉路段分割。我们出击平汉线，使其终于铸成一体，晋冀鲁豫东可与山东、苏北部队协同，西可与陕甘部队呼应，南可支援中原部队拒敌，北可帮助晋察冀部队作战，更能发挥“四战之地”、“四战之军”的作用。这一点不仅当时对迟滞敌人的全面进攻有重要意义，而且影响到后来我军的大军出击，经略中原，以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再次，我们的部队在战斗中也逐步实现了由地方兵团向主力兵团、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换。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所以能够很快地适应了形势的需要，立于不败之地，与出击平汉线这一段作战中队伍的发展壮大，干部的培养锻炼，以及战争经验的逐步积累是分不开的。

胜利地完成出击平汉线的任务之后，我便到太行军区报到了。

斡旋在谈判席上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我党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达成停战协定。双方颁发了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生效的停战令。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还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为了执行停战令，由我党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和美方代表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我方委员是叶剑英同志。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是郑介民。居于中立地位、担负军调处角色的美方代表是罗伯森。

军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在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我们多是就地取材，委任当地军政负责人参加调处，一来了解情况，二则解决问题方便。

我当时是太行军区司令员。被委任为军调处第十二小组（即石家庄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少将军衔。我们军区副政治委员黄镇被委任为第十小组（即新乡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也是少将军衔。我们两人一人北上，一人南下，基本上轮廓了我太行军区管辖的区域。出发之前，邓小平政委还特意把我叫去，嘱咐我：军事斗争我们胜利了，政治斗争更为重要。同国民党打交道，要多几个心眼，凡事不要急，不要轻易表态，少说话，多调查，言多必失，要善于抓对手的把柄。邓政委还交代一条原则，叫内方外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己掌握原则，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但这并不等于就要拍桌子掷板凳地跟人家干，方式方法上要讲究，要不动声色地解决问题。邓政委的这番话，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一直都是军事干部，没搞过政治，谈判更没搞过。

我向邓政委表示：牢记首长要求，尽量控制自己，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邓政委又告诉我，薄一波副政委就在邯郸，要我多向薄副政委汇报、请教。

二月八日，我和本小组成员陶希晋、张蕴钰、马芳庭以及冀南、冀中、晋察冀等地的代表乘车前往石家庄。

说起此行，也是很有意思。

我们乘坐的那辆小汽车，是解放修武时缴获日军的。日军远离本土作战，能源供给严重不足，没有汽油。也亏得他们能想出办法，烧木炭。那个样子可真够狼狈的。我们不顾那么多，开着那辆破车，前面还插面八路军的小红旗，一路上喇叭呜呜叫，汽车摇摇晃晃但也照样精神抖擞，时不时地停下来加点木炭。

行至元氏南楼村，有数百名群众堵路拦车，看样子是请愿的。果然，车刚停稳，群众便蜂拥而上，有的手执小白旗，上面写着“要求惩办汉奸魏永和”，“要求执行小组为元氏人民复仇”。还有一些人往车里扔控诉书。

魏永和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汉奸，倚仗日本人，对群众敲骨吸髓，群众恨之入骨。惩办他是天经地义的。但因我们急于赶路，不便久停，只好由我出面向群众讲了话，保证一定将他们的要求和魏永和的罪状反映到执行部。

群众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又说了些祝福的话，互道珍重，然后我们继续赶路。

中午，我们风尘仆仆赶到了石家庄，好多人过来围观看稀奇。为什么呢，关键是挂了八路军的旗帜，还有我们臂上的“八路”臂章。那是有号召力的。八路军成立后一直都在华北跟鬼子打仗，很多城市老百姓还没真实地见过八路军是什么模样。我们住在石门旅馆，白天晚上都有人探头探脑，尤其对我们那个破车特别感兴趣。甚至有人说：“八路军就是神，国民党的汽

车没汽油一步也不能动，八路军的汽车烧木炭也照样跑得呜呜叫。”我们听了，心里觉得十分好笑，也不解释。

在旅馆里一住下，我的脑子就开始高速运转了。

参加革命十七年来，我这是第一次离开根据地，公开合法地、堂堂正正地来到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石家庄，作为我党的代表，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对我来说，这显然是新的考验。一方面，我感到很自豪，当初国民党那么大的力量，闹腾到现在，也不得不放下武器同我们谈判，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蒋某人是诚心诚意追求和平了，只能说明我们的力量壮大了，腰杆子硬朗了。组织上把谈判这样既要勇又要智，既要政策观念又要机动灵活的政治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极大信任。

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么多年除了打仗还是打仗，枪杆子发言我可以不打结巴，而谈判是一种需要高智商和高素质的艺术。我过去在交际方面没受过专门的训练，所谓内方外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理论上略知一二，实践起来能否得心应手八方玲珑，心中实在没底。所以压力也很大，生怕一时把握不准，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

石家庄执行小组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第三军的参谋长。美方代表是葛瑞波上校。执行小组的任务主要是监督停战、讨论受降。比较棘手的是讨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分界线。那可真是高桌子低板凳正经八百地谈判，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谁。

我们那时候很明确，和平也好，调处也好，但我们的根据地不能丢，丢了就是失职。

来石家庄之前，我专门做过调查，有些地方，似是而非，既不是国统区，也很难说是解放区，原先都在日本鬼子和汉奸手里。这些地方，将是斗争的焦点，究竟该划到哪边，很大程度上要靠谈判桌上由嘴皮子来决定。

国民党代表也有一个原则，那便是见地盘就争，见缝子就钻。因此，谈判从一开始气氛就显得很紧张。

我到石家庄，接的是前任代表徐德操同志的工作。下车刚进旅馆就通知开会，实际上国民党方面是想利用我们尚未进入情况搞突然袭击。当美方代表宣布“今天是昨天元氏会议的继续”后，我马上站起来提出：鉴于我们初来乍到，应首先全面介绍元氏情况。

国民党见我们没上当，又使出一招，说出席会议人员过多，并主动撤出三人，想以此迫使我方退出列席人员。同时还提出元氏城外部队应后退六十里。

我心里琢磨，你减人那是你的自由，我不减人自有我的道理。稍加思索，我便提出以下几条质问：一、关于参加执行小组的人数是否有明确规定？二、临时召集会议为什么不征得我们同意？三、如果认为中共今天出席会议的人数过多，那前两次会议中，中共代表仅徐德操一人，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五人，这又该作何解释？如不能解释，则此次会议应该停止讨论元氏问题，以首先解决执行小组内部组织及确定会议日程。

我这几个问题一提出来，会场气氛马上就紧张起来。国民党代表大吵大嚷，反而说我们无理取闹。我们当然是据理力争。最后，美方代表同意首先报告元氏情况，此时国民党那三位假意退出的代表已弄假成真，再反悔就是自打嘴巴了，我们遂在人数上以五比二的优势占了上风。

这次会议以及第二天的会议，在我们的坚决斗争下，终于作出了元氏城

内伪军部队受降的决议：一、关于元氏城内的部队受降问题电北平执行部请示；二、在北平指示未到期间，双方部队不得发枪。（实际上是我军保持了原状而限制了国民党军和伪军的活动）；三、双方部队管辖区的群众可以自由往来，其办法另行规定。总的看来，以上三条决议对我均有利而无害。

经过两天的嘴皮子战斗，我得出两条经验，一是抓住对方弱点和政治上不利之处，狠狠地进攻。譬如国民党想收编魏永和的部队，他的代表最忌讳提“伪军”和“汉奸”之类的称谓。而我们专揭他疮疤，我们有事实证明魏永和当汉奸卖国，并口口声声扬言要查他的靠山。

这样一来，国民党代表就很心虚，不敢跟我硬对硬，连美国代表也不一定帮他，所以促成了“关于元氏城内部队受降的协议”。第二条经验是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同作战一个道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第一手资料就是我们的弹药，逮住一个证据，瞄准对方的弱点，一炮放出去，打得他头昏眼花。

二月十一日的会议，在我方的坚持下主要是讨论冀晋区（即获鹿路北李村镇一带）的军事冲突问题。这个地区是国民党第三军驻地，与元氏情况不同，不能以“伪军”盘踞论处了。但它深入到我腹地，对解放军威胁极大，因此我们打算主动提出实行隔离，要求国民党军后退三十里。

会议开始后，我报告了自停战协议生效以前我军部队在获鹿路北的位置以及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违约进攻解放区的事实，并提出双方部队后退的建议。

经过一天的斗争，最后达成协议：国民党军队后退十二里约十三个村庄，我后退五里约八个村庄（实际上这些地区已经没有我们的部队了），并且确定了以四个村庄为非武装区，双方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往来。

显然，这个协议为我们争取开展石门工作又多了一块跳板，可以说是一个较大的胜利。

坦率他说，虽然我们没有经过交际方面的正规训练，但真的进入了谈判角色后，国民党代表的辩论能力还不如我们。一方面，我军干部的政治活动多，经常组织学习，讨论三大民主，还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问题能抓住要害。二则，从客观上讲，我们比他们有优势。比如争地盘，很多地方，我们的游击队和武工队都去活动过，而国民党第三军刚来不久，情况生疏。只要他没有军队在那里驻扎，他就说不清楚。

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第一次上谈判桌，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也可以说是绝不后退，对中央的精神和上级的指示，绝不会有半点马虎。你来软的我笑脸相迎，你来硬的我横眉冷对。反正我抱定一个原则，地盘不能丢，这东西多了可以，少了不行。那国民党的代表也是奉命行事呀，地盘丢多了他也不好交差，于是就争、就吵，有时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弄得美国人也没办法，和事佬当得很艰难。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还是我们提出来的，譬如为一个村庄争执不下，我说那好，你说是你的，请你拿出证据，该村庄有多少人，有多少地，驻扎的日军是谁的部队，村里开展过哪些抗日活动？一问这些，国民党代表就傻眼了。他也是带兵打仗的，玩政治搞外交比我们好不了多少，细节问题考虑不周。一进入争论，就摊开地图，那上面尽是标记符号。弄到最后，连美方代表都不耐烦了。这样一来，只好就把很多原来游击区或敌占区的地方，划到了抗日根据地。

我们带有电台，每次谈判情况，都要向中原局汇报，听取上级的指示。

当时中原局分管谈判工作的是中原局党委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同志。

谈判进行了一个时期，北平军调部召集各地小组负责人到北平开会，汇报情况。

从石家庄到北平并不远，中间只有几个稍大一点的车站。其中在两三个车站上，火车一停下，站台上便涌出来一大群人，有穿长袍的，有戴狗皮帽的，也有的像叫化子，有堵住车头的，有扒车厢的，乱哄哄地喊成一片。

喊什么呢？都是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这个说我手伤了，是八路军打的。那个说腿断了，是武工队的地雷炸的。说共产党破坏和平，停战了还不让他们回去，在八路军占领踞论处了。但它深入到我腹地，对解放军威胁极大，因此我们打算主动提出实行隔离，要求国民党军后退三十里。会议开始后，我报告了自停故协议生效以前我军部队在获鹿路北的位置以及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违约进攻解放区的事实，并提出双方部队后退的建议。

经过一天的斗争，最后达成协议：国民党军队后退十二里约十三个村庄，我后退五里约八个村庄（实际上这些地区已经没有我们的部队了），并且确定了以四个村庄为非武装区，双方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往来。

显然，这个协议为我们争取开展石门工作又多了一块跳板，可以说是一个较大的胜利。

坦率他说，虽然我们并没有经过交际方面的正规训练，但真的进入了谈判角色后，国民党代表的辩论能力还不如我们。一方面，我军干部的政治活动多，经常组织学习，讨论三大民主，还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问题能抓住要害。二则，从客观上讲，我们比他们有优势。比如争地盘，很多地方，我们的游击队和武工队都去活动过，而国民党第三军刚来不久，情况生疏。只要他没有军队在那里驻扎，他就说不清楚。

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第一次上谈判桌，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也可以说是绝不后退，对中央的精神和上级的指示，绝不会有半点马虎。你来软的我笑脸相迎，你来硬的我横眉冷对。反正我抱定一个原则，地盘不能丢，这东西多了可以，少了不行。那国民党的代表也是奉命行事呀，

到了北平，首先去协和医院向叶剑英汇报。在场的有

罗瑞卿，耿飏等人，还有全国各地执行小组的负责人。我

们军区的黄镇同志也来了。

老战友新同事欢聚一堂。工作谈得热闹，也玩得痛快。我们这些土八路，头一遭进了六朝皇城，不免新奇，也免

不了要闹出许多洋相来。

当时我们的住处安排有一个讲究，愿吃西餐的住北京

饭店，陈赓同志就在北京饭店住。愿吃中餐的住翠明庄，我和黄镇等人便住翠明庄。

在协和医院汇报时，也闹过一个笑话。

会议中间，我和马芳庭出去上厕所，我已经出来了，他顺手一带，“叭”地一下门关死了。这下可不得了，怎么弄也弄不开。急得他满头大汗，在里面大呼小叫，“老秦、老秦”地乱喊，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铜疙瘩。从没见过那

玩艺，左抠一下，右抠一下，东拧一下，西拧一下，哎，开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个暗锁。

马芳庭出来后我问他：“解手了吗？”

他回头望望，心有余悸，怕又被关在里面，连忙说：

“不用解了。都变成汗跑出来了。”

出了厕所，又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协和医院的门都是一个样，我们又在厕所里苦斗了半

天，早把方向弄糊涂了。没办法，到处乱撞。在里面转了

两圈，幸亏碰到一个扫地的老头，经他指路才回到会议室。

还有一次，我和黄镇一起逛街，也闹出个天大的笑话

来。

那时候我们都是三十岁出头，身强力壮，从翠明庄到前门，步行一会儿

就到了。

从石家庄出来时，我们穿的还是老八路的粗布军衣，一到北平就发了呢

军服，少将军衔。三十一、二岁的将军，神气得很啊！

到了前门，遇到一个烤红薯的。黄镇是安徽人，喜欢吃甜食，说：“老

秦，我们买两个烤红薯吧。”

我考虑我们两个八路军，穿着呢制军服，又佩着少将军衔，在街上吃那

玩艺儿有失身份，便说：“到前面找个馆子，再好好吃一顿。”

附近有家山东人开的饭馆，我和黄镇一前一后走了进去。

迎面出来个女招待，见到我们，笑容可掬，很热情，问：“二位长官吃

点什么？”

我说：“有没有红薯？”

她没听明白，问：“什么？”

我说：“红薯。”

她还是不明白，又问：“什么？”

这回麻烦了。我是湖北人，她是山东人，口音本来就不同，再加上红薯

这东西，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北平人叫“白薯”，山东人叫“地瓜”。

我横说竖说，她就是不明白，还问：“到底是什么？”

两个人对话，死活对不到一起，这不急死人吗？我看嘴说不行，就上手

比划，有多长，有多大，是个红皮皮。我自以为比划得满形象，这下她该知

道红薯是个什么东西了。

岂料，她愣了愣，竟然脸红了起来。

她这一红脸，我反而莫明其妙。直到转过脸，看见黄镇也在一旁笑得古

里古怪，这才恍然大悟。她误解了，把我的解释和手势同一个下流的思路联

系到一块了。

我想这下糟了，我这个八路军还是个将军，闹这个误会，她该怎么看呵？

可怎么能解释清楚呢？也算是急中生智，我拔腿就跑到街口，找了半天，一

直找到原先见到的那个烤红薯摊，买了几根红薯跑回饭馆里。

女招待看了，这才明白我不是存心调戏她，笑得直不起腰来，说：“这

不是白薯吗？俺们老家叫地瓜，你咋老说是烘须呢？”

记不得哪一年，部队普及普通话，我就给机关干部讲过这个故事。我们

国家幅员大、民族多，语言既丰富也繁杂，而作为军队，必须使用统一的语

言，否则就乱了套。闹笑话事小，要是打起仗来，都是南腔北调岂不要误大

事？

我们在北平没呆几天，汇报完毕，就纷纷返回了。没想到回去之后，家

里也闹了一些笑话。

我临走时，有过交代，在我离开期间，石家庄小组由陶希晋同志负责，代理我出席谈判。因为谈判是很讲究规格的，陶希晋也不知道军调部给他授的是什么衔，自己估摸是少将，便在谈判中介绍他是八路军少将。等我从北平回来宣布执行小组成员的衔阶时，他才知道自己是上校。

他说：“糟了，我已经对外号称少将了”。我也觉得有点麻烦，因为要考虑到本党谈判代表的威信，不能给人家留下一个共产党代表瞎吹牛的把柄。

我说：“既然已经说是少将了，就当是少将吧！”这倒不是自己封官，那时候谁也不在乎官不官的，主要是为了谈判方便，反正我们的衔是临时的。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

我的一身呢军服是发的，军衔领章也是发的。但陶希晋没有。怎么办呢？开始我们轮流穿，谁上台谁着制式军服。后来，小组成员张蕴钰（时任一分区参谋长）出主意说：“何必这样换来倒去，两人都上台怎么办？街上有卖的，买一副领章不就行了吗？”

张蕴钰自告奋勇去买了一副领章，这一买，又买个洋相出来。

张蕴钰曾在西北军当过排长，对军衔知识略知一、二，但并不精通。国民党军衔标志在领章上，将军领章的金板豆上没杠。校官的中间有两道杠，尉官的一道杠，区别很清楚，一般是不会认错的。但也有个别例外，比如骑兵校官的领章也没有杠，当然，跟将军领章是有区别的。将军的豆是梅花型，骑兵校官的则是一般的星豆。

张蕴钰也不是太明白，买了副骑兵少校的领章回来了。

陶希晋一直做地方党政工作，一天兵也没当过，当然更不懂啦。

第二天，陶希晋佩上领章昂首挺胸地走进会议室，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都愣住了，问：“陶代表，你这个少将怎么一夜之间变成骑兵少校啦？”弄得陶希晋十分狼狈，下来后冲着张蕴钰好发了一通脾气。

关于石家庄谈判，由于前后时间不长，没有太多的记忆。印象比较深的除了同国民党唇枪舌剑地争夺地盘，就是这些笑话了。

不久，由于国民党阳奉阴违，一边假意和谈，一边大量调兵遣将，内战阴谋已十分明显。中央遂决定将参加谈判的军事指挥员召回，留下一批军队政治干部或地方干部作为代表坚持谈判。

离开石家庄执行小组后，我首先取道邯郸，向中原局薄一波同志汇报。事实上，我们的电台天天汇报，中原局对我们谈判的每一步都了如指掌。薄一波同志送给我两句话：原则性很强，灵活性不够。

原则性很强，是指我的态度。

在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时，可以说寸土不让、寸土必争，本党本军的利益绝不能受到丝毫损害。

上级对我的这一点是给了充分肯定的。

灵活性不够，是指我的方法。

那时候遇到敏感问题，就不顾一切地争，一个劲地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时还得理不让人，甚至还发脾气，恨不得三分钟之内全部解决问题。薄一波同志说“灵活性不够”，实际上是对我的委婉的批评。也是对我爱护的一种方式。这两句话，对我是很有启发的。冷静下来想想，这次为时不长的谈判，使我很受教益，虽然闹了一些笑话，但开阔了眼界，见了世面，也

练了口才，特别是思辩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谈判中一些问题迫使自己的思路机敏起来。还破生平先例，第一次看了电影，苏联战争片，黑白的，好象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容。除了个人受到的这些教益，最值得欣慰的是，捍卫胜利果实，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我们这些军事指挥员离开军调小组之后不久，形势就紧张起来，谈判工作也日益波诡云谲，险象丛生了。解放后我曾看过一部电影，叫《停战以后》，印象很深。实际上就是以石家庄谈判作为背景的，敌人把一个共产党代表非法逮捕起来，秘密藏在地下室里。生活中的那位同志是晋察冀派到我们小组的工作人员，从解放区来到石家庄，还没同我们见面，就被国民党第三军秘密逮捕了。开始我们不知道，直到后来晋察冀方面查问这个同志的下落时，才知道他遭到了国民党的毒手。

风云突变战豫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一度扑朔迷离。中华民族经过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是天大的喜事。敌对了多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也结成了“统一战线”，如今胜利了，统一战线还能维持下去吗？对这个问题，中国人拭目以待，外国人拭目以待，就连我党不少同志也不知所以然。

其实，在毛主席脑子里，答案是明摆着的。

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即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第五天，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告投降的前两天，延安召集了一次干部会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后来定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毛泽东说：“最近几天就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高屋建瓴，极其科学地预见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将会遇到的现实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一点都有清醒的认识。

抗战胜利后，一方面我党和全国人民对和平有良好的愿望，一方面国民党假作姿态，而美国又积极撮合，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当时呼声很高的和平态势。

但实际上，国民党一边大叫“和平”，一边调兵遣将。对此，我党一边积极追求和平，同时也保持警惕。但是，也有少数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被“和平”麻痹了神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出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教训。

在对待“和平”的问题上，晋冀鲁豫军区把握得比较好。刘邓首长高瞻远瞩，始终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松迎击国民党军挑战的准备。

我从石家庄执行小组返回太行军区没几天，晋冀鲁豫军区就在邯郸召集高级干部练兵会议，更好地统一领导的思想，明确内战必打的观念和今后的作战问题。当时的纵队和各级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长都参加了。

邯郸会议实际上是一次集训。我印象很深的是，刘伯承同志首先趴在地上打了三枪。

打完之后司令员站起来对我们说：“我年岁大了，又是一只眼睛，打的成绩不算理想。但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

刘司令员又明确指出：“全国性的内战箭在弦上了。和平、松懈、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危险的，要死人的。”

刘伯承司令员这一打一说，把我们的心都扣紧了。司令员这么大年纪了，眼睛又不好，还如此身体力行，可谓用心良苦。他这是以自己的行动，警告我们不要松懈斗志，不要被“和平”的假象消蚀了警惕性。要强化战斗观念。

集训期间，刘伯承司令员还给我们作了一个战术报告，从作战准备、作战重点、寻找和创造对方弱点、战斗的突发性和主动权、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保存自己协同作战、游击作战等八个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

实践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预见是十分英明的。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签定的“双十协定”和停战令，集中二十五个旅的兵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国民党军队倚仗有美国的援助和兵力上的优势，扬言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消灭人民解放军。

六月二十七日，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命令和本区实际情况，确定了晋冀鲁豫军区的战略部署，集中野战纵队，机动歼灭敌人。由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率第三、第六、第七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共四万余人，执行豫东方向作战任务；由滕代远、王宏坤两位副司令员和薄一波副政委负责军区工作，主要任务是指挥冀南、太行军区主力，对付豫北平汉路及道清路之敌，保证野战军主力侧翼安全。同时组织地方兵团、游击队、人民武装，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作战和对付其他方面之敌。

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二月，根据自卫战争的需要，我们奉命组建两个独立旅。

以第一军分区之三十四团、第二军分区之三十八、三十九团组成太行军区独立第一旅，一月七日在林县大菜园成立，崔建功任旅长、王大任任政治委员，张锡珩、吴思行为副旅长、聂济峰为政治部主任。

以第四军分区之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和五分区的四十八团组成军区独立第二旅，二月四日在林县沙河村成立，向守志任旅长、余洪远任政治委员、张显扬任副旅长、陈皓任副旅长兼参谋长、窦力新任政治部主任。至此，我太行军区野战力量基本形成。

二月上旬，我们集中军区主力独一旅、独二旅，在五分区和其他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起了汤西反击战。

汤西反击战发起的时候，我刘邓主力正在陇海线上频频出击，冀南主力也尾追大名、内黄南窜之敌。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孙殿英部，在鹿楼和赵家厂两次战斗中，连续遭我痛打，丧失了两个营，内部士气大减，惶恐不安，其主力一部除守备汤阴至宜汤段铁路外，大部加强鹤壁及外围据点守备，共约七个营的兵力。

汤阴至鹤壁之间三十余里敌人基本上没有固定的据点。这一带，则是我们的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加上我军刚刚经历鹿楼、赵家厂两次战斗的胜利，士气正旺，兵力也相对集中。

这次作战，是我们太行军区在由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过渡过程中的一个比较大的战役，也是由游击、破击战向大兵团野战样式转换的一次尝试。因此，我们尤其注重战术运用，并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一些教训。

我们的基本战术是围点打援，最初的想法是以主力先夺鹤壁，创造打援条件，尔后收拢主力，在战斗中调整部署，以三分之一兵力（十七师及五分区主力）先剥掉外围据点，围困鹤壁。两个独立旅在汤阴、鹤壁之间打援。

战斗于七日中午打响。当时正下大雨，风大路滑，我军将士顶风冒雨作战，连续克敌，攻克姬家山、娄家沟、槐树岭、康家、中山、崔家沟等十余个据点、消灭敌人一部。

鹤壁外围剥皮战后，我主力迅速收拢待机。

九日上午，敌四十师、一六旅配合孙殿英部一个团，分别由室莲寺和汤阴出发，分三路进至二郎库、时半一带，被我独一旅一部阻截停滞，我独

二旅两个团从时半以东迂回到该敌侧后，歼其一部。敌人见势不妙，急忙退缩。于是一、二旅全部进入追击战斗。

在汤西反击战中，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比较深。一方面，可以说这件事反映了我军指挥员身先士卒不畏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各级指挥员尚缺乏大部队协同作战经验。

在九日的追击战中，逃敌一六旅旅部及三一六团逃到协庄集中，我先头部队四十三团原任务是占领袁庄以东高地，带头的副团长李钟玄和副政委石宇发觉袁庄有敌人，二话不说，带领部队就往里冲，冲进去了回头一看，只跟上来两个排，其余部队均在村外。

这时敌人也发现我追兵不多，回过神来，立即组织反扑。李钟玄和石宇率部退到一个院子里殊死抵抗，因有我大部队威胁，敌人不敢恋战，天黑后悄悄溜掉。四十三团围攻部队并不知道敌人已经不战自退，还以为李钟玄等人被敌人吃掉了。战士们磨拳擦掌，要为副团长、副政委和战友们报仇，迫击炮都调过来了。后来发出信号一联系，方知敌人已走，村庄里只剩下李钟玄和石宇等十几个人，这才悻悻收兵。

三月五日在三井召开汤西战役总结会，我把李钟玄和石宇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话说得很重，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啦，匹夫之勇啦，不懂战术不会控制部队啦。批完之后，又让他们检讨。而实际上，从内心讲，我是很器重这些干部的，首先他们有勇敢精神，仗打多了，经验丰富了，战术思想形成了，他们都会成为我军的栋梁之材。以后我们成立纵队，成立十五军，李钟玄一直都是主攻团的团长。

汤西反击战从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开始，至十三日止，经七昼夜激战，彻底摧垮了敌人的三十六处据点，歼敌二千五百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马匹。除部分敌人龟缩到鹤壁外，其余汤西广大地区全部收复，巩固了平汉路西解放区，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北战役，开始局部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

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旬，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应在晋南反攻的同时，向平汉线实施进攻，专打王仲廉集团，进行连续作战，以便和晋南作战一起，给陕北和山东我军以有力的配合。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结合豫北敌军的情况，刘邓首长决定于三月下旬举行豫北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破坏敌人企图用于联系东西两个战场的枢纽地带，错乱敌军部署，吸引敌人增援豫北，减轻陕北彭老总的压力，保证党中央的安全，策应山东粟裕大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

在豫北反击作战中，太行军区成立了由我、副政委黄镇、政治部主任袁子钦组成的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九纵指挥机构的前身。以太行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及第四、五分区部队和第十七师为第四集团，我奉命担任第四集团总指挥，任务是切断新乡之敌。另以有力一部和十万民兵分别向道清线和平汉线汤阴、汲县段展开辗转破击活动。

当时，汲县地区守敌是整编第三十二师，参谋长王启明是我们的地下党员，直接同我联系。还有一个团长也是地下党员。他们已经做好部分军官工作，准备发动起义。

战役打响前，我给王启明派了五个政工干部，均是经过考验，政治上坚定，又有带兵经验的连队指导员。跟他们约定，等我们四面将城围住，他们开一个城门，哪怕带不出多少人也不要紧。意义在于大兵压境，有人临阵倒

戈，对敌人震动大，影响他的士气。刘邓首长很重视我们的策反工作，接到王启明同志的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后，决心调整部署，将第一集团调到新乡西南方向的小冀地区，作为总预备队，集中第二、第三、第四集团主力围攻县城，并于四月二日攻占东关与外围据点多处，威逼城内守敌，为起义创造条件。

情况的发展出人预料，在进与退的严峻时候，王启明同志的主要助手和依靠力量，那个手握兵权的团长动摇了，形势顿时急转直下，起义行动遭到破坏。王启明同志急忙把我派去的五名指导员送出城外，他自己也跑回来了。这样一来，敌人反而有所察觉，主力退守城内。

在此期间，王仲廉将黄河南岸之整编第六十六师和整编第九师一部，焦作地区之整编第三师及淇县地区之整编四十一师一个旅调到新乡附近，共五个整编师另两个旅汇集于新乡地区，对我汲县攻坚构成极大威胁。

为了避开优势集中之敌，争取在野战中歼敌，刘邓首长决定结束汲县作战，挥师北上，进行第二步作战。计划首先扫清平汉路两侧据点，消灭分散之敌，彻底破坏平汉路安阳、汲县段，并相机夺取汤阴、淇县两城，控制卫河以北以西和平汉线以东广大地区，开辟战场，诱王仲廉部队北进，然后寻机在运动中歼灭之。

在整个计划中，我第四集团的任务是：以一部向汲县、新乡佯装侦察，另以有力一部配合第三集团围攻淇县、汤阴县城，其余部队挺进到安阳以西地区歼灭鹤壁、曲沟、水冶、观占等地之敌。此外，以大量民兵和参战群众破坏安阳、新乡段铁路。

四月三日夜，我们各集团分路急速北进，至十日，先后攻克淇县县城及回隆、楚旺、宜沟、鹤壁等据点数十处，歼灭了惯匪、河南第三专署自卫第一、第二、第三总队程道生、扈全禄、司华生等部共万余人，彻底破坏了安阳、汲县段铁路，解放了卫河以北、以西平汉路两侧广大地区，开辟了良好的战场。我主力逼近安阳、汤阴，吸引敌人向北增援。

果然不出刘邓预料，敌整编三十六军军长王仲廉率六十六师两个旅、四十一师一个旅、四十师一个团和第二快速纵队，沿平汉路东侧来援。三十二师随后跟进。刘邓判断：若继续围攻汤阴，威胁安阳，敌仍可能来援，乃以六纵队一个旅和冀南军区两个独立旅，加紧强攻汤阴和崔桥，主力集中准备打援。并将一、二集团主力合组为路东集团，三、四集团合组为路西集团，以便于打援时向心突击。

十三日，顾祝同严令王仲廉率四个半旅为第一梯队，分三路北援汤阴。另以三十二师为第二梯队，在卫河岸构工掩护。刘邓首长指挥我们以小部队作运动防御，诱敌前进。经十六、十七两昼夜激战，歼敌第二快速纵队全部，四十一、六十六师各一部，生俘快速纵队司令李守正以下九千余人，并缴获这几股敌人的全部坦克和汽车，收复淇县、滑县、浚县三城。

王仲廉遭此打击后退缩新乡，汤阴之敌更加孤立，也更加恐慌。刘邓首长决心以三集团攻汤阴、二集团攻崔桥，我集团一部在淇县地区侦察敌情，主力集结休整备战。

五月一日，我军对汤阴守敌发起总攻，经连夜激战，至二日上午，全歼敌暂编第三纵队，生俘纵队司令孙殿英以下七千余人。七日，二集团攻克崔桥，歼敌两千余人。至此，盘踞豫北十余年之久，为人民所极端痛恨的孙殿英、王自全等部被我全歼，汤阴人民重见天日。

刘邓对我的教诲

我在太行军区工作的时间不长，参加的战斗也不算多，但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戎马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由分区司令员到太行军区司令员，从此便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战斗，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战术思想，不管是做人还是作战，都得到了他们更多的教益和培养。二、由过去的地方游击战争为主逐步过渡到指挥大部队作战，为以后指挥野战军开展运动战、攻坚战、阵地战，提供了技术准备。

刘邓大军，如今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称谓了，也不仅是指一支特定的部队。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科学领域里，它还是一种现象。有人这样说过：刘邓刘邓，百战百胜。对此，我个人也有许多体会。刘伯承同志是驰名中外的军事家，他不仅指挥实战功勋卓著，有极高的军事理论造诣，同时他又是个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同志是著名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伟大的军事家。刘邓在一起工作，彼此自觉支持，配合得浑然一体。在他们的手下为将当兵，个人的智慧和才干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

我任太行军区司令，最初遇到的问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问题，困惑的不仅是我们，当时在相当高阶层的认识都不是很统一，有些部队甚至因此而吃了大亏。但是，刘邓高瞻远瞩，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毛泽东同志的“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领会得极为准确深刻。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还在延安参加整风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发来电报，命令我们加强战备，防止内战。刘邓首长一天也没放松对打内战的警惕。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刘邓首长全力以赴指挥了上党战役，为和谈撑腰。跟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可以说枪杆子里面出发言权。上党战役刚结束，刘邓首长就召集直属机关干部大会，揭露蒋介石假谈真打，玩弄反革命两手的阴谋，号召部队加紧训练，加强备战，以革命的两手准备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九四六年六月，刘邓组织的晋冀鲁豫军区练兵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反内战的预先号令。刘伯承同志的那三枪，充分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敌斗争的敏感性，对于我们这些生于战争长于战争的老兵来说，不啻是一堂触及灵魂的政治课。后来的实践证明，谁做好了打仗的思想准备，谁的仗就打得主动。由战争转入暂时的和平，再由暂时的和平转入大规模的战争，在至关重要转折关头，就看谁能认清形势，抓住契机，这一点，刘邓首长是英明的。

革命战争有其自身的特点，它要求军事指挥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因此，刘邓首长在给我们下达作战任务时，不仅教给我们巧妙的战术，同时非常强调各级指挥员必须熟知整个战场局势乃至全国形势，这样才能对自身的任务有一个完整的理解，战斗过程中不会

拘泥于一胜一负，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会机械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俯瞰整个战场，从而认清自己的作用和地位，以有利于全局发展为原则，决定自己的行动。

在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过渡中，我们先后出击平汉线，参加平汉战役、破袭正大线，转战汤西，反攻豫北，所有战役都是在刘邓首长全局一盘棋里运转。而刘邓首长指挥的这一片广阔的战场，则是全国一盘棋里举足轻重的一着。

在蒋介石公开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刘邓首

长反复强调晋冀鲁豫是东西南北都可以开辟战场的“四战之地”，号召部队不要辜负“四战之军”的光荣使命，为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尽自己最大努力。当时，蒋介石首要的战

略目标是抢占平津，夺取东北，这就需要打通平汉路，而处于战线中央的晋冀鲁豫部队恰好首当其冲。

刘邓首长指出，卡住津浦、平汉、同蒲三条铁路，就会使东北敌人陷于孤立。立即发起平汉战役，不但可以歼灭北进之敌，而且有利于粉碎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邓小平同志指示部队所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要集中意

志，大部分人还要亲临前线参战，务必保证关系全局的平汉战役的全胜。由于刘邓首长全神贯注的指挥，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全歼敌两个军，争取了敌一个军并一个纵队的战场起义，取得了解放战争初期第二个重大

战役的胜利。

在刘邓的指挥下战斗，就是站在全局中战斗。

同时，在刘邓的指挥下战斗，又是运用战术的战斗。刘邓的战术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刘伯承同志根据多年的战争经验，把对作战行动最有影响的五个要素——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之为“五行”，并常常告诫我们“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熟知“五行”是取胜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是否就必然胜利了呢？那还不一定，同一种战斗，有千种万种打法，也可能有千种万种结局，如何选择最佳方案，怎样打出最理想的效果，那就要看艺术了。

在刘邓手下为将，草莽英雄是不受欢迎的，要求我们必须讲究战术，以智慧弥补兵力和装备之劣势，以奇谋方略克敌制胜。同样是伏击战，但在不同情况下，有的伏其救者，有的伏其退者，有的是“引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口袋战术，有的是“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的是“围师不阙”，“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同样是围点打援，有的是虚张声势，攻城是假，打援是真。有的则真围真打，既夺城又打援。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击”，鄆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飞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凡此种种，例不胜举，说明刘邓对兵法谋略运用自如。

我们在刘邓的指挥下，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战中运用战术。出击平汉线我们大造声势，采用先声夺人的办法，使敌人产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恐慌心理，敲山震虎，打掉一个，吓跑一群。因此连战连捷，势如破竹。汤西战役我们先打一个剥皮战，围攻鹤壁，引诱汤阴之敌出援，“伏其救者”。而在豫北反击战中，刘邓则指挥我们围攻汤阴，吸引王仲廉主力北上，并以小部队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刘邓首长不仅教育我们以清醒的政治头脑把握战争的全局，不仅教我们运用战术，对于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其它各方面也都给予了许多关怀和爱护。

他们在战场上是威严的，在生活中却是慈祥的、温暖的。

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在太行山期间，曾经挨过刘司令员两次批评，批得我心服口服，甚至可以说批得痛快。

第一次是在豫北反击战期间。那时战争条件艰苦，我们太行军区一方面要参加作战，同时还要组织民兵民工参加支前。因为有好几个纵队参战，部队的供给保障也由太行军区负责。军区政委李雪峰同志是晋冀鲁豫地区党委书记，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军区的作战指挥和党政军后的主要领导工作都落在我的肩上，昼夜没法休息。起先想迷盹一会都没功夫，后来有空隙了能睡反倒睡不着了，高度紧张，严重失眠。记不清是在哪次战斗中缴获了一点白面（可洛因），一个参谋给我找了一点，纸烟往下嗑一嗑，上面灌点白面，点火一吸，还真管用，精神面貌马上就不一样。

就这么件事，不知怎么让刘司令员知道了。他把我叫去谈话，并没有单刀直入地批评我，而是旁敲侧击的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我原来有一个同事，方方面面都是不错的，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太劳累了，抽上了鸦片，开始还只是为了提提神。但后来上瘾了，不能自拔，抽到最后。身体垮了，意志也衰退了。”

刘司令员这几句话，和风细雨，不显山不露水，语调慈祥得像个老妈妈。却重锤敲在我的心上。我明白了司令员的良苦用心，当即表示：“请司令员放心，我再也不抽了。”我说话是算话的，自从刘司令员找我谈过话之后，我连可洛因的边也没再沾过。

还有一次，是在行军中过一座桥。我骑的那匹骡子，看起来雄壮伟岸，平时也是耀武扬威，但那天怪了，它就是不敢上桥。首长的战马都是经过挑选的，理应模范带头，但这匹骡子竟表现得如此怯懦，我实在生气。

我让马夫在前面硬牵，我在后面掏出了手枪。

“叭！”朝天放一枪，它吓了一跳，赶紧往前窜一步。

“叭！”我又放一枪，它又往前跳一跳。

那时候我才三十刚出头，年轻，虽然是领导了近万人的司令员，但有时候也难免闹点恶作剧，我就这么一枪枪地放，骡子就一步一步地往前跳，一直跳到河对岸。

没想到，这件事当天就传到了刘司令员的耳朵里，他又把我叫了去。这一次，批评相对要严肃些。

“你呀你秦基伟，你那个游击习气什么时候能改掉呵？这么大个司令员，怎么能跟牲口作对，开枪吓骡子，亏你想得出来，像小孩子似的，让战士们怎么看你这个司令员？”

我说当时只觉得挺好玩，没想那么多。现在我知道了这样做影响形象，以后一定注意。

刘伯承司令员这才宽厚地笑了。

第九章 挺进中原

渡河南征

一九四七年六月底，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部署，刘邓首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二、三、六等四个纵队一举突破了国民党自以为可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进入鲁西南地区。从七月二日至二十八日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连续不断地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收复了黄河两岸广大地区，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一着是很高明的。

当时，蒋介石进攻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山东。那时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根据地，背靠大海，敌人可以发挥陆、海、空立体作战优势；第二个重点是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那里只有彭老总的西北野战军，力量相对薄弱。我们晋冀鲁豫军区是“四战之军”，处在“四战之地”，怎样减轻彭老总和陈粟的压力呢？若派兵驰援，即使火速，也是远水不解近渴，且长途跋涉，沿途征战，赶到目的地也是疲惫不堪，反有可能被敌人“诱而歼之”。

刘邓首长清楚地看到，蒋介石的进攻重点虽是在山东和陕甘地区，但其联结两翼的中央战线兵力薄弱，那种态势，恰似摊开两臂袒露胸膛，出击中原，则犹如给敌人当胸一拳，正中要害，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完全打乱了敌人在陕甘和山东两翼重点进攻的布局，直接威胁南京和武汉两大重镇，为党中央“逐鹿中原”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基础，有力地扭转了整个战局。一改过去敌攻我防的局面，战争已经走向敌人心脏。形成犬牙交错局面。蒋介石不得不抽调重兵来对付刘邓这一砣，从而大大缓解了陕北和山东的紧张形势。

可以说，刘邓出太行，千里跃进大别山，缩短了解放战争的时间。

但是，这样一来，刘邓的压力就大了。

十几万大军，不要后方，长驱直插敌战略纵深，进行作战和建立根据地，艰难险阻是可想而知的。敌人前堵后追四面围击，后勤补给根本无法保障。有的部队十天见不到油盐。眼看冬天也快到了，十几万大军没有棉衣御寒。弹药和医药补充也十分困难，由于弹药跟不上，连许多重武器都埋掉了。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曾考虑要派部队给刘邓送弹药送粮食，但这个设想未能实现，再说远水也不解近渴。最后中央决定，以陈赓、谢富治的四纵队为骨干，组织陈谢集团，渡河南征，出师豫西。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自从大反攻开始后，晋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陆续升级为野战军，太行军区已先后抽调基干部队成立了三纵队和六纵队，所以说九纵是太行人民的第三个儿子。

一九四七年七月，太行军区接到晋冀鲁豫军区预先号令，要筹建野战纵队。当时，我们正在组织道清战役，一边作战一边筹建。除军区独立一、二旅依次编为第二十六、二十七旅外，又以一分区的三十六团，四分区的四十六团，四十七团，五分区的五十团、五十三团等五个乙种团和由第一、五军分区抽调机关干部和直属分队组成第二十五旅。根据上级命令，新建纵队首长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副参谋长李静宜。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九纵在河南省博爱县王卜昌正式宣布成立。或许是巧合，本来北方很少下雨，尤其是八月，更是水贵如油。但那天有意思，

二场大雨铺天盖地，下疯了，下狂了，下得浑浑沌沌、茫茫苍苍，面对面站着，都看不见对方的脸，雨打得睁不开眼。

干部战士风趣他说，今天我们九纵成立，老天爷也表态了，下场大雨给我们洗个澡，让我们干干净净地出发南征。

全纵队两万多人集结在王卜昌广场上，周围还有许多群众，全都伫立在水天相连的滂沱大雨中，没有一个人乱动，从战士到司令员政委，没有一个人打伞披蓑衣。会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

成立大会由纵队政治部主任谷景生同志主持，二十六旅旅长向守志担任阅兵总指挥，黄镇政委宣布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组建第九纵队和任命旅以上干部的命令：第二十五旅旅长蔡艾卿，政治委员冷裕光，副旅长张锡珩、刘自双，参谋长廖开芬，政治部主任聂济峰；第二十六旅旅长向守志，政治委员余洪远，副旅长张显扬、陈皓，陈皓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窦力新；第二十七旅旅长崔建功，副旅长黄以仁、唐万成，副政治委员李万明、王银山，参谋长张蕴钰，王银山兼政治部主任。

黄镇宣读完命令，太行第四专区公署专员杜毓云代表太行行署，向新成立的纵队献旗，旗上绣有“太行子弟结长纓，跨河南征缚苍龙”。

我代表全纵队指战员受旗，然后向部队讲话，号召大家“为巩固阵地，保卫太行解放区，保卫太行人民翻身的胜利果实，为解放中原及全国人民而继续战斗，我们要打出去（即打过黄河的意思），争取更大的胜利。”

为了使全体将士更加明确渡河南征的战略意义，我向部队做了比较直观的说明：“蒋介石想把战争放在解放区周围，达到消耗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打出去，才能减少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把战火烧到蒋介石身边去！”

建军之初，千头万绪，但此时我们纵队领导十分清醒，这支队伍是组织起来了，但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坚强壮大，能否在战斗中经受住考验，出色地完成任务，最初的一步怎么迈出去是非常关键的。

我代表纵队党委和首长，要求部队“虚心向老大哥——早于我们成立的三、六纵队学习，努力提高军事素质，提高政治觉悟，紧密团结，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军事民主，集中大家智慧，鼓励创新精神，培养战士诸葛亮，官兵一致，上下一致，把我们九纵建设成一支具有高度军政素质，能征善战的野战部队！”

我讲完话之后，太行参战民兵、民工代表，第四专区副专员刘梅也登台大声宣布：“部队打到哪里，参战民工就跟到哪里，太行人民要用全力来支援部队打出去。”与会军民士气高涨，气氛热烈到了顶点，经过几天酝酿，部队上下都清楚地意识到了，将面临一个全新的形势，再加上由地方部队升级为野战军，由小到大，指战员们的振奋之情是不可遏止的，会议中间喊起了口号：

“我们打出去——！”

“打——出——去！”

“打——出——去——！”

真是拳头如林，吼声震天，口号一浪高过一浪，透过雨空，在群山中久久回荡。当时的《新华日报》，还以《打出去》为题，发了报道。至今我回忆起九纵成立的那一幕，仍然激动不已。

成立后的九纵建制上隶属于晋冀鲁豫野战军，但根据当时战略态势的实际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由陈赓和谢富治

的四纵、我们九纵以及战场起义的原西北军三十八军共同组成一个作战集团，对外称“陈谢集团”，并成立了前敌委

员会，委员除陈质和谢富治以外，还有我、黄镇以及三十八军军长孔从洲和政委汪锋。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同志为前委书记，谢富治为副书记。没有专

门的指挥机构，陈赓和谢富治是以前委的名义，下达军政指令，指挥作战并开展各项工作的。

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我们是完全拥护的。首先，从原则上讲，共产党员不计较职务高低这一条我始终不含糊的。其次，我对陈赓和谢富治一直都很尊重，他们都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政治水平高，在作战指挥上很有一套。特别是陈赓同志，上过黄埔军校，是个知识分子，早年参加革命，有许多光荣而传奇的经历。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是三八六旅的旅长和太岳军区司令。我任太行军区司令后，两个军区互相配合打过几仗，我对他的学识、认识和把握问题的能力、作战指挥的精湛艺术，以及正直的人品和豪爽的性格，都是比较了解并且钦佩的。所以说，虽然同是纵队级首长，但接受陈谢的指挥，我没有任何别的想法。纵队其他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明确，我们是新纵队，小兄弟；四纵是三八六旅的老底子，红军部队多，战斗作风硬，是老大哥，我们要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虚心学习，提高自己。

我们纵队成立后，仅休整了几天，便于八月二十一日开始沿沁阳、济源、王屋、邵原一线向黄河北岸渡河点开进。除了纵队两万余人马，还有七千民工。

一向被视为北方旱季的八月天，在那段时间里一反常态，连日暴雨不停，还有敌机跟踪轰炸。部队顶风冒雨进行，随陈谢集团大部队抢渡黄河天险。

行军中，部队气氛十分活跃，各级政工干部边行军边鼓动，有些现编的鼓动词，既形象又生动，很能振奋人心。“风大雨急路滑，革命战士不怕，白天飞机当伞，夜里灯笼高挂（指敌人的照明弹）”。

还有一首打油诗道：“同志哥呀，迈大步呀，快快走呀，过黄河啦，过了黄河，打老蒋呵，动作慢了，老蒋跑了，跑了老蒋，怎么办啦？”

有的新战士说：“老战友解放了我们的家乡，使我们获得了新生；现在反攻了，我们要积极战斗，像老战友解放我们家乡那样为老战友解放家乡。”有些来自黄河以南的指挥员和老战士也希望早点打到他们的家乡，解救他们的亲人。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部队不畏艰难，顽强行军。

八月二十日晚，纵队机关抵达关阳渡口。这一段河面较窄，只有三百至五百米。有些头一次看见黄河的战士说，闹了半天，黄河就这个样子呵，没啥了不起的，表示很藐视。

当时只有十一只木船，一次可渡五百到七百人。坐在船上，一位老船工对我和黄镇说，往年，进入七月黄河水就涨。如今都是八月了，还老下暴雨，水不但不涨，还往下降，是你们八路有福！

我们也开玩笑说：老天爷也讨厌蒋介石，巴不得我们赶快过河收拾他，所以暗中相助我们。

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陈谢集团过黄河后，对蒋介石又是重重的一击。形象他说，如果把刘邓跃进大别山比喻成给蒋介石当胸一拳，那么陈谢集团突破黄河天险，师出豫西，就好比是朝蒋介石肋骨上又喘一脚。为了对付这一脚，他不得不侧过身

来抵挡，不得不忍痛剜肉补疮，从尾追刘邓的部队中抽调整三师、二十师、四十一师等共八个旅组成第五兵团，由李铁军统一指挥；又以分布在陕东和灵宝、陕县地区担任守备的整二十七旅、一三五旅、一六七旅以及一六五旅之四九四团共约四个半旅的兵力，组成陕东兵团，由谢甫三统一指挥。另以各县保安团队积极活动相配合，企图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打陇海路，阻止陈谢集团的发展。二十八日，我们到达新安县境内一个叫分山头的村子，在这里同陈赓、谢富治会合了，这才知道，四纵正在组织攻打横水镇。

就在此时，中央军委来了电报，指出：“西面空虚攻取较易，洛阳附近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要求陈谢集团“速以四纵全力，三十八军及二十二旅（太岳军区部队）抢占陕县、灵宝、阌乡、洛宁、卢氏，向右抢占雒南、商县、商南，秦纵位于新孟洛北区，牵制洛阳之敌，以一部攻占宜阳、嵩县……”

接到这份电报后，陈赓和谢富治于八月三十日召开会议，讨论当前的任务，决定横水这一仗是打还是不打。

会议最后形成的决议是放弃攻打横水，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四纵向西挺进，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九纵继续南征，横扫豫西土匪，牵制蒋军在豫西、豫南的部队，策应刘邓主力。

站在全局的角度，这个决议无疑是正确的。

会议之后，九月二日。陈谢就率四纵和三十八军挥师向西。九纵除留二十六旅监视洛阳北以及横水的敌人以外，纵队率二十五、二十七旅在洛阳以南分散活动，攻占城镇，歼灭敌地方部队，给敌以我主力仍在豫西的错觉，借以稳住李铁军兵团。

陈谢走后。我们的负担就重了。

这一带完全是新区，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后方支援，没有情报来源，到处都是敌人，走到哪里都有枪声。除了国民党军队，还有土匪和地方恶霸武装。在这块土地上作战，基本上是无后方作战，衣食住行粮弹兵员补充，一切都取决于前线而不是依靠后方。离开了根据地，我们就变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唯一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只有我们的兄弟姐妹——来自太行山的七千多名民工。

说到民工，我要多说几句。太行山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她用她虽然贫瘠然而又充满热情的胸膛造就并养育了一支又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又送他们远行，协助他们作战。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太行《新华日报》就九纵参战民兵民工，作过专题报道：秦基伟将军所部渡黄河南下时，太行万余翻身农民随军参战。

这些民工每人负重七、八十斤，在连绵的阴雨中长途行军，往前背弹药，往后送伤员，还不断受到土匪的骚扰和敌机的轰炸，是非常劳累的。

坦白地说，当时部队都有逃兵，但民工队伍中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形势那样紧张，那样混乱，但民工没丢一点弹药，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说怪话，那真是不穿军装的军队，甚至比军人还要过硬。毛主席写了一篇《愚公移山》，论起籍贯，愚公也是太行山人。较起真来，太行山人何止能够搬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在几十年风火血雨的革命斗争中，太行儿女同全国军民一道，搬掉的是整整一个黑暗的旧世界。

伊河脱险

四纵东进之后，我们独自活跃在豫西新区，由于方方面面的条件限制，连续几仗都打得比较被动，其中我印象较深的是伊河阻击战，如果不是我们反应快，动作神速，连纵队机关都差点被李铁军的整三师包了饺子。

八月中旬，我纵队前指率第二十五旅、第二十七旅冒雨南下，在延秋镇以西渡过洛河，攻克宜阳。当时，我纵队机关、首长、文工团以及几千民工，仍在伊河以北等待渡河。

头天晚上，我带人查看了河段，夜间看不见，没法过。再加上交通工具不行，只有两只小筏子，只好在河岸宿营。但是我很不放心，此地离洛阳不过三十里路，敌人整三师个把小时就能赶到，他们的飞机白天一直撵着我们轰炸，尽管他不一定知道是我九纵首脑，但我们的行踪是比较暴露的。还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前面过河的是二十七旅，他们过去之后把警戒收了。当时，我们身边的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营，我让警卫营长任登仕派了一个排往东前出到三里路以外的一个村子里，向洛阳方向警戒。

当晚，我们住在一座教堂里。因为身边部队少，再加上这里也没人给我们通报情况，所以心里总是不踏实。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床了，带着警卫员沿河边走去，发现有几架敌机在头上飞来飞去。我一琢磨，不对劲，根据以往的经验，敌机轰炸，是从东往西而来，可今天是南北横飞，这显然不是轰炸，而是侦察。我于是判断，地面有敌人的部队，但不会是大部队，也不会是有意识的进攻，而是试探性的寻找。

我正在琢磨，就听到远处传来枪声，噼哩啪啦，不太密集，重火器不强，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枪声表明，是我派出去的那个排同敌人接上火了。

我二话没说，带着警卫员一阵小跑，回到村庄教堂时，许多人还在睡觉。

我一声咋唬“有情况！”，睡觉的人全都从铺上蹦下来，穿衣服的穿衣报，摸枪的摸枪，作战处长崔星和温锡等人，连图钉都来不及取，一把一把地从墙上往下抓地图。

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想，简短分工后便各自行动。我和何正文同志组织警卫营抵抗掩护，黄镇同志组织后方人员和民工转移。

我们刚出门，就遇上前出警戒的那个排派回来一名班长报告情况，当面之敌是敌整编第三师一部。前锋一个营。

我判断，敌人兵力少，又以为我是“庞然大物”（其实大部分是民工），所以他不敢贸然快速进攻，但他们是快速部队，洛阳方向增援神速，一旦发现我们是纵队首脑，再识破我们的千军万马都是民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当即对警卫营长任登仕和教导员郝德章说：“警卫营就地抵抗，一步也不能退！”

何正文接着说：“至少要顶一个小时！”

布置完毕，警卫营派一个骑兵班护送黄政委和何参谋长渡河，其余部队由任登仕、郝德章和副营长王德远各带一个连。王德远带领的连队占领了北山制高点，其他两个连钻进青纱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同敌人捉迷藏。

我还有点不放心，直到勤杂人员及民工全部脱离村庄，又跟郝德章等人交代了交替掩护的办法，这才离开。

这一仗警卫营打得很顽强，从早晨一直顶到下午，敌人没能前进一公里，但我们伤亡也很大，还有九个烈士没能抢下来，正是由于他们英勇抵抗，才掩护纵直机关、首长和几千民工安全转移，从韩城渡口涉水渡河。渡河之后，

我派人赶到柳泉，寻找郝德章等人，告诉他们韩城水浅，可以徒涉。

当天夜里，住在韩城对岸的村子里，我一直没睡，惦着我们的警卫营，心里很难过。他们打了一天，洛阳敌军肯定蜂拥而至了，大兵压境，伤亡是少不了的。也不知突围了没有？

还有，我派去的人不知死活，就是活着，也不知能不能找到郝德章他们。如找不到他们，他们又怎么能知道韩城能徒涉过河呢？过不了河，天一亮敌人追过来，背水一战，岂不又要吃大亏？弄不好就被打完了。警卫营是我身边的部队，一张张亲切可爱的笑脸我都很熟悉，一想到他们正在浴血奋战正在牺牲，我的心情就越发沉重。

可喜的是，半夜里他们竟回来了，分别一天多再见面，真是又惊又喜，有几个战士见了我只喊了一声“司令员”，就说不出口了，只顾掉眼泪。伤亡一大堆，还有九个战友的尸体没有抢回来，大家心里都很难过。我也难过，但我不能掉泪，我说：“哭什么？任务完成得很好嘛！”

不久，郝德章也回来了，见了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伤亡大，有九个尸体没拉下来，这个仗打得窝囊、憋气！”

他这话说得我心里也是“咯噔”一声，但我不能流露，我说：“谁说窝囊？这是大胜仗，纵队首长和机关，还有这么多太行子弟安全过河。你们立了大功。回去告诉部队，我要为你们请功。”

天亮后，郝德章集合部队把我的话传达了一遍，部队的情绪一下子上来了，在往鸣皋去的路上，一路歌声。

除了纵队机关伊河遇险之外，部队也有几仗没打好。

九月上旬，二十七旅分东西两路合击嵩县。东路由副旅长唐万成带领，开始进展顺利，九月一日攻克白杨镇，歼敌两个中队，翌日又克鸣皋，九月三日进抵田湖。

田湖是伊川和嵩县之间的一个大寨子，守敌是蒋军退役师长宋天才纠集的一伙子土顽流氓和保安队，这些泼皮无赖打起仗来还真敢玩命，不少人都是用光膀子左右开火、双手持驳壳枪百步穿杨的角色，加上寨子筑有坚固工事，我军连攻三次均未奏效。

最后我以一个连钻山沟穿城墙潜入镇内，这才将寨攻破，但我军也付出了较大伤亡。

二十七旅西路一支在向嵩县进军途中，派一个营于九月一日攻打西赵堡，遭敌顽强阻击，伤亡较大，连攻三次均未奏效。

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声称：“日本人没打开西赵堡，皮定钧也没打开西赵堡，你们更不行。”我八十一团于夜间强攻，没有得手。第二天，八十一团重新部署，三面突击。三营营长刘占华率八连连续突击三次，终于在东南角登上寨墙，突进寨内。

九月五日，二十七旅合围嵩县，接受了打田湖和西赵堡的教训，经认真准备，采取多路突击。一小时激战后，解放嵩县城。该旅乘胜东进，十一日又歼敌三百余人，解放伊阳城。

打得比较顺利的是横水战斗。

九月上旬，敌十五师师长武庭麟指挥六十四旅等五个团由横水西犯，意在北占狂口，南取新安，遭我二十六旅引诱伏击。敌一九一团陷入重围，大部被歼灭，其中有两个连向我投降。救援之敌连夜窜回洛阳。二十六旅于十一日乘胜解放横水镇。

这次战斗，共歼敌一九一团大部，其它各团各一部，毙伤敌六百四十余人，俘敌一九一团副团长晃松义以下四百一十五人，粉碎了敌人封闭黄河渡口的企图，受到了纵队的通令嘉奖。

这一时期，陈赓同志的四纵及三十八军战况也佳。

九月十三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太行行署、太行军区给我们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电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陈赓、谢富治、韩钧、孔从洲、秦基伟诸将军及全体指战员：诸将军统帅之反攻大军，先后于六月、八月下旬，强渡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及豫西后，横扫蒋匪，连下二十七城。太行翻身农民闻讯，喜形于色，争相传告：封建老根快倒了！我们谨代表太行六百万人民向你们致敬，祝贺你们伟大的胜利，祝贺中原父老重获解放，并誓作你们的后盾。”

此后，我纵又经过了陆浑岭战斗、小店东战斗、汝河追击战、五龙山战斗等。多数战斗胜大于负，少数战斗得失相当。大获全胜的战斗只有一次“守株待兔”，干得比较漂亮。

九月二十五日，洛阳之敌以青年军第二六师一个团并结合第五三一团，由二六师第一旅旅长赵云飞率领，经龙门、彭波抵吕店，寻我作战。二十九日，敌进至小店及其以东地区。敌青年军一个侧卫连因天降大雨到连庄来避雨，恰好我们的七十八团三营也驻扎在这里，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当然我们不会白白放过。

营长教导员一合计，如此这般，兵分几路，向这群落水鸡发起突然袭击，一顿痛打之后，毙伤敌五十余人，俘敌四十八人。不可一世的青年军的这个连，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从豫西大地上永远地消失了。

陆浑岭战斗，由于敌情不明，误以为敌一个旅孤军深入，哪知越打越多，打到最后才知道，当面之敌是三个旅。我们当机立断，三十六计走为上，跳出去，把伤员留给李静宜送往嵩山，主力大踏步行动，一夜之间行军人十余公里，摆脱了敌人。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纵队在鸣皋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回顾成立纵队、渡河南征以来的作战和开辟根据地等方面的情况，总结经验教训。

这一阶段作战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客观上讲，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进入新区，无后方作战，情报失真，供给中断，使我们耳目闭塞，衣食无着，尤其是伤员的治疗和运输困难极大，很大程度地限制了作战行动。

二是纵队刚刚建立，就连原来的两个独立旅也是前不久才成立的。由十几个单位的游击队升格为正规军再升格为野战军，虽然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但大部队互相之间的配合、协调还较生疏，尤其是指挥上更不能得心应手。

三是通信条件落后，部队不断行动，无法架设电话线，靠无线电收发报，大大耽误了时间，导致指挥往往失灵，不是不到位就是慢半拍。兵贵神速，这是作战取胜的重要条件，在战场上，时间就是军队。能保证各部队依计而行，神速运转，才能稳操胜券。而通信保证不了，指挥员的决心就很难实现，行动慢了一分钟，往往就相当于少了一个师一个旅。

再有就是敌情、地形复杂，这一时期的天气也是阴阳怪气地难以捉摸。

以上困难，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在鸣皋会议上，我们没有把责任推给客观困难，而是发动大家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多从主观上找原因，多从指挥上找问题。

作为我个人，原来就是太行军区的司令员，九纵又是从太行军区抽调的

骨干力量。纵队虽然是新的，但我这个司令员不是新的，作为一号首长，作战的得与失，我都要负主要责任。

我们反复向各级指挥员强调，务必加强学习，迅速掌握新区作战特点；严格管理部队，各级指挥员要以身作则，在最残酷的战斗中要身先士卒，还要勇于在最严峻的战斗中摔打部队，尽快完成从地方军到野战军的转变。

同时大力提倡军事民主，集思广益，各级干部要及时总结经验吸收教训，热忱欢迎下级出主意提意见，取众之长，补己之短，从而减少指挥失误。要做到全军上下团结如一，把热情智慧和勇气都统一到同敌人作战上来。

在同有的军事干部谈话的时候，我还着重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工农干部怎样尊重使用知识分子的问题。早在太谷游击队时期，我就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十年来，我尊重知识分子，爱护文化人才，与知识分子干部一起工作，互相帮助，互相宽容，始终配合得十分默契。我个人在理论素养、思想水平和文化知识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教益。

我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要求大家，当一个尊重知识的有心人，当一个爱动脑筋肯钻研肯学习的明明白白的指挥员，我的部队不能有那种仅凭匹夫之勇，光会死打硬拼的二愣子干部。

开辟豫西根据地

鸣皋会议之后，我们九纵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配合东进归来的四纵队，集中主力指向陇海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广大地区，意在歼灭该地区反动地方武装，开辟根据地。

十一月一日至五日。我纵连克鲁山、宝丰、叶县，方城、南召五城，歼敌地方武装一千五百余人。与此同时，第四纵队也攻克了临汝、郊县、登封等城。至此，我军解放了伏牛山东麓的广大地区，打通了鲁山到来川间的交通，使我豫西第三、第五、第六军区分联成一片。

四、九纵队会师南下，连克数城的胜利，不但打开了豫西的局面，同时也破坏了洛阳敌人的西进计划。洛阳李铁军急忙以其主力整三师、二十师的五个旅赶到宝丰、郟县，以一二四旅指向临汝，以一二五旅赶往襄城，企图在临汝、鲁山、宝丰地区与我主力作战。

十一月八日，陈谢集团在南召应店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对策。

也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立即迎战逼近之敌，或者把部队拉向西面至伏牛山的牛背上去建立根据地。

陈赓同志则认为：双方兵力大致相等，装备上敌优我劣，又是在新区，就地消灭这股敌人的把握不大，贸然与之决战，势必陷自己于被动。至于钻进大山，骑上牛背，倒是相对安全，但实际上等于卸担子，达不到策应刘邓、配合陈粟的目的。比较好的选择是在伏牛山东麓展开，威胁敌人的动脉平汉线，调动敌人，达到策应刘邓、配合陈粟的战略目标。

会议最后决定，以一部兵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以“牵牛”战术，将敌主力西引，求得拖疲、拖瘦敌人。主力则以旅为单位隐蔽向北、向东，沿平汉线西侧展开，寻机歼敌。

具体部署是：黄镇政委和黄新友副司令员率领我纵二十五旅并统一指挥四纵十三旅，执行西进“牵牛”任务；我指挥第二十六旅、二十七旅插到临汝、鲁山、宝丰地区，横扫该地土顽、股匪，组建第五军分区。

黄镇、黄新友两同志率第十三、第二十五旅在沿南召城、刘村镇、大石桥向镇平前进途中，一面采取多路行进、沿途增灶等虚张声势手段，一面消灭沿途土顽，与敌人主力保持一定距离。

经过一个时期的清剿，临、鲁、宝地区势力较大的几股反动地方武装大部被歼，人心大快。为发动群众，巩固、建设根据地，我以小分队为单位，分散展开，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政府。由于群众觉悟提高，主动协助我军瓦解土匪，使散匪纷纷携械来降。

我纵于十一月下旬在宝丰马渡街正式成立第五军分区。

五分区初建，虽人数较少，也没有野战部队作为分区骨干武装，然由于我二十六旅、二十七旅大军压境，且先后消灭了平文正、袁金祥和黄万镒等匪首，逼走了敌一二四旅，迫使宝、郟间土匪武装纷纷向我分区要名义，愿接受收编，企图以合法身份保存实力，静观时局变化，另作它图。

在此之前，十月三日，纵队党委根据前委指示精神，决定以栾川、嵩县、伊阳、伊川等七县为辖境，建立了第三军分区。

为了便于机动作战和根据地建设同步进行，纵队根据前委决定，从一九四八年一月起，将二十五旅全部留置第三、第五两分区。该旅旅部任第五军分区领导机关，代理旅长张显扬兼任分区司令员，旅政治委员冷裕光兼任分区政治委员。

在我三、五分区境内，普遍建立了县政权，部分建立了区政权，两区群众已初步发动，少数解放较早的地区开始进行土改并组织了民兵武装。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下旬，正当我主力集中平汉线歼灭整三师之机，敌裴会昌兵团乘虚进入豫西地区，该兵团以第一、第三十、第三十六、第六十五师等部共六个旅的兵力沿西（峡口）荆（紫关）公路，荆、卢（氏）、栾（川）公路及洛河南岸分三路向东进犯，妄图摧毁我伏牛山根据地，恢复洛（阳）、潼（关）间交通。

在第五军分区境内，郑州的敌人慑于我重兵集结平汉线，未敢出动。派出特务、自称“五县总指挥”的王文成到郟县，结合当地潜伏隐藏的国民党军残部，乘隙于郟县、临汝间汝河两岸，策动红枪会等反动会道门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弱点，大肆欺骗宣传，造谣惑众。

一时间，宝丰的周营、韩庄、临汝、郟县间的纸坊、东西赵洛、山头赵、前后冢王、太朴寨、沙三店等二十余村镇会匪一哄而起，兴风作浪。并狂妄叫嚣，限期我军撤出宝丰县城。临汝、鲁山境内潜伏之匪则倾巢而出，袭击我区乡政府及我军后方医院，使我第三、第五军分区局面一时呈现紧张状态。

豫西的地方反动武装，名目繁多，数量庞大。除各县有保安团外，尚有乡、镇地方武装（即所谓中心寨），有军阀官僚看家、护院的卫队、会道门的武装以及历史较久的惯匪等。蒋介石对豫西土匪一贯采用“招安加封”政策，如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司令王凌云、军长武庭麟、师长宋天才以及伪顽孙殿英等都是由豫西土匪一跃而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这就更促使一些怀有野心而又为生活所迫、无法生存的人铤而走险。“要当官，先架竿”。当土匪，在河南成了一种当官发财的阶梯和途径。加之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汤恩伯一部溃散于此，使匪顽更加猖獗。形成了官匪一体，匪霸不分，会匪合一的混乱局面。我军进入豫西之后，这些匪徒一部被我歼灭，一部隐匿或分散流窜。此次，他们乘机而出全部暴露，正是我军将其剿灭的大好时机。这时的剿匪斗争实际上是开展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前提。

一九四八年元月下旬，第二十六旅由平汉线归建。

为了有力打击匪焰，稳定局面，纵队全力投入了剿匪斗争。一九四八年元月十九日，以二十五旅旅长张显扬率第七十四团由宝丰进入嵩县，二十五日又以二十七旅旅长崔建功率第八十团在护送民工返回黄河北之后也进入三分区清剿；四纵队第二十二旅的六十四团也在宜阳以南地区展开；我第七十五团第二营也进入伊阳、付店剿匪，以及原在该区的七十三团，进入三分区的部队已达四个团加一个营，统由李静宜、崔建功、张显扬指挥。历经宜阳、韩城、赵堡、德亭、马回营、杨山寨、九皋山等地辗转清剿。两个月的时间内共歼灭土匪三千余人，局面有所好转。

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多系山地，易于隐藏，当地土匪大部分是地头蛇，倚仗地形熟、耳目多，据险与我周旋，所以未能彻底剿灭。直至洛阳解放之后，股匪才感到坚持无望，遂插枪隐匿或缴械投诚。如伊阳惯匪陈旦，为匪多年，且拥有七路人马共千余人，在我攻克上店后，被国民党委为伊阳“剿匪”司令，横行一时，曾袭击我区、乡政府和后方医院。洛阳解放后，他看到大势已去，遂召集亲信骨干聚在一起，大哭一场，要大家各奔前程，然后只身逃往外地（后病死在滑县）。数十年的陈家匪穴，这才算土崩瓦解，局面日趋安定，伏牛山根据地建设从而得以顺利发展。

五月一日，前委决定成立豫陕鄂八分区（即以后的豫西四分区），由张

显扬任司令员，后委派李福祥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武承先任分区副司令员，廖开芬为参谋长，聂济峰为政治部主任。抽五分区三分之一干部组成分区领导机关，以宝丰团恢复七十四团番号为分区基干团，辖境包括登封、密县、汜县、荥阳等五县（以后又增加郑州、新郑、广武、成皋四县），并将鲁山团改为登密支队；另以皮定钧部队的干部孙永华为首加强部分连排骨干，就地组成颍河大队（约七百人），以后这个大队又组成登封独立团，均直属分区建制。

第二十五旅在参加开辟豫西第三、四、五军分区的一年斗争中，积极开展剿匪、建政、发展地方武装等艰苦工作，逐步将敌占区变成了我继续向南进军的供应补给基地，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当初，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时候，曾经给中央打过报告，分析了三种可能的前途，一是进去了，又被敌人赶出来；二是没有被赶出来，但被困住了，达不到战略上牵制国民党军队的目的；三是站稳了脚跟，开辟了工作，建立了根据地，达到了牵制敌主力的目的。

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奋斗，刘邓大军实现了当初估计的最为理想的一种可能，站稳了脚跟，建立了根据地，紧紧地牵住了蒋介石的视线，从根本上搅乱了蒋介石东西两个重点进攻的态势。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旬，蒋介石为了夺回大别山战略重地，集中十四个整编师共三十三个旅，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向我大别山根据地展开全面进攻。

为了配合刘邓部队，陈谢集团配合华东野战军发起了平汉、陇海破袭战。具体部署是：以第十三旅集结于招抚岗、刘林、石桥，监视南阳地区敌第五兵团；第二十五旅仍然留在宛西开辟根据地并起牵制作用；以第十旅、十一旅、二十六旅、二十七旅（欠八十一团）全力投入平汉破击战。

根据这一部署，我纵于十二月十一日由宝丰地区东进，沿途左右开弓，打下了襄城、繁城、临颖、大石桥车站等城镇和要点。

十四日到十六日，大雪纷飞，豫南原野皓茫一片，我纵队冒雪出动，将许昌至阳武庙段全长二十余公里铁路彻底破坏。与此同时，我华野陈（士渠）唐（亮）集团第八纵队解放许昌，并破坏了新郑至许昌段铁路；我第四纵队解放漯河，也破坏了漯河至阳武庙段铁路。这样一来，漯河以北就完全被我们占领了，并有一百多公里的铁路线陷于瘫痪。

十二月十七日，我纵奉命以第二十六旅并附第七十九团，调归陈谢直接指挥，继续向南破击，扩大胜利战果，我则带领二十七旅旅直及第八十团返回宝丰，清剿散匪。

二十六旅及七十九团在陈谢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围歼以祝王寨为中心的敌第五兵团部、第三师师部及第三旅的战斗，一举扫清了祝王寨以北的罗庄、余庄、外庄、枣茨牙等处敌人据点，其中七十七团歼灭敌整三师特工大队四百余人；枣茨牙敌第三旅第八团（欠一个营）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由团长陈德华带领，向我七十九团投降。

说起来像个笑话，敌人的这个整三师在一九四六年定陶战役中已经被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消灭了，中将师长赵锡田也被捉住了。蒋介石不信邪，还把整三师的番号当招魂幡，东拼西凑，拼了一些部队，让整三师又借尸还魂了。死了一次又上战场，但厄运又一次落到它的头上，这一次陈谢、陈唐两个集团配合作战，围而歼之，除李铁军和整三师师长李楚流率少数人员逃跑外，整三师再一次全军覆没。

二克洛阳

一九四八年初，由于我军外线作战频频告捷，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

自从我军大破平汉、陇海铁路，歼灭整三师以后，除潼关、洛阳、漯河、郑州、南联等重镇外，中原地区大片城乡都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我鄂豫皖、豫皖苏和豫陕鄂三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使我们有了强大的后方，并且可以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短期休整。

二月十六日，纵队党委在宝丰召开了扩大（团以上）会议，传达了陈谢集团委员会旧县会议精神。

我代表纵队党委在会上作总结发言，就我纵南渡黄河四个月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着重对纵队存在的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剖析。

豫北时代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对大兵团野战缺乏经验，协调不好。渡过黄河之后，先是轻敌，另外战术上也比较保守，未掌握大踏步进退的方针，不愿丢弃坛坛罐罐，结果包袱越背越大。鸣皋会议后，通过学习刘伯承合同战术理论，打歼灭战有了进步，但有的部队有时对鸣皋会议精神还执行得不够好。

针对这些情况，宝丰会议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肯定了成绩，找出了问题，总结了经验，增强了上下级之间的团结和了解。

宝丰会议是第九纵队建军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要在军队内进行整党、整军工作。鉴于华东野战军先行一步，我们派出大批干部前往华野陈（士渠）唐（亮）兵团学习取经。在宝丰会议之后，我们开展了以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

在新式整军的基础上，部队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各级指挥员重点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十大军事原则，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体会。结合陆浑岭等战斗不大理想的实例，我们抓紧点滴时机，向下级灌输刘伯承的战术思想，告诫大家，勇敢绝非莽撞，大胆也不是随心所欲地蛮干，打仗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既要胆大包天又要心细如发。也就是说，下决心要胆大，计划要心细。兵者，生死之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胆大要建立在心细的基础上。刘伯承司令员说过，我们的部队是极其勇敢的，“但要保持他们的信心，必须要上级指挥员有精密的战斗组织”。“千万不可因为指挥员的失误，而造成士兵的无谓牺牲。”“让战士去硬拼是犯罪行为。”这些警句，成为我们鞭策、督促干部自觉研究战术，提高指挥艺术的常备课程。

通过学习，各级指挥员的军事素质均有提高。

宝丰会议之后，我纵队副司令员黄新友同志因病回华北休养，政治委员黄镇同志也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纵队。纵队领导力量有所削弱。副政委袁子钦、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等同志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作战指挥和其它工作中分担了许多任务。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军委批准发起洛阳战役，以掩护刘邓主力转过大别山集结休整。

洛阳地扼陕、晋、豫三省要冲，是陇海路中段之重镇。占领洛阳，对我豫陕鄂根据地建设和西北、大别山我军行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洛阳战役于三月七日发起，华野三纵、陈谢四纵为主攻，我们九纵队准

备阻击可能由潼关来援之敌。

战斗发起后，敌三十八师、四十一师和十一师分别由巩县、禹县、登封等地逼近洛阳，我纵又受命东进阻击该敌。三月十四日洛阳解放，歼敌青年军二六师五个团及部分反动地方武装，共一万七千余人。

随后，我纵队受命于伊河两岸设防阻敌三天，掩护主力撤离战场。

十八日，主力转移完毕，我们便主动撤离阵地，放敌人进占洛阳空城。接着，我们又占领龙门及其以西山地，阻敌南犯，以掩护主力休整。以第七十七团、八十一团坚守龙门、辛庄、花砦和田庄、高家屯、马圪挡，组成第一线防御。

从十九日起，敌人每天轮流以两个营或一个团的兵力向我防御阵地发起攻击，甚至以旅为单位出动，都遭到我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残酷。

二十二日晨，敌三七团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我第八十一团九连阵地攻击。又以两个营的兵力绕过马圪挡攻击徐家寨我八连阵地。我八连打退敌四次冲击后，放弃徐家寨向纵深李家屯靠拢。十二时许，敌进占徐家寨后从马圪挡寨东门突入，我九连三面临敌。副营长杨更戌甩掉棉衣，一手持枪，一手拎手榴弹，独自一人守西门。九连连长王海龙赤膊上阵，带领战士们与敌进行白刃格斗。许多战士在手榴弹用完、步枪损坏的情况下，赤手抢夺敌人刀枪。王海龙左胳膊被敌戳破，仍奋勇搏斗，夺第四支枪时，手腕血管被割破，鲜血喷溅，敌人惊惧后退，卫生员这才乘机将王海龙拖了下去。

这场阻击战虽然规模不大，但我部官兵打得顽强壮烈，惊天地、泣鬼神，从早晨打到黄昏，给进攻之敌以惨重杀伤。此后，敌虽然以重兵再三进犯，但我防线始终未破，坚持了七个昼夜，完成了阻击任务，歼敌千余人。

为了加强郑州及平汉路的守备力量，进入洛阳之敌于三月下旬陆续东调，到四月上旬，守敌仅剩三七一团及洛阳、宜阳两个保安团守备。部队分散在铁路沿线，兵力薄弱，异常恐慌。

四月五日，陈谢主力突然回师洛阳，并决定在再克洛阳战役中以我纵担任主要突击任务。

纵队决定以第二十七旅（欠七十九团）占领洛阳西关，由西门突击；以第二十六旅并指挥第七十九团于洛阳以东攻击，并准备于张古洞、十里铺、田村地区截歼可能东逃之敌。

四月四日，二十六旅在洛阳东部地区展开。

敌发觉我部队行动后，第一二四旅进至偃师后即停止东进，并以三七团向西回援。

战斗打响后不久，洛阳守敌弃城向东北突围，遭我打击后，又折回去企图依城等援。但此时我二十七旅已占领洛阳并向东迫击，逃敌遭到东西两个方向夹击，顿时乱不成军。

我七十六、七十七团勇猛突击，将敌人分割打乱于张古洞、十里铺地区。敌三七团自身难保，再也顾不上洛阳，拼命向东逃窜。我第七十八团即掉头向西围歼敌三七一团。

战斗两小时，几乎全歼洛阳守敌。二次解放洛阳，我纵共歼敌两千五百余人，俘敌三七一团正副团长冉苍、张铁军，并于四月六日追击途中在偃师东南用轻武器击落敌P—51战斗机一架。

洛阳战役是我纵经过新式整军后的第一次作战行动，不仅从军事上给予

敌人以沉重打击，而且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切断了中原之敌与西北之敌的联系，打开了我中原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通路。从此，我军在豫西作战完全处于主动地位。

从战术上讲，二克洛阳也充分体现了刘邓的战术思想，即阵地既能打下来，也舍得丢掉。大踏步进退，充分机动，寻找敌人弱点，创造敌人弱点，抓住敌人弱点，准确出击。在战斗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各部队密切协同作战，大兵团运转比较自如，部队的机动能力、阵地防御作战能力和攻坚能力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它标志着我们九纵在正规化建设上实现了一次较大的飞跃。

四月八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对城市政策、城市管理、生产、供应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明确的、具体的指示。我纵奉命派出以谷景生同志为首的大批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参加了洛阳城市接管工作。并在以后的半年内，以第二十七旅各团轮流担负洛阳城市警备任务，二十七旅副政委王银山和七十九团团长任应先后担任城防司令，使洛阳逐步巩固，稳稳掌握在我军手中。

再克洛阳后，纵队率两个旅沿陇海路向东追击，直逼郑州城郊。此时，已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下旬，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我们九纵改属中原野战军首长直接指挥。

纵队率第二十七旅进驻巩县回廓镇、清易镇地区。第二十六旅进入登封、密县间的牛店地区，监视郑州方向，保障洛阳城市从事民主建设，并争取了两周时间的战隙整训，以团为单位进行了总结，补充了兵员、弹药、换了夏服，部队面貌为之一新。

五月初，中原野战军首长决定发起宛（南阳旧称）西战役。我纵受命并指挥豫陕鄂第八军分区基干团（即第七十四团）向郑州西南佯动，寻机捕歼弱敌，并严防郑州之敌西犯洛阳。

由于宛西战役的发起，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这样一个奇妙的格局，我陈谢主力攻打南阳，郑州之敌西犯我洛阳，我华野陈唐集团威逼郑州，我们九纵队则以神速的机动游弋其中主动争取战斗，另外开辟战场，逮住敌人就打。在敌人进至登封、密县时，我们机动地转入敌后，干脆利索地攻下荣阳，歼敌一个团部两个营，且在登封之敌撤退时，抓紧战机，看准火候，紧咬不松，将敌一二七旅大部歼灭，继而乘胜收复密县。这一期间的战斗，我们打得比较顺手，左右开弓，都没吃亏。中原野战军首长十分满意，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同志联名发了嘉奖电——

秦并转全体指战员同志：

九纵队在郑州外围牵制敌人，配合宛西战役中，十三日以奇兵出击荣阳，将守敌暂编第二十六旅新一团（缺一个营）歼灭。十六日，又协同地方武装予敌四十七军一二七旅大部以歼灭性打击，毙伤敌千余人，俘虏敌团长以下 2000 多人，收复登封。此种用歼灭手段达成完满的牵制任务，值得表扬，特电嘉勉！

此后，我纵队奉命在禹县地区集结待命。

第十章 解放郑州

豫西整军

一九四八年七月底至八月中旬，中原局、中原军区在豫西宝丰县召开了全区团以上干部会议（即“宝丰会议”）。会上听取了中原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传达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党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邓子恢同志关于党的新区政策和财经问题的报告；刘伯承同志关于整军的动员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陈毅同志。刘伯承、邓小平、邓子恢等人都是我的老首长，受他们的教育多，得他们的表扬多，挨他们的批评也不少，上下之间是很熟悉的。对于陈毅同志，过去只听过不少关于他的传闻，但从未见过他。这次在宝丰会议上一睹陈老总的丰采，感到果然气质不凡，他谈笑风生，诙谐自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从宝丰会议后，我和陈老总就熟悉了，不知他听谁说我会唱京戏，只要有空，他就喊：“秦基伟来一段。”我经常给他唱《借东风》。我唱，他打拍节，有时唱到高兴处，

他也哼两句。

为了进一步贯彻宝丰会议精神，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纵队在禹县召开了由排以上干部参加的第九纵队建纵南征周年纪念大会。

中原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陈谢集团陈赓司令员都为大会题词祝贺。

我在会上结合宝丰会议精神，作了《建军南征一年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分阶段回顾了建纵一年来的进步历程，总结了作战与建军的成绩与经验教训，号召全纵同志艰苦顽强、英勇奋斗、不骄不躁、再接再厉，为全部解放中原、把战争继续引向蒋管区而奋斗。

会议还表彰了英模，展览了战绩，并向全体指战员颁发了“建军南征一周年”纪念章。纪念章上镌刻着红色飞

马，骑士手持红旗，红旗上面的“艰苦顽强”四个字，象征着我们朝气蓬勃、飞跃驰骋的精神。

纵队政治部主任谷景生同志还就“艰苦顽强”四个字做了说明，要求指战员“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新任政治委员李成芳同志做了总结。

这次纪念活动，对部队士气鼓舞很大，对敌人的震动也很大。豫西一带土匪见识不大，把我们称作“飞马牌”部

队。在有些地方，部队下去筹粮，所到之处，大小股匪一见是穿黄军装佩“飞马牌”纪念章的，纷纷躲避，不战而退。

我们九纵队成立一年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根据作战与建军相结合的原则，我们从敌人手中夺来装备，先后建立起炮兵、工兵、侦察等特种兵分队。部队得到了发展壮大，人员由南渡黄河时的不足二万人，增加至二万六千余人。轻重机枪、各种迫击炮都有很大幅度的增加，战马由六百四十六匹增加为一千五百多匹。根据“不战即练，边打边学”的方针，抓紧战斗间隙，广泛开展了战术、技术训练，克服了游击习气，加强了正规化建设。干部的指挥能力，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协同动作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纵队有随营学校，各旅有轮训队，团有教导队，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后勤等方面的干部。

九纵成立仅仅一年，渡河南征，共参加大小战斗二百八十八次，攻克和

收复县城三十六座，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个整团、七个整营及十个整连，毙伤敌近八千人，俘敌六千余人。歼敌非正规部队近两万人。缴获各种火炮一百一十多门，各种机枪七百多挺，长短枪一万二千多支。这样的战绩，对于一支新建的部队，而且是在无后方或半后方地区作战，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九纵队之所以进步幅度这么快，我认为主要是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善于学习。

学习是我们建军治军的法宝。自纵队成立那天起，我们就向各级指挥员反复强调，首先要认真学习上级的指示。

对于上级指示和作战部署，我们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执行，而要在其中找出几个问题，分析出几个答案。这样，在作战上虽然兵处一地，但胸有全局，仗就打得主动灵活，调度自如。一场战斗打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同上了一堂形象、直观，而且令人难以忘怀的战术课。其次是向友邻老大哥学习。纵队成立之初，向陈谢的四纵队学习。大到大兵团的作战指挥艺术，小到野战班排的战术动作，凡有长处，均学为己用。同华野会合，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

去学习新式整军经验，交流战术体会，还有礼节礼貌、接人待物等方面，无不虚心取经。正是因为注重学习，使新成立的九纵队少走了许多弯路，大踏步地追上了老大哥部

队。到郑州战役时，不仅能跟其它纵队并肩作战，而且成了重要的方面军。

二是治军严。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干部身上，首先是以身作则。凡是要求下面做到的，纵队首长和各级指挥员必须首先做到。打仗作表率，纪律严要求，生活不特殊。干部做到了这几点，对部队再严，条件再艰苦，环境再恶劣，下面也没话说。中国有句名言：强将手下无弱兵。这话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兵随将转，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话有它的科学道理。再好的路线没有人执行就是空谈。赏罚分明，有功则奖，出问题责任到人，处理起来绝不心慈手软。这样一来，部队的风气就正，就能健康地进步。

三是民主作风好。

有意见就提，错了就改，没错也引以为戒。战争年代的九纵队，没有打击报复这一说。纵队的三个旅长，张显扬、向守志、崔建功都是强将；旅的政委冷裕光、余洪远都是久经战争考验的，政治工作都搞得很活跃。但遇到问题，我该批照批，他们对我有意见也照样提，吹胡子瞪眼也是有的，但大家从来不计较，该放到什么位置还放在什么位置。那时大家心里只有作战，只追求解放全中国。心底无私天地宽，意见怎么提都不伤和气。下面部队也是这样，集思广益，战斗前一般都要召开诸葛亮会，从战役方略到战术动作都广泛听取意见。事实证明，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智慧多，想得全面，想得周到，避免了许多失误。

四是团结互助。

有了自觉的学习意识，有了以身作则的行为楷模，有了严格治军的标准，有了良好的民主作风，也就有了团结的基础。团结这两个字，往往是在最艰苦的时刻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而在顺利的时候，在取得胜利之后，往往就不

那么容易保持了。我们在九纵强调一条，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大家都是同一种材料，听党的话，执行党的政策，在党的指挥下作战，个人的一切恩怨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党的战斗事业，全纵将士必须无条件地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形成铁拳，只能砸向敌人，绝不允许内耗。团结出智慧、出热情、出战斗力。像九纵队这样一支由地方武装刚刚升级起来的部队，深入蒋管区，无后方作战，无依托开辟新区，没有被敌人打垮，靠的是什么呢？靠虚心好学，靠从严治军，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郑北歼敌

一九四八年九月，党中央作出与蒋军实行战略决战，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策，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军委统一号令下发起了迅猛的攻势作战。

九月十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打响了辽沈战役。

九月十四日，华北军区在晋绥军区部队配合下包围了归绥。

九月二十四日，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一举歼敌十万。

在四面楚歌之中，蒋介石剜肉补疮，为了维持中原战局，急令孙元良部撤出郑州向徐州靠拢，遗防由实力派、驻安阳和新乡的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率部接替。临阵易将，而且显然不是加强，这无疑给本已军心浮动的郑州守敌又增添了几多惶恐。

郑州北据黄河，南控中原，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在这里交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向我华北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就是以郑州为基地，曾先后在这里设立过绥靖公署以及陆军总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等机构。但是内战爆发两年之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的节节破碎，郑州已成为一座孤城。

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华野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一场廓清中原并影响中国命运的南线决战即将展开。中野首长饬属全军加强西线行动，配合华野作战，全部解放中原。

十月九日，中野首长决心集中一、三、四、九纵队相机攻取南阳、郑州，或尾击东进之孙元良、黄维两敌，以策应徐州。中野首长的这个决心完全符合军委意图。两天后，军委电示淮海战役作战方针，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配合华野首歼黄百韬。十三日上午，纵队在禹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我和政委李成芳讲了话。我向大家预告了上级攻郑意图，并向大家介绍了全国形势，我军秋季攻势进展顺利，华野打下济南后，敌士气沮丧，失掉了防守中心城市的信心。目前我军在锦州、晋绥、西北、太原、徐州等地都有大的行动，蒋介石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的三角（指徐州、汉口、西安构成的大三角）、四边（指陇海路、兖州以南之津浦路、郑州以南之平汉路和宝成公路）、十三点（即开封、郑州、济南等十三个城市）战略已中途破产。对于豫北，敌已准备放弃，河南省政府已有向信阳转移的打算。这些都说明国民党反动统治气数将尽，彻底光复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

干部们喜形于色，跃跃欲试。

当天下午，陈锡联、杨勇两位司令员率本纵团以上干部和侦察部队到我纵驻地，我们三人共同研究攻打郑州部署，初步拟定了战役计划。

十四日上午，陈锡联司令员主持召开一、三、九纵团以上干部会议，我和陈、杨司令员分别介绍了郑州敌情及城防情况，阐明攻郑战术，强调执行城市政策和加强战斗团结。

同日，刘、陈、邓就攻郑州的时间及部署问题请示军委时，又进一步陈述了攻打郑州企图在于“吸引孙元良全部回援甚至可能更吸住邱（清泉）兵团一部向西，以达到协助华野作战的主要目的。并同时影响南线黄维、张淦两兵团之一部北调，更为我南线部队创造战机。”这说明，夺取郑州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战役行动，而是南线决战的有机组成，是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战略、战役协同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野首长着眼“箝制徐州各部援敌”并关照南线二、六纵队等部行动，于十月十八日定下攻郑作战决心，下达基本命令，并着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统一指挥郑州战役。

具体部署是：陈锡联指挥一、三纵为东南集团，由城南至东北方向实施攻击；陈赓、谢富治指挥四、九纵队为西北集团，由城西南至正北方向实施突击。在郑州至黄河铁桥间选择有利地形预设阵地，阻新乡之敌南援并防郑敌北逃。以豫皖苏军区一、五分区部队位于开封以西、以东地区，防止郑州的敌人东逃；南线二、六纵等部继续箝制张淦、黄维两兵团，防其抽身北顾。同时，华北野战军一部向新乡至黄河铁桥间发起攻击，协同作战。

解放郑州，是九纵指战员盼望已久的事情。

自一九四七年八月纵队在陈谢集团编成内渡河南征，开辟豫西以来，我们已在郑州周围辗转作战一年有余，先后建立了拥有五百万人口、十九个县、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豫西第三、四、五军分区，呈半月状瞰制郑州。可以说，河南省最肥沃、最富有的地盘都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南征期间，我们还在郑州以东参加了开封和睢杞战役。由于常有渗透敌人防区的行动，所以对郑州城内的情况颇为了解。国民党军队横征暴敛，就地出饷，民物憔悴，如洗如劫，小麦卖到两亿元一石，普通百姓不敢问津，连大商号的有钱人也只能日食两餐小米粥并野菜等果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军宪警特罗织罪名大肆捕人，二十余万居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广为流传一首民谣：盼八路，望八路，八路走了想八路；恨中央，骂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

郑州人民的苦难遭遇和渴盼解放望眼欲穿的心情极大地激发了指战员的使命感，上上下下都憋足了劲头，要在解放郑州的作战中建功立业。加之前不久我们刚刚在禹县举行建纵一周年紀念活动，对部队的士气鼓舞很大，指战员们盼望打大仗，要求扛大头，啃骨头，打攻坚战。

在进行思想动员的同时，我们大力进行了战备训练，以攻坚战术为主，着重解决登城突击与火力配合，小兵群攻击敌人地堡等战术动作问题。在此基础上，组织连、营两级攻坚战斗综合演习，领会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和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随着上级攻郑决心的日渐明确，我们及时部署了包括筹集登城用的云梯、跳板等战斗器材在内的大量具体的准备工作。

当时，虽说整个战争形势对我有利，又是打孤立之敌，但我们纵队的领导同志十分清醒：九纵毕竟是一支年轻部队，首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攻坚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为此，纵队党委提出，要“打响南征第二年的头一炮，为九纵的历史增光彩”，要求各级务必高度负责，兢兢业业，周密制定方案，充分进行战斗准备，保证层层落实。

为了贯彻中野首长关于“攻坚作战、执行政策和团结协作三个方面都要做好”的指示，争取军政双胜，我们除了政治上的发动鼓舞之外，还特别注意了城市政策和纪律教育。由纵队政治部负责，采取领导宣讲、营上大课、排以上干部专题学习的方法，组织部队普通学习了保护城市和工商业政策以及兄弟部队在襄樊战役中执行城市政策和纪律的经验，批判了“拿块肥皂、毛巾是小意思”、“点心糖果吃到肚里，谁也看不见”等违纪倾向。在普遍教育的基础上，各级制定措施和约法，建立健全纪律检查组织，作出了班（排、连）有一个违纪则全班（排、连）无功，班（排、连）长受批评，违纪人员受处分的严格规定。有些部队还结合临战训练，假设各种复杂的社会情况，

组织了城市政策演练。

通过实际、生动的教育，部队树立了严明之师所向无敌的观念，“打胜仗只占五十分，另五十分是执行好政策”成为大家自我约束、互勉互励的响亮口号。

本来，我们对于郑州附近的敌社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但为了确保先机制敌，我们把侦察判断敌情作为攻郑准备的关键步骤。从十月十日起，纵队相继指派二十六旅副旅长陈皓、二十七旅副旅长黄以仁率部分团干和精干部队、纵队侦察科长和四分区负责干部带侦察分队抵近郑州外围侦察。他们采取化装潜入、捕捉“舌头”、火力侦察等手段，在我地下人员配合下，获取了大量情报，甚至搞到了敌人的城防部署图，从而进一步查明了郑州守敌的兵力、番号、部署和行动企图。

依据敌情，我作出了三点判断：

第一，郑州之敌守备空虚，信心不足，弃城逃跑的可能性很大。万余守敌，虽统归第十二绥区司令部指挥，但建制杂乱，各有打算，且空诸依傍，难为持久之战。当年孙震谈称，要守郑州起码要有战斗部队二十个团，眼下的兵力显然不足敷用。九十九军二六八师成份新，战斗力较弱。四十军一六师虽有一定战斗力，但遭过我歼灭性打击，余悸犹存。李振清并非嫡系，不会为蒋拼死效命。相反，情况紧急时保存实力溜之大吉倒是合乎逻辑的。早在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在给中野首长的电报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刘、陈、邓攻击郑州时机应待邱、孙向北深入再行决定，不可过早。对郑攻击时，应以有力兵团绕至郑州、中牟之间，从东边向郑州攻击，因敌准备放弃郑州，苦无口实，你们一到，即可能逃跑。”毛主席的这一预见是十分英明的。

第二，若守敌果真逃跑，北逃新乡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豫西在我控制之中，西去无路；如东逃开封距离有一百四十里，其间只有中牟一个点，可以接应。但我豫皖苏军区的部队就在这一带活动，一、二纵队也随时可以压境而来，敌人东逃，无疑是自投罗网；如果向南，距张、黄两兵团太远，没有畅通的机动道路，中间又有我主力兵团阻隔，也不能不视为畏途，故而最大可能是往新乡跑。新乡是李振清经营多年的老窝，我军转入外线作战之后，李的实力又有相当发展。他们接防郑州后，其后方和军官眷属等都还留在新乡。从敌人的兵力部署看，二六八师和一六师师部带一个团担任城防，一六师一个团守古荣镇和南阳寨车站，三十九师一个团、四十军搜索营和两个炮兵连守黄河南岸邙山头及黄河铁桥，另四个保安团布防于郑州至黄河铁桥间。这种坚守要点、控制机动城廓的态势，也是狡兔三窟留足后路的部署。加之已有守敌向新乡转移物资的情报，可见郑敌已无固守之心，弃城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第三，粉碎敌人北逃企图，必须先敌控制黄河南岸至郑州之间的孔道和要点，并作阻逃打援的双重准备。这些情况，纵队都及时报告了陈谢和野司，为上级定下决心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的这三点判断与纵队其他首长和各旅旅长的判断是一致的。根据上级赋予我纵从城西北方向实施突击，并以有力部队位于郑州、黄河铁桥间阻敌北逃的总任务，结合我们对于敌情的分析判断，纵队确定了如下部署：

以二十六旅为攻城第一梯队，由郑州西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以二十七旅（欠七十九团）为攻城第二梯队，攻击前配合友邻完成对郑

州的包围，攻击开始后视情况加入战斗；

以豫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张显扬和二十七旅副旅长唐万成、副政委王银山统一指挥七十九团和四分区基干团，组成“北支队”，在薛岗、苏家屯、双桥、杜庄（郑州西北十二至十五公里处）地区构筑防御阵地，阻敌北逃南援。后来的战斗实际证明，这是郑州战役致胜的最为关键的一着。

鉴于我纵的攻击部署囊括了敌人北逃的机动走廊，打好了，可以吃一块肥肉；打不好，就会丧失全歼敌人的机会，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是显而易见的。为此，我们命令各级干部亲自掌握敌情，严格控制部队，加强统一指挥，确保通信联络畅通，搞好协同配合；在战术指导上要善于敌变我变，把握主动，随时准备把攻坚作战转换为野外歼灭战。同时，要求“北支队”加强领导指挥和教育鼓动，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闭锁战场，确保战役全胜。

按照战役计划，九纵于十月十九日晨离开禹县向郑州开进。“北支队”二十日进抵荥阳西北地区隐蔽集结，二十一日日终前到达预订作战地域，以七十九团部署于薛岗、苏家屯一线向南成对内正面阻逃；以四分区基干团位于双桥、杜庄一线向北成对外正面打援。

部队到达后即现地区分任务，连夜构筑工事，拆毁铁路，拂晓前完成了战斗准备。

二十二日二时，二十六旅进至郑州西北的兰寨、石佛、百炉屯等指定地域。七时，二十七旅到达大李寨、西南岗、常庄、君府庙地域。纵队也在六时前于须水镇开设了指挥所。至此，我纵从西北方向达成了既定部署，卡住了敌人北逃的主要通道。

此时，各友邻部队也相继进逼郑州，一纵夺取了城东北之祭伯城。豫皖苏军区部队占领了郑汴间的中牟县城。大军云涌，合围在即。

情况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郑州守敌见势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于二十二日六时弃城向黄河铁桥方向脱逃。由于我们要求部队到达指定地区后尽量派小部队前伸监视敌情，抢占外围要点；同时二十六旅在十二里屯铁路以西一个面粉公司的楼顶上设立了观察所，二十七旅七十九团又在薛岗监听到了敌人的电话，因此很快获取了敌人逃跑的情报。

敌变我变，纵队因势利导，果断定下决心，将预定的城市攻坚战转变为野外歼灭战。

当时，邓、陈首长在四纵指挥所，我向他们报告了纵队决心。邓小平政委当即指示我们：一定要歼敌于运动之中，不能让它跑掉！

郑北歼敌大致可划分为薛岗、苏家屯阻击，老鸦陈围歼和夺取邙山头、控制黄河铁桥三个作战阶段。

首先是薛岗、苏家屯阻击，这是闭锁战场、保障全歼郑州守敌的关键一着。薛岗位于郑州西北十二公里处，有八、九十户人家，紧靠平汉铁路，公路贯穿其间，是通往黄河铁桥的必经之路。七十九团到位后，以二营坚守薛岗，团主力部署于薛岗东北下坡杨和苏家屯。指战员们不顾行军疲劳，仅用八个小时，构筑了二里多长的阵地，每种重火器都有两三个比较坚固的工事。

拂晓，敌先头部队两个营首先与我接火，守候已久的二营依托既设阵地，激战一小时，顿挫其锋；九时三十分，敌九十九军二六八师主力向我薛岗、苏家屯阵地发起轮番攻击，七十九团沉着应战，适时组织大胆反击，并与突入村寨内的敌人开展巷战，艰苦厮斗，打退敌数次冲锋，牢牢守住了阵地；十时许，驻古荣镇之敌一六师三一八团南向接应，遭我四分区基干团顽强

阻击，不得前进。

为便于前敌观察和机断处置情况，我带领一名作战参谋，于上午十一时赶到二十六旅指挥所。向守志旅长报告了当时的情况：敌已全部离开郑州，其先头被我阻滞于薛岗、苏家屯一线，本队狼集于老鸦陈、固城及周围的村落旷野之间，后尾已通过十二里屯。

另据“北支队”报告。老鸦陈已聚敌数千，敌正多路攻击苏家屯，薛岗侧后受到威胁。若敌压力过大，我阻击阵地很难保全。

我对在场的同志们说，突围逃跑的敌人一般是两头强中间弱，且军心慌乱，疲于奔命。因此，只要能顶过眼前的困难，后面的仗就好打。

我们当即在该旅指挥所重新组织战斗，命令“北支队”不惜一切代价，以顽强的阻击和反冲击，坚决堵住敌人，保证人在阵地在。以纵队主力拦腰突击，打乱敌人部署。二十六旅沿布袋庄、石佛，王龙口、兴隆铺、王庄，冉庄、十二里屯、二十里铺三个方向向老鸦陈和固城突击；二十七旅经孟寨以南、小杜庄、大小铺向陈寨方向兜击，并以一部兵力向花园口方向追歼逃敌，以造成分割围歼敌人的有利态势。最后规定，十五时向被围的敌人发动总攻。

十二时许，北逃的敌人又向我薛岗、苏家屯、固城阵地猛扑过来，企图夺路逃生。坚守薛岗的七十九团指战员奋力拼杀，连续挫败敌三次冲击，敌弃尸盈野，十四时许，该团实施反冲击，将进攻的敌人击溃，并乘胜追至老鸦陈村北。在固城担负机动防御的分队，节节抗击予敌杀伤后，撤回苏家屯阵地，敌人占领固城。十五时，敌又以三个团的兵力，由九十九军参谋长余辉庭亲自督战，沿铁路、公路两侧向我薛岗阵地发起疯狂进攻。此时，进占固城之敌已攻到我薛岗阵地东北角，南援的敌三一八团和一一五团各一部占领村庄。南北两敌对薛岗成夹击之势；相距仅一千五百多米，形势十分危急。

我七十九团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敢打硬仗恶仗。团长任应、政委田耕沉着指挥，全体指战员视死如归，打得英勇顽强，积极主动，死死关住了敌人北逃的大门，阵地岿然不动，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战役的全胜。

薛岗、苏家屯阻击战后，达到了闭锁战场的目的。接着就是聚歼老鸦陈之敌。

老鸦陈是个五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庄，分南北两寨，每寨方圆半里，寨墙高一丈五，上宽三尺，并有护寨沟。寨内瓦舍栉比，俨然一座小城。此时，逃敌大部、指挥机关并车辆、辎重等，均被我压缩于此，人马嘈杂，一片混乱。

十五时许，纵队主力向敌发起全面突击。一阵炮火之后，七十八团一营和七十七团二营相继攻入南北两寨，顿时杀声四起，火光硝烟笼罩了老鸦陈。敌辎重塞道，人马失措，不成建制地狼奔豕突，起初乱糟糟地拥到村东北角，见势不妙又向二十里铺和固城方向逃窜。此时，我七十六团和七十八团主力已进至二十里铺一线。除七十六团一营出固城配合七十九团截击敌人外，其余迅速展开，由东向西兜击。坚守薛岗的七十九团二营也向敌实施反冲击，由北向南击敌侧翼。二十七旅八十团主力则由二十里铺向固城以北追歼逃敌。八十一团主力直插花园口，防溃散之敌由此抢夺渡口出逃。

这是一场浩大的野外追歼战。各出击部队行动迅速，攻击猛烈，并加强了友邻和步炮间的协同，打得敌人没有喘息之机。失去指挥的溃散之敌，被我四面压缩于老鸦陈、二十里铺之间长宽不足五里的狭小地域，如同无头的

苍蝇，满地乱窜。一排手榴弹投过去，即炸死一大片；一梭子机枪扫过去，就撂倒一大堆。

屡经打击的敌人精神已经彻底崩溃，我军“缴枪不杀”的喊声此起彼伏，折磨着残敌可怜的神经，军心一乱，不战自溃。当时喊话特别灵验，可以说一呼百应。投降者遍地皆是。

有个战士站起来喊道：“蒋军兄弟们，我原是整三师三七一团的，到这边来不仅不杀不打，还优待！”于是便有一帮蒋军士兵调转帽沿，把枪倒插在地里，过来投诚了。有的喊：“咱们都是爹娘养的，哪个没良心？有良心的过来！”前面的敌人就停止抵抗，集体缴械。事后不少战士说：“这一仗打得比演习还痛快！从前听说济南战役一下子消灭敌人十万还不敢相信，这回可算服了。”

在追歼敌人的过程中，整个战场到处都有敌人丢下的皮鞋、手表、被装和其它军用物品，指战员表现了高度的纪律观念，没有停下来捡东西的。

有个连队卫生员给六个俘虏包扎伤口，俘虏兵感动得送金戒指。

卫生员说：“只缴你的枪，不要你的东西。”我们的战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了“打好仗，执行好政策，争取双立功”的决心和誓言。到下午五点左右，猬集于老鸦陈和固城地区的敌人除少量沿黄河大堤逃往开封以外，其余全部就歼。

南援之敌三一八团、一一五团见主力被歼，知大势已去，连忙撤回邙山头要塞，企图凭险待援。

邙山头海拔二百多米，沿黄河南岸蜿蜒西去。这里沟壑叠错，道路崎岖，堪称险要，是控扼黄河铁桥及南岸车站的要塞。抗战时期被日寇占领时，就筑有坚固堡垒。蒋军盘踞后，又加修了许多工事。纵队主力聚歼老鸦陈之敌后，张显扬率部于二十二日十九时攻占了邙山头以南的广武车站。

二十三日九时，纵队命令崔建功和张显扬指挥二十七旅、四分区基干团（七十四团）、临汝团（七十五团）攻占邙山头和黄河铁桥，要求他们尽快搞清敌情，随后发起攻击。

崔、张决心以八十、八十一团从两个方向钳击邙山头，夺取制高点，抢占黄河铁桥。七十七团为二梯队，四分区基干团在二十七旅两侧并肩攻击。

二十四日拂晓，二十七旅突破敌前沿阵地，并控制了主峰南坡。但由于敌工事坚固，居高临下，我向纵深的突破未能奏效，部队伤亡较大。该旅及时变换战法，以一部兵力继续攻击主峰，吸引敌人火力，而将主力指向黄河铁桥，首先断敌后路，得手后再回顾邙山头。

十五时，我二十七旅、四分区基干团与华野十四纵一部同时向黄河铁桥两端桥头堡发起进攻。八十团一营英勇顽强，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越了两米多高的铁丝网，搭人梯越过六米多深的外壕，攻占黄河南岸火车站及桥头堡，切断了敌准备炸桥的引爆电线，扼死了敌人的退路。同时，该团三营奋勇向主峰发起攻击，连下敌五个地堡。八十一团三营利用沟壑楔入敌纵深，夺取了五座弹药库。四分区基干团一个营也突破敌阵地，攻了上来。至十九时，邙山头守敌除一个连漏网外悉数被歼，我纵与华野十四纵在黄河铁桥上胜利会师，郑北歼敌之战落下帷幕。

陈老总说：九纵成熟了

郑北歼击战，不仅把敌人打垮了，也把敌人打服了。他们对我军的协同动作和班排战术的默契熟练程度感到不可思议，没想到前不久在他们心目中还是“土八路”的队伍，居然一夜之间迈向正规化，大兵团作战调度自如，小部队奔袭围歼战术也运用得精湛老练。

我们则明确告诉那些成为阶下囚的蒋军将领，别看你们上过这个学校那个学堂，别以为只有你们那几支美国造才是正牌的军队，我们什么学也没上过，但我们什么仗都打过。你可以把古今中外军事经典著名战例倒背如流，但真刀实枪，面对这一座具体的城池，一座现实的山头，一座横贯眼前的铁桥，在这里摆兵布阵，你未必如我们。更何况国民党腐败至极，蒋介石不得人心，天下趋势，有目共睹，国民党军士气一落千丈，而我军军威则如初升太阳。如此鲜明反差，谁胜谁负，尽在不言之中。被我们俘虏的九十九军参谋长余辉庭感慨地说：“贵军以精锐而驱乌合，摧枯折腐，理所当然。”

郑州战役是我纵跨河南征之后参加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我们仅以微小的伤亡代价（与敌伤亡之比为一比三十二）取得了全歼郑州守敌的重大胜利。敌第十二绥区司令部，四十军军部一部及一六师两个团，九十九军留守处及二六八师、三十九师各一个团，四十军一个搜索营，炮九团、重炮十四团各一个连，工兵第九团一个营，通信兵第四团一个连，团管区司令部，郑州警备司令部以及四个保安团的建制被消灭。共歼敌一万一千余人，其中毙伤敌四十军少将参谋长尹继英、一六师少将师长赵天兴以下一千六百余人；俘敌九十九军少将参谋长余辉庭、十二绥区少将政工室主任王德林、少将经济处长夏子英、兵站分监少将参谋长陈守遵、九十九军二六八师少将高参李福五以下九千五百余人。敌四十军军长李振清被我击伤后逃往新乡。缴获汽车三十余辆、各型火炮八十二门、轻重机枪三百余挺、其它枪支三千八百件以及大量军用物资。

此次追歼作战的胜利，有很多因素。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陈首长的英明指挥。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自始至终给予很大的关注，数次致电中原野战军首长，分析敌情，指示行动方略。直至郑州解放毛主席还亲自为新华社写了《我军解放郑州》的消息。其次，郑北歼敌之所以水到渠成，是因为整个战争形势对我有利、中原蒋军顾此失彼，造成我乘敌之隙的可能。而中野首长审时度势，决心攻郑，又不失时机地把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其三是友邻纵队兵临城下，四面包围，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致使郑州守敌惧歼而仓皇出逃，有依托之敌变成了野战运动之敌，更利于我分割聚歼。主要战斗虽然都是九纵打的，但如果没有一、三、四纵兄弟部队大兵压境，没有豫皖苏军区、二、六纵队和河北野战军协同作战的威慑，敌人也不至于弃城出逃。若其据城死守，单凭九纵力量攻城，可以说绝无胜利的把握。所以说，郑州战役的胜利，是一、三、四、九纵队并肩战斗取得的。其四是纵队首长在指挥中灵活机动，变更部署快，组织突击快，积极把握了战场主动权。其五是我们九纵禹县整训的成果转化成了物质力量，部队上下团结一致，互相支援，发扬了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加之战前我们对敌情判断正确，部署周密，所以北逃敌人无路可走，悉数被歼。

郑州的解放，促进了中原战局的胜利发展，直接配合了淮海战役的发起和进行。攻克郑州后，开封守敌慑于我军声威弃城离去。郑、汴两城的光复，不仅使豫西和豫皖苏解放区连成一片，而且除了豫北新乡、安阳等少数残敌

据点外，中原和华北两大解放区也联成了一片，其军事、政治、经济上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的。从军事上讲，我军开辟了广阔的战场，有了更大范围的机动自由。敌中原防御体系进一步瓦解，信阳、武汉、徐州之敌失去了战略上的屏障，暴露于我锋芒之下，态势愈发被动。而我在两线釜底抽薪的动作，又有力地牵制了徐州以西敌人不使东调，从而为华野隔断徐州和全歼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郑州战役之后，中野主力腾出手来，只作短暂休整即开赴徐蚌线，为淮海大战增添了一支锐军，这更是加快整个战争进程的一种战略上的主动。

经过郑州战役的考验，九纵在自己的成长史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此役从攻坚准备开始，以大规模野外追歼结束，在作战过程中又经历了阵地阻击、追击围歼与攻克要点三个阶段，使部队接受了全面锻炼。各级指挥员在分析判断敌情、果断定下决心、适时转换作战样式调整部署以及机动灵活地实施不间断指挥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各部队在行军机动、作战编组、步炮协同、火力与战术运用以及攻、防、追击等战斗动作上，都有了新的提高。如果说纵队的建立，只是从编组形式上实现了由地方部队向野战部队的过渡；那么，经过郑州战役，我们则从军政素质上实现了这种过渡。这对于一支年轻的部队来说，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一步。为九纵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建树新的功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进城后，陈毅同志于当晚就视察了市容，陈赓同志也来了。陈毅对我说：“九纵已经成熟了，可以打大仗了。”

视察完了，陈赓同志说：“老秦，你们纵队打了个漂亮仗，也不请我们的客？”

陈毅同志也说：“对头，你打了蒋委员长的土豪，我们要打你的土豪。”

我说：“那好哇，我这几个伙食尾子，都共产算了。”

二陈都很高兴。我们当晚就上街，但由于时间已晚，饭店都关门了，我们敲门进了一家小餐馆，由陈赓亲自下厨，做了几碗肉丝面，大家吃得很高兴。

十月二十三日，中原军区郑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该会成立，指派张际春、刘岱峰、孙祥祜、秦基伟、李成芳、姚继鸣、李一清、宋致和等为委员，张际春、刘岱峰为军管会正、副主任，秦基伟和李成芳分任郑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谷景生任郑州市委书记，宋致和任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十月二十五日，我纵二十六旅接替三纵七旅担任郑州警备。该旅组织了隆重的人城式，军容雄壮，阵势浩荡，郑州各界军民无不为之耳目一新。

打下了郑州，我们九纵可以说是人财两得，兵员和装备、供给都有了很大补充。而中原野战军其他纵队都是刚从大别山过来，装备、物资、财力都很紧张。因此，我们严令，除二十六旅外，其他部队不得入城。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也不准擅自自动用缴获财物，所有缴获一律上交，支援兄弟部队。我们的举措，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好评。

在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中，邓小平同志治军严厉是人所共知的，奖罚分明，一丝不苟，我在郑州担任警备司令期间，有两件事，对我教育很大。

第一件事，是因为看戏。我比较喜欢河南的豫剧，觉得豫剧唱腔，七拐八拐，很有韵味。一年四季都是作战，难得有个进城消闲的时候。没想到看一场戏闯了一个祸。

记不清具体日子了，那天晚上安排好值班，我换上便衣，掖好手枪，悄

悄地寻到一家剧院门口，自己掏钱买了一张票进去了。

怕出事就有事，偏巧这天晚上邓小平政委打电话找我，一听说我不在，就火了。司令部的值班参谋绝对是个忠诚的同志，明明白白地向邓政委报告：“秦司令员看戏去了。”

这下还了得吗？没二话，通报全中原野战军批评；

受批评，自然不舒服，但仔细想想，这个通报批评也是该挨的。郑州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敌情仍很严重，我作为郑州警备司令，哪能随意离开工作岗位。如果部属们也学我的样子，岂不乱了套！

第二件事是纵队后勤部长杨以山惹起的。

郑州打下后、我们首先补充的是武器弹药，其它装备还未改善。纵队首长外出开会，要么骑马，要么步行，在城市里，这样的交通方式确有不便。杨以山见铁路局有几部小汽车，就去向人家借。

这件事反映到邓小平政委那里，一个命令下来，撤了杨以山的职。

杨以山是个工作十分勤恳的同志，就因为借一部车子被撤职，是不是处理重了点呢？小平同志不这样认为，他说，什么借？郑州是你打下来的，你是胜利之师，他铁路局虽不是党政军机关，但也是国民党的办事机构，那些人本来就对共产党心存疑惧，你明借暗要，不是抢也是抢，违犯了我党我军的城市政策，该撤职。

打了郑州后，通报批评了纵队司令员，撤了纵队后勤部长，抢打出头鸟。小平同志这一手很厉害，矫枉必过正，敲山可震虎。在非常时期，尤其需要这样，所以，我和杨以山都口服心服。

现在想来，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郑州打下来后小平同志马上就动手抓苗头，一抓一个准。我记得就是在这前后，为了根绝进城后出现的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召开了一个干部会。大家到齐了，还不知开的是什么会，见邓政委来了都很高兴，都伸出手来想跟邓政委握手。但没想到？邓政委却把手一甩，说，我们今天要开一个不握手的会。他问大家，我们部队中间违犯群众纪律的问题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违犯纪律的人虽然只是百分之三，但也够严重的了。但是，更严重的是我们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对百分之三的人采取了自由主义。这一下，把大家镇了，邓政委不仅批评了犯纪律的人，而且批评了对错误行为采取自由主义的人。小平政委这一手来得很过硬很及时，不然的话，形势好了，城市占了，条件改善了，如果没有坚强的纪律约束，部队就要出乱子。

第十一章 淮海大战

攻克宿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全国各战场的秋季攻势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济南战役歼敌十万人，辽沈战役歼敌四十七万人，东北全境解放，使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蒋军总兵力已下降到二百九十万人。北线傅作义集团已被压缩在几个主要城市；南线西北战场的胡宗南集团，已被挤到关中一隅。中原战场的刘峙、白崇禧两个集团分踞武汉、徐州周围。各集团间形成了互不相连的孤立集团。而此时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二十三个纵队，加上豫皖苏、陕南、豫西等地区地方武装共约六十余万人。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要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十一月十六日，党中央鉴于南线决战的时机已成熟，确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为常委，统一领导与指挥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组织淮海战役，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

我们九纵在解放郑州之后，经过短暂休整，至十月三十一日，除留二十六旅七十八团担任郑州城防外，纵队主力作十一天八百里长途行军，前出徐（州）蚌（埠）之间

地区。

十一月十五日晚，我纵以二十七旅配合三纵攻打宿县，崔建功旅长亲率八十团配属三纵九旅，为西门攻城第一梯

队。

攻克宿县战斗是三纵陈锡联司令员统一指挥的。宿县过去被称之为“南徐州”，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宿县攻克后，斩断了敌人中枢，将淮海战场一劈两半，直接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徐州地区之敌重点集团，提前达成了对徐州之敌的战略包围。

与此同时，纵队主力南下，抗击从蚌埠来援之敌李延年、刘汝明第六、八兵团，保障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

十五日二十二时，中原野战军首长令第九纵队并指挥皖豫苏独立旅于十六日夺取固镇，破坏铁路，并在固镇以北的任桥集、公平集、花庄集、张大桥一线布防，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北上。并指示我们“应以一部在正面引诱敌六十八军深入，主力位于铁路东侧，待敌通过后，突然断敌退路，以便三、四两纵赶到歼灭之或逼其起义。”

我们依计而行，于十六日晚进抵花庄集一线。当晚豫皖苏独立旅袭占固镇。

十九日上午，北援之敌九十九军全部两个师沿铁路东侧同时向我任桥集进犯，连续向我小库圩子、任桥集发动十八次猛烈进攻。敌人的这个军也是我们的老对手了，在一九四六年曾被我军全歼过一次，后来招兵买马，东拼西凑，又挂起了还魂旗，装备一般，战斗经验不足，但指挥官多是死硬的反共分子，政治上十分反动。战斗中，我军采用欲擒故纵战术，与敌反复争夺，敌人始终前进不得。

在我阻击敌九十九军的同时，敌第五十五军沿铁路以西前进，被我豫皖苏独立旅阻击于邱庄、欧家围子一线，也是不得前进。经过一天纠缠，我纵和兄弟部队并肩作战，给北进之敌以重创，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巩固了隔断徐州的有利态势，保障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首歼黄百韬兵团任务的顺利达成。

中野主力闭锁徐州战场的果断行动，使敌四个兵团面临各个被歼的命运，中央军委对这一行动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宿县被克后，蒋介石极为震惊，下令尽一切力量打通徐、蚌之间的阻隔，命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个兵团火速北进，驰援徐州。并企图打通徐蚌。这样一来，形势就复杂了，敌北线四个兵团再加南线三个兵团，总兵力超过八十万，比我两大野战军参战兵力还多二十万，特别是由信阳气势汹汹扑过来的黄维十二兵团，是蒋军的一等精锐，计十二万人，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这股敌人自内战爆发以来基本上没遇到过歼灭性打击，因此极为骄横。显然，如果南线敌人并入徐州战场，势必对战局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战役第一阶段任务达成后，两大野战军如何动作，便成了十分关键的战争指导问题。

总前委审时度势，决心集中中野主力在华野一部配合下，先吃掉黄维兵团；华野主力以逸待劳，挟住已被关在门内的杜聿明集团；同时以华野、中野各一部转向南线看住企图北进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采取“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部署，发起第二阶段作战。

出击浍河

十一月二十日，我纵队进至东坪集、桃园集地区，配合四纵正面阻击由蒙城向宿县进逼的敌十二兵团。

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第二天，纵队于宿县西南五公里处邵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由我传达上级歼灭敌十二兵团于江北的决心，动员各级做好充分准备，不惜花费最大代价获取全胜。

问题清楚而又严肃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让黄维兵团的增援企图得逞，整个战争进程就要推迟。但要挡住黄维，我们中原野战军面临的困难也是十分现实的，中野主力经大别山一年苦斗，消耗了不少元气，不少重火器都被毁掉了，战斗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翦除十二兵团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说是一着险棋；要是先将重点放在歼击较弱的李、刘兵团一路，剩余的兵力又难以阻挡强敌推进，稍有不测就会牵动全局，若等华野吃掉杜聿明集团之后再合力对付黄维，不但会给华野造成很大压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变化也难预料。权衡利弊，横下心来与黄维兵团决一死战实在是义无反顾。这样，既可除掉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又可“承前启后”，使江北局面大定。正因为这是知难犯险的战略决战，所以邓小平政委明确提出“拼老命”的政治口号，告诫部队只要歼灭了国民党南线主力，即使把中原野战军打完，其他野战军也能渡江夺取全国胜利。这种对于战争代价的清醒估计和顾全大局的胸怀，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和英雄气概。

实事求是他说，当时胜利的曙光虽然就在眼前，部队主流情绪是振奋和进取的，但也确有少数人反而因为接近胜利而产生了保命思想。因此，纵队党委在贯彻邓小平等首长指示精神的同时，还向部队提出，为夺取战役胜利及一年左右根本打垮国民党反动政府，应树立必胜信心和决心。

各级党委积极响应，纷纷表示：“请上级给我们任何艰巨任务，如有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二话不说，情愿接受最高战场纪律制裁。”“我们抱着必胜信心去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绝不叫苦，绝不埋怨，愿作胜利前的最后一批牺牲者。”……不论前方后方单位个人，都严肃认真地表明态度，造成了一种互相监督的政治空气。这就使“拼老命”的精神得以系统灌输，扩大了积极因素，洗刷了消极情绪，铸成了众志成城、视死如归、压倒一切敌人的坚强信念。

就在我们召开邵寨会议的伺一天，黄维十二兵团的先头主力第十八军渡过淝河，向浍河南岸四纵南坪集阵地猛攻，一部突破浍河。

总前委见十八军态势突出，轻敌冒进，有隙可乘，决定四纵部队撤离南坪集，诱敌十八军过浍河，在浍河以北布置袋形阵地，以四、九纵队吸引敌人，利用浍河将敌南岸的三个军隔断，集中一、二、三、六、十一纵队两翼包围，予以攻歼。

二十五日，敌发觉我军企图，仓皇收缩至浍河南岸调整部署，准备向李、刘兵团靠拢。

敌变我变，总前委迅速作出反应，命令各纵采取攻势行动，压缩敌人于有限地幅，形成四面包围。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我纵并指挥豫皖苏独立旅，开始突破浍河战斗。

浍河最深处水可没人，河面宽约五十公尺，两岸堤坝高出地面。敌十四军在南岸仓促布防，筑有野战工事，并设置了断断续续的鹿砦。虽然算不上

大的江河障碍，但在当时条件下要克服它仍有相当困难。

二十六日二十一时，二十六旅在东坪集附近架桥强渡，迅速突破前沿，连陷刘庄、小王庄、雷楼、李寨：二十七旅以一营佯攻王湾桥头阵地，以两个营在楼成子架桥偷渡成功，击敌侧背攻占了马庄、王庄、白庵；豫皖苏独立旅也顺利突破占领忠义集一线。

二十七日，敌急于在我构成合围之前摆脱被动，集中四个主力师于拂晓向东南方向突围。

敌人只顾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可他万万没想到，廖运周的一一师恰在此时趁势起义。临阵倒戈，在敌人内部引起了很大震动。当面担任掩护的敌十四军眼见后院起火，守备信心一落千丈。

总前委抓住时机，决心乘敌混乱先发制人，进一步扩大敌人的被动，组织各纵勇猛出击。

当晚七时，我纵开始全线出击，二十六旅、二十七旅平行出击，势如破竹，马不停蹄地打下了杨志庄、李围子、李八集和宋庄、阎庄、白大庄、大小韩庄等处。

这是一次白昼出击，敌人从南京、蚌埠派出数百架次飞机助战，构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立体作战规模。美制B—29空中堡垒不时投下重磅炸弹，强击战斗机疯狂地俯冲扫射，敌人的地面炮火也此起彼伏，在这种短兵相接的考验中，我军指战员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各个纵队的进攻队形如同强弩利剑，朝南猛插。

我纵先头部队很快与敌防御部署犬牙交错，各旅之间也互有穿插，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团混战。由于我军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首先从精神上压倒了敌人，一边作战一边整理部队，坚韧不拔，前赴后继。始终保持了压倒敌人的优势。

二十六旅在沈庄、杨围子之间遭到敌人快速纵队的反扑，混在一起的几个不同建制的部队主动协同。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进攻，巩固了既得阵地。

二十七旅八十团战士王学智、程远湘等人是刚刚从蒋军中解放过来的战士，其中王学智是宿县解放战士，程远湘和黄金礼是郑州解放战士，加入我军只有几天或十几天，连军装都没换，对所在部队的番号还没弄清楚。但他们抠掉青天白日帽徽，掉转枪口就建立了功勋。突破浍河后他们在班长带领下猛追敌人，冲到一片坟地时发现四面都是敌人，才知道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当时坟地里共有九位同志，先由一名副排长统一指挥，后来副排长等三人负伤，王学智主动指挥战斗，同程远湘、黄金礼一道以身上的蒋军服装为掩护，钻入敌群，毙敌连长以下七人，俘敌六人，缴获了十几支步枪，由于追击，部队前出，他们押着俘虏，还带着几个伤员，找了三天，先找到十一纵队，以后才辗转回到九纵。我接到二十七旅关于王学智等人事迹的报告后，很受感动。这几个同志都是刚刚解放过来的新战士，只经过短暂几天的政治学习，就恢复了阶级觉悟，且如此忠勇，实在可嘉。我们纵队几个首长在指挥所里接见了他们，给他们记了功，跟他们合了影，号召全纵向他们学习，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

在浍河大出击中，我纵动作快，战果大，代价小。共歼敌二千七百余人，缴获一个炮兵营各种火炮十七门，轻重机枪近百挺，协同四纵，基本上把敌十四军打瘫痪了。

此次大出击，时机选择有利，对发展决战形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首先

是给敌以当头一棒，一举挫败了黄维兵团夺路增援徐州的企图；第二是逼迫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初步形成了压缩包围、聚歼该敌的有利态势；第三是打击了黄维兵团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我军的决战信心。

经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作战，十二兵团被压缩到纵横都不到八公里的狭小地幅内。南逃北去的道路均被封闭，所谓援军，实际上成了被围待援之军，蒋介石指望三路（即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路）会师，“北上解围，拱卫徐州”的企图成了泡影。

十一月三十日，徐州敌人待援无望，不得已弃城西逃，又被我华东野战军包围在水城地区。两敌双双落难，战场上的主动权完全操在了我们手中。

砸碎硬核桃

十二兵团毕竟是国民党的嫡系主力，蒋介石在十二兵团身上花了血本。陷入重围后，他们很快稳住阵脚，建立了比较坚固的防御体系。他们以双堆集为核心，凭借周围二十几个小村庄，构筑集团工事，组织环形防御，各种火

炮、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重叠配置，几乎控制了每一寸土地。敌人把这种防御措施称之为“硬核挑战术”，扬言“要让共军啃掉牙胀破肚子”，“败北于阵前”。

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璉非常狂妄，我亲自在电台里收听到他用明语向南京吹嘘：“我这个核桃又大又硬，刘伯承啃不动，吞不下。”敌人的狂妄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当时中野部队大都没有重火器，战场又是无遮无掩的平原开阔地，如何对付敌人的火力优势，跨过一段漫长的死亡地带，冲上去砸碎硬核桃，确实成了一个战术上的难题。

浍河大出击虽然形成了压缩包围敌人的态势，但敌人只是把头缩起来了，内脏并没受到致命打击。有些部队低估了敌转入防御的能力，企图用“一瓢水”的办法侥幸取胜，结果不仅不能突破，反而增大了伤亡，战场出现了胶

着状态。

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敌人的兵力雄厚，梯次配备，火力也强，对我突击队实施连续反扑，所以在其前沿立足困难；主观方面的原因则是阵地攻坚战的思想普遍不够明确，战术路子基本上没摸到。在作战形式由运动战到阵地战的转换关头，个别干部不是积极地总结教训琢磨战术，而是错误地认为“打仗还能不死人？命是公家的。拼完为算！”

十一月二十九日，总前委发出战术指示，明确告诫各纵队：敌坚守待援，我不易一鼓攻歼。应首先攻其外围，削弱敌人有生力量，采取稳定的攻坚战，构筑纵深坚强的攻防阵地，攻占一村，坚守一村，围师不阙，紧缩包围，一口一口把敌人吃掉。

总前委这个指示非常及时，既扭转了部队的急躁情绪，又提出了打破敌我僵持局面的指导原则。据此，纵队强调不能把“拼老命”的政治口号当成战术思想，拼老命不是死拼，敢拼不等于乱拼。严令各级必须爱惜阶级兄弟生命，充分发动群众，认真研究战术，摸着石头过河，以勇敢加智慧，砸碎敌人的硬核桃。

十月一日，我纵二十七旅在十一纵和豫皖苏独立旅配合下攻克小张庄，全歼守敌一个团，打破了几天来的僵持局面。

小张庄位于敌十二兵团防御圈东北角，是个仅有八户人家的小村子。守敌为十军一一四师一团（欠两个连）。敌人在这里构筑了三层工事，外层是鹿砦、铁丝网和前伸地堡，纵深一百五十米；中层环村一百五十公尺，地堡密集，堑壕交错，各地堡之间均有交通壕贯通，构成环形防御工事，形成交叉火网；里层是房屋和大地堡构成的集团工事。核心大地堡配备二至三挺重机枪，周围有二至三个小地堡，各配备一至两挺轻机枪。集团工事间，每隔三十米筑有小地堡和射击掩体。这样的防御体系，硬攻显然是不可取的。

说到底，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战士中间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性。在敌人的严密防御面前，一个既简便又实用的“近迫作业”战术应运而生了。

二十七日下午，我二十七旅八十一团曾一度突破小张庄外围阵地，但因

敌人的火力太密，难以发展进攻。该团一机连班长牛孟连和两个战士冲到敌鹿砦跟前，遭敌火力网压制，攻不上去，也撤不下来，只得依托几个土包，就地隐蔽。也可以说是急中生智，为了生存和战斗，他们被迫进行土工作业，先将卧射掩体挖成跪射掩体，再挖成立射掩体，尔后互相招手示意，将工事挖通联成堑壕，居然在敌人的火力下坚持了一天。

战士的行动启发了我们指挥员的战术思想，旅团两级领导干部抓住这一生动战例因势利导，启发部队思考问题，强调对平原野战筑垒之敌进攻，制胜关键在于缩短敌火下运动距离，而开展大规模近迫作战。

用交通沟抵近敌人，正是提高我生存能力，使敌人的火力优势发挥不了的重要手段。

二十七旅崔建功旅长和张蕴钰参谋长把他们的设想向纵队作了报告，我们觉得可行，责成他们继续试验。

十一月二十九日，纵队定下进攻小张庄的决心。我到七十九团、八十一团研究作战方案，检查攻击部署，具体交代了三个问题：

- 一、交通沟要最大限度地抵进敌人，使突击队能迅速跃入敌人外壕；
- 二、发挥炮火和炸药威力，集中全旅炮火突击，纵队保障弹药；
- 三、军事攻坚与政治攻心双管齐下，运用瓦解整三师的经验，开展策反工作。当面敌人曾在以往战斗中遭受过我军的沉重打击，对我军恐惧心理尤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条件，加强攻心战。

按照纵队的总要求，旅团两级又研究敲定了具体行动方案。

当夜，一场空前规模的近迫作业悄悄展开，各连连长用米袋装上石灰，向敌人的阵地匍匐前进，战士们顺着若隐若现的白线跟在后面。直到距离敌人阵地数十米，连长发出暗号，大家才开始挥锹作业，天亮之前便初具规模。

至十二月一日战斗发起，二十七旅挖成三条交通沟，每条二百五十米，距敌前沿七十至一百米，宽能走担架，深可没头顶。我们纵队和旅的首长先后都钻进沟里，跟团、营、连的干部在一起，这样一来，掌握情况当然更全面更准确了，大大减少了指挥失误，进路退路心中都有了数。

为充分发挥现有火器威力，二十七旅集中五门山炮、三门化学炮、十八门迫击炮、十四门六 炮、十二挺重机枪组成强大的火力队。

纵队工兵主任柴学久还发明了一种特殊武器：用废汽油桶制做炸药抛射装置，将一百多斤梯恩梯炸药包扎捆在一根木棒上，木棒插在抛射装置上，点燃抛射装置里的黑色炸药后，黄色梯恩梯炸药包便连同木棒飞向敌阵。这东西厉害得很，战士们管它叫“土飞机”、敌人则不知这是什么新式武器，怕得要死。

可以说，进攻小张庄的作战条件和物质准备是相当充分的。突击队的组成以党员和班以上干部骨干为主，一般队员则采取自愿报名、群众审查的方法挑选。所有队员都是大家信得过、军政兼优、智勇双全的同志，并且“放下步枪、背包，拿起汤姆式、手炮（炸药包和手榴弹）”，称得上好钢利刃。

突击之前，我和李成芳政委先后到突击队待机地，与他们拍了照片，并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攻小张庄事关全局，现在还没有攻克敌野战坚固阵地的先例，你们要为全纵拿出样板来。

经过三天周密准备，突击部队群情激昂。

十二月一月黄昏，我军进行炮火准备。一声令下，群炮齐鸣，尤其是我们九纵的“土特产”——炸药抛射装置大显了神威，“土飞机”所到之处，

山摇地动，房塌墙裂。有些敌人身上既无枪伤也无炮伤。但两眼圆睁，七窍流血，硬是被活活震死了。侥幸活着的敌人也肝胆俱寒，搞不清解放军发明了什么新式武器，投诚或被俘的敌人，都心有余悸他说：“你们有一种炮太厉害了，地堡、掩蔽部都不顶事，在交通壕里更不行，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个投诚士兵说：“我们排里十分钟就要换一次排长。解放军的炮那么厉害，打不死也震死了。”

经过三十分钟炮火准备，敌前沿工事及附属防御物大都被我摧毁。我七十九、八十一团从堑壕跃出，飞天遁土一般，守敌还没清醒过来，已是短兵相接了。

经过十二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一千二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五门，战防炮一门、轻重机枪三十余挺。

小张庄战斗的胜利，创造了对平原野战筑垒之敌攻坚的基本战术经验。十二月三日，邓小平政委表扬了我纵率先拿出办法的创造精神，指示我们再接再厉，再拿绝招，进一步活跃战局，坚决歼灭黄维兵团。当天晚上，我就赶到二十六旅，把小平同志对我们的嘉勉传达下去。邓政委的鼓励和指示，进一步坚定了指战员的歼敌信心。

小张庄战斗后十二小时，纵队即召集参战部队的主要干部、突击队长和参观见习人员总结经验。友邻部队也派指挥员来研究我们的战术手段。

纵队党委发出号召。要求部队认真研究敌情，做好工事，分割敌人，歼灭敌人。强调在敌实施坚固防御和垂死挣扎中，必须采取新的战术对策，依沟夺沟，依堡夺堡，小群孤胆，依托堑壕前进，沿着交通沟发展。发挥炮兵威力，周密组织火力，掩护连环爆破，以破坏敌鹿砦、铁丝网和地堡。先剥皮后挖心，先巩固后发展，稳步前进。要有高度的坚韧性，改变猛打猛冲为顽强的连续战斗。

我们采取多种形式推广小张庄战斗经验，广泛进行以较小代价争取较大胜利的战术思想教育，发扬军事民主，调动群众智慧，“边打边学，边打边练”在全纵蔚然成风。当时部队叫响了许多口号，如“用工事和敌人作战”，“依沟夺沟，依堡夺堡”。“多流汗，多流血，工事做得好，歼敌多伤亡少”，“挖工事好比挖敌人的命根子，挖得越快，敌人垮得越快”，“谁在前面挖，谁的功劳大”等等。这些口号深入人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指战员们从“敢拼”到“会拼”的思想认识的飞跃。

转入壕沟斗争和围困作战后，指战员体力消耗极大，昼夜监视敌人。这对战斗意志是一个严重考验，各级政治机关针对作战形式的这种变化，深入前沿，抓倾向性问题，提针对性口号，发动群众，创造新的动员方式。诸如检查战斗意志，评议作战效果，火线记功入党，同突击队员谈话等等，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保证了把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与提高生存能力的战术思想统一起来。

纵队领导同志经常到有打点任务的团队，检查巩固组织的情况，给突击队员们做动员讲话、照像，鼓舞部队情绪。纵队的《战场》报和画刊一日数期，及时传播胜利喜

讯、成功经验和英雄事迹。

纵直各单位自动捐献一个月的津贴和伙食尾子，买鞋、袜、毛巾等物品慰问战斗部队，组织往前沿送葱油饼、胡椒汤等。

二十六旅精制纪念性光荣证书，发给参战人员。七十

七团一个解放战士每天掏出证书看几次，内心始终充满战斗热情，在一次战斗中主动要求出击，连陷三个地堡，并喊话争取十人反正，带回机枪两挺。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极大战斗力。

十二月五日，刘怕承、陈毅、邓小平发布命令，从十二月十六日十六时起，对黄维兵团发起全线总攻击。

我纵奉命在友邻协同下，首先攻歼张围子守敌，该敌为十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是十二兵团所谓九大主力之一，

胡璉把这个团命名为“青年团”。该敌比小张庄之敌更有优越之处。既可得到双堆集方向炮群的火力支援，又有随伴炮兵，可在前沿构成更强的火力在制地带。在此之前，我七十六、七十八团已在敌火下进行了三个昼夜的近迫作业，挖好了三条沟并以多条支沟连贯，将攻击出发阵地推抵距敌鹿砦前六、七十米处。

六日十六时，二十六旅以七十八团由张围子东北及正东实施主要突击。由于该团刚从郑州赶到淮海战场，思想准备不足，没有周密组织步炮协同，加之守敌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攻击未能奏效。我当即指示，二十六旅调整部署，以该旅主力第七十六团力队战斗，重新组织进攻，务求必克。

七日上午，为了确保一战成功，我又赶到前面，和二十六旅旅长向守志等同志一起研究，审定攻击部署，具体调整火力组织，向部队作了战斗动员。二十六旅吸取了六日攻击受挫的教训，将交通沟继续前伸至敌前沿四十五米左右，把平射炮分别抵近距敌前沿一百至一百五十米处，并调整加强了突击队的力量。

七日十八时，七十六团和七十八团再次向张围子守敌发起攻击，炮火准确有效，突击队五分钟即突破前沿，连续打垮敌人八次反扑，后续部队陆续加入战斗，展开逐沟逐堡的激烈争夺。

七十六团三连在战斗中表现了红军连队的高度顽强性，一边战斗，一边调整队形，最后只剩下九班长郝俊、通信员马绍孔等十六名几次负伤的同志，还编成了两个突击班，由指导员周福棋率领，拿下了最后一个地堡群。

至八日四时，我纵与友邻部队协同全歼守敌。这是一场硬仗，俘虏不多，但敌人留下的尸体遍地都是。

据以后调查，淮海战役结束后，当地政府发动群众清理掩埋国民党人马尸体，埋一人尸发高粱五斤，埋一马尸发高粱二十四斤，张围子群众共得政府发粮万余斤，由此可粗略估计敌人死亡之多。也由此可见，这股死多活少的敌人是相当顽固的，我们的仗也是打得很残酷的。

通过张围子一战，验证并发展了我们“依沟夺沟，依堡夺堡”的经验，使攻坚战术进一步成熟完善。事实证明，以近迫作业改造地形，用交通沟抵近敌人，可以大大削弱敌人的火力和空中优势，有利于我避短扬长。而且，工事越抵近敌人，对敌人精神上的震撼也就越大。我军的这种沟壕战术，就像给敌人身上裹了一张湿牛皮，太阳一晒，越缩越紧。敌人眼见我军挖到一村就攻歼一村，时时担心打击降临，惶惶不可终日。以后敌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曾苦着脸说过：“面对共军依托堑壕逐步蚕食的战术，高级将领坐在地堡里，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毫无对策。”

张围子战斗之后，我们的仗越打越顺手，基本上每攻必克。

十二月十一日，我纵配合四纵全歼杨围子守敌十军军部及所属残部，十

三日与十一纵协同攻歼杨子全、杨老五、三棵树守敌十军七十五师二二四、二二五团各一部及该师工兵营，从敌人防御的东北方向撕开了口子，敌兵团部侧背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

直捣双堆集

经我军连续突击，步步紧迫，敌十二兵团兵力越来越少，地盘越来越小，每况愈下。起初他们还奢望凭借实力保守空间，争取时间，作一翻挣扎，到最后外围阵地连连

失守，所谓的“硬核桃”也没有多少皮了。

包围圈内，一切可食、可燃、可用的东西都早已荡然无存，几万人马只能靠空投接济。而且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空投物资至少有一半落在敌我之间的空地上，有的还飘到我军阵地上，少得可怜的一点东西落在敌人阵地上，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引起一阵又一阵哄抢、火并、自相践踏。

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的危机面前，敌人内部派系之间、官兵之间固有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和公开化，阴森的气氛和绝望的情绪笼罩着蒋军官兵。

我前沿部队抓紧时机开展政治攻势，在敌人阵地前树

立标语牌、喊话，有选择地释放俘虏往回带劝降信，把稀饭、馒头、香烟摆在中间地带，通知敌人来取……特别是

反复播送刘伯承、陈毅司令员的《促黄维立即投降书》，更起到了巨大的精神威慑和瓦解作用。先是一些零散士兵携械归降，后来发展到整班、整排、甚至整连的投诚。

而与敌人的山穷水尽形成鲜明对照，我军越打正面越小，攻击部署越来越强劲有力。华东、中原、华北三大解放区人民以“倾家荡产，支援前线”的自我牺牲精神，扛着担架、推着小车，赶着骡马，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队伍，粮秣、弹药源源而来，光是迫击炮弹，我们纵队就补充了一万多发。

十二月十五日，总前委命令向敌人发起最后攻击。我纵奉命与十一纵协同攻击杨四麻子，全歼守敌。尔后直捣双堆集。纵队决定以二十六旅为第一梯队，由杨四麻子正东实施主要突击；二十七旅为二梯队，伺机向纵深发展。

为确保攻歼一举获胜，部队在行动之前进行了周密的攻击准备。各突击队潜到敌人阵地前反复观察地形，一一指示目标，分配任务。突击队员们发扬军事民主，具体设想，讨论了冲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棘手情况和处置办法，直到每个队员都胸有成竹，所以行动开始后能以凌厉的攻势突破敌阵，连续打退敌人的反扑，发展并巩固住突破口。二十六旅自十五时三十分开始炮火准备，三小时后解决战斗，全歼守敌七十五师二二四团（欠一个营），拿下了双堆集东北方向最后一个据点。这时，敌人在我各路大军的猛烈突击下，已无招架之功。黄维开始组织残部突围，人马嘈杂，一片混乱。

我们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一鼓作气直捣双堆集。整个战场沸腾起来，夜幕中到处是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人们的呼喊声。二十六旅迅速占领了敌兵团部所在地西马庄。

敌人指挥部掩体内，枪支、弹药、被装、文件七零八落。一架被手枪子弹穿了几个窟窿的报话机歪在墙角，连标着突围部署的军用地图也没有来得及撕掉。二十六旅还同时占领了双堆集以东炮兵阵地，缴获野炮和榴炮大部，并控制了赖庄临时机场。

二十七旅也一举攻占吴庄、赖庄，金庄诸点、

之后，我纵与友邻兵团攻进了敌核心据点双堆集，曾一度飞扬跋扈的十二兵团彻底覆灭，至此，战役第二阶段的预期目的圆满达成。

总结淮海战役时，我们第九纵队由于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各个阶段的任务，多次受到刘、邓、陈首长的表扬。

第一个任务是二十七旅配合三纵，在陈锡联同志的统一指挥下攻占宿县，消灭了宿县城全部守敌，切断京浦路，使徐州成为孤城。

尔后，我纵在固镇以北市防，坚决抵挡了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北援，保障了华野侧后安全，从而无后顾之忧地聚歼黄百韬兵团。

第三个任务是浍河大出击，趁黄维攻击部队部分过河之际，将其拦腰斩断，分割围歼。这个反击打得巧妙也打得壮观，敌我混战，从白天打到夜间，迫使黄维由进攻转入防御，这是淮海战役中战争胜负趋势的一个重要转折。

第四个任务是攻打双堆集。九纵队首创近迫作业，克服了平原作战敌火下运动暴露的困难，并土法上马，用黑色炸药推动梯恩梯炸药，对敌人构成很大威慑作用。先打小张庄，再克张围子，把敌人一个牛皮哄哄的“青年团”打得鸡飞狗跳，所剩无几。打小张庄的时候，可以说正是整个淮海战役中最艰苦的时刻，敌我僵持，局面尴尬，我们打了小张庄，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战局有较大影响。

四纵开始的几次进攻不太理想，谢富治把旅长们叫来，一个个训得脸皮发黑。他号召干部破釜沉舟，烧床铺草（一方风俗，准备死的意思）。可以说，淮海战役中我们共同对敌，但各纵队之间是个无声的竞赛。

我们九纵是支年轻的野战部队，红军底子少，战斗经历尤其是大部队作战经历并不多，为什么在短短的年把时间内，就能同老大哥纵队并驾齐驱，并且进步较快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谦虚好学，有创新意识。

年轻的纵队朝气蓬勃，没有骄傲的本线，无论是作战还是其它工作，我们都是老老实实，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摸索路子，不断研究问题，虚心检讨弱点。譬如近迫作业一事，尽管只是战士们急中生智的产物，但我们当领导的反应敏感，脑子里有弦，一拨就响，不仅能及时发现，予以重视，而且能举一反三，产生联想，使之趋于完善，最后推广使用，把不自觉、下意识的行动提高到自觉地、有意识的程度，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加上正确引导和合理扶持，威力就会更大。

邓小平同志说：平原地区作战，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障碍，九纵搞了个“近迫作业”，率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同时，也正是由于部队新，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思维活跃，思路开阔，说白了就是胆子大、点子多，什么都敢试一试。譬如“土飞机”，我们工兵主任柴学久用八二迫击炮筒子试制发射装置，这绝不是胡来，而是在一定的理论依据的前提下进行的大胆尝试。用废汽油桶和八二迫击炮发射大体积炸药包，这个点子想得邪，也想得绝，大量杀伤敌人是一个方面，震慑的作用比直接杀伤的作用还要大。

说起来，搞发明创造也算是九纵的一个传统，以后的渡江、剿匪、打上甘岭，每次重大战役，每个关键时刻，我们的部队都能出其不意地玩出几个绝招。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我们九纵从郑北歼敌开始到兵摧双堆集，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对于淮海战役的胜利，我有几点认识：

一、党中央和总前委的统一指挥是淮海战役胜利的先决条件。我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成立总前委，是非常英明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刘伯承、陈毅两位同志为常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两个野战军组成一个拳头，从组织上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一个大拳头打人比两个小拳头打人，那力量当然要大得多。倘若两个野战军各打各的，虽然有中央调度，但毕竟是远距离遥控，没有身临其境指挥来得迅速准确。党中央站得高、看得远，实践证明，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这一招是十分英明的。

二、两大主力团结战斗是保障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两个野战军亲如一家，天然协调。在战争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勇挑重担，多做贡献。战斗中争抢硬骨头，把牺牲留给自己，把顺利让给兄弟部队，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极大地激发了部队比学赶帮的士气。

三、强大的后方支援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淮海战役，地域之广阔，兵力之庞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千军万马，从秋高气爽打到冰天雪地，食从何来？衣从何来？万枪千炮又从哪里来？陈毅同志说得好，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当时，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大部分地区都解放了，尤其是山东者解放区，支前大军浩浩荡荡，可以说铺天盖地。我们有如此坚强的后盾，敌人焉有不败之理。

四、淮海战役的胜利，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那就是敌人犯错误。按照刘伯承的战术理论，我们寻找了敌人的弱点，也为敌人创造了弱点。敌人一是内部派系倾轧，每当危难时刻，自顾保命者有之，袖手旁观者有之，坐观虎斗者也有之；二是盲目自大，轻取冒进。就拿我们的老对手黄维来说，开始倚仗机械化，向我四纵南坪集阵地猛攻。我们来了个浍河大出击，他一下子就从进攻转为防御。这时候他还不服气，又倚仗火力优势和浍河作为屏障，以为我们无奈他何，还牛皮哄哄地吹嘘“我这个核桃又大又硬，刘伯承啃不动吞不下。”他们在那里趾高气扬，哪里料到，我们的近迫作业已经像牛皮绳一样一点一点地勒进他的肉里。直到最后，动弹不得，束手待毙。

当然。淮海战役的胜利，还有其它许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全国战争形势的影响，国民党在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再惨败，尤其是何基沣、张克侠于决战前夕率部起义，廖运周在重要时刻临阵倒戈，都摧枯拉朽一般加剧了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的最后失败。

淮海战役，对于年轻的九纵是一次过硬的考验，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次过硬的锻炼。尤其在大兵团协同作战、攻坚作战以及作战样式的灵活转换等方面，有不少收获。在战役期间，除了指挥作战外，我还利用白天因有敌机轰炸、部队不便展开的战斗间隙，在野战工事里读了三遍《孙子兵法》。第一遍解决生字生词，第二遍解意，第三遍悉心揣摩其中的深邃内含。我对这部书爱不释手。过去只知道《孙子兵法》是一本宝书，但鉴于文化有限，感到可望不可及。经过十多年的战争磨练，一方面对于谋略本

身已经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另一方面，自从在太谷领上了一群学生娃，开了个学文化的头之后，十余年来记日记、学文化，我一直坚持不断，积累至今，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蹲在淮海战场的堑壕里攻读《孙子兵法》，说起来也是

别有一番意境。这次攻读《孙子兵法》，更加深了对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理解。毛主席博览群书，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理论，都有较深的研究。在他的著作里，有大量内容是对《孙子兵法》中关于敌我、进退、攻守、利危、治乱、勇怯、饱饥、虚实、奇正等矛盾关系的辩证阐述和注释，形象直观，通俗易懂，从而能在指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运用得出神入化。像我们在战争实践中运用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争规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及此后形成的“十大军事原则”等谋略思想，无不汲取了《孙子兵法》里的科学营养，并赋予了它们以新的内含。这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必须与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得其精髓，心领神会：

直到现在，《孙子兵法》仍然是我最喜爱阅读的书籍之

第十二章 饮马长江

直出江北

淮海战役结束后，第九纵队奉命集结于安徽省宿县地区休整待命。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五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积极准备向长江南岸进军的指示，九纵奉命西移到河南省周口地区进行整训，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渡江准备工作。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比较大的思想转弯。

当时，我们已经听到毛泽东主席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感到特别振奋，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真可以说是胸有蓝图了。作为一个打仗打了几十年的老战士，一方面为即将取得全国胜利而欣慰。另一方面，眼看战争快要结束了，又难免有一种紧迫感，甚至隐隐有点失落感。

经过淮海战役，部队军事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全国各大战场形势发展喜人，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被打垮，使我军士气更旺。但是，由于蒋介石玩弄“引退”、“求和”的花招，时局发生了某些微妙变化。国际国内有些人看不透国民党反动派所包藏的祸心，在帝国主义的战争讹诈面前底气不足，主张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停止冲突，实现南北分治的所谓“和平”。于是，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严重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部队中小生产者革命的不彻底性也开始抬头。指战员的思想意志统一到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决策上来，成为刻不容缓的中心工作。周口整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是一次包括家属在内全军普遍发动的思想教育运动。部队坚持正面教育，主要是通过诉苦，认清国民党反动政权是一切剥削压迫的总祸根，从而理解“打过长江去”的必要性。干部则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基本文件，营以上集中学，连以下集中于师，开展大讨论，进行自我检查和思想互助，集中解决“政治上过长江”的问题；明确我党关于实现国内和平的立场和方针、揭露敌人企图以“和平”姿态蒙蔽舆论，牵制我军行动，争取喘息之机的阴谋，树立“敢战”方能“言和”的策略思想；批判右倾情绪，澄清糊涂观念，坚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意志和信念。

为确保整训质量，在纵队（后为军）党委领导下建立了学习指导委员会。针对少数干部战士不愿意继续奋斗，希望不战而定天下的思想倾向，我们用宣传提纲，启发报告等形式反复告诫部队：打仗是流血的“谈判”，谈判是不流血的“打仗”。我们同蒋介石打过多年，也谈过多次。每一次都是以打促谈，谈中有打。因此谈不谈，怎么谈，是中央考虑的事。我们全部注意力就是准备打。蒋介石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就“开过去”；不接受，我们就“打过去”。

我给部队上课时还打了一个比喻：人要生了虱子，如果只把上衣的虱子捉干净，不管下衣，那迟早还得挨咬。大家听了会心一笑，说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要打过长江去，把下衣的虱子也消灭掉。

在政治整训的同时，根据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指示”及中原军区一九四九年二月整编命令，第九纵队二月十四日开始整编。由“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隶属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建制。我任军长，政治委员谷景生，副参谋长张蕴钰，政治部主任余洪远，副主任许志奋。十五军下辖三个师，依序为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第二十五旅奉命归建，改编为第四十三师，师长张显扬，政治委员薛韬，副师长雷展如，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聂济峰，参谋长廖开芬；第二十六旅改编为第四十四师，师长兼

政治委员向守志，副师长陈皓、方文举，副政治委员李万明，参谋长尤继贤，政治部主任卫景濂；第二十七旅改编为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副师长唐万成，副政治委员王银山。

这年春节是在周口过的，热闹异常。经过三大战役，全国形势大好，淮海战役后，河南基本上全解放了。老百姓重见天日，扬眉吐气。我军经过改编，编制上整齐划一，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忙里偷闲，学会了开汽车。

整训中，我们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经常同群众开展各种联欢和比赛活动，人民群众对我军十分拥戴，离开周口时，不少学生参了军。我记得有个女学生，扒到卡车上，怎么动员也不下来，非要参军不可，部队做不了工作，就找到我。我同她谈了一次话，问了她参军的动机、愿望和决心，发现这个女孩子还是比较有思想的；最后批准了她参军。

二月下旬，野司和兵团预告我军为二野渡江先遣军，先期向江边跃进。军即决定各师和军直分别召开进军誓师大会，以此光荣任务相号召，进一步低硕士气，发展政治整训的积极成果，掀起请缨热潮。各级党委、支部，干部、党员、功臣、模范竞相表态：“要做全革命，不做半革命！”“一百里不到，九十里不停，保持光荣，再立大功！”

在这个请缨热潮中，我还接到陈慎言等九名战士用指血按了手印的一封挑战书。他们以“打通思想”和“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逃跑”，“保证完成任务”两项条件向我挑战。战士们质朴的语言像一团火，使我十分感动。

我在给他们的应战书中写道：“你们热情的来信我已经看到了，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我很高兴和你们作革命的竞赛。虽然我们工作岗位不一样，可是我们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你们给我提出的挑战条件，表现了你们对革命无限忠诚，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督促，……我决心在渡江进军中兢兢业业，执行上级一切命令指示，努力学习战术，学习政策，做到把队伍指挥好，把政策执行好，保证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打胜仗，这样来回答你们对我的热望。……同时我也希望你们努力，全部实现你们的挑战条件。除了原来的两个条件以外，我还提议增加：（1）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二）坚决服从命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努力学习，不断进步。这三个条件，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努力吧！”

后来，军政治部把我和战士们的挑战书、应战书登在了《战场报》上，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实际上这是运用一种活跃的形式，贯彻了上级的决心和政策。这件事也说明，群众中的积极因素始终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因势利导，“励其无畏之心，而作其敢为之气”。

根据野司命令，我军三月五日从周口出发，按第四十五师、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的顺序，以战备姿态隐蔽跃出大别山，向长江北岸挺进。出发之前，我和谷政委分别到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参加出征誓师大会，向部队提出了“行好军，打好仗，执行好政策、纪律，与新区人民见好面，争取军政双立功”的要求。

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同志和我们一起行动，以加强指挥。

所谓先遣，当然有时间上和态势上的要求，但更主要的是要把一支有足够战斗力的部队带上去，为主力打开通路，构成迫敌就范的军事压力。因此，军在出发之前召开各师参谋长会议，强调此次行动将直接配合中央在政治上

的举措，不可等闲视之。督促各级干部发扬高度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把充分的政治教育和正确的军事管理相结合，开展群众性的思想和体力互助，“行好军，巩固好部队，保障人马健康。”

十日，部队抵达演川。

野司指示：白崇禧部在宋埠、麻城、麻山河、浠水、广济等处各分布有若干兵力，十五军在前进中如不扫荡这些敌人，则难如期到达望江地区，也无充裕时间作渡江作战的准备。为避免上述困难，我们认为该军应不带车辆取捷径经沙窝、福田河、沙河、三河口、木子店、平湖、罗田、英山、鼓家贩、松杉铺、何家铺、合水涧、太湖隐蔽运动直出望江为有利。同时强调加紧进行渡江各项准备。

同日，兵团电示：“车辆绕六安、桐城至太湖”。

根据野司和兵团指示，我军从十二日起按新的行军路线，弃大路而走山间崎岖小径，直出长江边。

这次行军，可以说是一次小型的长征。从周口出发，过潢川、新蔡到达太湖边上，一千多里，除了长征，八年抗战中从没有一次走这么远的路。

江淮间的三月，乍暖犹寒，悠忽间春雷骤起，接着就是大雨倾盆。而且有时一连几天浙沥不止，飘飘洒洒，道路极其泥泞，许多河流无法徒涉。为了不在与我右侧背活动的白崇禧之警戒部队纠缠，尽快前出，我们弃大路而走崎岖小径，爬大山、住穷乡。部队在雨中浇、泥中滚，日夜兼程。艰苦之状，难以尽述。而大别山既是老区，又是新区，几经敌人摧残，人物憔悴。群众对我军行动颇多疑虑，普遍拒用“中州票”，所过之处，粮菜柴草都很难买到。加上连队炊事员中以北方人居多，不会做大米饭。一锅米煮出来，下面是糊的，中间是红的，上面是生的，战士难以下咽，面有饥色，情绪受到影响，减员、逃亡现象有所增加。

针对这种新情况，军及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检查政治动员是否深入，部队管理是否松懈，特别是各级领导有无官僚主义。重申渡江作战是几路大军的协同动作，发生任何困难都不能有辱使命，掣肘全局。

会后，我和政委谷景生抓了三件事：

第一是抓了炊事员集训，解决不吃生饭、糊饭问题。我这个南方人下伙房给他们做示范表演。两尺深的大锅，水加得适当，注意了焖饭的火候，结果米饭上下一色，糯软喷香，战士们都说好吃。连锅巴都吃光了。炊事员看了示范后，觉得不难，他们努力一下也可以做到。

第二件是组织师团干部下连，帮助下面解决实际困难，监督点名制度和行军纪律的执行情况，同连队党支部一道分析思想形势，明确巩固对象，因人制宜地进行帮助，纠正某些只重看管而不重教育和感化的倾向。

第三件是加强宣传鼓动工作，把部队的文化干事集中起来，教唱队列歌曲，设置“行军鼓动棚”，组织流动红旗竞赛，以活跃振奋部队情绪，减少疲劳。我们军的领导还分头下到部队，跟战士一起行军，带头唱歌，组织拉拉队喊口号。我不仅把牲口让给体弱的同志骑，还帮战士扛机枪。

我一扛枪，战士们便传开口令：“向前传，军长扛机枪！”“向后传，军长扛机枪！”整个队伍都知道，军长就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样，跋山涉水，扛着机关枪。那大家当然受鼓舞啦，行军劲头格外大。

这几件事虽不是什么惊人之举，但对巩固部队和人马健康方面都收到了明显成效，出现毫无减员、逃亡的连队五十七个，机关二十三个，“巩固部

队模范营”四个。人民军队的内在优势一旦调遣出来，就会转化为一种势不可当的物质力量，凄风苦雨，饥饿疲劳，岂奈我何！

此次进军，全军团结一致，相互提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长驱一千五百里，历时二十三天，沿途肃清匪伪地方武装，适时抢占湖北英山、罗田及安徽太湖、望江四城，按照野司和兵团规定的时限如期于三月二十七日抵达指定位置。

江畔厉兵

军前卫四十五师轻装疾进，二十八日以迂回动作，霹雳手段，将据守华阳镇（望江东南八公里）及江字号滩头阵地的敌人六十八军一一九师三五五团一个营全部歼灭，扫清了江北障碍，控制了直出长江的华阳渡口及部分内湖船只，保护了二十多万斤粮食。此次战斗打响了渡江作战的第一炮，为迎接和掩护兵团主力展开创造了良好条件。

江河作战属于特种战斗，它比一般的阵地攻击复杂艰巨，战前准备的要求也更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部队尚在开进过程中，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就催促我们着手实际的渡江准备，指出关于侦察、渡江、器材和渡江战术技术问题是刘邓首长特别关心的大事，“万勿骄情疏忽”。

部队在江边展开后，我和谷景生政委即据刘邓首长的有关指示，命令各师，似十五天时间（四月十一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第一期五天，控制沿江要点，全力搜罗船只、水手，了解一般地形；第二期七天，组织具体侦察，选择突破点，集中力量进行战术演习及政治动员；第三期三天，深入检查，拾遗补缺。后来，上级指示发起渡江作战的日期推迟，但我们的准备工作始终是围绕这几件大事来进行的。

三月二十九日，我跟郭天民同志一道至江边勘察地形。阳光下，只见大江如练，浩荡东去，确实气象不凡。华阳渡口一带江面宽两千至三千公尺。我方纵深地势平坦，多沟渠，运动受限，但沿江有高约三公尺的江堤可为遮蔽。

望江西北的泊湖，水域宽阔，便于我屯集渡江器材，开展水上练兵。江湖之间有长河（当地群众亦称华阳河）联贯，是良好的出击通道。南岸多系沙滩，便于登陆，但有瞰制水际摊头的两个制高点，左为黄山、右为香山，高差二百公尺以内，便于敌居高临下组织防御。两山之间突向水际的腿子上筑有灯塔，漆有“海关灯屋”四个字。

隔江的敌人为汤恩伯集团刘汝明部之六十八军一四三师。该师师部带四二七、四二八团位于娘娘庙至鼓泽地段，第四二九团附榴炮三门位于娘娘庙至茅林洲地段。牛矶、番

口、灯塔东南无名高地及黄山、香山有集团工事。近岸构有堑壕，水际有鹿砦等附防设施。两山鞍部为炮兵阵地，纵深没有设防。

看过地形之后得出的初步印象是：望江、华阳镇地区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出发地域，适于隐蔽进行作战准备；对岸香口至茅林洲地段也可预定为突击登陆地段。

为了力求精确周密地完成各项准备，各师建立了三种专门委员会。由侦察、保卫、敌卫部门组成情报委员会，以动态观察、捕捉敌探、过江侦察或佯动侦察等手段，查明敌兵力火力配备、活动规律、警戒程度等；由作战、训练、通信部门组成战术研究委员会，搜集水文、气象和兵要资料，研究渡江战术，拟定作战方案，组织水上练兵和战术演习；由政治部、军械、后勤和民运部门组成后勤委员会。

另外，全军还抽调三百名干部，协同分区开辟新区、建设政权，发动群众，各级首长分工，直接参与某一组织的领导。

导。

水战，舟楫是基本的条件。但是找船这件事开始是很难办的。因为大部分船只已被敌人劫走。剩下的都是船家

自己沉入湖底或隐蔽起来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军政治部副主任许志奋同志在这方面想了许多办法。

当时军情紧急，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一切都无从谈起，慢慢等待群众觉悟肯定不行，所以我们双管齐下：一方面组织部队大力救灾济贫，宣传我军渡江是拯救民众的义举，争取基本群众；一方面会同地方政府制订必要政策，利用旧保甲长和船主帮头，强制征集。比如我们宣布凡有主之船使用后确保物归原主，损坏赔偿；无主之船谁发现打捞并提供给我军，将来就归谁。这样一来，调动了船主和知情者两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提供线索的人越来越多。

有位老和尚在饥病交加中得到我们保护，非常感激，说“大军仁民爱物，不可不助。”他在签筒里做了点手脚，于是，那些对我依违未定的船主到庙里去求问吉凶时，总得好签，以为天意助我，遂踊跃交船。这个小小插曲，也说明当时工作的深度。

同时，我们出动五个团的兵力，分成小股多路，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积极搜索。并以小型武装攻打控制内湖沙洲的土顽，令其交船。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至四月五日我们即筹集与修补大小船四百四十三只，可保证一个师同时渡江。

有了船，还得有水手。

从作战要求来讲，船工必须成为很好的突击队员。他们有没有信心，敢不敢同舟共济，于渡江成败关系更为直接。有些船工经过我们的宣传启发，被我们体贴人民疾苦的高尚行为所感动，觉悟得比较快。如望江关家大屋老船工赵家贤不但带着自己的兄弟报名参加了船工队，还动员了五个义气相投的“船老大”。但由于船工都是“跑码头”的，而且大多数在“帮”，讲究辈份，有较大的封建性。完全按照老区那套办法去“发动”，往往碰钉子。我跟负责船工工作的余洪远和许志奋等同志商量，决定让部队换个办法。各师团领导可以出面请“大辈份”的人喝酒，请他们“参与军机”，帮助出点子；指导员、教导员都要上船去和“船老大”聊家常、交朋友；战士们则要像徒弟服侍师傅那样尊重船工，虚心学艺，上船时集体向其敬礼。除此以外，对船工家属在生活上一律给予优待；对于帮助部队有特殊贡献的船工，颁发记功令，挂光荣旗，领导宴请，记者照相。这些办法，打动了那些经常喝几口老酒、整天衣襟大敞的江湖汉子，船工队剧增至几百人，原先说过“我这湖里船根本上不了江”的。如今砸着自己的胸脯保证：“不送大军过江，枉为今世人！”

四月初，部队集结于泊湖开始紧张的水上练兵。

找船的同时，各师通过组织干部战士“谈水”、“看水”、“试水”，已经初步打消了大家的畏水情绪。有些战士说：“未见长江怕长江。见了长江也平常。”战士的乐观是建立在革命英雄主义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从“陆上虎”变成“水中蛟”，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的战士在陆地上一天跑百十里路轻轻松松，可在大浪滔天的湖上兜一圈，五脏六腑都得翻过来，呕吐得叫人心痛。

北方战士都是旱鸭子，用他们的话说：“只要双脚挨地，· 283 怎么着都有办法，一进到水里，有劲使不上。”一双双弄钢碰铁满不在乎的手，如今却被舵把、橹把、篷索挤磨得血肉淋漓。几天下来，许多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被折腾得病病歪歪，明显地瘦下来。但部队的情绪始终很旺盛，因为大家都明白，不咬紧牙关过好这一关，就不能实现舟楫手段和战斗力的结合，就

没有打过去的资本。

水上练兵本着军事混编、循序渐进、逐步加大训练强度和难度的原则进行，从上下船、船只操纵、救生器材试验和各类兵器水上射击等一般性课目，转入到航渡编队、指挥联络、步炮协同及登陆突破等战术动作。通过短期训练，绝大部分同志学会了摇橹划桨，约六百多人能够掌舵撑篷。连编队行船速度可达每分钟七十公尺，全连登陆动作只需三十秒。卫生员在三分钟内就可以把伤员从百米之处推送到救护船上。有道是“艺高人胆大”，部队掌握了水上功夫，原先怕风浪、怕兵舰、怕“江猪（即江豚）”、怕迷失方向，怕登陆后掌握不住部队等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逐一得到解决。

四月二十一日，四十四师组织一三团在湖里进行渡江模拟演习：随着信号弹腾空升起，清风满篷、桅杆如林的航渡编队在“炮火”中齐刷刷地飞驰，蔚为壮观。靠岸之后，部队的登陆突击动作干脆利索，勇猛迅捷。该团还特意组织了迫击炮、机枪对湖上运动目标的检验性射击，结果证明命中率很低，而且他们准备的堵漏排水措施行之有效。前来观摩的各单位指战员为之亢奋，跃跃欲试，对未来的胜利更加充满信心。他们说，“国民党有海军，咱们有湖军！”

四月十二日，接野司通告，军委决定渡江作战推迟到二十一日，并嘱郭天民、谷景生同志速至二野驻地桐城参加师以上干部会，明确渡江作战具体问题。

四月十七日，野司正式明确番口、茅林洲段为我军登陆突击地段，正面宽十公里。

四月十八日，在大战帷幕即将拉开的前夕，我率军基本指挥所从金家新屋前移至陈氏冲，以利前敌指挥。

四月十九日，我们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并部署渡江作战实施方案。

会上，谷景生同志传达了刘邓首长的指示，报告了中央对今后时局发展变化的估计。我就战术指导问题代表军党委发表了意见。强调指出，渡江作战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在我军战斗史上也是空前的，因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一切从困难处着想，充分准备，坚决攻击。”

关于具体组织实施，我把水上练兵以来上上下下共同探讨的主要问题，归拢了六条原则：

（一）应充分估计江水流速、风向、风速对编队的影响，正确选择进攻出发地位，指定明显目标，精确计算时间，达成趋利避害、出敌不意的效果，（以后在作战实践中第一梯队正是在这一点上做得较好，从而顺利渡江）；

（二）偷袭与强攻相结合，船只应增橹加桨，轻装疾进，争取偷渡过中流，越靠近敌岸越要加快速度；

（三）树立以船为战斗单位，船自为战的战术思想，有进无退，勇猛登陆，登陆后不作任何集结停留，坚决歼灭当面敌人，向心突击；

（四）战斗中船只遇难由专门救生船处理，余船应置于不顾，超越前进，不同建制分队上岸后自动听从友邻上级指挥，主动协同，逐步靠拢；

（五）分队不设指挥船，干部分乘战斗船只，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每船应配曲射火器、自动火器和爆破器材，至少十五人以上，以保证能成为独立的战斗群；

（六）炮兵贯彻集中使用原则，以三分之二力量摧毁我预定登陆地段敌

人的主要支撑点，三分之二进行全面压制，造成一种假象，以稳蔽我之主要突击方向，保障突击队水上运动。

会后，军即颁发作战命令：四十四师为第一梯队，以四个营为第一突击队，由海关灯塔以东登陆后即以一个团控制香山，二个团控制黄山。四十五师在四十四师之后过江，策应东西友邻作战。

四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拒绝我党和谈代表团提出的最后修正案，扯下了自己的虚伪面孔。这一点，对于陈兵江畔，日操夜练的我军来说早在意料之中。不少指挥员担心老是引而不发，不利士气维持。现在好了，敌人摊牌，我们何乐而不为！就在同一天，作为第一梯队的四十四师召开排以上干部和活动积极分子渡江作战誓师大会。军党委把两面辉煌壮丽的大旗，分别授予担任主攻的一三二团和一三一团。一面大旗上写着“打过长江去”，另一面写着“解放全中国”。突击团的士气十分高涨，“为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坚决突破敌人江防！”“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誓把红旗插上香山、黄山！”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江南数里内的乡亲都听到了他们的喊声。

突破天险

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一百二十万大军分西、中、东三个突击集团，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一千多华里的宽大江面上，发起了扭乾转坤的渡江战役。

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共九个军为西集团，在枞阳、望江间行动。

十五军为四兵团第一梯队，担任突破香口、茅林洲段敌人江防，占领香山、黄山等滩头阵地，尔后向至德方向发展的任务。左邻为第五兵团十六军，向东流方向突击；右邻为本兵团十三军，在鼓泽、马当间突破，十四军为兵团二梯队，将在我们之后跟渡。

军决心以灯塔、香山、香隅坂为主要突击方向。这是我们二十多天来对敌情和战场情况反复侦察、研究的结果。因为灯塔附近，特别是灯塔以西礁石参差、岸崖陡峭，不便上陆，所以敌人基本上未作防范。他们把防御重点摆在了灯塔以东，这里不仅火器配备比较密集，而且沿江岸布设了鹿砦。敌人之所以这样布局，是因为判断我们从华阳渡口入江，人的划力加水的流速，船只只能在灯塔以东靠

岸。

敌人确实低估了他的对手，九纵也好，十五军也罢，我们这支部队可以说打过很多邪门仗。我偏偏把主突点选在不便上陆的灯塔附近。一来这里是敌一四三师的翼侧，也是其四二九团两个营的结合部，便于我撕开口子；二来从这个方向突击可以避免长时间在敌火下作横向运动；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此举可以出敌不意，突击部队上岸后可直取香山，拊敌侧背，断敌退路，打乱其部署，保障我向纵深发展进攻。灯塔东南虽然有敌一个防御支撑点，但面积不大，我可集中炮火予以摧毁。

为贯彻上述决心，我们把四十阳师一三二团二营的进攻出发地选在目标上游两公里的江字号，船只入江后要溯流向上拖一段距离，以保证船只从这里出发后，流速加划速，能按时到达灯塔下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这一手很厉害，刚好打了敌一个空档。过江后我们捉住了敌四二九团副团长，该俘供称，对我运用奇兵借江流拊其侧背之举，他们始料未及，因而一旦侧背告急，全线不敢恋战，顿成瓦解之势。

中午，我在华阳镇东侧江堤指挥所，召集突击部队和炮兵营以上干部，进一步明确任务。组织步炮协同。

我们的炮兵力量非常有限，连十四军配属过来的山炮营在内，计山炮三十门，化学炮九门，八二迫击炮九门。炮弹除迫击炮的炮弹较多以外，其它炮种的炮弹均不到两个基数。说到这里有一个插曲：

四兵团本来有一个榴炮营，我向兵团申请火力，当时

陈赓同志不在，郭天民副司令等人一研究，认为十五军是兵团先遣，加强火力理所当然，就把炮调过来了。谁知刘伯承司令员另有考虑。这个榴炮营已经到我们十五军构筑

阵地了，又被拉走了。

我当时心疼啦，不仅榴炮营没争取到，还挨了刘司令员一顿批评。没有办法，为了在主登点形成相对密集的火

力，我们不得不置次要方向于不顾，最大限度地集中配备，

以山炮十九门、化学炮九门组成主要火力队，摧毁灯塔左右一线工事，支援第一梯队登陆并逐次延伸火力，保证部

队向香山冲击。

考虑到炮少弹缺的实际情况，以及步兵对炮火持续时间的要求，我特别强调了目标摧毁率，要求各火力队严格按计划赋予各炮目标，瞄准后即发射，不一定齐射，也不

一定急袭，一个萝卜一个坑，打一发就要解决一个问题，“不求一致热闹，力求准确奏效”。

下午三时，我炮兵开始试射。敌榴炮作出反应后，我以七门集火压制，很快把它打哑了。

四点四十五分，实施效力射，首发即将敌灯塔摧毁，对敌震撼很大。接着灯塔东南土矶垄附近敌人的弹药所被击

中，顿时火光冲天，江水抖动，南岸烟雾弥漫。我们的指挥所内一片欢呼，部队也倍受鼓舞，士气陡增。

与此同时，我突击部队一三团全部和一三一团一营开始登船，沿长河向江边运动。余晖中，十二里长河挤满战船，指挥员昂首挺立于各自船头，轻声吆喝着“左舵”、“右舵”，原来不识水性的战士此时都已成为熟练的水手。炮声寂落了，桨声显得更急。

七点三十分，船至河口，才发现长河上的浮桥事先未予拆除，一时队形拥挤，更增添了紧张的气氛。突击部队仓促处置，团长李钟玄挥舞大斧，奋力抡砍。经两小时紧急操作，清除了河面障碍。幸亏敌人没有发现我军企图，只有零星的盲目射击。

此时天下小雨。江面上愈加迷茫，数百只战船出华阳渡口入江，沿着江堤一字排开。一三团在河口以西，一三一团一营在河口以东。部队到位后，抓紧校正登陆目标，焦灼地等候出击命令。

二十三点，东北风起，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船工们喜出望外，说“天随人愿，共产党有福”。军即号令启航突击。我航渡编队如离弦之箭，争趋中流。各船的尾灯像天上的星星落下来，洒满了江面。远远望去，桅杆如林。当年赤壁之战中曹操，“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横架赋诗”之举可谓豪壮了，可是与今天的“百万雄师过大江”相比较，确实又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了。

十几分钟后，四十四师报告：“船到江心，一切顺利。”

谁知话音刚落，敌人发现了我们的动作，打了一长串照明弹，发出惊心怵目的光亮。

偷渡不成，部队遂按计划强攻。各船扯起篷帆，加速前进。敌炮经过短暂反应，开始射击，江中不时掀起冲天水柱。我炮兵也起而进行局部压制射击，隆隆炮声，在千里江面上经久回荡；点点白帆，在炮火中颠簸前进。队形错综向前，有些船开始偏离航向。

我抓起电话对向守志同志讲：“告诉第一梯队对准目标，掌握好方向，个把船漂下去无碍大局。二梯队按计划起渡，成败在此一举，一定不能犹豫！”

突击部队的船在水上运动四十多分钟，这四十分钟只能挨打，本身毫无还手之力，只有靠炮火掩护，我们的炮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摧毁了灯塔和敌人营指挥所以及弹药库。但是，毕竟炮少弹缺，火力密度太小，又难以持久，对敌沿岸步兵的压制更是力不从心。再加上敌江南还设有水雷、地雷、鹿砦等障碍物，给登陆造成了极大困难。

部队在向南岸冲击过程中，以“有进无退，争取渡江第一船”为战斗口号，表现得十分顽强。

一三 团团团长李钟玄面部负伤，顾不上包扎，挺立船首，指挥部队接敌。

六连一排战船后舱被敌炮击中，二班大部分伤亡，船工牺牲，江水涌入船舱，情况十分严重。乘坐该船的六连长罗金印不顾自己多处挂彩，拼力扳舵，并且一边组织部队排水堵漏，一边鼓舞大家：“人人要做硬骨头，加快速度靠岸！”

突击船队越抵近敌岸，敌人的火力越密集猛烈，在距敌岸一百公尺左右时，“红三连”二排战船上的老船工被流弹打伤，接着桅杆也被炮火削断，连同帆篷倒入江内，船失控了。战士张国正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迎着弹雨，把定舵柄。指导员周福祺见兄弟战船相继超越，心急如焚，指着那面写着“打过长江去”在风雨中猎猎翻飞的红旗高声呼喊：“我们不能辜负全团上下的信任，真英雄真好汉，关键时刻在考验！”战士们拿起铁锹、钢盔奋力划水，他们的战船重新冲到了前面。

一三一团一连四班战船被敌人手榴弹炸了个窟窿，江水直往里灌，船身下沉。胸部负伤的副班长赵强将缆绳系在腰间，跳入水中，迎着敌人的疯狂扫射，忍着剧烈的伤痛向岸边游去，脚一着地就转过身来，不顾一切地拉船上岸。

在我军将士的英勇行为面前，敌人惊恐了，用火焰喷射器封锁滩头，妄图阻我上岸。

我突击部队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赴汤蹈火，抢滩登陆，呼啸着冲向敌人阵地。一阵骤雨般的对射之后，灯塔两边亮起几处篝火，这是登陆成功的信号。

“请报告军长，第一梯队已全部上岸！”电话中传来四十四师师长向守志兴奋、急促的报告。

一个伟大的胜利来得这样突然，使人来不及陶醉。看一眼手表：差十分零点。这时候大家才想起来，我们还没有吃晚饭。

突击之前，战士们说，“只要脚底沾地，就保证完成任务！”这不是过分自信。刘汝明有多大的本事，在淮海战场上我们领教过，若不是有一道天险，实在是“豆芽菜”。现在部队已经跨越天险，切切实实踏上了江南大地，当然可

以说胜券在握。

我炮火开始延伸，支援部队扩大登陆场。一三 团二营抢占了灯塔支撑点，歼敌一个营部及一个连大部后，向香山发展进攻。该营五连排长崔彦德带一个排脱离主力，自香口东五百米处登陆，乘敌之隙，坚决果断地攻上香山，他

们控制主峰后，点燃篝火，吹响军号，犹如神兵天降，搅乱了敌人的整个防御部署。

滩头守敌见退路已被我军切断，各自惶惶奔命，因此

可以说，我们突击的成功是以奇辅正，巧妙用兵的结果：正面压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了奇兵的动作；奇兵出敌侧背，扼其要害，又有力地策应了正面攻击，一举启开

了胜利的门枢。

与此同时，一三一团一营也在友邻配合下，以两个连迂回包抄，一个连正面攻击的办法拿下了黄山。由于突击部队指挥员把握了上陆后不作任何集结与停留，直奔各自

突击目标的原则，所以登陆点虽然错乱，但较好地做到了一边打一边恢复建制，主动协同，向心合击。

激战三小时，至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解决战斗，守敌将山炮榴炮、各类辎重狼藉委地，调头向南鼠窜。“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大旗插上了香山和黄山主峰，傲然招展。

四十四师过江后，军指挥所即跟进转移至南岸。

拂晓，雨过天晴，朝日喷薄。我登上香山，敌人阵地上尚有很浓的硝烟味，但唇含甘露的山花已在抓紧点缀劫后春光。宽阔的江面上，浪花飞溅，船员往来如梭，已经在搬运行李了。就是这条江，曾使千古风流人物归于烟波，就是这条江，几乎分割华夏变为界河。但是我们硬是打过来了，一夜之间天险变通途！我们以自己的行动宣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前无古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二十二日这一天，敌六十人军全军动摇。我军沿江岸向两翼扩张，切荡残敌。四十五师渡江后，乘胜廓清香口，猛攻马当要塞，并配合十三军挫败敌炮舰的骚扰，保证了后续部队安全渡江。

二十三日，一三一团解放至德县城，并于城南良田铺聚歼逃敌一部。至此，我军胜利完成了突破长江天险的任务。

这次渡江，十五军作为二野第四兵团的先遣队，虽然也曾遇到过一些困难，但由于我们准备得充分，湖上练兵扎实，再加上地形用得好，战术上也比较灵活，飞兵顺流下香山，奇袭敌阵，出其不意，大乱敌人士气，所以最后基本上是一触即溃。

一九八九年五月，我们一大批“老十五军”回十五军，参加军史审稿会。向守志同志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会后，我们一起乘船前往南京，路过望江一段时，正是中午时分。时值春末夏初，天高云淡，两岸山色清晰可见。目睹四十年前的旧战场，我这个渡江先遣军军长和第一梯队师师长向守志心潮澎湃，那壮观的渡江场面，那激烈的战斗情景，那些在枪弹中顽强疾进的战船，那在炮火和照明弹覆盖下如同白昼的浩瀚江面，还有那些不顾生死的英雄战士的可爱面孔，一一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缅怀过去，感情难以自禁。中午在船上就餐时，我和守志同志频频碰杯，借酒抒情。

千里追击

万里长江横渡，各军捷报飞传。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急遁广州，江防之敌如潮水一般向沪杭及浙赣全线溃退。刘邓首长考虑到当时的态势，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交叉运动去南京，而直出皖浙边山区，把进攻矛头指向浙赣线。这样，既可断敌向华南、西南的退路，又能彻底割断蒋桂联系，拊蒋军侧背，扩大京沪杭会战范围。

刘邓首长的这一决策，体现了他们通观全局，高度重视战略协同的指挥艺术，使得满盘皆活，大大发展了渡江作战的胜利，加快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

四月二十五日，十五军作为兵团左路从香隅坂、至德地区出发，向江西东平、上饶进击。途中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指战员周身泥饰，但情绪甚为高涨。

二十九日黄昏，先头四十五师攻占乐平。

三十日，军主力进至乐平以北地区。

渡江战役的顺利发展和江南蒋军的土崩瓦解，一方面使指战员们欢欣鼓舞；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个怎样适应急转的形势、正确贯彻上级意图的问题。部队连续作战，极度疲劳，指战员中，少数人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情绪，也影响了渡江后的动作，所以，部队未能很快转入大纵深的追击作战。

刘邓首长高瞻远瞩，及时给予战术指导，要求各部队过江之后，“主力应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击之。”

军党委在乐平开会分析形势，认真领会了上级的作战意图，并向各师发出指示，强调敌崩溃之势不可逆转，其构成新的防线之前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要求各级树立追上敌人就是胜利的战术思想。

我向各师师长交代：必须以每日八十里以上速度前进，不为小股掩护之敌所阻，不为成群逃散之敌所惑，不为缴获所拖累，不为城镇所扣留，不为山高路窄、风狂雨暴、人困马乏的情况所动摇。

同时我们还反复告诫各级指挥员，不要老是盯着“打”，要在“走”字上做文章。作为军队，一般说来，总是把“能打”作为最高荣誉。但能与否，往往是由能走与否来决定的。苏沃洛夫元帅有句名言：“脚才是胜利的基本条件，手是辅助的。”这句话真是说得太妙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行军机动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

通过反复动员，各级干部的观念基本上从“打”字转到“走”字上，对军里提出的“凡是能打的部队，首先是能走的部队”这句话表示赞同。各部提出轻装追歼的口号，以新的姿态，日夜兼程挺进上饶。

五月二日，四十五师一三三团在漆工镇追上了敌一四三师，激战两小时，歼敌一部。为保护追敌的势头，军令该师以小部队监视截留，主力直奔上饶。

五月三日，根据野司部署，兵团命我军径取横峰，相机占领铅山，不再进击上饶。但当时四十五师已逼临上饶，为了大量兜歼逃敌，军机断处置，改以四十四师为前卫，于五月四日疾行一百四十里奔袭铅山。该师为完成前卫任务，向全师指战员发出号召：“前卫不挡路，后卫不掉队，胜利建立在脚板上，不怕艰苦，克服困难，追上敌人就是胜利。”

五月八日，兵团电示，我左邻五兵团当面之敌李延年兵团所部为我进击态势所压迫，正由浙江江山地区向福建撤退，着我军以两个轻装师星夜兼程，务于十日前进至福建建阳，断敌退路，配合友邻全歼该敌。

当时，我各部正在上饶，铅山一带分散清剿，远的有一百多里，重新集结，困难很大。因此只能一面出发，一面收拢。军严饬各师，“每日行程百里以上”。同时，为了防止一路尾击的弊端，四十四、四十五师成两路平行追击，以便在夺取建阳的同时，形成兜歼敌人主力的态势。

由于我军行若迅雷，注意抢占控制交通要点，保证了各级的宽大机动。敌人如惊猿脱兔，除了逃命以外，全无余力采取任何阻滞措施，沿途桥梁大部来不及破坏。

五月十四日，四十四师前卫乘坐刚从敌人手中夺得的汽车，进抵敌闽中供应基地南平。当时，各路逃敌纷纷集于此地，乱糟糟地拥成一团，并窃喜侥幸漏网，所以戒备疏松。我突击分队乘敌分辨不清，直闯敌阵，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以快制乱，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我军轻取南平，声威惊慑福州。蒋介石当时在福州召集军事会议，训斥他的将领：“所幸敌人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的狼狈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

五月十八日，接野司电示：“渡江作战现刻已告结束，准备迎接新的机动任务。”

我军自渡江以后，兼程追击二十六天，行程一千五百里，实施主要战斗十二次，歼敌一万二千余。部队整日与淫雨泥泞为伍，头上无伞，足下无履，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不分昼夜地穷追猛打，经受了艰苦卓绝的考验。

千里追击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战役扩张。

当时，敌人兵败如山倒，蒋军官兵中的大多数人已不愿继续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了。所以即使建制尚存，也如惊弓之鸟。所以，我们有时发现山头有小股敌人，部队甚至不做展开攻击的动作，重武器根本不下驮，只是几个嗓门大的一喊：“嘿，”快给我下来！”敌人就乖乖缴枪投降。

一路上。逃敌遗弃的辎重随处可见，汽车仰翻路侧，人马尸体枕藉沟壑。成群给队的军官眷属和伤兵蓬头垢面，凄凄惨惨，踌躇行止，极为狼狈。

正是这种“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形势，使“兵贵神速”的问题更加突出。实际上走得快就是胜利，走到了就是胜利，只要追上，就是胜利。只要开枪，就有胜利。各级指挥员的全部工作都是为着调动积极因素，保持坚韧意志，使部队打不垮，拖不烂。他们和战士们一样，在风风雨雨中摸爬滚打，茹苦含辛。四十三师师长张显扬同志宁肯自己打赤脚，也把仅有的一双鞋脱给战士。至于把牲口让给病号和体弱的同志，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军官兵一致、自觉团结奋斗的优势，使我们始终保持了追击速度，一路席卷，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我军进击建阳、建瓯、南平，行动迅捷，战果可观，受到刘邓首长特别嘉勉。

在这段追击过程中，我们不但风卷残敌，还扩充了自己。国民党军队败撤上海时，裹挟了许多青年学生，对他们进行“共产共妻”的欺骗，准备运往台湾。被我军追上后，国民党军队只顾逃命，这些知识分子则醒悟过来要求加入我军。以后有的老战士开他们的玩笑，说他们是“提前过江”。

通过这一段实践，部队初步掌握了大兵团追击作战的特点，理解了“当我们困难的时候，敌人更困难，谁能战胜困难，谁就能胜利”这一重要指导思想的深刻内涵，获得了战役上的平行追击与战术上的尾击堵击相结合、线的追击与面的清剿相结合等成功经验。也可以说，渡江追击作战，是我们尔

后加入战略追击，挺进大西南的一次成功预演。

“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渡江作战一举换了人间，但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军数百名干部战士慷慨捐躯，突击梯队的营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挂彩。这些同志以不朽的生命壮我军魂，以赤诚的热血报效人民，永远值得我们敬重！

人民解放战争的本质是人民战争。我军靠自己的崇高宗旨感召人民，而人民一旦理解了我們，便敢以身家性命相许。渡江前我军屯兵的望江地区，久经蒋军涂炭，当时又正值青黄不接，村寨残破，民生萧条。但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依然为部队筹集了一百多万斤粮食，六百万斤柴，五百万斤马草，两万双军鞋。出动船工、民工三千多人。送我军渡江的船工当中，有十四五岁的少年，也有五六十岁的老人。船工牺牲了，亲属们忍着眼泪默默掩埋，而耻于到民政机关提这样那样要求。其深明大义，使人怆然！

从王卜昌成立纵队，到渡江战役十五军荣膺先遣，不到两年时间，我们这支由地方部队升格而成的野战军，南征北战，经受了无数次大小战斗的考验。在战争中，我们越打越大而不是越打越小，越打越强而不是越打越弱。部队的成长，当然有很多方面的条件。这里，我仅从军事指挥上谈点体会。

毋庸置疑，一支部队能不能打胜仗，指挥员是非常关键的。作为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我认为，万变不离其宗，最基本的还是八个字——知己知彼，知天知地。

这八个字说起来简单，实则容量极大，意味深长，奥妙无穷。

知己，就是要了解自己的部队，从人员装备到特长短处，谁善攻，谁能守，谁善于啃硬骨头，谁善于打持久战，指挥员心中都要有数。我作为纵队司令员和军长，对于团以上干部的战斗经历和实战指挥能力，基本上能掌握。军里的三个师，四十四师善攻，攻势凌厉，能啃硬骨头；四十五师能守，稳打稳扎，柔中有刚；四十三师在开辟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以及清剿股匪方面有独到之处。再往下，有些团兵强马壮，善于攻坚；有的团机动灵活，善打穿插；有的团可以用来开路；有的团可以用于伏击；有的团可以用于防守；有的团可用于奔袭。在使用部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精打细算，一兵一卒都争取用到点子上，用得恰当、科学。

知彼，就是要了解敌人。了解其兵力装备，仅仅是一个方面，还有敌军官情况，派系背景，战斗经历，士兵思想动态等，有时甚至连兵员籍贯、生活习惯等细节都要研究。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互相关联的，尤其是在作战中，往往是一个细节问题决定一场战争胜负。战争可以说是一桩十分精密的工艺，在研究敌人时，要求我们心细如发，只有把他们揣摩透，避开了他的锋芒，揪住了他的尾巴，才可胆大包天将其消灭。不了解对方的作战，就是糊涂仗。我是坚决反对打无准备之仗、打糊涂之仗的。

知天知地，就是要学会利用天候地理条件。我们装备差，有时兵力不足，靠什么？靠战术、靠指战员的勇敢加智慧，还有一个重要依靠力量，就是依靠天候地理条件。当年孔明白手起家草船借箭就是利用了天候条件，赤壁之战也是利用天候条件，火烧了曹操的战船。我们渡江时，也是利用了天候地理条件，我带着一三团几个干部在江边勘察了好几天，才定下奇兵出华阳镇下香山这个计策。凭着浓雾，溯水拉船，如猛虎静卧于吉水一带，待渡江时蛟龙出海，顺流急下，飞兵顺水下香山，出其不意。这一手是很厉害的，其它滩头敌人的火力拼命打我们，等香山这个卫星一放，敌人就不战自乱了。

那是夜里，敌人也不知我们有多少部队，实际上我们只有一个营，但作用大。占领香山，又是放火，又是吹号，搞得沸沸扬扬，从心理上给敌很大压力。

以上我说的是致胜的基本条件，那么，知天知地知己知彼，是否就意味着稳操胜券呢？也不一定，指挥员和部队的素质以及应变能力才是致胜的关键。重要时刻，指挥员的决心要硬，该拼的不惜赔血本，咬紧牙关拼到最后一个人也在所不惜。甚至有些战斗明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也要硬着脑袋打下去，那往往打的是政治仗，是顾全大局。为了全局，敢于牺牲自己，这也是指挥员不可缺少的素质之

当然，无论打的是什么仗，指挥员都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部队的伤亡，保持战斗力，该拼的坚决拼，还要会拼。不该拼，坚决不能恋战，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不为坛坛罐罐绊住了手脚，不患得患失，指挥员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现象后面，宏观地展望整个战场风云，把握我阵敌势的强脉弱弦，才能带领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千里追击结束后，我军奉命集结于江西省临川、宜黄地区休整待机。同时进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学习和继续进军的准备工作。

渡江作战以来，指战员们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士气高涨，信心十足。但在少数人员中，不同程度地滋长了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停顿不前和贪图享乐的情绪，这是继续完成进军任务的障碍。学习中批评了“打过长江就万事大吉”、不愿艰苦奋斗的思想，以及骄傲横蛮、违犯政策纪律、与友邻团结不好等不良倾向。

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全中国的思想，使全体同志明白：我们的两面大旗，“打过长江去”已经实现了，但“解放全中国”还有待于继续不懈地努力。与此同时，还总结了对白崇禧作战的经验，进行了各种火器的射击技术训练和山地、稻田、河川的战术训练，并补充了部分人员和物资。

我军由北方长驱南下，由旱鸭子变成水上漂，部队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也由于连续转战，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临川是个丘陵地区，林木茂密，山青水秀，环境十分优美。更可喜的是，春末夏初，山林里野花点缀，翠竹挺拔，山涧溪流涓涓如丝，空气清爽宜人。我们这些当领导的，绷紧了神经也得以松弛一下，瞅个空子，背上猎枪，开个吉普车，钻进山林深处，打上一两只野鸡，交给伙房，大家美餐一顿。

第十三章 挥戈华南

进军两广

在临川休整了一个多月，七月七日至九日，我军分别由临川、宜黄等地出发，两渡赣江，参加湘赣作战。

七月十七日，军主力进抵安福地区，奉命进行整训。安福地区历来为疟疾流行区，遍地杂草丛生，夏季蚊蝇、蛆虫比比皆是。有一首民谣：“安福泸水河。蚊子大如蛾，一个不够吃，两个差不多”。北伐战争时期，北洋军阀曾有一个团受疟疾危害，大部分病死在该地区。

我军进驻安福正值疟疾流行季节，天气闷热，医疗卫生条件差，加上部队长途行军，过度疲劳，营养不良，抵抗力差，导致疟疾在部队迅速蔓延，发病率急剧上升。全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都不同程度地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部队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

为了战胜疾病，军党委及时发出“开展人马健康运动”的指示，把突击治疗病号，改善生活，消除疲劳作为中心工作，号召全体指战员“紧急行动起来，开展群众性的人马健康运动，战胜疾病侵袭，尽快恢复战斗力”。

各师、团党委都分别召开党委会，拟方案，定措施，抓落实，一个群众性的人马健康运动在全军迅速掀起。

八月二十一日，在建军二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上，我把开展人马健康活动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向全军作了动员。谷景生政委、张蕴任参谋长带领四十多名机关干部深入连队，了解疫情，看望病号。

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军后勤部组织人员分赴上海、南京等地和华北老解放区，采购药品和副食，保障部队治疗需要。医务人员还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千方百计寻觅偏方和采集中草药。一三一团卫生队长杜希良还研制了“涩拉秧水”和“郁金香”等药剂。

除了医疗防治外，各级还狠抓了伙食调剂，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组织体育比赛。

我们的这些举措，抓得紧，抓得快，也抓出了效果。当时整个第四兵团都面临疾病危害，陈赓司令员十分着急，准备向中央报告。兵团卫生部长桂绍忠把我们“开展人马健康活动”的情况向陈赓同志作了汇报，陈赓很高兴，指示机关在全兵团推广了我们的做法。

在安福整训期间，我们除对追击行军进行总结和开展人马健康活动以外，还针对今后任务，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军召开了有团以上党委书记参加的党委扩大会，传达贯彻第二野战军在南京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中心讨论了加强党委建设和搞好与友邻部队团结会师的问题，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党委会工作方法》十二条。军党委要求：各级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学会“弹钢琴”，加强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委（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部队在向大西南进军中切实搞好与友邻部队、地方党组织、地方游击武装的团结会师。虚心向友邻部队学习，反对骄傲蛮横、功臣自居情绪，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除了党委扩大会，我们还召开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后勤工作会议，研究对白崇禧部的作战对策及后勤保障措施。我在会上就对白崇禧部作战的战术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各师分别组织了对抗演习。部队进行了从单兵到营的山地、水网稻田地战术技术训练和各种武器的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高

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从而在思想和物资两个方面都为继续进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赣南地区全部解放，华南之敌正处于我军的直接攻击之下。但蒋介石仍企图以白崇禧、余汉谋部组成“湘粤联合防线”来阻止我军南下，借以苟延残喘。

九月七日，叶剑英同志带着中央军委的指示到达赣川，主持召开进军广东的作战会议。

军委指示：解放广东问题，应首先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放的条件，争取全面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敌人在广州的顽抗。

九月九日，十五军由安福出发，沿遂川向粤北进军。在赣州同第四野战军会合。

这是我军第一次同四野老大哥见面。四野装备好，部队军事素质好，战斗力强，是早就听说了的。我特别重视这次会合，主要是想借此机会学习老大哥部队的战斗作风和先进经验，学习他们的城市管理经验和群众工作经验。会师之前，我派人提前去四野了解情况，连待人接物、礼节礼貌方面都列入取经范围。

二十三日晚，我第四十五师急行军六十五公里，奔袭南雄城。在追歼南雄逃敌战斗中，又顺手攻克始兴城。四十五师两天之内连克西座县城，共歼敌一千五百余人，打开了进入广东的大门。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当时正在南雄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总结南、始作战经验，讨论向广东进军部署。从收音机里听致开国大典盛况，万众欢腾，军心大振，决心尽快解放广州，向伟大祖国献礼。

十月六日十二时，四十五师主力经七十公里急行军进至曲江城东。十七时，我四十三师和十四军四十一师从东、南两边包围曲江，守敌第六十三军一五二师四五四团惧歼，将曲江南边铁路桥破坏后渡北江逃窜，曲江遂告解放。

十月十四日，第四兵团首长令我军不进广州，转向西南方向沿北江东岸追击残敌。

十四日十九时，我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解放广州。之后，军主力进至佛山地区集结待机。

十月十七日，军奉命以第四十三师、四十四师归第十四军军长指挥，向阳江方向追击敌二十一兵团，第四十五师留佛山及其以南地区清剿残敌，军部位于佛山城。

广东战役的胜利，是我军遵循毛主席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英明战略决策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在广东战役取得胜利的同时，第四野战军主力在衡宝战役中歼灭白崇禧集团一部，陈兵湘桂边境；第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在广东作战中，歼灭了余汉谋集团的主力；第四兵团威逼广东西部，这就形成了南北合击白崇禧集团的有利态势。

为防止该敌逃往海外，中央军委决定，在第二野战军及十八兵团发起西南战役的同时，由第四野战军首长统一指挥第十二兵团、十三兵团及二野第四兵团共九个军、三十个师及敌后人民武装一部，共四十万余人，迅速发起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集团。二野第四兵团及四野第四十三军为南路军，由陈赓同志统一指挥。

十一月七日，广西战役开始，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在湘、桂、黔边向敌十七兵团首先发起进攻，打响第一炮。十日，占领通道、黔县、解放榕江、从江、河池后，分路向百色、宾阳、南宁急进。守敌第十七兵团慌忙沿黔桂边境西逃。

十一月十五日，我二野五兵团攻占贵阳，白崇禧惨淡经营的所谓“西南防线”被拦腰斩断。十八日，我北路军在东安、道县向敌展开全面进攻。二十二日，解放桂林，接着占领阳朔、贺县、梧州并渡过西江迅速向南扩展。

在我军猛烈攻击下，白崇禧向云南、贵州逃跑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其右侧背受我南路军威胁极大，企图利用我西路、南路部队相距尚远之机，调集其主力部队发动“南线攻势”，妄图控制广西南滨海地区，打开逃往雷州半岛和海外的道路。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四野首长指示，南路军首长决心在廉江、南唐圩、信宜一线设防，阻敌南下，以粉碎敌人的“南线攻势”。

我军奉命并指挥十四军的第四十师、第四十一师，秘密转移至信宜以西地区，围歼敌第七军。

敌人的这个第七军，原是桂系一等精锐，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能打。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广西猴”，战术动作敏捷，战斗作风也硬。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了，第七军成了白崇禧手中的一张王牌。同时第七军也是我们的老对手。刘邓大军进大别山的时候，就是这个凶恶的敌人跟在后面穷追不舍。这一次。我们十五军同它是狭路相逢，全军上下都很明确，非把它干掉不可！

十一月二十六日黄昏前，各部队均进入上述指定地域。

二十七日九时，敌第七军自旱田坡、岭头开始向我第四十五师、第四十一师阵地发起进攻，遭我坚决阻击。激战五小时，敌遗尸数百具，被迫停止进攻。十五时，我第四十一、四十三、四十五师完成对敌迂回，向敌第七军发起全线进攻。第四十五师一三三团由133高地、188高地突入敌阵，连夺156、石板坡等高地后，向165高地突击。当部队接近高地时，遭守敌顽强阻击，该团政委田耕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接到田耕牺牲的噩耗，我的心里十分难受。田耕同志是山西省高平县人，一九三七年入伍，英勇善战，政治水平相当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政双优的好干部，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下了对田耕的深切悼念之情。

这次战斗，曾逞凶多年的第七军在我十五军和配属十五军的兄弟部队的坚决打击下，萎靡不堪，被迫溃退。这样一来；引起敌军整个“南线攻势”破产。白崇禧发现不妙，急令其第三、第十一兵团向合浦撤退。我军奉命直达陆川、博白地区追歼逃敌。

这次追击，又是秋风落叶之势，敌人如丧家之犬。我们开枪就有胜利。那些日子。根本不用担心他有还手之力。陈赓与我通话，全是明悟。陈赓说：“还讲个屁密码，张淦都被抓住了。我们就明明白白告诉他我们是怎样用兵，他也没有一点办法。”

为了抢时间加速度，我让电台联网工作，一边行军一边喊：“同志们啦，加油追呀。不要吃饭，不要睡觉，再坚持一下，啃口干粮，喝口水，能往前走就决不停下，追上就是胜利，我秦基伟就在你们中间，跟你们一起跑，我也是一个背包一个粮带，除了比你们多扛一支枪，还比你们多了一把年纪。我呼吁同志们看着我，我不停下，你们就决不能停下！”这招真灵，据后来

有的干部对我讲，我的行军鼓动对战士们触动很大。部队追击劲头如狂飚旋风，席卷残云。不能走的倒下了，能走的继续追，够百儿八十就是一个连，够三二百就是一个营。只要还有气，部队就拼命地往前追。

我军边追边打，于十二月四月到达陆川。

同一天。我第四十三师在碰桐一带，从东、西、北三面，向退守新田的敌一三八师残部实施突击，激战两小时，将敌一千余人全歼于三合水地区。

第四十五师一三三团在向郁林进军途中得悉敌七军残部正沿郁（林）贵（县）公路向西逃窜，当即跟踪追击，会迫到距浦塘三公里时，发现敌人就在村内，根据敌如惊弓之鸟，建制已乱、互不相识的情况，决定智取。十时，该团八连化装成国民党军，巧妙地通过敌两道警戒线。入村时，被敌第七军哨兵阻拦，发生争吵，敌哨兵持枪威胁，被我当场击毙，敌军顿时乱作一团。我八连立即开火，迅速占领高地并堵住村北山口，正面部队迅速投入战斗，将敌包围，战斗进行不到十分钟即告结束，共俘敌三百余人。

一三三团追至郁林以北罗秀圩避雨时，团警卫排恰与化装潜逃的四十军军长张文鸿同住一楼。张在楼上装病呻吟，其侍从人员进出时，神色慌张，房东也显得心事重重，经耐心做工作，宣传我党政策，房东低声告诉我们的战士说：“我家楼上住的是国民党大官”。该排立即上楼，将张文鸿活捉。说起来像游戏，抓一个军长，像抓一只鸡。

第四十四师受命剿灭博白西北六万大山地区的残敌。经十天搜剿，将溃散在山区的残敌大部肃清。此时，我友邻部队已解放合浦，并在钦州地区全歼白崇禧总部及其主力部队。

至十二月十日，广西战役胜利结束。

辗转西南

广西战役结束后，我军经过横县整训，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开始向云南进军。准备担负卫戍昆明的任务。现在回想起来，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就军来说，十五军走的路真是多而又多，从山西到河南、河北、湖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下一步还要到贵州、云南、西康、川西。走呵走呵，转呵转呵，可以说马不停蹄。

这次开进，正值隆冬季节，白天行军汗流浹背，宿营后，为了御寒，战士们就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进入贵州后，气候更加寒冷，部队普遍出现高山反应。部分体弱的同志出现呕吐、头晕等现象。在这种环境里行军。可以说十分艰难。一是生理反应问题，二是心理压力问题。生理反应带来了心理压力，而心理压力又反过来加重生理反应。为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各级领导做了许多努力。

说到这里我要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多说几句。

还是在大行军区时代，我们就有了先锋剧社，老艺术家赵子岳就在先锋剧社工作。以后成立纵队，又组建了文工团。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作战时他们是战斗队、运输队、救护队；休整时他们是演出队、慰问队、保障队；行军时他们是宣传队、鼓动队、服务队。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句话说得入骨三分。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我们甚至也可以说，没有文艺工作者的部队，是一支缺乏生机缺乏朝气的部队。解放战争以来，我们每打下一座城市，都要补充一批知识分子，也都要增添一批文艺工作骨干。这支队伍诞生于战争，服务于战争，许多人在党的培养下，成了我军出色的军事、政治领导干部，有的则在战争中锤炼了艺术品格，成了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例如以后成为电影《上甘岭》编剧之一的曹欣、成为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的李建国、汪宜婉夫妇等人，都是从十五军脱颖而出的。在战争年代，我们的文艺轻骑兵能够随时结合中心任务和战斗实际需要，创作出短小精悍而又形象直观的节目，鼓动士气，启发觉悟，宣传政策，深受部队的喜爱。在豫西作战的艰苦环境里，他们不仅亲自参战，还担负救护和运输任务。在千里南下途中，又是这支队伍，沿途以各种形式进行宣传鼓动，每到一地，部队休息时，他们就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地出现在部队面前，以他们的歌声舞姿激发指战员的信心和热情。我作为一军之长，对这些既有知识，又有艺术才华，更有革命精神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们，是十分喜爱并深深感激的。

为了使部队在日复一日的长途行军中始终保持高亢的情绪，除了军师专业文艺队伍进行不间断地宣传鼓动以外，基层文化工作也开展得十分活跃，逐步形成了群众性的活动，许多连队组成业余的小剧团，实行“兵演兵”。

一三 团一连的战士们土法上马，大胆创意，用玻璃纸连成长条制成幻灯片，用图片和文字解说故事的情节，借手电筒的灯光放映，以包袱皮作放映幕布。形式活泼，比单人快板说唱之类更受战士欢迎，而且操作简便，在行军的大小休息中，连队都可饱餐一顿“电影”故事，为下一步行军打足底气。

这些文艺战士还注重把娱乐工作与部队中心任务结合起来。比如，部队要进云南了，他们就现编现演《进军云南》的小剧，军里强调要和兄弟部队搞好团结，他们就及时地演出《茶水站》，用四野部队设茶水站热情招待我军的事迹，教育自己的部队。在一次大部队行进中，有些战士不给汽车让路，

以致发生汽车碰人事件，他们针对这些现象，演出了《让汽车》，教育战士们要文明行军，互相尊重。这些内容现实、形式新颖的文化娱乐活动，极大地丰富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我们的整个行军途中，即使是在最困难时期，部队也保持了活跃乐观的情绪。

为准备卫戍昆明，我们决定利用通过贵阳的机会，举行入城式，以培养锻炼部队的正规作风和良好的军容风纪。因此，途中即开始准备工作。过贵州都匀后。部队每天出发前，都认真检查军容风纪，宿营后进行纪律教育，检查评比部队的军容风纪情况。

贵州省的党政军民，为迎接我军过境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商人纷纷自动摆设茶水站迎接我军。贵州省委、省政府及第五兵团，在杨勇司令员（兼任省主席）和苏振华政委关怀下，联合组成迎送我军的专门组织，积极为我军储粮备草，印发欢迎我军的慰问信、标语，并慰劳我军一批钱款和大量物资。

二月九日，在一片载歌载舞的欢乐气氛中，我十五军指战员精神抖擞，迈着矫健的步伐，通过贵阳市接受五兵团首长的检阅。贵州省、贵阳市党政军民热烈欢迎，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同胞载歌载舞，献旗献花，对部队教育鼓舞很大，进一步增强了部队进军云南的信心。同时，也极大地振奋了我军的声威，对安定民心，稳定贵州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贵阳城小驻期间，有个小小的生活插曲。五兵团先到贵阳一步，杨勇、苏振华又兼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他们便尽地主之谊，犒劳我军。我们入城那天，杨勇等设宴招待，气派很大，大碗上肉，大碗喝酒。胜利之师，豪气冲天，看那阵势，五兵团首长非把我们来个一醉方休不可。我们也是不装孬的。五兵团的同志喝一碗，我们也回敬一碗，开始就这么货真价实地较劲儿，喝了一会，我发现不对劲儿，一是我们人少，经不起他们轮番陪饮；二是我们属于客人，客随主便，经不起劝，一劝就喝，长此下去，还有不醉之理？我也改变了战术，三个师长作了明确分工，先头部队崔建功上，他口才较好，先让他花言巧语，死磨嘴皮子，这属于敬酒，不拘形式，找出理由让对方喝酒就行。若这招不灵，攻坚部队向守志上，向守志脑子灵，反应快，打擂台赛，猜拳，一般都是他胜利。一旦向守志招架不住，只好兜老底了，第三梯队张显扬上，他的酒量一般人比不了，喝个斤把两斤没问题。为了确保斗酒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还储备了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政治部副主任许志奋的爱人苏辉。苏辉是我们文工团的主要演员之一，性格豪爽，又是伶牙俐齿，既会劝酒，又会猜拳，同时还有斤把的酒量。一个女同志，能说会猜又有量，可以说是酒场三件宝，一件也没少。这次互相敬酒，一方面是因为胜利了，大家高兴；另一方面，五兵团是我们的老战友，大家见了格外亲。再有，那时候年轻，身体好，有本钱。那天晚上，虽然五兵团人多势众，可也没奈我何。

想当年，那真是“上马杀敌千里不殆，搁剑豪饮万斗不醉”。

剿匪平叛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我军刚过贵阳，就接到兵团电报，要我和谷景生同志于二月二十日前赶至昆明，受领新的任务。这才知道因云贵匪情十分严重，十五军将不卫戍昆明，而以第四十四师插进西康参加西昌战役，第四十三师兼昭通军分区，其余部队留在云贵地区剿匪。

从兵团首长的谈话中，我们还得知，四兵团除我十五军（不含四十三师）外，各军、师均兼任了卫戍区和军分区的任务。我们十五军是全兵团的唯一机动部队。

不久，军政委谷景生同志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军政治部副主任许志奋同志也奉命率三名团政委及部分营、连、排干部战士共三百余人前去卢汉起义部队作为中坚力量，对暂编第十二军进行教育改造工作。我们军的领导，本来就只有五名，现在一下又调走了两名，在这样的情况下率部剿匪，我感到有一定的压力。

剿匪对于十五军来说，不是新课题，但在川滇黔康边区剿匪，又确实有很多新的特点。首先从地理上讲，这个地区山高林密，便于土匪藏匿。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明处，而敌人在暗处。其次这里是民族地区，由于多年沿袭下来的偏见，很多地方不欢迎汉人。再加上匪本乡本土，扛枪为匪，插枪即民，当地群众虽然深受土匪祸害，但又不敢站出来揭发。土匪又往往同国民党残部结合，更显得嚣张，他们凭借峻岭险道和密林河汉神出鬼没。所以说，这次剿匪，虽然对手不是敌人的大部队，但绝不会比以往的战斗轻松，甚至可以说更为艰难复杂。

当时，川南匪焰正炽，匪势最大。在我追剿区的土匪八十二股、八万余人中，川南以陈超为首四十六股、五万余人，黔西北以罗湘培为首二十八股、二万余人，滇东北以伪专员安纯三为首八股、万余人。

西南军区赋予我军的任务是：剿灭川、滇、黔、康边境之匪，保障川、黔、滇公路和川江航运安全，并指出四川境内各地匪情，以川南最为严重，如不及时肃清，将大大影响粮税的征集。要集中兵力打几个好仗，彻底消灭几股土匪，以转变川南局势。上述地区，东到川、黔公路，西至大凉山，南至云、贵边的会泽、水城，北到江南岸，纵横各约五百公里，包括四省、七地区、三十余个府，其中十六个县为重点进剿区。除川江南岸一线为丘陵地外，其余均属云贵高原，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境内多民族杂居，文化落后，各地各民族均有一、两个“南霸天”式的人物，他们有枪在手，割据称霸，既是“官”，又是匪，多少年来，历届政府从来无人过问。如川南合江县以南，贵州习水县以北的大、小漕地区，川滇边的普洱渡地区，金沙江以西大小凉山个别地区，一向为惯匪巢穴，或地方封建势力割据地区。

十五军剿匪主要分为三大块。

（一）川南进剿

我们将参加完西昌战役归建的第四十四师主力置于匪情最严重的宜宾地区，将一三二、一三三团由军直接指挥，置于泸州、合江、江津段以南地区，以军和四十四师两个直属分队。分布川江沿岸清剿散匪，掩护川江航运安全。

进剿从东而西相继展开。

五月二十二日，第一三二团奔袭合江东南川黔边界之佛室场大、小漕地区的惯匪韦映辉部，在当地群众带领下乘夜将韦匪设在大漕后山上一个大庙里的指挥所捣毁，生俘匪团长曹鸿模、女匪首涂大嫂以下二十余人。接着分

路奔袭习水、土城、洛用等地，经辗转进剿，打伤匪“川黔边反共游击纵队”总指挥韦映辉，活捉其副总指挥何伯禽，击毙匪支队长以下三百余人。三十一日夜，该团再次急行军百余里奔袭习水老城，匪闻风西窜，一三二团跟踪追击，终于在赤水将匪击溃，俘百余人。

六月下旬，匪“川黔反共保民军第八纵队司令”罗裴然看大势已去，率一千三百余人携械向我投降。

六月二十一日，在绥江驻剿的第一三团一连组织小分队上山搜捕散匪。当搜捕队行至君昌坝时，借着朦胧的月光，发现坝下玉米地里有四个人影在缓缓蠕动，聪明的战士们判断此地远离村庄，又是土匪经常出没之地，一般农民这个时候是不会下地干活的。遂迅速向这块玉米地展开包围，终于将其全部活捉。经审问，那个操北方口音，自称在插秧的“农民”，就是在我穷追急赶之下，企图化装逃跑的原国民党二十七军参谋长刘德荣。

二十二日，该团一营在新滩溪以南山中搜剿时，又俘匪一百五十余人。审问俘虏，供认那个在人群中一直耷拉着脑袋、缄口不言的中年人，就是成都战役中漏网的原国民党二十军中将军长刘孟濂。两天活捉两名匪首，极大地鼓舞了我进剿部队的士气，增强了剿匪的决心和信心。指战员们坚决表示：不消灭土匪决不收兵。

经过近三个月的剿匪斗争，我军驻川南部队在西南军区和川南区党委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在壁山、泸州、宜宾、乐山诸地区党政军民的大力协助和支援下，克服各种困难，剿灭了主要股匪，共五万三千余人。主要匪首均先后落网，其中有原二十七军军长、后又被胡宗南在西昌委任为“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的刘孟濂，“川滇黔康反共军”总司令陈超等大队长以上匪首二百五十六名。

陈超被送来军部后，一天下午，我亲自审问了他一次。我问他，你一个小小的营长，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拉起那样多土匪？这个曾经在川南地区翻江倒海的“人物”老老实实地说了一番大实话。

他说，其实我只带出来一个半步兵连加半个机枪连，我将连、排长封为师长，共七个师。当时，成都战役刚结束，大批散兵游勇来宜宾、乐山，解放军正忙于接管政权、处理几十万俘虏和起义人员，没有精力来收拾我们，我趁势将他们都收容起来。这些人都是北方人，怕丢枪，怕分散回家半路上被老百姓收拾掉，都集中在我这里，所以我的队伍就大了。

我问，你的枪弹和给养从哪里来？

他说，胡宗南逃出西昌前曾拨过一部分武器和金银为伙食费。其实我们吃的都是抢的，开始时吃国民党留下的粮食，以后全是抢老百姓的了。和毛人凤联络上以后，向他报告几次情况，都是胡编乱造的，我哪里能弄清解放军的情况呢？我向他要补给，他要我报人数。一次电报中他突然问我：“陈超兄，听说你有八万人。”我知道他这是试探我是否忠诚，我回电说八万人没有，三万人我有，其实我能直接指挥的只有八千人。

我又问他，你觉得凭你们这些残兵败将，能有什么作为吗？

他笑了笑说，报告长官，这我想过，国军几百万美械装备的部队都被消灭了，我能有多少本领抗拒解放军的打击呢？我只是想，将声势造得大一点，多搜罗几个人，占一块地盘，将来收编时，对自己更有利些……

因为他是将要就刑的人了，我只是想摸摸他的内心活动情况，好作为瓦解敌人参考依据，所以和他谈话是心平气和的，谁知后来他越说越有劲，意

思是我们只要用他，他可以帮我们把四川的土匪都剿灭掉。他根据我的表情知道我无心听他这天方夜谭式的故事了，竟然向我提出，可以把他送重庆交给刘伯承主席，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二）昭通平叛

一九五二年二月底，第四十三师在云南军区及军的双重领导下，团结昭通人民，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胜利完成了军事接管，组建了警备区。

昭通地区地处云南东北部，是云、贵、川、康四省结合部，西北方以金沙江为界，与康、川相邻，东与贵州毕节地区接壤，南毗邻本省曲靖地区。全区共有十一个县。这里既有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又有少数民族封建的土司、头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特别是云南为和平解放地区，从上到下，旧势力、反动组织制度原封不动地被我接收过来，旧官僚及地方恶霸势力未受到应有的摧毁，给四十三师开展工作增加了更多的困难。

进入四月，云、贵匪焰日炽，先是伪贵州保安师长罗湘培由安顺潜逃窜入水城叛变，接着，驻防纳雍、织金、水城的原国民党起义军何绍周部二七一师叛变，贵州省保安一、二、三师所属几个保安团也先后叛逃来黔西，这两股武装以罗湘培为首成立了拥有所谓三个军的“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

原伪云南昭通专员安纯三在向我四十三师办理交接后，率两个团叛逃至镇雄、威信、彝良地区为匪。

在昭通担任我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的龙绳曾（龙云之三子，外号龙三公子），接受了蒋介石的“滇东北军政长官”和“川滇黔康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委任状，虽未公开叛变，但暗中全力执行蒋介石的“西南游击战争计划”，对我采取明里就俯、暗中捣鬼的手段，唆使他们在各地的爪牙，秘密搜罗散兵游勇、扩充实力，组织起大大小小的“反共救国军”、“反共自治军”、“暗杀团”、“抗粮军”，袭击我军驻地，暗杀我筹粮工作队员和区、乡干部，进行一系列的反接管、反改造、反征粮征税的活动与我对抗。

面对复杂的形势，第四十三师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改造起义部队的方针和党的民族政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政治上耐心教育他们，要认清形势，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组织上允许保留部分护卫武装，生活上从优照顾。这些宽容措施，丝毫也没能改变他们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安纯三叛逃之后，成立了“黔川边游击总指挥部”，自封为总指挥。

原昭通地区的另一个实力人物陇承尧投靠川南的“川黔滇人民反共游击军”田栋云部，充任其第二军教导师师长。

龙绳曾虽未公开叛变，但叛变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一面利用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合法身份坐镇昭通，一面与已经叛变的匪首安纯三、陇承尧、江赢洲、安尊三以及贵州的罗湘培，川南的田栋云等加紧勾结，亲自任命大队长以上反动骨干六十五人，图谋在昭通组织大暴乱。在龙的授意下，一时间，昭通地区到处组织暴乱，并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妄图把我第四十三师挤出昭通。四月三十日，龙的“大队长”计光华胁迫群众数百人，围攻我会泽县中寨乡政府，打死我乡党委书记及民兵队长，并将乡政府洗劫一空。

五月中旬，张显扬同志赴昆明开会，途经会泽县支锅山，遇到龙绳曾任命的“反共救国军”总队长刘振清的伏击，并疯狂喊叫“活捉张显扬”。担任护送任务的师侦察连英勇还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毙匪三十余人，才杀开一条血路冲了过去。残匪向驾东湾方向逃窜。

师部命令一二七团以一个连追歼刘振清股匪，保证公路畅通。该连急行

军三昼夜，翻山越岭追至大国洞，将刘振清活捉，其“反共军”总队一百一十七人被我军全部歼灭。

龙绳曾伙同安纯三等叛匪，在制造了一连串的危害人民及人民政府事件后，于五月二十二日又在镇雄县芒市制造了一起投毒谋杀案。匪徒化装潜入我一二八团团部驻地，趁我不备将毒药投放在茶水壶里，致使我一二八团团长、副团长中毒。团长范金标经抢救脱险，副团长郝士贵不幸身亡。

对上述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我们所以未及时采取大规模的反击镇压措施，是本着从大局出发，争取龙绳曾，暂时稳定住昭通地区的局面。而龙把我们的忠言善意，视为软弱可欺，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加快了反革命暴乱的步伐。他一面加紧和已叛变为匪的各主要头领频繁联络，精心策划叛乱。一面将他属下的匪众作了应变的部署：以康成英、郑霖两团调驻巧家，控制金沙江渡口，对付我军。并将主力一部调回凉山，以为退路，如不能占领昭通，便把残部拉回凉山，和我进行游击战。

从表面迹象和我们查获的龙的来往信件中得知，龙已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叛变在即。为防止敌突然袭击，四十三师将一二七团一营调入昭通，龙见势不妙，遂将原定七月一日暴动时间拉到六月十八日（端午节前一天）。

虽然我们对其阴谋早已识破，但仍继续做工作。从五月十六日起，四十三师领导曾连续多次邀龙协商解决。在暴乱当日晨五时，张显扬还派人送信给龙绳曾要他停止反叛行为，但却遭拒绝。七时，驻扎在龙绳曾公馆的龙的警卫营便衣手枪大队首先向我开火，并向我警备司令部营门突击。另一部则企图合围我一二七团一营，并将我派往龙部的三名军代表杀害。

在此情况下，第四十三师乃下令驻昭通城区部队坚决歼灭叛贼。以一二七、一二九团两个营合击叛匪主力，师直属队围歼龙公馆敌指挥部。

在我猛烈攻击下，各处叛军迅速瓦解溃散，被我各部队拦截聚歼于炎山、大包山、梭山地区，龙绳曾当场被我击毙。两小时结束战斗，共毙敌二百余人，俘匪首唐声周、龙奎垣（两人后均逃跑继续为匪）以下一千六百人。

平息龙绳曾叛乱，使昭通我第四十三师解除了敌人里应外合的隐患，曾受到陈质同志的高度赞誉：“打得好，为云南人民除了一个祸根”。

（三）川滇黔康边围剿

经过六、七、八三个月分区清剿，我军共歼匪七万余人，基本上肃清了川南、黔西北和滇东北近二十个县的叛匪，川江航运畅通无阻。

到八月底，残存土匪尚有四万余人。

为肃清残匪，西南军区八月十日命令：“第十五军及宜宾、乐山、昭通、曲靖、武定、毕节、西昌诸分区部队各一部，统由十五军秦基伟军长指挥，于九月中旬开始，以川滇黔康四省边境地区之匪，实施围剿，全歼叛匪。”八月十三日，军据此发出了围剿作战命令，将进剿部队区分为四个集团。

以第四十五师及四十三师两个营，曲靖、武定分区各一个营组成南集团，由崔建功师长统一指挥，负责歼灭威宁、赫章地区罗湘培为首的叛匪。是此次围剿作战的重点。

以第四十四师主力及四十三师两个营组成北集团，由向守志师长统一指挥，负责歼灭滇东北盘津、大关、威信、奕良、镇雄、牛街地区之匪，并视情况向南合击，协助南集团歼灭罗匪。

以第一三二团，军侦察营及泸州、毕节分区各一部组成东集团，由军直接指挥，负责歼灭叙永、古宋地区之匪。

以乐山、西昌、宜宾军分区各一个团及第四十三师三个营组成西集团，由乐山军分区副司令员梁俊亭统一指挥。负责歼灭金沙江以西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吕镇华、龙定洲等匪部。

我各追剿部队不顾山高沟深，饥饿寒冷，一面组织捕捉队，寻歼散匪，一面将部队分散到各乡村，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政策，同时，还帮助群众秋收冬播，担水打柴，边劳动边宣传。

通过实践，使群众亲自感受到解放军是贫苦民众的亲人，是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于是纷纷靠拢，揭发匪徒罪行，自动报告匪情，积极协助我军剿匪。

许多被迫为匪的少数民族群众，纷纷脱离匪巢，投诚自新。第一三一团在牛街地区剿匪中，俘虏两名被迫为匪的苗民，经教育将其释放。他们回去后立即动员四十七名苗匪登记自新，并将土匪匿藏的一百只羊、五千公斤土豆献出来交给我军，还积极带路护送我军伤病员。

第一三团在群众协助下，三天争取了八百余名土匪登记自新，并活捉了匪首宋敏文、杨成杰等。

第一三一团六连二十天争取土匪近千人来降。

西集团活捉了匪首王鸣先，争取了匪首吕镇华、章文伟、黄继辉等投降。

第四十三师主力，在西渡金沙江后，配合西集团、西昌军分区五五一团剿灭川康边梗堡地区之残匪，是我军在川滇黔康边围剿作战的最后一仗。

梗堡位于大凉山南端，海拔三千米，地势十分险要。长期以来，这里是龙绳曾的势力范围。云南解放前夕，龙就有预谋地在该地囤积大批粮弹。六月份，龙匪在昭通叛乱被击毙后，其舅父龙定洲逃到梗堡，搜罗残匪一千五百余人，拼凑成立了“反共救国军”，龙定洲自封司令，以苏慕武、唐声周、郑霖为副司令，企图凭借梗堡的有利地形，与我军进行“游击战”。

第四十三师以一二七团、一二九团共三个营及师侦察连，十月二十日前，分别从巧家的大寨和永善的万和场等五个渡口，渡过金沙江，分头向凉山挺进，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先后在德姑、德渣、仁义田、天地坝等地和五五一团会合。

进剿部队认真贯彻了军政兼攻的方针，发动群众，揭露上匪罪行。路过村寨，都要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并把事先准备好的彝胞最喜欢的、也是最缺少的针、线、火柴、食盐等日常用品，作为礼物送给群众，并按照彝族的传统习惯，同当地土司和头人共饮鸡血酒，钻牛皮，赢得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持。

经过半个月工作，梗堡附近村寨的群众基本发动起来，对我军剿匪采取积极支持和拥护的态度。

十一月十日晨，经过协调，第五五一团从东北司瓜口方向，第四十三师从对坪子村沿着悬崖峭壁间的小路合击梗堡，经过四小时激战，占领梗堡。龙定洲被五五一团击毙，俘匪三百余人，残匪逃入深山老林。匪首苏慕武继任总司令，和唐声周一起，继续顽抗。我即化整为零，一面追捕，一面发动群众，布下天罗地网。

十一月十七日在彝胞报告并引导下，我四十三师侦察连将逃往打洛寨山洞内的苏慕武活捉。第一二七团八连和机枪连追击匪首唐声周、郑霖时，曾两渡西溪河，不顾疲劳，日夜兼程，穷追不舍。机枪连于二十一日追至拖觉坝子，终于将唐声周活捉。

第八连追至耦屋家村时，在一个山洞里俘获了五名土匪。经审问后，得

知匪首郑霖已投靠当地黑彝头人罗斯罗月的门下。被我俘获的五人中，除土匪外，还有罗斯罗月的妹妹和儿媳。罗派人来要求放他妹妹和儿媳，八连提出以交出郑霖为条件。

当天下午，六个彝人押着郑霖来进行交换。

梗堡一战，盘踞在大凉山地区的龙绳曾残部全部被我歼灭。击毙龙定洲，生俘苏慕武、唐声周、郑霖及匪大队长、营长以上匪首共二十六名，匪团长侯光富、大队长冯万友向我投降，各地逃往梗堡的大小匪首全部落网，共歼匪一千四百人。至此，龙绳曾匪部全军覆灭。

此时，从昭通潜逃的匪首龙奎垣尚未落网。

第四十三师本着除恶务尽的精神，下决心要将龙奎垣捉拿归案。

龙奎垣在昭通随龙绳曾叛乱被我俘虏后，对他从轻处理，令其悔悟，促其自新，但他反动成性，不思悔改，乘我不备，于七月十五日潜逃永善者巢，重新招起三百余人为匪，继续作恶。

从八月十四日起，我四十三师以一二九团四连跟踪追击该匪，历时四十天，没有休息。召开群众大会十余次，宣传群众近万人，大小战斗十六次，歼匪三百六十余人。

龙奎垣自知这一带无处藏身，遂偷渡金沙江，逃到大凉山，委任地头蛇肖国福为其副司令，仍在永善一带活动。我四连继续追歼肖匪，九月二十日、二十九日，我四连两次追击肖国福匪部，但因其地形熟而被溜掉。

十月二日，群众报告肖匪带几名贴身护兵在蚂蝗沟奸淫妇女，抢劫财物，我当即以一个班急追五十里前去捕捉，肖匪令护兵掩护又只身而逃。

经我多次追剿，先后共击毙其正副大队长以上骨干二十六人，肖国福感到穷途末路，于十月下旬也离开永善，逃往小凉山。

十二月中旬，龙奎垣、肖国福，又利用我部队调动空隙，收拢残匪千余人，卷土重来。这伙匪徒穷凶极恶，在回龙坝、松树坪、金家沟等地，一天内就抢劫了三百二十四家，烧房子三百一十八家，宰杀牛、羊、鸡、猪千余，绑架群众一百三十一人，杀死群众十二人，从黄葛树到基务镇这几里地段内的村庄被搞得十室九空。

四十三师立即决定：一二九团二营重返永善，坚决消灭龙奎垣匪部。

部队东渡金沙江，封锁渡口。二营长李五小率六连和永善县警卫营一个连迅速赶到黄葛树，与五连实施对敌夹击，将惯匪肖国福等一百余人消灭在一个大碉堡内。

混战中，龙奎垣只带一名卫士逃到沙湾子，见渡江无望，便躲在卫士的姐姐吴氏家中。吴氏孀居，当了农协会小组长，龙奎垣向她乞求说：“你收下我吧，将来土改时，把一切家产都给你。”这位农协会会员当然不吃他这一套，可她心想，我一个女人，万一制服不了，让他逃跑了，那才是放虎归山。于是她心生一计，装出笑脸，欢迎他进去，做饭给他吃。饭后把他藏在一间小草屋里，用稻草盖好，便去报告农协会。农协会马上集合二三十人拿起棍子、锄头赶来，朝着草堆里乱打乱戳，当部队赶到时，龙奎垣已被砸死。

经九至十二月的围剿作战中，我军在川滇黔康边，又消灭土匪三万七千余人。连同六至八月分区清剿，共歼匪近十一万人。所有主要匪首或击毙，或活捉，均被我消灭。基本上肃清了川、滇、黔、康边境地区内五十人以上股匪，建立了区乡两级政权六百多个，完成了征粮、征税和初步发动群众等任务。

由于广泛宣传和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和我军纪律，更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阶级觉悟，沉重打击了西南四省边境地区内的封建残余势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西南地区变成他反攻大陆的反革命基地的梦幻。

第十四章 跨过鸭绿江

请纓入朝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

十月十九日，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第一批志愿军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连续发动了四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和南韩军队的嚣张气焰。紧接着，党中央、中央军委又决定组建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及炮兵部队入朝参战。

这一时期，我军正以团为单位，分散于川、滇、黔、康边境七个军分区范围内，纵横共约五百公里的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二野部队南下西南地区后，为了加强地方党政建设，多数部队都兼了地方军区或警备区的任务。四兵团兼云南军区，十三军兼开远军区，十四军兼滇西军区。但十五军没有兼任建设地方武装或党政机关的任务，完全还是野战结构，保持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能，全力投入剿匪。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的胜利消息传过来，十五军的干部战士一方面很受鼓舞，另一方面心里也痒痒。

我们这支部队，是从战斗中诞生的，也是在战斗中成长的，更是在战斗中壮大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打”字贯穿始终。打败了日本鬼子，又打跑了蒋介石，西南解放后，十五军虽然一直担负着剿匪任务，但随着我军一遍又一遍地扫荡，股匪眼看已剩无几，再这样剿下去，用不了多久部队就无仗可打了，大家心里难免有些失落感。尤其是师、团指挥员们，一二十年来绷的都是战争弦，骤然松弛，和平气息扑面而来，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一听说要组建第二批志愿军入朝参战，大家的情绪一下就上来了。

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有抽调部队入朝这项议程。我也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之前，我已经得到消息，西南局已经内定我为西南公安军司令员，指挥包括十五军三个师在内的五个满员师。公安军司令部设在重庆。若论安居乐业，这是一个美差。但是朝鲜那边打得不可开交，作为一个戎马半生的军人，岂可等闲视之，安享太平？

我当时的想法是，个人进退去留由组织分配。我当不当司令员，部队改不改公安军，都听组织的。但是，眼下还得争取入朝参战，打走了美国佬之后，回来一切都好说。听说我想请纓，三位师长都给我打电话，表示支持。

在这次会上，我便恳切地请求批准十五军入朝参战。

我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十五军干部战士有要求，军心正旺，士气正高，而且十五军始终在剿匪，战斗的弦还绷得很紧，战争弯子转得快；二是十五军没有兼负建设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的任务，完全是野战结构，机动性强，说走就能走，说打就能打，没有拖泥带水的羁绊。

但这件事在当天没能定下来。

会上，我慷慨陈词，请纓出征。会后，我又找到兵团政委谢富治，好话也说，硬话也说，请他帮忙。

这一招很快奏效了，谢富治在第二天讨论时发言说：“我看老秦的意见有道理，十五军没有地方任务，可以考虑去朝鲜。”

他这么一说，就把僵局打破了，最后邓小平同志终于拍板：“好，十五军去！”

任务是请下来了，但这只是一个预先号令。什么时候入朝，这次会议并没有明确，中央也没有明确指示。部队于是在等待中积极地做着入朝准备。

也就是在这二时期，刘伯承同志受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委托，在南京筹办的军事学院即将开学。

刘伯承是二野的重要缔造人之一，是我们的老司令员，他本人一贯严于律己，对部下也是一贯严格要求。国内战争结束了，刘帅办校的夙愿也终于实现了，他要求二野部队的指挥员，上至兵团司令员，下到团长，全部入学，好好地总结一下近年来作战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接受战役理论教育。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下旬，我带领本军十几名师、团长从重庆乘飞机赶到南京，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典礼，部队交给各级政治委员和副职掌握，继续做好入朝准备工作。

入校后，我被分在速成系。这个系的学员都是兵团和军级指挥员，又称高级系。教员有我们自己的，也有国民党被俘军官或起义军官，还有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官。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如此正规、如此肃穆的教室里听课，开始难免有点心猿意马。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上马纵横驰骋、下马摸爬滚打的战斗生活，乍一坐进教室，缩手缩脚，很不自在。有些理论，放在地图上、沙盘上我们可以说了如指掌，一旦形成系统理论，这个术语，那个概念，这个数据，那个论点，搅在一起就被弄糊涂了。

刘伯承院长不仅严格要求，而且管得细致，学习不好的那是一点也不客气，不管你是老部下还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有多高的职务，点名站起来批评。

我也有好几次被教员提问搞得十分紧张，好在我的班长是杨勇同志，他是初中毕业生，学习起来相对要进步快些，每当我被提问难住时，他就在下面小声嘀咕，给我通报答案，所以我很少当众出洋相。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走运，有一个好的学习班长。有些学员自己答不出来，班长也答不上来，一熊就被熊一窝，以致于有的同志不服气，背地里骂那些被俘的原国民党军官教员：“妈的，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

更有甚者，有人当面顶撞旧军官教员：“谁的不对？老子当初就是这样打的，不是照样把你们俘虏了吗？”

虽然在课堂上也能过关，但我有自知之明，下课之后，我一定要找比我学得好的同志帮我补课。听课时，只要能记下来的，我一定要记下，记不下来的，下课之后借杨勇的笔记抄下来，反复研读。

军事学院学了三个月，使我开了眼界，明白了许多东西。

过去有许多仗，打得顺手，打胜了，一靠上级决心正确，二靠部队顽强。当然也靠我们各级指挥员的灵活调度。我们有实战经验，有对战场动态和敌情的敏感嗅觉，有把握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驾驭能力，也有对付突变的快速反应能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我军多数指挥员都是具备以上能力的。战争年代是条件不行，我们只能边打边学，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感性的经验指导战争，也创造了不少优秀的战例，甚至体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但那毕竟有许多成份是跟着感觉走。如今有了学校，有了教室，战争被关到窗外了，我们能够暂时抽出身来超然于外，转过身，低下头去俯瞰战争，剖析战争，系统地理出个一二三四，找出个优劣长短，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指挥员尤其是不愿停止战斗的指挥员来说，目光仅停留在“胜利”这两个字上还是不够的，他还要进一步思考那一仗是怎么胜的？当初选择的那个方案是否就算是最佳方案？如果换一种打法，会不会更圆满，会不会伤亡更小，歼敌更多，对整个战局影响更大？

我的认识是明确的，所以学习起来就特别上心。

三个月的学习时间虽然短暂，但我十分珍惜，也十分怀念。虽然没能把那几本厚厚的教程啃完，但是那种学习气氛，那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那热烈而新鲜的讨论话题，使我的思路很受启发。

学习期间，我们也曾闹过一次小小的“学生运动”，主要是反映伙食问题，不是因为伙食差了，而是因为伙食太好了，好得让人咽不下去。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还很差，但我们的生活很好。用苏联专家的话说：“你们都是高级将领，营养差了不行。”我们每天上午上四小时课，中间还送糕点牛奶。俄罗斯是“食肉民族”，苏联专家也坚持多让我们吃牛肉。

国内有好多地方连饭都吃不饱，天天让我们喝牛奶吃牛肉，实在有点咽不下去。

我们把意见反映上去，后来刘伯承同志发话了，说中国的情况跟苏联不一样，我们吃不了那么多肉，牛奶喝不来。这才降低了伙食标准，省下一笔经费，用在教学上。

我们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朝鲜战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进展，彭老总指挥第一批入朝志愿军，连续发动四次战役，给仁川登陆后嚣张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及其盟军劈脸一记耳光。为了乘胜进击，扩大战果，彭老总要求第二批志愿军尽快入朝。

十五军于五年十一月底接到北上命令。

十二月十八日，西南军区发布命令，正辗转于滇东北剿匪的第四十三师脱离十五军建制，留在云南建设昭通军分区，归云南军区领导。将第二十九师编入十五军序列。

为了加强力量，西南军区又调炮兵第九团配属十五军，并命令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各组建一个炮兵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十五军首长致电四十三师：“你们师在滇担任边防任务，不便抽出。……四十三师为我军建军以来之骨干部队，对军之成长发展与壮大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特向四十三师致以敬意……”从此，第四十三师即正式脱离十五军的建制。

从个人感情上讲，把四十三师留在云南，我是有点舍不得的。这个师在十五军建制内历史最老，前身是太行军区独一旅。进入解放战争以来，他们打了不少硬仗、苦仗。这次入滇，匪患嚣张，四十三师又是首当其冲，披荆斩棘，使土匪闻风丧胆。从作战出发，我很希望十五军齐装满员入朝，因为干部熟悉，特点熟悉，调度起来心中有数。但因他们肩负剿匪重任，机动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西南军区用二十九师换下四十三师。对此，我完全理解，并坚决拥护。

二十九师也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在此后的朝鲜战场上，他们很快就融入十五军中，浑然一体，战斗作风同样过硬，使我深感欣慰。

对空作战

一九五一年二月，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输送，十五军部队先后顺利到达华北战略机动位置——河北省邢台地区。

此时，我和正在学习的师长、团长们也奉命离校赶到邢台，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二月十七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我军正式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下辖第二十九师、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隶属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军长仍然由我担任，政治委员谷景生，参谋长张蕴任，政治部主任车敏瞧，后勤部部长尤继贤。原二十九师师长周发田升任副军长。

这次出国作战，对于我们来说，将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此，我们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一是向先期入朝的老大哥部队学习；二是开展调查研究。为了便于工作，我向西南军区建议，并得到同意，即调张显扬同志回十五军任二十九师师长，二十九师政治委员是王新。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师长没有变，政委分别是朱业奎和聂济峰。

通过整编，部队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入朝时，全军共有四万五千余人，其中干部六千余人；各种火炮五百三十余门，大小汽车一百三十多辆。干部战士的素质、武器装备的数量、质量，都有所改善和加强，对战胜美军加强了力量，增添了信心。

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具体地了解敌军情况，更直接地把握美军作战特点和朝鲜山地作战经验，我们组织了入朝见习团，向先期入朝的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学习。见习团由副军长周发田带队，第二十九师副师长傅严森、第四十四师副师长李钟玄、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等二十多名干部前往友军学习。他们不但听了经验介绍，还亲身体会了实战中的一些做法，带回来许多具有针对性的经验。

三月一日，军党委向全军发出了“坚决打响出国作战第一炮”的号召，军、师还分别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和党员代表大会，以进一步动员。

为了昭示决心，我们让机关制作了一面特制的红旗，上面绣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大字。在军里参加营以上干部会和党员代表大会的同志都踊跃在旗上签名，表示请缨出征的决心。

曾经出席过全国第一届英模大会的独臂爆破英雄柴学久、白衣战士杜希良、智勇双全的战士王学智，一再表示决心：坚决打好出国第一仗，争取荣立国际功勋，再上北京去见毛主席。

军文工团十六岁的女战士汪宜婉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就要跨过鸭绿江参加保家卫国的战斗了。你们有十个女儿，就为祖国奉献一个吧！”

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四连的高春旺班给毛主席写信，表示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立新功，为毛主席争光。入朝不久，该班收到了毛主席办公室的回信，信上说：“毛主席希望你们英勇杀敌，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光荣立功。”这封回信，使部队受到极大鼓舞。

我们军里的领导同志在誓师大会上向大家发出号召：“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做一个国际主义的英雄。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就是马革裹尸，也是绝顶光荣。”

我们带头表示：“在朝鲜战场上，自己的名字，不书英雄榜，便上烈士碑。”

经过一系列的动员、宣誓、挑战应战、表决心等活动，部队的情绪犹如干柴遇烈火，越燃越旺。在一片求战声中，五一年三月下旬，全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经新义州、定州、安州、慈山、三登、粟里、石达里，向战役地域开进。一路上翻山越岭，昼宿夜行，克服了种种困难。

在朝鲜，敌人欺负我军没有制空权，飞机十分嚣张，低空飞行，简直像看准脑袋扔炸弹。有的战士说，美国飞机飞下来把帽子都抓跑了。这话虽然夸张，但低空飞行产生的气流的确能把帽子刮跑。

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因为没有系统的高射火器，因此吃了敌机不少亏。

当时，第四次战役正在进行，彭总正在紧张地策划第五次战役，我们火速行军就是为了赶到指定的涟川地区，参加五次战役，时间要求十分紧迫。可是敌机如此猖狂，对我们的行动构成了很大威胁。飞机一来，就要隐蔽，漫山遍野，山巅谷底，到处都藏。大部队行动真是困难重重，撤出去一句话，收拢起来半天锣齐鼓不齐。敌机骚扰个两三次，一个半天就过去了，严重地影响了行军速度。

先入朝的志愿军部队遇到敌机袭扰，大多采用隐蔽的办法。因为他们的时间相对宽松，再加上对空射击的武器也不行。但我们就不同了，四次战役战犹酣，五次战役还等着我们去开场，敌机拼命地挡，彭总使劲地催。怎么办呵，棘手的情况逼着我们想办法。

军里几个首长一合计，统一了思想：防敌空袭不能消极防御。越是躲着它，它越嚣张，它越嚣张，我们的行军就越受威胁。我们要积极地防，大胆前进，边走边打，以打代防。

我们这样想，并不是蛮干。对于十五军来说，飞机并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解放洛阳时我们就用步枪把老蒋的一架战斗机从天上揍到地上。美国飞机就算高明一点，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是也有了高射机枪吗？

当然，也有可能打它一次，它要报复十次。但他敢来十次，我们就打它一百次。即使打不下来，我们也要把它撵到高空，让它不敢低飞。

于是，军里一个号召传下去，全军为之一振：挺直腰杆子，开展对空射击。军政治部也发出动员令，要求部队“争取打飞机光荣立功。”

入朝之前，上级给我们配备了一批新的火器分队，每个团都有一个高射机枪连，有五挺高射机枪，全军加在一起，数量也很可观，可以组成一个较强的空中火网。再加上轻机枪和步枪，也可以在山顶或制高点上对空射击。敌机稍微低一点、我们就开火，山顶、山腰都有火力，有时简直是居高临下射击。

这样一来，对敌机的威胁很大，它再也不敢低空飞行了，山沟里更不敢飞，它飞得越高，投弹就越盲目，我们在谷底行军，安全也就得到了保障，从而顺利地赶到指定地域，参加五次战役。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十八时，第五次战役开始。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司”）命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全线向敌人发起攻击。

我军配属炮兵第二十九团及战车第一团两个连，为三兵团西路军，任务是沿临津江东侧直下涟川，首先歼灭美军第三师六十五团，尔后向全谷里方向发展进攻；会同兵团主力，歼灭美三师及菲律宾营于全谷里地区。

战斗打响后，我二十九师和四十四师部队协同作战，连续战斗十几个小

时，先后占领 162 高地、152 高地，歼敌菲律宾营大部，溃敌退守汉滩川南岸。

二十三日夜，二十九师部队渡过汉滩川，与敌形成对峙。

二十四夜，第四十四师于全谷里地区渡过汉滩川，在大田里地区歼灭美三师七团二营两个连后，敌人即全线溃退。

我挥兵南下，跟踪迫击，一路势如破竹，一直追到汉城北大门议政府和东面的仁仓里等地区。此时，敌人已撤至汉城及北仅江、昭阳江以南组织防御，在汉城周围组织密集而绵长的火力控制地带。

从敌人一哄而散的行为中，志司察觉了他们是有计划的退却，因此越追到最后越是小心谨慎，以防埋伏。待抵近汉城后，志司分析，聚歼逃敌的时机已经过去，加上我部队前出纵深已远，补给跟不上来，于是下令停止攻击，迅速撤至议政府地区。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历时八天，我军初入异国作战，对敌作战特点生疏，仓促投入战斗。但由于部队英勇顽强，各级指挥员稳中求胜，因而仍然取得了入朝作战的首次胜利。尤其是率先开展对空射击，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刚刚开始的一天，上午十点左右，两架敌机在三巨里上空盘旋。当时布防在此地的，是二十九师八十五团高射机枪连。当飞机掠过二班阵地时，射手高荣成用三十五发子弹击落一架敌机，另一架仓皇南逃。被打的飞机上跳下两名飞行员，一名叫“杰克”的被我军活捉，另一名伞落他处，被友军生俘。

群众性打飞机活动，玩得最精彩的还要数第四十五师一三三团。也是四月二十三日，一三三团进至余积山里，遇上敌广播飞机在上空盘旋宣传，团里当即组织火器对空射击，将敌广播机击落。下午，敌人缠上一三三团实施报复，来了三架飞机在一三三团驻地村内实施轰炸，又被击落一架，飞行员跳伞后被活捉。敌人的飞机这回算同一三三团较上劲了，组织了十多架战斗机，掩护一架直升飞机来营救他们的飞行员，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又被我打栽一架。其余的见势不妙，掉头就跑。

不知道是敌人认准了一三三团还是巧合，四月二十五日，敌人出动多架飞机袭击一三三团驻地，该团组织高射机枪和步兵武器射击，高射机枪连一班射手屈秀喜用五发子弹击落一架敌机，七班战士张常聚也击落敌机一架。仅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两天，一三三团就击落敌机五架，可以说是创造了陆军打飞机的最高纪录。

配属给十五军的高射炮兵团在第五次战役中，担负掩护部队作战和保卫桥梁、保障运输的任务。四月二十五日上午，该团在议政府的东豆川里击落敌机两架。四月三十日上午七时至下午二时，守卫临津江大桥的高炮团同二十多架敌机展开了一场激战。那阵势，就像是我们的地面部队同敌人的飞机拼上了刺刀。敌机轮番向大桥俯冲投弹、扫射，企图炸毁大桥，切断我军运输线，造成我军供应困难，阻止我后续部队前进。高炮团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几个回合之后，击中一架正在俯冲准备投弹的“P—51”型野马式战斗机，其余敌机四散逃窜。

十五军对空作战所取得的成绩，受到了志愿军首长的高度重视，志愿军司令部向部队发出了《关于十五军对空射击经验的通报》。《通报》指出：“（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四天之内击落敌机十一架，成绩很大，值得表扬。”《通报》还介绍了十五军开展群众性对空作战经验：干部重视，

普遍发动；使用一切火器，组成火网；树立敢打必胜信心，特别是敢打低空和俯冲飞机；及时记功表扬，鼓舞部队。

在整个第五次战役的五十多天里，十五军开展群众性的对空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共击落、击伤敌机八十三架（其中击落五十六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打掉的不仅仅是几十架美国飞机，而且打掉了部队中的恐美情绪，增强了干部战士敢打必胜的信心。新华社有个记者写了篇文章，对十五军对空作战评价很高，称赞此举是“在我志愿军还未有空军参战的情况下，相当地打击了美国飞机称霸天空的疯狂气焰”。从此，被一些战士们戏谚为“抓帽子”的美国飞机，在十五军部队的上方，再也不敢超低空飞行了。

血祭乏浦里

十五军入朝后首先接触的便是第五次战役。该战役第一阶段，我们在志司统一号令下全线发起冲击，从四月二十二日打到四月二十八日，把美三师、菲律宾营消灭部分后又一直追到议政府。虽然一路胜利，但志司还是发现了一个迹象，我们一进攻，敌人就坐上汽车往后缩，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彭总分析，敌人可能有诱我深入的企图，想把我们吸引到汉城附近，然后以空军、炮兵配合地面部队在汉城地区消灭我们。因此，志司急令我军停止追击，回到战役开始时的出发地带集结待命，不久进至水平、抱川地区，休整十天，总结经验，补充弹药，调整组织。

自从进入朝鲜后，我们就一直为战事忙碌。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这才发现我的牙床发炎，医生说是急火攻心，炒面吃不下去，人渐消瘦，左边脸却肿成半个胖子。我

自己难受，军里其他领导也很着急。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说是野鸡蛋清心败火，参谋长、主任都信了，从警卫连派了几个战士到山上找野鸡蛋。结果找回十七个，用开水冲了吃，效果还真不错。

不久，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说来也怪，牙也不疼了，脸也不肿了。同志们开玩笑说：“军长就是打仗的命。”

战斗从五月十六日十八时开始，我军各师按“联司”统一号令出击。第四十五师一三四团（加强第一三五团三营）率先占领沙五郎峙地区，歼灭美二师三十八团二营五连全部和六连两个排，毙伤敌二百余名，俘敌十名。

五月十七日，我二十九师、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均向前推进，兵团电令我军急速向指定地区穿插，防止正面平推。第四十四师前卫第一三团当即向大水洞地区穿插。因敌情复杂，地形险峻，所以打得十分残酷。

这次穿插战斗，涌现出了我军著名的青年战斗英雄马绍孔、特等功臣常同茂和一级战斗英雄崔建国。这几位同志的特点都是同敌短兵相接，孤胆杀敌，每人杀敌均在十五名以上，其中马绍孔在突围中踏响地雷，壮烈牺牲。

十八日清晨，经一夜激战，第一三团占领了大水洞，但部队只有两个营，而且一路夺关破隘，伤亡过半。又由于山高沟深，拂晓多雾，与上级的无线通讯中断，四面受敌，情况危急。据此，团长东传钧、副政委冯立忠立即决定，就地展开，组织防御，接连打退了敌步兵和坦克的数次进攻。七时三十分，第一三团与师沟通联络，师即令一三二团沿一三团前进路线，搜索前进，打通与该团联系，扩大战果。

在我军连续五昼夜的攻击下，东线之敌于五月二十日撤至九城浦里、牛岩里、巷洞里、下珍富里、铁甲山、仁邱里一线布防；美第十军主力迅速向洪川方向靠拢；美第三师已进至清源里、长坪里地区，堵塞了我战役突破口；伪第八师也由大田北调至平昌、提川，建立纵深防御。至此，敌人又形成东西相连的完整防线。同时，我军经过六天连续作战，携带的粮弹将尽，后勤保障一时接不上茬，因此，“联司”决定，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于五月二十一日结束。

此后，我军奉令向北转移。

志司五月二十二日预计，“……根据敌人以前习惯，利用高度机械化进行所谓磁性战，企图消耗疲劳我军，我主力北移休整时，敌尾我北犯是肯定的。但前进速度，要看敌人的兵力大小，我机动防御打得好坏而定……”由

此可见，志司对于敌人行动是有警觉的。

但是，此后不久的战局发展变化，比志司估计的还要严重得多。

我接到志司的回撤命令之后，深感形势严峻。既然不能前进，全军转移，必须动作迅速，延误不得。在战争中，我有个体会：大部队行动，组织进攻还相对容易些，有主动权，比较从容。但撤退就不那么从容了，组织得不好，几万人马，一退起来就如洪水决溃，一旦乱套，指挥就不灵了，可以说叫天天不理，叫地地不应。

这一次，我们的通讯联络可以说立了大功。打郑州时，除了其它战绩以外，我最看重的就是缴获了一批通讯设备。我一直强调，任何情况下，通讯都要保持畅通。值此紧要关头，我命令全军报话机全部开通，一个命令直接下到团，一个团长一个团长地叫出来，亲口交代。十五军部队因此得以迅速收拢，神速转移，基本上没吃大亏。不仅战斗部队收拢神速，勤杂分队也快速集中转移。我怕勤杂分队拖拉，让参谋长张蕴任亲自去组织行动。张蕴钰同志果断地来了个“紧急集合”，几百号人，点名之后，一个“向右转”，一路小跑离开了驻地。火烧眉毛时，人撤出去就是胜利，坛坛罐罐就顾不上了。实践证明这一手是很厉害的，要不然，光下达个转移命令，后勤同志这也舍不得丢，那也舍不得扔，磨磨蹭蹭到最后，不仅东西保不住，人也很难脱身了。

在这次紧急撤退中，只有军属高炮团由于没有严格按照军规定的转移时间，擅自提前行动，在夜幕降临之前，汽车结队前进，被敌机发觉，遭到空袭，损失37毫米高炮十九门，令人痛心疾首。

五月二十七日，敌军占领汶山、全谷里、永平、华川、富坪里一线后，以美第一军向铁原、第九军向金化、第十军向杨口、南韩第二军团沿东海岸继续向北进犯。

向铁原方向进攻的美第一军，分四路北进。其中一路沿抱川、永平线向芝浦里攻击。其兵力有加拿大第二十五旅，美军第二十师、第三师、南韩第九师，总兵力约四万人。该敌企图抢占芝浦里，配合涟川、华川北犯之敌，迅速占领铁原金化地区，以切断我军东线主力向西北转移的道路。

在北移途中，兄弟部队六十军一八师由于多种原因，掉队被围，被敌分割打击，损失惨重，使全线为之震惊。

敌人随之来势更猛。

战场形势风云突变，骤然之间，我军由追击转为退却，由进攻变为防御。尤其严重的是，我东线尚有大量部队未及调整部署，其中有宋时轮十九兵团的三个军，我三兵团的十二军，朝鲜人民军第一军、第三军，如果让敌迅速占领铁原、金化，我们窝在东线的部队就很难退回来，在那个狭长地带里，要打展不开，要守也展不开，几十万人窝在一堆，无后方，没供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正是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军在北移途中突然接到志司的紧急命令。因为我十五军在第五次战役中是第一梯队，冲击中最靠前，回撤时当然也最落后。后面出现紧急情况，原地向后转，回马一枪，我们又成了最前沿。所以志愿军首长命令十五军迅速在金化以南芝浦里地区角屹峰、鸣城山、朴达峰一线（正面约十七公里，纵深约十九公里）占领要点，组织防御，坚决阻敌以迟滞敌人行动，掩护我东线主力兵团调整部署。志司并通报有不明之敌进至永平东南之梁文里、机山里之线，要我们提高警惕。正式命令下达后，彭

老总还不放心，又亲自跟我通话，让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七至十天。我当时向老总坚决表态：“请司令员放心，我们采取一切手段，至少顶住十天！”

决心虽然表得很干脆很慷慨，但我自己心里明白，敌大兵压境，我全线撤退，斗争焦点集中，仅我一点支撑、坚持数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况且，十五军在第五次战役连续作战中，减员达三分之一。步兵营以下分队，减员过半。多数连队仅有五十余人。武器弹药损耗大，没有粮食，部队极度疲劳。组织尚未调整，粮弹急需补充，加之受领任务紧急，仓促投入战斗，敌情不明，地形不熟，困难较

多。

然而，大局之下，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了。

军的几个领导同志只经过简短的交换意见，一个铁腕

决心便形成了：不借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为了完成

掩护任务，十五军准备打光最后的一兵一卒。

军向各师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部队“忍受艰苦，克

服困难，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在向部队进行动员的同时，防御部署决心已经形成，迅速在角屹峰、朴达峰一线构筑阵地，又在芝浦里、广德山一线构筑了第二阵地，第二梯队师于初里洞、大德峰一线构筑第三防御阵地。

我当面向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和一三四团团团长段成秀交代，此次阻击，只许顶住，不许后退。

崔师长和段团长深感责任光荣，也深感责任重大，向我表示，无论多么困难艰巨，也坚决完成任务。

五月三十日，敌先头部队加拿大步兵第二十五旅由文岩里向北进犯，企图一举突破我防御阵地，为其主力攻占芝浦里开路，遭我顽强打击，毙伤敌少校营长以下一百五十余人。

三十一日，加拿大旅撤出战斗，美二十五师和美三师先后投入战斗。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四日，敌人的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炮火轮番轰炸，坦克轮番冲击，飞机数次俯冲，我阵地几度易手，又几度失而复得，给敌以极大杀伤，我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我防线始终未破，近在咫尺，敌人却不能前进一步，徒奈我何，只得望线兴叹。

在芝浦里阻击战中，我四十五师一三四团与敌之战尤其残酷，部队打得勇猛壮烈，几乎所有阵地打到最后都成了白刃战，涌现出不少英雄模范，其精神惊天地泣鬼神。

六月一日晚上，敌约一个营在炮火支援下向朴达峰及西侧无名高地进攻。一三四团四连连续击退敌人三次冲击。

与此同时，一三四团七连正接替一、三连朴达峰西南侧无名高地阵地时，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分若干梯队向无名高地连续进攻。七连一班主动灵活地伸出我阵地前一百米处，依托石壁和有利地形，迫敌过早展开。当敌接近时，我以短兵火器和突然行动，连续击退敌三次冲击。这场战斗打了一夜。

六月二日六时，敌以一个营向 799.6 高地进攻；同时以两个营向我七连占领的无名高地进攻。

七连虽三面临敌，但英勇顽强，连长郭新年下巴颏被打掉一半，多次昏迷，只要醒过来，就坚持指挥战斗，并奋力向抵近之敌投出多枚手榴弹，毙

敌三十多人。

双方激战至中午，七连因伤亡过大，阵地大部被敌占领。身负重伤的副指导员刘汉和卫生员两个人用手榴弹又击退敌人的两次冲锋后，壮烈牺牲。

目睹连长、副指导员的英雄行为，十九岁的苗族战士刘兴文发誓要为连长、副指导员报仇。他提起一箱手榴弹，主动会同机枪排负伤战士赵金平，两个人坚守二排阵地，采取分工协作战术，远处之敌由赵金平用机枪消灭，抵近之敌由刘兴文用手榴弹和爆破筒消灭。两人经常交换战斗位置，迷惑敌人。从当天中午打到夜幕深沉，战斗了七、八个小时，击退敌人十一次冲击，毙伤敌一百余人，守住了阵地。刘兴文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立了一等功。一九五一年国庆节前夕，被推选为志愿军国庆节归国观礼代表，后到西南各地报告前线作战情况，对于全国特别是西南地区苗族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九五二年四月，刘兴文重返前线，到各部作巡回报告。一次，在完成任任务返回前沿阵地途中，遭到敌人炮火袭击，光荣牺牲。

在朴达峰战斗中，还有一个战士，也使我印象至深。他叫柴云振——

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四日，朴达峰战斗连续进行了五昼夜，敌人在我阵地前死伤千余人。我一三四团七、九连也仅剩下四十余人，合编为一个连。

六月四日清晨，美二十五师一个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采取逐次增大兵力的战术，向七、九连阵地进攻，浴血鏖战了八个小时。至十四时，敌人又以三个营的兵力分多路向我猛攻，七连主阵地为敌占领，一线防御阵地有被突破的危险。

此时，带病在三营指挥战斗的副团长刘占华即令该营一面组织七、九连剩余人员坚决阻击；一面乘敌立足未稳，以营二梯队进行反击。

三营营长武尚志（人称武和尚）立即组织八连进行反击。当天才由师警卫连补充到八连的七班长柴云振带领全班向占领我主峰阵地的敌人发起反击，一举夺回七连主峰阵地。

占领阵地后，柴云振又发现溃逃之敌正龟缩在一个较高的山头上构筑工事，这个山头可以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对我威胁很大。他当即带领三个战士乘敌立足未稳之机，突然冲入敌阵。柴云振首先击毙敌人的营指挥官。

战斗中，三名战士全部负伤，四个敌人见柴云振孤身作战，一齐猛扑过来，被柴云振挥枪打倒了三个，但一名大个子黑人士兵还是冲到了跟前，二人于是扭成一团。

黑人士兵人高力大，柴云振瘦小单薄，相比之下敌兵占了上风。柴云振用手指抠挖敌兵双眼，敌兵则咬掉柴云振一截手指。柴云振在全身二十四处负伤的情况下，仍支撑拼搏，直到用石头把敌兵砸昏，自己也昏死过去。

关于柴云振，还有一段插曲。

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给柴云振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但在庆功会上，奖章和证书却无人认领。这是因为，在那次战斗中，柴云振昏死不久，三营营部撤离，友邻部队赶到，先把他送到战地医院。

几天后，柴云振苏醒过来，已经身在国内，并被单独送往包头的一所部队医院了。他在包头住了一年多医院，养好了伤，被评为残废军人，带着一千斤大米票证作为“复员费”，悄悄地回到了家乡，从此和原所在部队失去了联系。

柴云振回乡后，积极参加生产，表现很好，他先后当过生产队长、大队

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和乡长等职务。为群众做了许多好事。

部队从朝鲜回国后，一直不知道柴云振的下落。

前些年，部队整理战史，分别派人到山西、山东、河北等地调查，并在《四川日报》上连续刊登了寻人启事。此事很快在群众中传开。柴云振的儿子看到报纸，觉得跟父亲的经历差不多，便要父亲前往部队联系。这样，失去音讯多年的英雄战士才有了下落。当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时，柴云振回答说：“我那一个班都牺牲了，只剩下我，我活在世上，应该代我的战友做点事，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

柴云振的这几句话，说得诚恳而又简朴。此后不久，柴云振到北京来开会，我曾接他到家里来吃饭，望着这个满脸生活风霜、朴实憨厚的农村汉子，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些生龙活虎般活跃于朝鲜战场的小伙子们。是啊，那时候我们跨过鸭绿江，就是为了保家卫国，个人生死完全置于脑后，当我们的战士们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谁会想到以后去要个名要个利要个什么官当呢？世界上最纯洁最美丽的，是战士的情感呵！我这个当军长的，真为有这样的部下而感到骄傲。

在芝浦里阻击战中，不知还有多少像柴云振这样的英雄。我们的部队正是靠这种无私无畏有我无敌的精神和气概，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疯狂进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七日，我十五军在芝浦里地区执行阻击作战任务十昼夜，共毙伤敌人五千七百余，击落、击伤敌机四架。我军伤八百八十七人，亡三百九十九人。粉碎了敌人攻占铁原、金化，截断我志愿军东线主力兵团退路的企图，胜利完成了志愿军首长赋予的任务。彭德怀司令员于激动之中给我发了一份充满感情色彩的电报：“秦基伟：我十分感谢你们！彭德怀”。彭老总的勉励迅速传遍了部队。我从这份电报里，感到彭总当时的心情是既高兴又沉重。在芝浦里地区打得最苦的一三四团和八十六团二营的干部战士虽然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当得知彭总致电鼓励的消息时，许多人拥抱一起，热泪横流。

今天，当我回忆起这桩往事的时候，内心也是充满感激之情的。感谢你们，我的好同志，好兄弟，好战友，是你们守住了芝浦里，是你们为全局做出了牺牲，是你们为十五军赢得了荣誉，是你们为祖国人民建立了功勋！

坑道里面“打老虎”

芝浦里阻击战结束后，我军奉命为志愿军战略预备队，开至谷山地区整训。根据志愿军准备实施第六次战役的精神，整训时间最初定为三个月，后因情况变化，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整训时间延长到一九五二年三月。

志愿军赴朝参战，打了五次战役，开始两次打得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志愿军突然上阵，美军思想准备不足，彼此互不摸底。敌人虽然装备优于我们，但我们不跟他摆开阵势比家当，基本上是运动战，也打游击战，实在不行，阵地战也顶上一阵。总之。我们的打法比较灵活。而美国及其仆从军队则相对机械，习惯两军对垒，倚仗家伙过硬，动不动就要摆开阵势比较。再说他想灵活也灵活不了，机械化固然了不起，但也有短处，离不开公路。

我们这两条腿，在朝鲜山区比美国佬的机械化好使，逢山过山，逢水过水，想上哪里就上哪里，不受限制。他还没回过神来，我们又不知从哪个地方突然出现。穿插、迂

回、分割，怎么顺手就怎么打。打得他懵头转向。

但是，到了三、四、五次战役，我们打得一次不如一次。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嘴张得很大，想一下子吃掉敌人几个师，一下子打到釜山，一下子把敌人赶下海。这种愿望虽然良好，但不切合实际。再就是美国人也在总结经验教训，找我们的短处。

我们的后勤保障跟不上，弹药、粮食全靠人背。背得再多，也只能坚持一个礼拜。前进三天，后退三天，就差不多弹尽粮绝了。敌人后来掌握了这个规律，称我们为“礼拜攻势”。掌握了规律，就有了对策，一看我们进攻，往往虚晃一枪，假意招架几下，然后坐上汽车往后缩，撩逗我们去追。他坐车走两个小时，我们要追两天。他们到达一个位置，占据有利地形，睡上一天一夜，当然精神饱满。

我们的部队吭吭哧哧跑了一两天，又累又饿，连热水都喝不上一口。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向敌进攻，怎么能攻上去呢？只有挨打的份。没办法，又往后撤，敌人跟着屁股追。

汽车追人，就像人撵鸭子，不费吹灰之力。再加上敌人炮火强，我们吃了不少亏。

五次战役之后，志司也总结了经验。为什么原来计划要打六次战役，后来又取消了呢？就是感觉到这种打法不灵。

彭总在给毛主席及中央军委的报告里指出：“联合国军已经在南朝鲜建立起三个战略性防线。我们的兵力优于敌人，但技术装备处于劣势，一切供给都要从国内运来，加之朝鲜地形狭长，敌人兵力集中，要在大踏步的机动战中消灭敌人是困难的。同样，敌人遭受了多次惨败，也不敢大胆冒进……这样，今后作战要以阵地战，即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为主了。”

毛泽东主席虽然人在北京，但对朝鲜战场的形势了如指掌，根据战局变化和志愿军的报告，明确指出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并强调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持久战，我们的战术原则是“零敲牛皮糖”，采用袭击、伏击、反击相结合的手法，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这样一来，朝鲜的战争样式就从根本上起了变化，由运动战转入积极防御战。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在防御中杀伤敌人，防御不等于被动挨打。毛主

席对这个战术概念有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叫做“零敲牛皮糖”。

牛皮糖是南方的一种食物，用麦芽糖熬成，大块头，整个是啃不动的，食用的时候一点一点敲碎。“零敲牛皮糖”就是打小歼灭战。毛主席说，要像打国民党五大主力一样，先割开，后歼灭，一个军一次搞一个营一个连就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不要看不起，这叫积小胜为大胜。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英明的，以后的作战实践证明，“零敲牛皮糖”对敌打击很大，尤其是心理威慑作用大。我们不贪大，抓住一小股，往死里打，全歼。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消灭他一股他就少了一股。

我们在谷山地区整训期间，进行了总结评查，召开了庆功大会。

一九五一年七月上中旬，军和各师先后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和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打小歼灭战，“零敲牛皮糖”的指示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学习彭德怀司令员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的讲话，总结第五次战役的收获和经验教训。并抓紧时机，进行了训练。

一九五二年，国内的“三反”运动远涉千山万水，进入朝鲜战场坑道。

部队自入朝以来，由于战事紧张，帐目不清，制度不严，在某些单位造成的贪污浪费现象是有的。因此，军党委根据志愿军党委《关于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对“三反”运动的目的、要求、时间、步骤、方法等做了明确规定。但是，我们都是带兵打仗的，如今又是身处国际战场，对于运动缺乏经验，战火纷飞，也可以说对这件事没怎么太在意。结果，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单位方法不当，出现了逼供信。

“三反”运动还有一个名字，叫“打老虎”。贪污上万元的（折合人民币）叫“大老虎”，这是要枪毙的。贪污上千元的（折合人民币）叫“小老虎”，小老虎要坐牢。有的同志对政策界限把握不隐，把“打老虎”运动扩大到基层，因而出现一些“假老虎”。

“三反”运动后期，集中揭发和批判了官僚主义。我们召开党委扩大会，最初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意见好提，会开得寡淡无味。我是军长，党内职务又是党委书记，眼看运动冷冷清清，心里难免着急，就一次又一次地动员，发动大家给军党委提意见。

我费了很大劲，讲得口干舌燥，这才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开始给军党委提意见，我们的部队就这样，如同打仗，要么不打，要打火力就很猛。阵势摆开，首先拿我们当领导的开刀。

一些人指着台上说：“提什么？大老虎都在上面！官僚主义都坐在台上！”

然后大家七嘴八舌。

因为我是主要领导，所以火力主要冲着我，有说我官僚主义的，有说我多吃多占的，有说我爱跳舞的。

什么叫多吃多占呢？那时候是供给制，从前管理处给点烟抽，这时候要算帐。解放战争时期，打过一些大城市，有时开会，有时同地方同志发生工作联系，到饭馆吃一顿，这时候也要算帐。有的部队还有人给他们的首长算出了“三机五皮”。所谓三机，就是收音机、照像机、留声机；五皮，就是皮鞋、皮帽子、皮大衣、皮手套、皮带。在朝鲜这样冬季寒冷的国家作战，首长的“五皮”是普遍的。新帐老帐一起算，该算的不该算的也一齐算，七算八算，“大老虎”就当上了。

我倒是不够“三机五皮”，但我有一件缴获美军的皮夹克，这件衣服熨贴合身，我穿上感觉很舒适，尤其是口袋很多、装烟装火柴装铅笔很方便。

军直属队开会的时候，文工团一位女同志递上来一张条子，上面写道：“一切缴获要归公，请军长把皮夹克脱下来给我们演戏用。”

我看了看，心想，穿件皮夹克，既不算贪污，也不算浪费。我的个性也是很倔的，所以对这张条子未作理睬。

当天会后，文工团员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军长态度不好，不接受批评。也有的说，不管怎样，军长下回肯定不敢穿这件衣服了。

他们哪里想到，第二天开会，我仍然穿着那件皮夹克。

又有人递上来一张条子：“军长，请尊重群众的意见，把衣服脱下来！”我还是没脱。

还有我的警卫员，也给我提了一条意见。说：“原来我背一个洗脸盆，瓷都快掉光了，军长也不让换，艰苦朴素哇！可现在倒好，说换就换了。”

这次运动，历时二十五天，团以上领导都作了批评和

自我批评，许多人给我提了意见。多数意见是对的，少数意见是误解，也有个别不实事求是。

不管意见提得对不对准不准，我都是虚心听着。第一，思想上没包袱。第二，绝不打击报复。给我提意见的同志不少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有些还是在太行山时就在一起打仗的，他们很受我的信任，平时对我也非常尊重。他们提意见，无非一是觉得有意见要提，二是觉得运动中应

该提。

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透明，有意见摆到

桌面上来。有意见提出来，一减一等于零，就没有意见了。有意见不提，积在心里，一加一等于二，积多了，就成了隔阂，上下就不团结了。

大家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大家提意见，互相帮助，互相洗脸，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确有益于政治上健康进步。而且有些同志提意见纯粹是出于完成任务，既然是运动，我们又反复动员，坐在会场上，不提两条，显得不合适。提上两条，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完全可以理解。既然是运动嘛，不提意见还叫什么运动？彭老总动员我们对他开展批评，我们也是毫不客气的。平时见他都怕，逮住机会，捋他根把胡须也是件得意的事。批评与自我批评在

战争年代就像两面干干净净的镜子，把领导与被领导者的心都照得雪亮。

当然，运动中也有一些过火行为。后来兵团副政委杜义德同志还专程赶到十五军，对一些不适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给运动做了总结。

“三反”过后，一位在我眼中很有才气的干部向我道歉说：“军长，我们年轻，平时老挨你熊，运动中头脑发热，讲了一些偏激的话，请你原谅。”

我拍了他一掌，说：“什么偏激不偏激，在家跟父母还磨嘴皮子呐。既是运动，不提意见还叫什么运动？”

这位同志笑了，一点也没背包袱，工作中一如既往，进步很快。

防御平、金、淮

我军在谷山地区经过九个半月的整训，充实了兵员，加强了装备，养得兵强马壮，士气十分高昂。

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兵团命令我军接替第二十六军防务，在朝鲜中线的平（康）、金（化）、淮（阳）地区，约三十公里宽的正面上担任防御作战任务。

当面之敌为美二师、韩二师和韩九师一个团，共三万余人，其前沿位于391高地、中墨谷、下甘岭、下所里、外也洞一线。

接到命令后，我和参谋长张蕴钰同志带领军前指及全军排以上干部一千一百多人到二十六军学习防御作战经验，磋商交接事宜。

老大哥部队很热情，专门派人给我们介绍了经验，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不死守阵地，阵地可以放手让给敌人，等他占领了，给他一顿炮火，然后再夺回来。也就是说以阵地为诱饵，达到杀伤敌人的目的。

我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阵地，工事多为土木结构，掘开式，有单人掩体、交通壕、猫儿洞，也有半截子坑道。

我当时心里琢磨：老大哥部队的打法有一定的依据。他们是首批入朝，仓促应战。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防御设施来不及完善，在当时我整个防线还未完全稳定下来的情况下，这种战法确实可以达到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但现在我们是坚守防御，就必须确立新的作战指导思想。我同张蕴钰和师长们交换意见，他们也是这个看法。大家都认为要坚守阵地，把敌人挡在防线以外打，就要从工事上做文章，在二十六军阵地建设的基础上，改造阵地工事，进行大规模的筑城作业，建设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以保障防御作战的胜利。

我军防区东起忠贤山，西至发利峰，正面宽约三十公里，纵深二十余公里。防区西部为平康平川，是东海岸元山至西涨岸位山公路的连接点，又有汉城至元山的铁路纵贯防区中央，交通便利，有利于敌坦克和机械部队机动。防区内西方山、斗流峰、五圣山等主要制高点，为中线战场的门户。敌战略要点金化、铁原在我瞰视和控制之下。地形北陡南缓，北高南低，便于我军防御和反击作战。

第四十四师配属步兵第八十七团和炮兵第九团（欠第三营），防守300.5高地、芝村、两双岭、知足里地域，阻敌由王在峰、西方山、斗流峰向平康方向突破。

第四十五师配属炮兵第九团第三营、炮兵第二十团（欠第一营），防守597.9高地、芹洞、723高地、安长洞地域，阻敌向上甘岭、五圣山、忠贤山方向突破。

第二十九师（欠八十七团）为军第二梯队，配置在霹雳岩山、726高地、塔洞、马背岩地区，随时准备支援第一梯队师作战。

四月下旬，军政治部根据军党委会精神，发出了“紧急动员起来，突击筑城，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军、师、团均成立了筑城办公室。

第四十五师提出“以阵地为家”的口号，决心把五圣山建成能打、能藏、能生活、能机动的坑道式防御体系。在筑城作业中，战士们琢磨出不少办法，譬如装炸药打炮眼，摸索出了“打斜眼、打水眼、空心装药爆破法”及“深打眼、少装药，紧填塞，放群炮、快排烟”等先进施工方法。为解决炸药不足，战士们在敌人的火力下拉回了许多没有爆炸的炸弹和炮弹，组织专人拆

卸，仅四十五师就拆出炸药三千七百多公斤。

部队一边抗击敌人进攻，一边紧锣密鼓地构筑工事。

至一九五二年九月底，十五军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基本完成，共筑坑道近七百余条，总长度一百余公里，堑壕总长二百三十余公里，交通壕总长近五百公里。前沿阵地前面，有重点地布设了雷区、鹿砦、铁丝网等附防御设施。坑道内有厕所、厨房、水池，为长期坚守创造了条件。

以后的作战实践特别是上甘岭战役的实践表明，正是由于确立了坚守阵地的作战指导思想，由掘开式工事变为坑道筑城，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防御能力，为战斗奠定了胜利基础。像上甘岭这样的重大战役，如果没有筑城，没有坑道，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其代价简直不能设想。

有了坑道，我们的底气就足了。坑道顶厚一般都在三十米以上，别说炮火，要是把坑道口封死，就是原子弹也无奈我何。部队就是凭借这样坚强的堡垒，到五二年十月中旬，先后击退了敌人的中、小型进攻和袭击、伏击一百一十余次，其中击退敌营以上兵力的进攻十次，消灭与消耗了敌人，锻炼与提高了自己。

我们刚上阵地的时候，坑道工事还没形成。那时敌人气焰十分嚣张，依仗有空中优势和炮火，公开在阵地前跳舞、喝啤酒、摔跤、晒太阳，大喊大叫、向我示威。苍蝇虽小，但是很讨人嫌。

我军接防后不久，根据毛主席“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原则，即大力开展了冷枪、冷炮运动，全军各部队普遍加强了射击训练。上阵地头一个月，冷枪、冷炮就歼灭敌人一百六十多名。不久之后，随着我一线坑道阵地基本完成，军、师、团不断总结推广打冷枪、冷炮的经验，战士们越打越精，越打越勇，涌现出大批神枪手、神炮手，使冷枪冷炮运动成为坑道里的热门话题。

在537.7北山上，敌人挨冷枪最多，死伤惨重，美国佬惊恐地把它称作“狙击兵岭”。这是我一三五团一连连的阵地，与敌人占领的537.7高地相距仅百米左右。我去前沿检查阵地设施，连对方说话声音都听到了。对于一连连长王福新来说，与敌距离如此之近可以说是天赐良缘。他组织了三十个狙击小组，开展狙击比赛，仅五天时间就打死打伤敌人二十余名。美国兵尝到了苦头，再也不敢到阵地前沿臭美了。

我们的战士，不仅敢打，而且善动脑子，展现了许多可爱的聪明才智。

有个叫陈风楼的战士，还琢磨了一套简便实用的射击要领：“跑步打胸前，上山打头，下山打腿。”实践证明，效果很好。

一连七班长邹习祥和他的战友们，为了防止敌人火力报复，在阵地前构筑了许多假工事，他们故意开枪，将敌人引出来，逐个“点名”。

至六月底，一连狙击手就消灭了三百多个敌人。美国兵换防时，向接防部队介绍537.7北山，说它是“比魔鬼还要恐怖的‘狙击兵岭’”。

在九个月的防御作战中，十五军开展冷枪、冷炮活动，共歼敌一万九千九百余人，充分体现了“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指导思想，有效地限制了敌人在前沿阵地上的活动，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除了开展冷枪冷炮运动，十五军还积极开展小部队出击活动。我们是积极防御，所以千方百计改善防御态势，挤占敌人阵地，控制中间地带，掌握防御主动权。

我们自从上阵地以来，连续打退敌人的冲击，阵地没有丝毫受损，冷枪

冷炮更是方兴未艾。

我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守住防线是主要的，杀伤敌人要在守住防线的前提下进行，所以，部队出击，格外慎重，无绝对把握，不得轻举妄动。四十四师一三 团挤占上佳山战斗就是一例。

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是美七师防御阵地前沿的一个突出点，守军一个加强排，配属火力极强，距我前沿不远，只有三百米，对我有一定威胁。

八月上旬，我听取了一三 团团东传钧和配属炮兵营长关于挤占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的汇报。

听完之后，我给他们讲了五点：一、上佳山要打，但不一定马上就打，必须时机成熟才能打；二、从现在情况看，准备还不充分，步兵对排除敌附防御（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的技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三、突击队太大，行动中灵活度肯定会受到影响；四、突击位置太远了，有好几百米。炮火准备后，没等我突击队上去，敌人的工事可能又复活了。最好是提前抵近潜伏，炮火准备后一跃而起，就能突破敌人防线。五、不打则已，一打必胜。

我还对他们说，现在没有大的战役，每一个战斗，不管大小，我都要亲自掌握。

这次谈话之后，东传钧等人就回去准备。

九月下旬，我去四十四师参加师党委扩大会。因为按我们最初的判断，防御部署的重点是四十四师，四十四师的重点又是一三 团。所以，下午开完会之后，在东传钧的引导下，我骑上他的骡子，到了一三 团前沿阵地，同坑道里的同志见面，讲了话，还参加了团党委会，对上佳

山战斗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这次到前沿，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敌人是机械化，战斗方法也有些机械。譬如打炮，也是定时的。我们头天下午从师部往前沿走，走了一会，东团长说，军长，敌人快打炮了，要当心。

果然，没走多远，炮弹就来了。牲口一惊，跳了起来，我翻身落马，把东传钧吓得不轻，大呼小叫喊军长。我说没事，继续赶路。心里却在想，妈的，美国佬打炮还挺按时的。

当天晚上，我在一三 团指挥所的坑道里住了一夜，向东传钧了解了干部战士的思想，也借此难得的机会和他谈谈心。第二天天刚见亮，东传钧就把我叫起来，到西方山主峰阵地看地形去。

为什么这时候去呢？因为这时候没有雾，能见度好。再说，不到敌人打炮时间，危险性小。

我到山顶上看了一会，把对方防御前沿都看了一遍。东传钧说，该走了，马上又要打炮了。我们到指挥所，正好八点，刚舀了盆洗脸水，敌人炮弹就打过来了。

由此可见，敌人虽然有优势的装备，但打法死板，一旦被我们掌握规律，完全有机可乘，没有什么可怕的。以后祖国慰问团到阵地访问，没有伤亡一人，也正是因为掌握了敌人炮击的规律。

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战斗于十月五日打响，一三 团一连一排、二排共六十八人，在炮火支援下，以迅速突然的动作，经三十分分钟激战，夺取该高地。从十月六日至十四日，共击退敌人三十八次冲击，毙伤敌九百九十余名，巩固了该阵地。

在平、金、淮地区防御战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夺取 391 高地的战斗。

391 高地是韩军第九师东侧前哨阵地的主要支撑点，由该师五十一团一个加强连防守。该高地是一个平地突出的山包，四周都是平地，山势孤立狭长，南北两峰对峙，全长一千二百米，楔入我军与友邻三十八军结合部之间，居高临下，俯瞰我阵地纵深。敌人火力强，工事坚，而我们的火力弱，射击距离短，弹药也少，要夺取这个山头并不容易。

经研究，我们决定智取，命令前沿分队加强侦察，熟悉战斗地带地物地貌和植被情况，连当地草皮都取些回来，做为伪装样本。

五二年十月十一日夜，经过周密细致的准备，我八十七团三营利用夜暗，由芹洞地区出发，秘密接近 391 高地，当夜潜伏于敌阵地前二十至一百米处的草丛里。

在部队潜伏期间，我不断以炮火对 391 高地上的敌人观察所和火力点进行封锁。第二天上午有五个敌人下山检查铁丝网，进入九连潜伏区，我潜伏部队被迫以一个战斗小组出击，毙敌三人。敌人误认我为小部队活动，未发觉我潜伏部队。

上午十时左右，一支野鸡突然从潜伏分队附近飞起。敌人似有警觉，但具体情况不明，盲目发射的一枚燃烧弹，落在九连三班战士邱少云身旁，烈火在他身上燃烧达半小时之久。这位坚强的战士为了遵守潜伏纪律，保证整个部队的安全和战斗的胜利，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一动未动，直到壮烈牺牲。

十二日下午五时二十一分，我炮火准备，十分钟后，炮火延伸，在敌人阵地前潜伏了十九个小时的部队突然跃起，高喊：“为邱少云报仇”的口号，一举攻占 391 高地，全歼守敌一百七十余人。

为了表彰邱少云同志的伟大功绩，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志愿军的战术出击，积小胜为大胜，使敌人始终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慌之中。在祝贺志愿军出国两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说：“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予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重大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又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进行下去，必能致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方法结束朝鲜战争。”

十五军担任平、金、淮地区防御，是一项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的任务。用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话说，中国军队控制的“铁三角”是他的心头大患。

所谓“铁三角”，是铁原、平康、金化三郡的简称，它形成一个正三角形，平康位于北满里三角形顶点，铁原、金化成了三角形东、西两个端点。

如果把朝鲜半岛看成一个人形，那么十五军担任防御的平、金、淮这个三角地区正处在“人”的肚脐偏上的心窝地区。该地区也是朝鲜东西海岸之间交通枢纽的咽喉地区。北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公路，东起东海岸的元山港，经过平康向西南方向直至西海岸之滨，穿越汉城。南有一条铁路干线，自汉

城经过铁原、金化，朝西北方向延伸至东海岸的大津里。这一条公路要道和铁路干线在铁原以东交会成十字形的交通枢纽，横跨“铁三角”上中部的五圣山主峰。

我们和敌人对峙的防线就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绳索，把“铁三角”地区从中划成两半，虽然敌人占据了铁原和金化，但平康和中部防线的制高点均为我十五军牢牢控制。

这段时间，战斗相对减少，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研究敌情上，我让作战处和侦察处给我搞了一个调查，除当面之敌的兵力部署和火力装备以外，还要了解不同国籍官兵的生活习惯、战争心理和战斗素质。连军中牧师的情况也不放过。我的日记里也有许多内容是研究敌情的。

说起日记，可以说它是在战场上最亲密的伙伴。自从我开始记日记之后，就从来没有一天中断过，日记给我带来的好处是很大的。我记得就是在平、金、淮防御期间，有一次我到志愿军司令部开会，会议结束时，已是凌晨一点多。回到住地后我照例要把当天的见闻和心得记下来，哪知警卫员忘带日记本，他说：“我忘了带日记本了。再说，开会开这么晚了，早点休息吧。”我把警卫员说了一通，让他找张白纸，我把日记记在纸上，第二天回到军指挥所后，再抄到日记本上，这件事对警卫员教育很大。我的警卫员调整时，老警卫员总是要把给我带日记本的事当作一件重要事向新警卫员交待。

从一九五二年四月到九月，我们没有大出击，美韩军队也没有大进攻，偶尔有一些挤兑战斗，都是拳打脚踢小打小闹，没有形成大的规模。

拳打脚踢的战斗模式，志愿军是不怕的。我们背靠祖国，身后就是朝中人民，阵地一稳固，后勤就跟上来了。可是这样的仗美国人打不起，它们是远涉重洋，干涉别国内政，统治集团内部本来意见就不统一，矛盾重重，硬着头皮出兵朝鲜，后顾之忧是很大的。再加上所谓的“联合国军”本来也是乌合之众，英、法、加拿大、土耳其等国政府对于参加朝鲜战争是持消极态度的，象征性地派出一点部队，也是瞻前顾后，抱着“有利就捞，无利则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溜”的思想，因此，一般战斗中他们并不卖力，往往是虚晃一枪能躲就躲，利害攸关的战斗几乎全由美国军队承担。

这样一来，美国军事当局更加感到压力。

另外，由于两军长期对峙，我军又没完没了地“零敲牛皮糖”，开展小出击活动，极大地消耗了美军的有生力量，尤其在心理上给这些老爷兵们造成了巨大的恐惧。

显然，敌人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对峙长期存在的，只要机会成熟了，只要准备充分了，他们就一定会大举进攻，打破这种对峙，突破我防线，长驱直入。我们知道，敌人进攻只是个时间问题。进入八、九月后，我们就预感到敌人可能要发动秋季攻势。

我曾对几位师长说过，去年敌人的秋季攻势，用时两周，激烈战斗一周。预计今年发动秋季攻势个把月，激烈战斗两周。

我这是从攻防战斗一般周期上判断的。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对手，都没有料到此后不久发生的上甘岭战斗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打越大，最终发展成为战役规模。

当时根据兵力部署和地形情况，我们分析敌人进攻方向可能有两个，一是以西方山为主攻，五圣山方向为辅攻，这个进攻方向的可能性较大；二是

以五圣山为主攻方向，具体地以攻击忠贤山为主，侧击五圣山，扩大注字洞南山阵地。分析结果，我们还是把防御的重点放在西方山方向，由四十四师担当此面。但我们的敌人此次没有完全按照我们的思路行事，而是把进攻重点选择在五圣山方向，即四十五师防御方向。

第十五章 鏖战上甘岭

难忘的七天七夜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凌晨三时，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苦思良久，惨淡经营的所谓“金化攻势”展开了。美军集中十六个炮兵营的三百门大炮、四十架飞机和一百二十辆坦克，向上甘岭地区五圣山前沿的597.9和537.7高地北山进行规模强大的火力准备。

我阵地内，平均每秒钟落炮弹六发，终日落弹达三十万余发，飞机投炸弹五百余枚。597“9高地和537.7北山表面阵地工事大部被摧毁，山上的岩石变成粉末。四点半，美七师第三十一团、韩二师三十二团及第十七团一个营，共七个营的兵力，在空中和炮兵火力、坦克的支援下，分六路向我597.9高地和537.7北山发起猛烈进攻。与此同时，敌以四个营的兵力向我西方山和芝林方向前沿阵地实施牵制性进攻。阵地上空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从此便开始了。

为什么叫上甘岭战役呢？这是根据地理位置为战役取的名。上甘岭是一个小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如果从空中俯瞰，它正好位于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方中间位置，因此，我们把这两个高地上发生的战役统称之为上甘岭战役。

我军坚守597.9高地的是一三五团九连，加上八连一个排。坚守537.7高地北山的是一三五团一连，面对的是十倍于我的进攻之敌。

此次战斗发生前，四十五师正准备攻取注字洞南山，该山阵地有守敌南韩军队一个加强营，楔入我防线之内，守敌的12毫米大口径步枪可以直接射击到五圣山主峰，的确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原计划于十月十八日夺取注字洞南山，拔掉这个钉子，因此，我们的主要炮火都已指向注字洞南山方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突然发生情况，我炮兵主力来不及调整射向，再加上敌人企图尚未彻底明了，所以，支援上甘岭战斗的，仅有十五门小炮，主要还是靠步兵武器依托坑道与敌顽强战斗。

经九个小时激战，我两个连连续击退敌人七个营的三十余次冲击。到下午一点，我虽然伤亡很大，弹药将尽，但除597.9高地2、7、8、11号表面阵地及537.7北山9号表面阵地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它阵地仍在我手。

十九时零五分，第四十五师以一三五团二连、三连、七连和第一三四团五连，共四个连兵力，对立足未稳之敌分四路实施了反击，在坑道分队的配合下，经三个小时激战，全部恢复了阵地。

十四日整天，我伤亡五百余人，歼敌一千九百余人。

战斗中，一三五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双腿被炸断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指挥，连续夺取敌人两个火力点，歼敌八十余人。最后在敌人反扑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这一天的战斗异常残酷，我们的战士承受了极大的考验，体现了英雄本色，还涌现出了陈治国、牛保才等英雄人物。

上甘岭战斗打响后，军指挥所的气氛也十分紧张。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又一个焦虑如焚的日子。敌人突然发动攻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法之狠，都是空前的。尤其是它避我实而就我虚，花招多少有点让我们意外。但我们没有惊慌失措。之所以“骤然临之而不惊”，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数。尽管时间和方向没有确定，但这场恶战迟早要发生，我们的思想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对于全军部队，我们

都反复做过动员，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打主动仗，敌变我变，不打呆板仗，不打糊涂仗。因而，部队应变的思想准备充分。突然打起来也能保持阵脚不乱，指挥畅通。一句话，我们是不怕的。

我主要思考的问题是敌人的企图和这场恶仗的背景。

这次战斗不比以往的挤兑战斗，如果仅仅是为了夺取两个制高点，敌人为什么一上来就集中那么大的火力和兵力？如此规模，分明是大举进攻的架势。可是，如果说是大举进攻，为什么突破口不选择在平康口子，那里地势平坦，遮蔽物稀少，易攻难守，尤其易于机械化部队向纵深突贯。

战争，对于战士来说是枪对枪刀对刀，而对于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来说，则是智谋和意志的较量。

经过十四日一天的激战，从敌人投入的兵力及后续力量上看，战斗规模始终有增无减。敌人的企图逐步明朗，它不把进攻矛头放在易攻难守、易于发挥机械和装甲威力的平康平原地区，偏偏打我五圣山前沿，是钻了我们的空子。我们抓住它的规律，而它这次偏偏不按规律来。

当时，政委谷景生同志正在国内，我同副军长周发田、参谋长张蕴钰、政治部主任车敏瞻等同志简短商量了一下，迅速做出决定：

一、立即向兵团、志司报告，调整第四十五师部署，停止对注字洞南山的反击，集中兵力、人力于五圣山方向，也就是上甘岭方向。

二、各级指挥所前移。第四十五师指挥所前移至德山岬，第一三三团指挥所前移至上所里北山。

三、调整战斗部署。由一三五团团张信元负责指挥 597.9 高地战斗；由一三三团团孙家贵负责指挥 537.7 高地北山战斗；一三四团团刘占华在师指挥所待命，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师炮兵群由第四十五师副师长唐万成及军炮兵室副主任靳钟统一指挥。

四、加强后勤保障。除原先定额储备的弹药以外，一线连队，每连配备手榴弹八千枚，全军给养储备三个月，迅速向坑道补充食物和水。

敌人拉开了大打一场的架势，我们则迅速做好了长打的准备。

因为谷政委不在部队，十四日夜，我又同车主任研究了干部配备问题，并由车主任向兵团请示，让我军正在兵团学哲学的师、团政委们先回来，打完仗再到兵团补课。我们的基层干部是三套班子，一套在阵地上，一套在师团保存，一套在军里培训，随时可以补充。我们这样做，也体现了打大仗打硬仗的思想准备和决心。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基层干部伤亡大。一定程度上讲，打仗也是打干部。

我们的政治部办了一个《战场》报，专职记者只有宣传科二、三人，但通讯员全军都是，能得到最前沿的最新消息，而且效率极快，当天有英雄事迹和战斗经验，当天就能写成文章刻印见报。小小的《战场》报对部队作战益处很大。

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的《参考消息》，稿源主要来自收音机，有国内重大新闻，也有敌台重大新闻。十五军的《参考消息》也有短、平、快，几条大标题，重点新闻，一目了然，国内外大事马上知道。了解国际间的政治气候，对分析战场形势往往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就是从自己的《参考消息》上知道了美国总统换届选举的消息，知道了上甘岭战斗是发生于第七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同一天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有助于我们判断敌人此次战斗的动机、本钱下的大小、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等等。

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敌我形成拉锯式的反复争夺。

白天，敌人使用大量兵力，大集群冲击，占领我表面阵地；夜间，我反击部队在坑道分队的配合下，进行反击夺回阵地。

由于我反击部队要从几千米以外接敌，遭敌火力拦阻，途中伤亡过大，致使进入冲击出发位置后力量不足，或反击成功后无力坚守，因而表面阵地多次得而复失。

为缩短接敌距离，减少伤亡，十八日我军暂停反击。利用夜暗将五个连的兵力秘密潜入坑道和待机位置，准备于次日反击。

上甘岭战斗打响后。为了加强五圣山方向的火力，志司给我们配属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这种炮是苏联造的，十九管；在当时是新式武器，一按电钮，十九枚炮弹像一条火龙流泻出去，半边天都是红的。“喀秋莎”本来是苏联的一个姑娘的名字，也是一首歌曲的名字。一九四一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苏军第一次使用这种多管火箭炮，给德国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苏联人民出于一种喜爱心理，给它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喀秋莎。

“喀秋莎”是在机动车上发射的，主要打面积目标，发射时炮位一片明光，阵地极易暴露，友军中就有“喀秋莎”营被敌飞机炸毁的事。我们对这个宝贝蛋，格外小心。平常藏在山洞里，连自己的部队都不让接近。确定要打，才悄悄选择阵地，计算好目标诸元，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时间一到，派出警戒，炮车直奔阵地，停车便打，打完就撤。所以在整个四十多天的上甘岭战役中，我们的“喀秋莎”前后发射十次，毫毛无损。

十月十九日十六时三十分，我“喀秋莎”火箭炮营一次齐射后，一百零三门山、野、榴炮即行拦阻射击。早已于十八日夜运动至坑道和待机位置的四个连加上坑道的两个连，分兵两路，同时向占领我 597.9 高地和 537.7 北山表面阵地之敌实施反击。激战到半夜，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

就在这次战斗中，在我突击队打下 597.9 高地 4 号、5 号阵地后，由于 0 号阵地上敌人集团火力点的疯狂射击，突击队受阻于阵地前，几次爆破未能奏效。第一三五团二营部通信员黄继光主动请战，于战场上被任命为六连六班长，带领战士肖登良、吴三洋二人，执行爆破任务。连续炸掉敌人几个地堡后，吴三洋中弹牺牲，黄继光、肖登良身负重伤。黄继光拖着伤体，匍匐爬行，勇猛扑向敌人最后一个火力点，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眼，为突击队开辟了前进道路，使突击队顺利夺回了敌人占领的阵地。为了表彰黄继光的不朽功勋，志愿军首长给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

我军收复阵地后，敌人十分恼火，下了更大的赌注同我较量。

十月二十日五时，美七师十七团、二十二团和韩二师十七团各以一个营的兵力，在三十余架飞机和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疯狂反扑，双方激战终周，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由于我伤亡过大，弹药供应不上，除 597.9 高地的 0、4、5、6 号阵地外，其余表面阵地，又被敌人占领。

从十四日至二十日。敌我双方在三点七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上，进行了七昼夜的争夺，战斗空前激烈。在此期间，敌人共投入七个团、十七个营的兵力，我投入三个团、二十一个连的兵力，进行了日以继夜的反复争夺，我以伤亡三千二百余人的代价，歼敌七千余人。第四十五师参战连队大部伤亡过半，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

连续七个昼夜，我在道德洞没有睡过一秒钟，守在电话机旁，神经高度

紧张。一会前面报来情况，好，上去了！夺回来了！心中自然一喜；一会又来情况，阵地又被敌人夺走了，心情就很沉重。

四十五师崔建功师长在德山岬师指挥所里更是热油烧心，七天七夜没离开作战室，出了坑道刚放松一下，就差点晕厥过去，上厕所都要人搀扶。我们两人通话，嗓子全是哑的。他的作战科长宋新安，在向军里报告伤亡情况时，痛哭失声。

前面的情况我也知道，敌人的炮火把两个山头犁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伤亡那么大，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今天已长眠九泉了，想起来实在让人心碎。但是，作为一军之长，又是身处战斗严峻时刻，我不能被感情之潮淹没理智。越是困难的时候，决心越是要硬，仗打到一定火候，往往就是拼意志，拼决心，拼指挥员的坚韧精神。

我对崔师长说：“告诉机关的同志，十五军的人流血不流泪。谁也不许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伤亡再大，也要打下去，为了全局，十五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国内像十五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可上甘岭只有一个。丢了五圣山，你可不好回来见我喽！”

崔建功是一位作战经验丰富的同志、打仗一向谨慎稳重。解放战争刚刚开始，成立太行军区，他就在独一旅担任领导职务。对于他独当一面的能力，我是放心的。但是上甘岭战斗事关全局，不仅牵动整个朝鲜战场形势，而且举世瞩目。因此，我的话说得就很严肃。

崔建功沙哑着嗓子说：“一号，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老崔的话说得我心里热辣辣的，我又对他说：“阵地不能丢，伤亡也要减下来。在西方山方向虽然没大打，但不能动，那个口子不能松。现在就靠你和张显扬师顶住，我已经向军机关和直属队发出号召，婆娘娃娃一起上。请转告部队，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

上甘岭战役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回忆起来，每个过程都十分清晰。在第一阶段坚守阵地与反复争夺的战斗中，我的日记始终没断。那几天里，我的日记差不多用掉半本。每天都有新的战况，每天都有新的事情，我也每天都有新的感觉。前沿坑道的电话一直通到军指挥所，使我们对战斗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只要有空，我就把内心感受

记下来，记的过程也是一个分析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总结的过程。那些人和事，那些突如其来的敌情，全在头脑里翻滚过滤，帮助我理清思路，正确判断。在战斗最激烈时，有线电话线被炸断，电台震坏，我们和前沿坑道的联系一度中断，虽然听不到声音了，但我坚信，我们的战士一定能够守住坑道。坚守在坑道内各自为战的同志们也坚信，首长一定在千方百计支援我们。就凭着上下之间这种亲密的了解和高度的信任，坑道分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退却，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上甘岭战斗，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

在上甘岭战斗发生期间，整个朝鲜战场其它地方的战斗大大减少了。兵团和志司首长从一开始就对上甘岭方向

给予极大关注。志司首长多次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给予

指示。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同志更是同我保持热线联系，及时调兵遣将，为我们补充了大量新兵，并组织增援炮兵，补充弹药给养，组织兄弟部队以攻势行动，在其它方向上打击并牵制敌人，减轻上甘岭的压力。

艰苦卓绝的坑道斗争

敌我双方争夺七天之后，敌人又将新兵师从汉城调到金化，边打边补。

二十一日后，敌一面以各种手段围攻我坑道部队；一面调整部署，准备继续进攻。他们将美七师汉滩川以东的防务和进攻 597.9 高地的任务移交给韩二师，防我从汉滩川向其左翼出击；美三师接替韩九师担任铁原地区防务；韩九师主力东调金化以南史仓里作为战役预备队。敌人准备投放更大的兵力，继续向我上甘岭阵地进攻。

十月二十五日，军在道德洞召开作战会议，分析了上甘岭战斗状况。目前我们减员较大，兵力有限，敌人一下子集中那么多的兵力和火力，看来是要大打出手了，其势正旺。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的同志考虑，是否可以暂避其锋，做战略退却。

兵团王近山代司令员给我打电话，也说了一个活话：“现在有两个方案，一是打，二是撤。”

王近山同志是二野的一员战将，以战斗作风勇猛、敢打硬仗狠仗恶仗而著称，但在上甘岭严酷的形势面前，这位硬将军也有点踌躇了，给了两个方案，让我选择，实际上是逼我下决心。

参加十月二十五日作战会议的除军的领导同志以外，还有各师师长、政委。我说了个人看法。认为，目前整个朝鲜的仗都集中在上甘岭打，这是十五军的光荣，我们打得苦一点，兄弟部队休整时间就长一点，我们已经打出了很硬的作风，咬着牙再挺一挺，敌人比不了这个硬劲。上甘岭打胜了，能把美国军队的士气打下去一大截。战场上常常是这样，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敌人也可能更困难，这时候就要较量胆魄和意志。所以我提出，上甘岭战斗要坚决打下去，就是要跟美国人比这个狠劲凶劲，这是朝鲜战场全局的需要。

与会者的思想非常统一，都支持打下去。

会议还就战术问题进行了检讨。指出，我军反击出发地往往距目标较远，运动中被敌杀伤较大。另外战术动作也被敌人掌握了，反击时间总是十七时至二十二时，总是先经一次火力急袭，接着就是冲锋。敌人在我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便可以判断我冲击目标和路线，同时准备好拦阻火力，开始对我运动道路及坑道口实施拦阻，杀伤我二梯队。我们炮火延伸，敌人也作好了反冲锋准备，如此，反击往往失利。

以上战术检讨，在下一步的反击作战中，起到了具体的指导作用。

这次会议还研究部署了继续战斗的有关措施。提出，为了将敌斗志彻底打垮，应集中打击占领 597.9 高地表面阵地的美军部队，先给美军以歼灭性的打击，这样。占领 537.7 高地北山表面阵地的南韩部队就会丧失斗志，易于收拾。

鉴于兵力不够，有的同志提出调四十四师部队增援上甘岭。我没同意。我认为，眼下战斗虽然集中在五圣山，但四十四师在西方山的防御正面一马平川，仍是敌人虎视眈眈的重要目标。一旦削弱西方山守备力量，敌机械化部队调头而去，打开西方山防线就如洪水决堤。因此，上甘岭方向越是紧张，西方山方向就越要警惕，切不可掉以轻心。

说到这里，要插一点想法。

上甘岭战役在敌人一方，称“金化攻势”，代号“摊牌计划”。从已经形成的事实看，“金化攻势”虽然是在上甘岭开始的，也是在上甘岭告以结

束的，它似乎说明了，范弗里特的根本意图就是在于选择我防御地形优越而防御力量薄弱的五圣山地区做为突破口。从敌人的兵力调动上也看不出他还有其它企图的蛛丝马迹。但是，作为上甘岭战役的直接指挥者，几十年来我一直心存疑窦，我总认为范弗里特还备有另一种不为人知的阴谋，即在上甘岭战斗登峰造极之时，他的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另一只眼睛一定瞪得老大窥探我的西方山。只是由于我们在西方山上死死按兵不动，范弗里特才悻悻作罢。如果我们因为上甘岭战事吃紧而动用西方山部队，范弗里特极有可能回马一枪，打我们一个声东击西。他毕竟是机械化部队，撤出战斗快，重新投入战斗也快。那样一来，上甘岭战役就成了西方山战役，战役的最后结局是什么样子，那就很难想象。我们自始至终没有动用四十四师部队。

军里的决心是：在基本阵地上，暂取坚守坑道斗争的手段，制止敌人扩张，争取时间，重新调整作战部署，做好决定性反击准备。

鉴于四十五师严重减员，军决定将二十九师八十六团除担任一线防御的部队外，抽五个连和八十五团担任防御的二梯队营投入 597.9 高地决定性的反击，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也抽五个连参加 537.7 北山的作战。

除十五军内部调整以外，兵团又调十二军三十一师及三十四师的两个团配属我军作战。以第九十一团作为 597.9 高地预备队，第九十二团、九十三团为军第二梯队。

当时三十一师师长吴忠尚未到任，师政委刘瑄和副师长李长林率部参战。刘瑄是我的老部下，曾经在太行军区当过团政委。他们的到来，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另外，我们还从军机关和直属分队抽调一千二百余名战士，为四十五师补充了十三个连队。军直的医院、文工团均派人抵近前沿。

我的警卫员王六也积极要求到前沿阵地。从感情上讲，我是舍不得的，这个小伙子跟着我也有一段时间了，不仅心细，而且很有思想，有时甚至能起参谋作用。在五次战役的时候，一架敌机向下俯冲，我当时正在观察，王六突然扑过来把我压在身下，站起来才知道，一梭子弹掠头而过。那一次要不是王六，我也早就“光荣”了：如今他要求上前线，也正是按照我自己提出的“婆娘娃娃一起上”的要求做的，我感到欣慰，临行时还把派克笔送给了他。这支笔还是一九四六年张蕴任同志从军调部带回来送给我的，我把笔送给王六，是希望他在战斗之余加强学习，谁知这个良好的愿望没能实现。王六同志下到前沿连队，战斗中很勇敢，在十月三十日 597.9 高地大反击战斗中，光荣牺牲。

敌人占领我表面阵地后，在两个高地上都布置了重兵防守，一面修筑工事，一面使用各种手段对坑道口筑堡封锁，断绝水源，烟熏火烧，施放毒气。我们的坑道被敌人炮击和炸弹轰炸越打越短，容积越来越小，人挤人不便行动，烈士遗体也只能暂时停放在坑道里。

在那样狭窄的空间里；大小便不能及时清理，伤员多而医药缺少，得不到及时治疗，坑道内硝烟、血腥、尿尿、汗臭使空气浑浊不堪，因缺氧经常导致人员窒息；极度缺水，战士们舔吮坑道壁上渗出的一点水珠，甚至以人尿解渴。

我们不断派部队往坑道送水、送水果蔬菜。除了后勤保障、慰问物品以外，军里领导还用自己的津贴买水果，在篓子上挂条，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祝福的话语，派人往上面送。以这种方式把温暖直接传递给坑道分队的同志。

虽然从后方到前沿坑道只有几百米上千米，但这几百米上千米的距离确是险情密布的死亡地带，中间有敌人的几层炮火拦阻线和步兵火力控制网，越是靠近坑道，遭敌杀伤越大。物资运输极其困难，为了送一袋萝卜或一桶水，往往有许多同志献出生命。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坚守坑道的同志忍受极大艰苦，互相照顾，互相体贴，共度难关。

随着冲击与反冲击次数增加，我们投入了几个建制不同的部队，每场战斗下来，都有部分人员进入坑道。因此，坑道内虽然人数有限，但单位繁多。

为便于统一指挥，四十五师确定以坑道为单位组织党支部。一三四团二营教导员李安德进入 597.9 高地 1 号坑道后，把十六个不同建制的连队人员编为第一三四团八连，建立了党支部；一三四团四连指导员赵毛臣在 597.9 高地 2 号坑道里将四个不同建制连队的八名党员组成坑道党支部，另有五名团员组成团小组。

一三五团七连在坑道里七天缺水，当运输员刘明生将路上拾到的一个苹果送给连长张计法时，张计法又交给了步话员，步话员忍着干渴，又将苹果传给一个重伤员。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一圈，又完整地回到连长手里。连长流着泪，带头咬了一小口，再往下传，每人都只咬一点点，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两圈才吃完。以后《上甘岭》电影和教科书里都反映了这个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为什么能够守住五圣山，为什么能够坚韧不拔地抵挡住那么猛烈的攻势？这个苹果的故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做出答案。

还有一个女战士使我印象至深，她叫王清珍，是个铁路工人的女儿，只有十七岁，她在五圣山后面的坑道病房护理二十多个重伤员，喂饭、换药、洗绷带，还要背伤员出洞解大小便。有个伤员嘴巴化脓，不能咀嚼，她先把饭嚼烂，像大人喂孩子一样一口一口地喂到战友的嘴里。还有一个腹部重伤的伤员，不能动弹，躺着解不下大小便，又憋又胀，十分痛苦。这个姑娘为了解除战友的痛苦，帮助伤员排尿，情操之高尚，令人肃然起敬。

在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的坑道斗争中，我们的战士就这样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革命军人的优秀品质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当时，整个朝鲜战场其它地方的枪声稀落了，板门店谈判桌上谈判双方都在等着上甘岭的消息，谁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得硬，谈判桌前谁的腰杆就硬，讲话底气就足。兵团、志司、军委乃至毛泽东主席，都密切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志司和兵团不断打电话询问情况，探探我的口气，看看十五军还有多大决心。我们虽然连日酷战，艰难重重，但心里清楚，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我们必须顶住，顶住就意味着胜利。因此，对上，我们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回答：“请各级首长和毛主席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十五军还要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

大反击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九师师长张显扬、政委王新、三十一师政委刘瑄、副师长李长林到德山岷会同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政委聂济峰召开了一次联席作战会议，讨论反击方案，并联名将方案报告军部。

针对火力上敌强我弱的特点，和冲击出发地距离目标较远的弱势，几个师的指挥员动了不少脑筋，集思广益，调动战术思维，提出诱惑敌人的炮火和机动地使用自己炮火的二十三条办法，运用假火力准备、假冲击、炮火假转移等战术。

衡量再三，我对这个方案是比较满意的，很快给了批复：“为利用有利地形，大量歼灭敌人，三十日夜，只拿下 597.9 高地主峰，其余次日夺取之。”

十月二十九日，我反击部队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经过两天预先火力准备，十月三十日二十二时，进行直接火力准备，五分钟后，火力延伸，第一线步兵佯动，诱敌展开，十分钟后，已经延伸的炮火突然减下表尺，杀了个回马枪，已经展开战斗队形的敌人并没有接触我进攻步兵，倒被突然缩回来的炮火杀伤不少。二十二时二十五分，我以十个连的兵力（含坑道内临时组织的两个连）对占领 597.9 高地表面阵地的敌人进行内外夹击。经过五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四个连，打退敌人一个营的多次反扑。三十一日凌晨，597.9 高地阵地全部被我军收复。曾经指挥过黄继光所在八连战斗的优秀指挥员、一三五团二营参谋长张广生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从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五日，敌人先后投入十七个营的兵力，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连续六天对 597.9 高地进行反扑。

美国佬为了鼓舞士气，也进行了“政治动员”，除了军中牧师那一套外，还把 597.9 高地取名为“珍妮·罗素”山。珍妮·罗素是好莱坞女明星，在美军中很受官兵崇拜。他们一边喊着珍妮·罗素的名字，一边往高地上冲。很多人被打死在这虚构的幻境之中。

十一月一日，经兵团批准，我们将作为军预备队的第三十一师九十一团投入战斗，我亲自给崔建功、刘瑄等同志打电话下达强硬命令。

刘瑄表示，三十一师要当好十二军的代表队，学习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的战斗精神，坚决服从十五军首长的指挥。

一切落实之后，我军共投入二十一个连的兵力，在表面阵地工事完全被毁的情况下，利用石缝、石坎、弹坑和敌人的尸体作掩体，采取坑道屯兵，小部队坚守，小部队出击，边打边补充，边打边修等手段，给敌以大量杀伤。

十一月二日，敌纠集韩九师两个营、美七师十七团、美空降一八七团及哥伦比亚等共五个营的兵力，多路、多梯次向我发动大小四十余次进攻。下午四时，敌人的三十多辆汽车运载一个营上来增援，遭到我炮火拦阻后，又退回去，于进攻出发地修筑工事，伺机出动。

我接到崔建功的报告后，决定尽量减少步兵参战，以炮火给这股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命令火箭炮营神速进入阵地，一次齐放，顿时一片火海，敌人的这个营基本上没留下几个活的。

刚上阵地的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也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体现出了兄弟部队过硬的战斗作风。尤其是指挥上注意研究，在人生地生、情况不明的条件下，迅速适应环境，摸清敌人规律。在反击和坚守中，均能体现灵活的战术，往往以小股战斗单位控制要点支撑十分得力。为此，军党委对三十一师予以通令嘉奖、号召十五军部队学习三十一师，边打边研究，打一仗进一步，以小

的代价歼灭敌人，最后把敌人熬垮。

十一月五日，美军和韩军拼凑了八个连队。向我 1、2、7、8、9 号阵地发起攻击，被我军打退。

上午十时四十分，美军两个营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又向我阵地冲击，仍未得逞。

这一天，我守备部队同敌人展开了十八次反复冲杀。

黄昏时分，在粉碎敌人最后一次集团冲击时，主峰阵地上空出现了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奇观。连续数日烽火硝烟遮蔽的天空在浑浑沌沌的黄昏中，倏然骤亮，那一瞬间，天宇间一片辉煌，桔红色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上甘岭战场。紧接着，一声奇异的爆炸声裂破了长空，天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团，暴风骤雨般降下一阵燃烧着的金属碎片。原来是美军一架低空支援步兵冲击的 F—51 型强击机，居然撞上了我军地面低弹道弹丸，顿时粉身碎骨，那眩目夺魄的一亮，那惊天动地的一响，再加上纷纷坠落的残骸正好落入敌阵，这使本来就胆战心惊的美韩士兵更加恐怖。

在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五日对 597.9 高地的大反击和巩固阵地的战斗中，我以伤亡二千五百人的代价，歼敌六千余人。

在反击 597.9 高地的同时，我八十七团以五个连的兵力，反击 537.7 高地，歼敌人百余人，有力地配合了 597.9 高地战斗。为此，中朝联合司令部首长彭德怀、邓华、朴一禹致电嘉奖十五军：“你军与敌血战了二十余日，敌军集中了空前优势的炮兵、飞机、坦克及大量步兵集团冲锋，不仅不能夺取我军阵地，而且丧失了一万五千余人的有生力量及大量炮弹，你们则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亦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制敌于死命’。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到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这份热情洋溢的嘉奖电，由十五军政治部印成红色大字的“号外”，迅速传遍了每一个阵地。十一月十日，身在北京而每时每刻都在关注上甘岭战斗的毛泽东主席将这份嘉奖电批转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及军委各部门。

与我们一片欢呼恰好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的敌人此时则是心灰意冷。这次反击，使美军完全陷入了绝望境界，美联社悲哀地宣布：“到现在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即 597.9 高地）是打败了。”

夺回了 597.9 高地并巩固了阵地之后，我们又开始准备反击 537.7 北山。

十一月五日，兵团发出部署指示，“为便于指挥，决定组织五圣山作战指挥所，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同志负责，统一指挥三十一师和三十四师之反击作战，二十九师之配合动作。该指挥所归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毛泽东主席对五圣山反击作战始终十分关注，在为军委起草的给志愿军的复电中指出：“你们对加强十五军作战地区之决心和部署是正确的。此次五圣山附近之作战已发展成战役规模，并已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

根据兵团指示，军决定五圣山作战指挥所设在德山岬，也就是四十五师崔建功原来的指挥所。第四十五师撤出阵地（炮兵不动）。转移到兵马洞地区整补。以第三十一师接替第四十五师防务。四十五师的师、团指挥系统和通讯、观察及后勤保障机构暂留原处，保障三十一师。二十九师第八十六、八十七团主力防守五圣山、忠贤山阵地，并以部分兵力协同三十一师作战。

三十一师以九十一团、九十三团负责坚守 597.9 高地；第九十二团全力反击 537.7 北山之敌。

十一月八日，五圣山作战指挥所向军部报告反击 537.7 北山的作战计划，决心以九十二团全部举行反击并从此巩固下来，我们同意这个方案，并上报兵团批准。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第九十二团两个营在炮火支援下，向 537.7 北山之敌实施反击。同时，以第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一个排佯攻注字洞南山，另以九十三团一个排，沿上甘岭以南造成佯攻声势，吸引敌人火力。第九十二团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动作，勇猛顽强，激战将近两个小时，全歼韩二师十七团一个营，全部夺回 537.7 高地北山表面阵地。

以后的几天里，敌人先后纠集十六个营的兵力，在空中和地面炮火的支援下，向 537.7 高地北山多次发起疯狂反扑。同时，注字洞南山的敌人对我后方供应线进行火力封锁。十一月十四日，我又将第九十三团两个营投入战斗。从十二日至十八日，我九十二、九十三团先后击退敌人一百三十二次冲击，毙伤敌二千余人。

十一月十八日，第一六团接替第九十三团参加 537.7 北山战斗。一面作战，一面抢修工事，改善了作战条件，并采取坑道屯兵，少数兵力坚守，加强火力控制，结合无规律的反击等手段，大量杀伤敌人，巩固占领阵地。

二十日以后，敌人因伤亡惨重，兵力不足，只能以连以下兵力实施小型反扑。其实，这种反扑已是象征性的了，是把脸打肿企图挽回面子。开始几天，他们的空中和地面炮火也虚张声势地投几颗炸弹放几声炮，我们的战士开玩笑说，美国佬和李承晚真的已经被拖垮了，连炮声都没有过去那么响了，听起来像哼哼。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他们连哼也哼不出来了，举步维艰，再也没有能力进攻了。537.7 高地北山阵地完全被我军控制。敌人将伤亡惨重的美七师和韩二师撤下去整补，这两个师的防务分别由美二十五师和韩九师接替。此时，敌人的进攻也基本停止，范弗里特抛下几万美韩官兵的亡灵，再也羞于提起“摊牌计划”了。所谓的“金化攻势”僵旗息鼓，不宣而退。历时四十三天的战役遂以我军的胜利而告以结束。

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时，十五军发出《关于兵力部署调整的指示》：

我 597.9 高地已达到巩固，537.7 北山除 7、8 号阵地外，其余阵地为我控制。伪九师接替伪二师后，看样子尚无大进攻企图，上甘岭地区之战斗，作为战役性的作战来说应该结束。537.7 北山之战斗，作为一个单独的战斗来进行，应减少这

一地区的部队和炮兵，以免过大地消耗和损失。如果我继续摆着战役的架子，则是以大对小，于我不利，根据兵团二十五日指示，部署如下：

（一）李副军长前指于本月三十日解除任务，由二十九师师长张显杨、三十四师参谋长蒋科统一指挥一六团作战。

（二）一六团应争取时间筑城，加强战斗准备，将 1、2、3、4、5、6、9 号阵地完全巩固起来，另指定两个连做好反击 7、8 号阵地之准备。

7、8号阵地攻下后，视情况，如达不到完全巩固，则造成一定时期的游击区，尔后逐渐巩固。

(三)十一师部队(九十一团已于二十五日撤离阵地)九十三团应于三十日二十四时前撤出阵地，全部开往谷山归建……。

话说上甘岭

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它由高地之争最终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战役，由最初的营、连战斗，磁石般地吸引双方力量，最后我十五军全军投入，并加强了十二军部分部队；敌人方面参战总兵力六万人以上，可见该战役牵引力之大。战役刚刚开始时，朝鲜其它战场上还有一些战斗，等上甘岭战役进入高潮，其它战斗几乎都告暂停，上甘岭就像一根敏感的神经末梢，动一动，痛全身，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片面积仅三点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后有人说上甘岭战役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是“朝鲜战场的淮海战役”，这些话是有一定根据的。

下面，我谈谈对上甘岭战役的一些认识。

在上甘岭战役之前，我们也判断出敌人在九月间会发动秋季攻势，估计要从日本调来骑一师，汇合已经同我们交手的部队，大约有四、五个师的兵力，向我发动战役进攻。至于攻势重点，我们分析最大的可能在四十四师正面（平康方向），企图夺取西方山、斗流峰。那里地形平坦，不宣布阵，易攻难守，一旦突破，机械化部队可长驱直入，我全军防线都将为之牵动，战斗持续时间可达二十天至一个月。我们估计敌人重点进攻五圣山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五圣山地势险峻，便于我军防守，如果敌人将攻势重点放在五圣山，就必须从日本调动力量，只凭在朝力量是不够的。而且，在五圣山这样的防御阵地上，我们也比较容易粉碎敌人的进攻。因此，我们虽然在五圣山一线做了防御准备，但不是重点准备。

到了九月下旬，敌人在日本的部队尚无调动迹象，而我军在整个朝鲜战线上发动了一连串的战术反击，我们估计敌人大规模战役进攻的可能性不存在了，于是，对以下两个情况产生了忽视和错觉：

一、敌人于八月底在五圣山前进行准备，我们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认为这种准备有虚假成份，敌不至于在五圣山前大举进攻。

二、在上甘岭战役发起的前八天，也就是十月六日，韩二师三十二团二营一名上士向我军投降，供出三十二团要配合美军在十月八日进攻。因为美七师在西方山正面虎视眈眈，所以我们继续估计敌人进攻可能在西方山，命令四十四师加强准备，严阵以待。也考虑到五圣山当面韩军会做些配合行动，但认为规模不会太大，所以只令四十五师一三五团作了一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战役性的防御准备。

出于错觉和判断失误。我们的精力仍集中在反击注字洞南山，结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赢得了战斗发起的突然性。我军在十四日战斗开始时没能回过手来给敌以沉重打击，从而拉长了战斗持续时间。

战役时间拉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敌人在战斗中边打边补缺乏足够认识。敌人，特别是韩军，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兵员和军官，可以源源补充。韩二师在战斗开始前有一万二千人，战役过程中伤亡惨重，经过不断补充，到战役结束，还有一万一千余人，可以说屡打不少。

由于我们对敌边打边补的力量估计不足，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周内，我虽伤亡大，但看到敌人伤亡更大，便认为敌人不久就要收兵。特别是当阵地被敌人占领后，脑子发热，想一巴掌把他打下去。所以我对崔建功师长讲了那样的话，打不下来不要回来见我。我这句话放出去不要紧，下面脑子更热，一股血气上来就拼命，增大了伤亡。

当然，打了一阵，冷静下来一想，发觉不对，敌人拉的架势很大，不是一下就能收场的，要稳往阵脚，同敌人打持久战。

二十五日军在道德洞召开作战会议，一是决心打，二是研究了怎么打，三是打成个什么样，心里都有了数，兵力作了调整，后勤保障有了加强。可以说，是这次会议决定了上甘岭战役的最佳结果。

较之国内外大的攻防战役，上甘岭战役是比较特殊的，它的特殊性在于：

一、集中大量军队使用于很小的地区。

按作战建制部队计算，在三点七平方公里的地区内，敌人先后直接投入战斗的兵力就有六万余人，我方直接投入战斗的兵力四万三千余人。这样的兵力密度，是近代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整个朝鲜战争的兵力动员规模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仅次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法战争和日俄战争。而上甘岭战役的兵力密度，不仅比朝鲜战争一至五次战役大得多，而且也是其它四大战争中任何战役所没有的。另外，在双方的背后，各有一支庞大的保障和配合队伍。近两百万兵力助战。

二、炮兵在战役中的作用增大。

此役中，敌军投入轻重火炮共一千六百多门，我军轻重火炮也有五百多门。“联合国军”还动用了三千架次飞机和一百七十辆坦克，弹药的消耗成了天文数字。仅敌人一方就向上甘岭两个小小山头倾泻了一百九十余万发炮弹和五千多枚炸弹，最多一天高达三十万余发炮弹，平均每秒钟落弹六发。每平方米土地上要承受七十六枚炮（炸）弹的轰击。如果历史地比较一下，这个数字触目惊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北法登陆后的一个月中，创造了共计发射炮弹五十八万发的纪录，以日计算的话每天只有二万发，而其散布面积长达一万五千公里，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为了攻占硫磺岛，使用火力最猛烈的那天，也只有三万发。在上甘岭战役中，我们在装备上虽然不能同敌人比，但在精神气质上，绝不示弱，全力以赴东拼西凑，也先后发射了四十万余发炮弹，在单位火力密度上也创造了自已作战的最高纪录。敌人说：“打炮像下雨，连小石头也躲不过”。表面工事被摧毁了，草木被打光了，坑道被打短了，山头的岩石被打成了半米多深的粉末。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是昏天黑地，硝烟缭绕，如此炮火密度，古今中外罕见。战役最后胜负，炮兵起了很大作用。

三、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器材。

四、作战持续时间长。

上甘岭地区作战从战术性发展到战役性的规模，持续了四十三天。战斗是敌人挑起的，但发展成战役规模，还打不打，怎么打，就不是他们说了能算的。到了最后，敌人几乎是被迫的硬着头皮往“无底洞”里填，我军的坑道筑城则显示了坚韧的持续力。

上甘岭战役的意义，我有几点认识：

上甘岭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军事打击。美七师、韩二师均被我打残废了，不得不把美二十五师和已经被我痛打得不堪一击的韩九师换上来。这样，敌人在朝鲜战场上就处于更大的被动状况，将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对峙，更加有效地稳定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上，并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历史进程。

从政治角度讲，上甘岭战役紧张阶段，美国正在大选，广大选民十分厌恶这场战争。尤其是上甘岭战役，使美军越陷越深，仆从国欲退不能，美国

国内怨声四起。

当然，也有人在上甘岭战役中占了便宜，这个人便是艾森豪威尔。艾氏在发表竞选演说时宣布，如果他能当选总统，他的政府将优先结束朝鲜战争，并说：“只有如此，我才能最好地学会如何在和平的事业中为美国人民服务，我将前往朝鲜。”这一番娓娓动听的许诺，立即博得美国人

民喝彩，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呼声顿时上涨。从一定意义上说，上甘岭战役帮助了艾森豪威尔，给了他一个“射门”的机会，使他关键的时候猛踢一脚，进了漂亮的一球。

上甘岭战役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胜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主席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胜利，是志司、兵团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的胜利。

五次战役后，我们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零敲牛皮糖”，不断地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时间。毛主席的这个指示通过实践证明是很英明的，特别是在一九五二年以后，朝鲜战场上不断成排、成连、成营的歼灭敌人，不仅从实力上削弱了敌人，更从心理上威慑了敌人，为上甘岭战役取得全胜奠定了基础。在上甘岭战役过程中，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始终对战事进展密切关注，不断发来电报，进行战役指导，对我将士给予了巨大鼓励和鞭策。志司和兵团直接调兵遣将，全力支援上甘岭，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和信心。

二、一切参战部队发扬了高度的团结战斗精神，表现

了特殊的英勇顽强与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造成了为国争光慷慨赴死的壮烈气氛。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等人的壮举，不仅使敌魂惊魄动，就是在我军战史上，这样的行为也不多见。他们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伟大气魄，在战斗异常紧张艰苦的情况下，发扬了勇敢和智慧相结合的作风，作战技巧出神入化，献身精神一往无前。有如此奋不顾身浴血死战将士，敌人焉有不败之理。以后，南朝鲜国防部编写的《韩国战争史》第3卷《对峙中期》一书中，把上甘岭战役称为“摊牌计划”，自称受挫，并承认中共十五军防御意志坚韧不拔，因此三角高地（即597.9高地）战役始终没有进展，反而使中共军打成漂亮仗而自豪。

三、大量的炮兵参战，炮火准确猛烈，为上甘岭战役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在朝鲜战场上我军的武器装备仍处于相当的劣势，但从志司到兵团乃至军、师，都尽了最大努力，将炮兵集中使用于上甘岭战场。而且，凡参战部队炮兵均组织得较好，快、准、狠，不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协调也十分默契。步兵部队上下都感到满意。正如毛主席在论述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时指出的那样：“……在十月中，敌人曾以两个半师兵力向金化以北上甘岭的三平方公里的我军两个阵地举行连续攻击，直打到十一月底，敌人伤亡两万多人，每天发弹两万多发，有时多至三十万发，每天并出动坦克、飞机助战，但两个阵地最后仍在我手，敌人未能夺取寸土。由于阵地战斗这样激烈，敌我的炮火均尽量集中。我歼敌一个连，平均每天需集中三十多门炮，消耗炮弹近一万发。过去三个月中，我已消耗炮弹二百四十余万发。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要素。”

四、坚固和完善的坑道体系，是保证上甘岭战役持久防御从而致胜的重要条件。我军担任平、金、淮地区防御任务之后，首先树立了正确的防御指导思想，进行了大规模的筑城作业，建设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

系。在上甘岭战役中，坑道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是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削弱了敌人火力优势的作用。客观上使我与敌在装备上的高度悬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从而为我挫败和战胜敌人提供了物质基础。战役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坚固的坑道工事做依托，在敌人以绝对优势火力对我实施疯狂的、持续的、旷世罕见的猛烈轰击下，要夺取战役的最终胜利，将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其次，坑道工事也为我长期固守和与敌反复争夺创造了有利条件。即使我表面阵地被敌占领，部队也仍能坚守坑道，从坑道内不断以小分队主动出击，零敲碎打的收拾敌人，破坏其修筑工事，使占领我表面阵地的敌人，如坐火山之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利用坑道囤积了大量粮弹，从而保证坑道分队的生存，不仅大量消耗阵前之敌，也为最后的反攻储备了有生力量。

五、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以十五军第四十五、二十九师为主体，各兄弟部队配合参战的结果。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第十二军的参战，是取得上甘岭作战最后胜利的保证。十二军是在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当时，十五军的二梯队已经拉上去了，敌人又调来了韩九师三个团，韩二师集中最后力量，加上美军空降一八七团、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等投入战斗，597.9 高地的战斗发展到决战阶段。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李德生同志的到来，三十一师投入战斗，使我们更加增强了取得战役全胜的信心。可以说，十二军部队的参战，保障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这次战役，虽然最初主要投入了四十五师，但在我十五军内部，也是密切配合，情同手足，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不妨略举一二。

为了有力支援上甘岭作战，坚守西方山、斗牛峰的四十四师部队，一方面严阵以待，一方面积极出击。师长向守志同志说，敌人在东边打，我们在西边打；敌人打我上甘岭两个山头，我们也打敌人几个山头。这是对上甘岭作战的直接配合，也是对四十五师的最好支援。十月六日，一三二团一举攻占上佳山无名高地，全歼美七师一个加强排，此后敌以一个营的兵力同我反复争夺，但上佳山阵地始终为我控制，在上甘岭战斗异常激烈时期，牵动了敌人的神经。一三二团以 391 高地与敌反复争夺，为了达到牵制目的，他们忽而放弃阵地，让敌蜂拥而至，忽而飞兵奇袭，将敌大量杀伤，再唢哨撤离。如此这般，在一个多月的反复争夺战中，他们三进三出南峰，前后共歼敌三千八百余人，创造了成建制歼灭敌一个团的范例。有人把这种战法譬喻为“玩猴术”——我依托北峰，遥控南峰，恰似用一条绳子套住敌人的脖子，使它无法脱身，既站不住脚，又走不掉，只能蹦达。

除上佳山和 391 高地战斗外，还有 381 东北无名高地战斗等，四十四师部队寻机而出，遇敌便打，西方山的枪炮声热辣辣地温暖了五圣山我四十五师部队的心。除了战斗上的配合以外，四十四师还先后派出两个慰问团，往五圣山上送菜送弹药。

在上甘岭战役中，十五军的另一支精锐二十九师，发扬了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共同作战。根据兵力部署要求，他们以一个团配属四十四师，坚守西方山，以两个团配合四十五师，后又配合三十一师战斗在上甘岭。当战役处于最艰苦阶段时，他们把上万斤萝卜、西红柿送到四十五师；在大反击前，师政委王新亲自率领两个营，把几万发炮弹和手榴弹送上五圣山。他们可以说是我十五军的一支没有机械化的机动部队，哪里情况紧急，哪里需要，他们就飞驰哪里。

一句话，没有兄弟部队的伴奏，上甘岭的锣鼓就不会敲得这么动听。

六、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还仰仗于后勤保障有力。

上甘岭战役越打越大，其它战线上就相对安静下来，整个朝鲜都在看着上甘岭打。所以我们要什么，上级给什么。志司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同志亲自抓上甘岭的后勤保障，二分部全力以赴，使我十五军“兵马壮、粮弹足”，战役过程中的粮弹供应，满足了战斗所需要的大量消耗。运输部队在敌火下昼夜不停的前运弹药、后转伤员，是战役胜利的重要保证。

七、在上甘岭战役中，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援和鼓舞。加强给我们的火炮，有许多是祖国亲人捐献的。当时我国还处于困难时期，父老乡亲们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抠出一点钱，支援我们打仗。战斗紧张时，祖国慰问团来到我军，带来了祖国人民的关怀。物资力量是可贵的，精神力量更可贵，它时时在鼓励并警示我们前方的同志，身后就是祖国，背后就是亲人，为了祖国的安宁，亲人的幸福，就是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忍受，再大的牺牲，我们也绝不能后退。

战役中，朝鲜人民踊跃支前，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在支前的队伍里，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妇女，其中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叫石吉荣，是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在支前中，她的左腿被美军飞机炸断了，康复出院后不能运送弹药伤员，便在转运伤员的路边设了一个茶水站，自己拄着拐杖给伤员送水喂水，每天早晨顶着月亮开始，晚上顶着星星收工，一直干了四十多天。还有一个叫李春实的姑娘，因为担架队只要男同志，她便同另外三个姑娘女扮男装，自己做了一副担架，到火线救护所抬伤员。

在许许多多支前事迹中，最让人难忘的，还是朴在根老人。我们干部战士，都喊他阿爸基，他的确是一位很好的阿爸基。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带头参加了担架队，抢运伤员，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精心护理我们的伤员。一次，担架队遇上敌人空袭，周围都是炸弹，躲避不及，朴在根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伤员保住了，朴在根老人却被弹片穿透背部，后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还有一位被称作“志愿军的妈妈”的老人咸在福，五十多岁了。战争爆发后，她的老伴、儿子、儿媳先后为战争捐躯。她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孙女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临时伤员转运站，凡从她家里经过的伤员，都受到她悉心的照料和无微不至的护理，那种慈母般的温情，使身处异国又负伤带疾的战士无比感动，可以说伤疼先从精神上被治好一半。

正是有了以上诸多因素，才有了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这话不一定准确，但是，在上甘岭战役中，我们所体现的“不怕牺牲，艰苦顽强，友爱团结，机智灵活”的战斗精神，尤其是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的确使敌人大为震惊。我们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群体呵！烈火烧身而纹丝不动直至牺牲的有，以胸膛堵枪眼的有，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有，用身体给战友当枪架的有，用身体当电话线的有，把生的希望无私地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坦然留给自己的也有。所有这些，灼痛了西方人的视野。对于中国人，他们应该重新认识了，必须刮目相看了。

屯兵东海岸

上甘岭战役后，美军在正面战场上已是穷途末路，基本上再也没有发动像模像样的攻势了，朝鲜战场出现了新的格局，由原来的你进我退或我进你退的大幅度机动，变为冷却对峙。板门店谈判也因此而陷入僵局。这种对峙和僵局对美国极为不利。

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对“人权”、“人道主义”问题叫得最响，以美国人的普遍心理，个人的生命是高于政治和战争的，然而在两年多的朝鲜战争中，美军损失三十一万人，直接用于朝鲜战争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亿美元，间接用于战争的费用达到八百亿美元，这就引起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争吵。老百姓则要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呼声日益强烈；特别是美军七个主力师长期陷在朝鲜战争的泥沼中，不但伤亡严重，而且破坏了美苏抗衡的战略格局。英、法等国被迫长期绑在朝鲜战车上，劳民伤财，百姓怨恨，这些国家也眼巴巴地盼望早些结束朝鲜战争。

可以说，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很拣了便宜的，战争爆发时无动于衷，战争高潮时仍按兵不动，而当战争进入决定性的末期，他才重兵投放，从而使战争形势急剧倾斜。

然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的这一手不灵了。

他们只得硬着头皮谋求尽快结束战争的新途径。正面进攻力不从心，金蝉脱壳推韩靠前，一时又难办到。李承晚也不是省油的灯，你美国佬既然打进来了，并且打成这么个烂摊子，想金蝉脱壳，可没那么容易。倘若再投入兵力大打一阵，实在是后劲不足，虚劲难提。坐下来重开和谈吧，又怕丢面子，再说，你打输了，谈判桌上腰杆也不硬。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美军调整部署，正面打不赢，就从两边做文章。企图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作战，以挽救其败局。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时，曾说过要尽早结束朝鲜战争，一席话说得选民们心里热乎乎的。而到他总统交椅坐定，这位曾经出色地指挥过诺曼底登陆的二战名将，又换了一种说法，宣称要用“行动”而不是“言语”来结束朝鲜战争。入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组成专门小组，制订两栖登陆作战的计划，准备鼓起最后一股虚劲，打一个翻身仗，为摆脱在朝窘境搭一个阶梯，体面收场。

可是，这个面子我们当然不会给他。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同志时，强调指出：志愿军应从“肯定敌人登陆这一判断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号召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要“小心谨慎，坚韧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

第三兵团首长十二月二十七日电令我十五军，将平、金、淮地区防务移交给第二十四军，然后进至元山地区，接替第二十三军防御任务。

由于任务紧迫，我们一手抓移交，一手抓接替，一交一接，在十七天内顺利进行完毕。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军于安边郡三巨里发布了海岸防御作战命令。各师、团召开党代表会、青年团代表会、贺功会，进行形势教育和紧急战备动员。此后，全军上下展开了紧张的抗击敌人登陆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期间，我已接到通知，要我回国就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但由于部队北上东移海岸，我军缺乏反登陆作战经验，投入海岸防御时间又很仓促，所以彭德怀同志指示志愿军邓华代司令员，准我继续留在朝鲜战场，待十五军在东海岸基本上完成了防御体系并站稳了脚根，再离任回国。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我在会上传达了兵团作战会议精神，分析了敌人的海、空军态势。鉴于部队缺乏海岸作战的经验，所以我们把战术问题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密。提出了战术指导与战斗方案，要求部队研究各种情况下的各种打法，在敌登陆前、靠岸时、上滩头等各个时期都有对策，另对炮兵部署、反敌机轰炸、反空降、反坦克以及战场保障和同友军协调等问题，提出了详尽的要求。

我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十五军部队要准备抗击敌人三至六个师和飞机五百至八百架支援的登陆作战；准备独立坚持与敌反复争夺的艰苦激烈战斗。因此，全军要抓好三个关键：一是熬过敌人登陆前的空、炮火力袭击，保存有生力量，这是确保胜利的关键；二是乘敌立足未稳，争取时间，抓住时机进行反击，大量歼敌，如我一时被分割，一定要保持指挥不乱；三是反空降、反战车，按预订方案进行，如果被敌人分割，守备部队不动摇，顽强战斗，直到胜利。

这次会议之后，各师根据军里的要求，均调整了部署，修订了作战方案并进行了应付各种情况的战术想定作业，组织部队进行战术演练。五三年冬末春初，全军各部队按照先前沿、后纵深；先要点、后次点；第一线阵地的坑道与野战工事构筑同时并进，第二线阵地先坑道、后野战工事的原则，展开规模庞大的工程作业。

从二月初到七月底，经过将近半年的施工，在绵亘百余里的正面上，基本上构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工程之大，任务之重，为十五军建军史上绝无仅有。据统计，全军共完成坑道二千余条，全长近六十公里，完成堑壕、交通壕及防坦克壕、各种钢筋混凝土工事若干，还修建了二百多公里的公路。整个施工量，比平、金、淮地区防御作战时增加一倍。

从我们的动作可以看出，十五军到东海岸，是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的，摆开了架势要和美、韩再战一场，决一雌雄。打，我们是不含糊的。

朝鲜战场的停战谈判时阴时晴，美国政府一会儿看到战场上形势不妙，就叫着要谈判；一会儿突然发现有便宜可占，又狂妄叫嚣：“让炸弹、火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他们发动“金化攻势”，就是企图从我军防线中央突破，迫我后退，以达到其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遭到惨败后，又准备从我侧后实施两栖登陆。岂料我东西海防坚如铜墙铁壁，令敌望而生畏，只得悻悻作罢，老老实实地回到谈判桌上来。

第十六章 西南戍边

离朝回国

朝鲜局势缓和之后，我便奉召回国。

同部队告别前几天，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十五军，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的直接领导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部队，虽然年轻，但进步很快。从四七年成立九纵起，以后便是渡河南征，挺进豫西，克洛阳，战郑州，逐鹿淮海，先遣渡江，千里南下，解放两广，西南剿匪，五十年代中央一声令下又上了朝鲜，五次战役追击逃敌势如卷席，芝浦里阻击战鏖兵喋血，上甘岭一战更是中外震惊。可以说，战场上的十五军，潇洒过，艰苦过，悲壮过，胜利过，就是没有装孬过。这的确是一支好部队。我从秦赖支队的司令员，当到太行军区的司令员，从第九纵队司令员当到十五军首任军长，可以说，我既是这支部队的一分子，也是这支部队的带头人，倥偬岁月，悠悠战事，二十年来，这支部队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有我的血，我的血管里也流动着对这支部队的情。我对这支部队既严又狠更爱，我的生命同这支部队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然而，我最终还是离开了十五军。

坐在回国的列车上，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村庄和路旁的树木，我的心很不平静。再见了，纯朴善良的阿爸基阿妈妮和朝鲜的兄弟姐妹们；再见了，我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同志们；再见了……

当列车驶过新义州，即将跨过鸭绿江大桥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次回国，也许就意味着我将结束战争生活。我这个戎马征战二十多年的老兵，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打仗了。以后的岁月，恐怕主要是在和平环境里度过了。

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残忍的，尽管我十分渴望和平。我这一生，可以说已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我稍稍懂得事理时起，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在战斗中由幼稚到成熟，从参加黄麻起义一直打到抗美援朝战争。行军打仗，占据了我生命的重要部分。如今，新中国成立了，朝鲜战争用不了多久也会结束，中朝人民渴盼的和平局面已经为期不远，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

然而，一想到从此将离开战场，心中竟涌起一阵惆怅和惶惑，当然，这种惆怅和惶惑都是短暂的，是稍纵即逝的感受。

化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革命军队的战争，同法西斯军队战争观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我们的战争正是为了消灭战争，不是掠夺，不是歧视，也不是炫耀武力，更不是兽性的屠戮。消灭战争。维护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既是我们的行动，又是我们的美好愿望。

由战争走向和平，转过这个弯子，应该说还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思想上的弯子转过来了，并不等于就已完全适应和平环境，就能得心应手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有相当一部分人，随着战争的结束，他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什么原因呢？思维是战争的思维，作风是战争的作风，习惯是战争年代的习惯。人，有许多素质，在战争年代里是优点，在和平环境里却未必能算是优点。

战争，可以使人的有些长处得到发挥，但也可以暂时掩盖一些弱项，最典型的就科学文化知识的不足。

平心而论，我们那一代人所参与的战争，基本上还都是常规战争，小米

加步枪的仗还是占主导地位。就是到了朝鲜，虽然是炒面加大炮，多了一些飞机，多了一些坦克，离现代化战争近了一步，但也仍没有脱离过人对人、枪对枪的基本战法。指挥员的指导艺术，多是从实战中来，积累了一些感性认识，升华到一定的理性高度，再根据战场实际，敌情我情，各自背景，天文地理，左右权衡，反复酝酿，形成决心。战争或战役实施过程中，则又密切驾驭战场态势，或敌变我变，或敌不变我亦变，或死守，或强攻，或迂回，或穿插，或背水一战，或回马一枪，随机应变，当机立断，击敌不备，出敌不意。一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员，理论上未必能说得出多少子丑寅卯，但真的打起来，却能指挥得得心应手。

战争为我军造就了一批出色的军事将领。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对于军事指挥员来说，又多了许多新的、更高的要求。仅仅会打仗是远远不够的了，它要求我们军事指挥员，尤其是高级干部，在政策水平、科学知识、交际能力、文化素养等方面，都要有更进一步的加强。客观地说，这种加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完成的。从战争走向和平，完成这个过渡，而且是从容地完成，只能凭借一种力量，那就是学习。

回忆以往走过的路，从老百姓到军人，从士兵到干部，从基层干部到高级指挥员，每一步转折，无不是在学习由陌生到熟悉、由幼稚到成熟。是学习，保障了我们在各级岗位均能得心应手地完成好工作任务。只有学习，才能不断拥有新鲜的知识，不断开拓新的意识，不断产生新的思维。学习使人成熟，也能使人年轻。

离朝回国，远离了血光飞溅的战场，即将走进和平建设的滚滚热潮之中，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认真读书学习，读马列，读毛主席著作，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补上由于紧张的战争而落下的课程。在战争年代自己没有落后，进入和平时期也不能掉队。

我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丹东作短暂停留。当时陈赓同志在哈尔滨组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担任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我便绕去哈尔滨看望他，并向他汇报了上甘岭作战情况。

陈赓同志是我的老上级，战争年代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我对他非常尊重。他听了我的汇报之后，认为很好，让我给军事工程学院教职员工作场报告。

当时也没有更多的准备，从战役背景，讲到战役过程，不用打稿子，一点一滴都涌动于心。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牛保才、王清珍等同志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艰苦卓绝的坑道斗争，十几个连队一个支部的故事，一个苹果八个人吃了两圈的故事，我们的女战士用嘴为重伤员排尿的故事……那些感人的事迹，不仅敌人闻所未闻，就连我们自己的同志，也被深深地震撼了。

我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工程学院的同志静静地听了四个小时。陈赓同志一向不愿意开长会，但那天也是稳稳地坐了四个小时。同志们被我军在上甘岭所体现的英雄壮举深深地打动了。

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讲完，陈赓同志又让我到战犯管理所，给溥仪等人也讲一讲。给溥仪等人作报告，主要是讲志愿军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针对他们的那段不光彩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当时战犯管理所有八十多人，除了伪满皇帝与大臣，还有国民党高级将领，这些昔日称皇为帝出将入相的人物，倾听上甘岭的故事，就像听神奇的传说。我们的战士所忍受的艰苦、所体现的英雄气概、所克服的困难，是他

们做梦也想象不出来的。

我在讲台上讲上甘岭的事迹，台下神情专注，鸦雀无声，当我讲到残酷的战斗场面、讲到战士们舍身报国的情景，讲到坑道里喝尿解渴仍然坚持战斗时，这些昔日与共产党为敌的人们，也深深为之所动，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流了泪。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初，也许你们中有人认为我们志愿军打不过具有优势装备的美国军人，美国军队可能会打进东北；有人还可能迷信美国的武力，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事实已经证明了，美国军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中国人，也包括你们，应该重新认识自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完全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

向毛主席汇报

我应邀在东北地区做了十几天的报告，六月上旬，到达北京，几天后彭老总打电话对我说，他要建议毛主席接见我一次。

彭老总这个电话让我很激动。抗美援朝战争前，我从没有在彭总领导下工作过。在朝鲜战场，十五军有几件事比较突出，一是对空射击，二是五次战役进展神速，三是五次战役回撤组织得好，尤其是在后来战场形势恶化的关键时刻，打了一场漂亮的芝浦里阻击战。彭总建议毛主席

接见我，可能是表示对我、对十五军的一种嘉勉。

在这等待的几天里，闹过一个笑话。

我在朝鲜一直都是穿布鞋，穿军用胶鞋，得知主席要接见，我想，我得武装整齐一点，穿这双松巴拉叽的布鞋去见主席，不成体统。于是便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

我过去极少上街，买东西没经验，加上又是仓促地买，买回来一穿，小了。我只好去买了第二双。

说起来也是毛躁，这第二双鞋我在柜台前试了试，还好，稍大一点。当时想，大一点就大一点，大一点比小了好，不挤脚，能走路就行。

谁知这个想法又错了，像跟我作对似的，第二天皮鞋穿上去，越穿越不跟脚，步子一大就往下掉。穿这样一双鞋，怎么去见主席呵？

一怒之下，我把它往床下一扔，又去买了第三双。

有了两次经验，这一回我不紧不慢，左挑右拣，反复比试，终于买到了一双合脚的皮鞋。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上午，我接到军委办公厅电话，通知我去见毛主席。不一会儿，来了一辆轿车，径直把我接到毛主席的住处。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受到毛主席接见，内心很激动，也难免有点紧张。

刚刚进去，毛主席就从内房走出来，握着我的手说：呵，欢迎你呵，秦基伟同志。问我会不会抽烟，我觉得在毛主席面前吞云吐雾不太合适，就推说不会抽烟。主席有点意外，说：噢，当军长的还不会抽烟呵！

其实，那时候我一天没有两包烟下不来。上甘岭战役第一阶段，我的烟一支接一支，几乎昼夜不断。毛主席见我推辞，以为我真的不会抽烟，便自己点火抽了起来，烟草香味直往我的鼻子里钻，还真的把烟瘾勾上来了。可是，既然已经说不会抽了。再抽就不好意思了。在谈话中毛主席很关切地询问了志愿军部队的情况，从干部战士的情绪，问到吃穿问题。然后说：在朝鲜作战是很苦的。

我说：苦是苦一点，但干部战士情绪很高，都很乐观，打仗都很勇敢。战士们说，毛主席对我们最关心，专门给高岗副主席打电话，叫给志愿军吃好点。高岗副主席听错了，听成让给志愿军吃炒面，所以志愿军天天吃炒面。毛主席听了，惊讶地说：我没有这样说呀！

我说：是战士们讲高岗副主席的俏皮话，算是个笑话。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说：还是不愿吃炒面啊，可是国家还穷呵，拿不出好东西了，委屈了同志们……在谈到对敌斗争时，毛主席问：美国佬好对付吗？

我说：刚入朝的时候对他的活动规律摸不着，有点生疏，后来交了几次手，就感到美国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并不可怕。美国佬有三个长处：一是机动快，二有制空权，三是后勤及时充足。但他也有三条缺点：一怕夜战，二怕近战，三怕死。有这三条，他就注定要败在我们手里。

毛主席笑着说：张牙舞爪到处要吃人的大老虎也被志愿军战胜了，可见确实是一个纸老虎。

我说：通过和美帝作战，更证实了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英明正确的。我们同美帝作战就是靠贯彻主席的军事思想取胜的。从进攻转入防御，稳定了战局，使战况根本好转。“零敲牛皮糖”威力很大，积小胜为大胜，把美国佬打得胆战心惊。

毛主席说：你们打的也是铁老虎、钢老虎，它们貌似强大，凭钢铁多，凭武器装备优良。我们是凭指挥员的智慧，凭战士的勇敢，凭正义战胜它们。

毛主席和我谈了没多久，刘少奇同志和周总理进来了。从内心讲，我很想在主席的住处多呆一会，多聆听伟人们的教诲，但我想，少奇同志和总理来，必然有重要事情，我于是请示告退。

巩固千里边防线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赶到重庆，向西南军区报到。然后，很快到了昆明，就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可以说还处于百废待兴状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才刚刚起步，任务很重，困难很多。

当时军区的副司令就我一个人。谢富治是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他同时又是云南省委书记，主要的精力放在省委那边，军区有重要会议请他回来参加一下，一般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军区这边的工作，司令部缺参谋长，副参谋长也只有王启明一人，政治部缺主任，副主任也只有胡荣贵一人。我们这三个副职，人少心齐，精力集中，相互配合，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倒觉得领导干部少而精应该是条经验。相反，领导机关臃肿、人浮于事，是必然要滋生官僚主义的。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他很留恋刘邓大军时期，因为主官配合默契，部属领会意图透彻，上有决心，下有信心，党内关系健康，民主生活正常，有了这几条，工作没有干不好的。

说句心里话，我也很怀念在云南军区工作的那段时光。那时困难是很大的，云南军区的部队，基本上是原来的第四兵团，还稍多了一些地方部队。几十万人马，没房子住。

除了房子困难，交通也是大问题，全云南境内只有两条通向境外的公路，一条是滇缅公路，又叫史迪威公路；另一条公路从昆明通向河内。我们担负的边防线有一千多公里，而云贵高原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有的部队连师部驻地都没有通公路，团部更不用说了。物资供应全靠马帮驮。

虽说已经解放了，但蒋介石还遗有部分残余势力，紧贴云南边境线活动，李弥残部蜗居中缅边境，一有机会就出来骚扰，加上少数民族地区股匪未绝，打家劫舍。所以对敌对匪斗争还是相当复杂的。

另外，还有一桩挠头的事，由于多少年来的民族歧视使少数民族仇视汉人，有些地方，在坏人的鼓动下，杀伤我军官兵的事也时有发生。

我到任后，面临的紧迫任务有四个：

第一是巩固边防线，对付蒋军残部；

第二是清匪反霸，协助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健全地方政权；

第三是架电话线，使指挥到位；

第四是建房修桥筑路，从根本上改善住房和交通状况。

以上四项工作，有些分层次分阶段展开，有些则同步进行。军区主持工作的实际上就是三人小组，遇到问题，三人坐在一起，三言两语，说办就办。所以说，那个阶段，心情是十分舒畅的，大家都一心扑在工作上，点子往工作上想，劲往工作上使，不推倭不扯皮，遇到困难或挫折，还都争担责任。什么事情都办得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部队作风也很过硬，还保留了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挖窑烧砖，开山凿洞，越岭架线，仍有不怕艰难困苦的攻坚精神。就是在原始密林和崇山峻岭中，困难也都没挡住我们。渐渐地，边境稳定了，股匪扫清了，公路修到了边境，电话线架到了哨所。几十万部队也都先后有了住房。

除了完成自身任务，我们还积极支持地方建设政权，先后派出去几十个民族工作队，分工分片包干边沿一线的民族工作，云南省建国后第一批地、县委书记，大多数是我们军队派去的。

那时候，地方党政机关的号召力还很有限，大事小事离不开军队。我们不仅在重大问题上为地方党委、政府撑腰，帮助树立他们的威信，而且开展了许多爱民活动，派出医疗队到少数民族地区巡回送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访贫问苦，筑路修桥，帮助各兄弟民族疏通关系，加强团结，也帮助他们发展生产，防疫治病，兴办教育。民族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军队同人民群众在并肩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云南人民对解放军一直有个特殊的称呼，叫大军，凡有部队涉足的地方，少数民族中便会流传着关于大军的种种故事。大军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再进军事学院

一九五四年，刘伯承元帅主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开办战役系，刘帅亲自拟定了第一期学员名单，五十二名学员都是军以上将领，我也在其中。战役系学期共为三年，其中一年为预科，补习文化。我因为一九五一年在南京学了三个月文化，被认为是无须补习文化者（我自己感到既光荣又冤枉）而没有参加预科学习，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底到达南京，直接进战役系。

这一次入学，我属于“二进宫”。一九五一年，全国刚解放，我的老首长刘伯承就雷厉风行地办起了这所全军之最的高等学院，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将领便首当其冲被召来“速成”，我们当时都铆足了劲，要抓紧来之不易的一点宝贵时间，加倍学习。可是，入学不久，朝鲜战争狼烟滚滚，我们又高校参战。一别学校，转眼四、五年过去了。这次被刘帅选入战役系，无尚光荣。在战争年代里，没有读书学习的机会，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真是太应该珍惜了。

同时也更加感到肩上的份量。国家还穷，军队还很落后，社会主义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种形势下，军委下大决心，集中时间给我们创造条件学习。对于个人来说，这次学习也是一个巨大的战役，打得怎么样，就看个人努力了。

战役系学员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军队高级干部，思想水平普遍较高，党的观念较强，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工作经验。因此，学院给我们制订的计划，主要是学习高级兵团战役组织指挥。在教学上，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提倡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战役系的学员，共有五十二人，全系又分为几个学习小组。张震同志是我们小组的组长。这些学员过去都是独当一面，拥兵挥军，手下都有千军万马，如今聚在一起，一律放下架子，大家都是普通一兵。

论打仗，大家都曾出生入死，论战术，彼此都能说出一二三，全系学员个个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如今要坐下来学习，把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而且要规范化、系统化，这可难为了我们。

我的文化不高，困难当然更大些。但我本着几十年一贯坚守的信念：别人能办到的事，我只要努力，也一定能办到，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第一学期是打基础，方方面面的常识都有，不仅陆海空三大军种，还有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兵等诸兵种兵器的战术性能及主要诸元。特别是航空兵，具体到各机型载油量、耗油量、飞行半径、火炮的口径、初速和最大射程等等。复杂倒不复杂，全凭死记硬背，可一多就复杂了，背多了驴头接到马嘴上，乱了套。有些计算题还是很复杂的，大公式套小公式，既要有解题智慧，还要有运算技巧，课程一天天地上，教材一页接一页的翻，笔记一本接一本地做，那段时间，真是知识轰炸。

我因为少上了个预科，没有参加文化补习，这可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这一年学没上，那感觉就大不一样，学习起来要吃力得多，比别人多了许多困难，但我坚持一不缺课，二不漏听。上课的时候，拼命地记。课余时间，一是补笔记，二是琢磨笔记，弄不懂的，还得想办法找别人“切磋”一番。

刘帅在学习上对我们抓得很紧，在思想和生活上也管得很严，他曾说过：“战役系学员都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保存下来的党的宝贵财产。将来，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指挥作战。”“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

习，积重难返。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照顾，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

刘帅的话，可以说是语重心长。从学习结果上看，这两年的战役系学习，我的收获是很大的。

南京是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到了夏天，热浪滚滚。一到放假，大家各奔前程，找个荫凉处避暑去。

我还是我的老原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难，四不怕热，捂一身大汗读笔记。当然，也不是死记硬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这也是刘帅教给我们的学习方法。

刘帅说：“凡钻研一门学科，大都是：一面以理解力开道，另一面以记忆力收成，两者又要相互为用，切实检验学科的思想体系，以求获得真正的有系统的知识，而在提纲挈领之处，尤须多用功夫。”

实践证明，先理解，后记忆，不背也有精髓在。不理解，靠强背，即便记住了，也是死学问，而且记忆不会长久。

一九五五年，我军实行军衔制，我被授予中将军衔。我认为这对我是合适的，既不高，也不低。我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中将，是党培养了我，是中国革命战争为我提供了横槊挥戟的舞台。

被授予将军衔是件光荣的事，但我没有把它看作是个人荣耀的资本。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成为将军，那是因为以往的战争，授衔只能说明过去，并不决定将来。能不能永远无愧于肩上的将星，还有待于在将来的实践中检验。因此，我把授衔及提升，都看成是一种驱动力，提醒自己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尽量使工作水平、成效与职务相适应。

一九五七年七月，我从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司令员（原西南军区已于一九五五年撤销，西南地区分别成立了昆明、成都两大军区。）

同周总理和陈老总相处的日子

一九五八年，全国开展大跃进。一经动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干部战士的情绪如干柴烈火，一燃就着。

总部号召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我积极响应，到十四军连队当兵。

那时才四十多岁，正是壮年，扎扎实实地当了一个月的兵。修水库，我担土比年轻的参谋干事们担得都多，而且走起来飞快，他们撵不上。

那一个月，我差不多全忘了自己是司令员，就觉得自己是个老兵，夜间训练，早晨出操，插秧割稻，站岗帮厨，一样不落。

当了几十年的领导，如今回过头来当兵，一觉得亲切，二觉得放松。跟战士们在一起，吃大锅饭，睡大房间，洗大澡塘子，一个场上打球，一个指挥下唱歌，很惬意，觉得自己也年轻了许多。

那些战士们开头还对我“敬而远之”，后来混熟了，就不在乎了，觉得这个首长挺随和挺可爱，彼此就近乎上了，有时还开开玩笑、扳扳手腕子。当了将军再当士兵，真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我至今仍然十分留恋。

在昆明工作期间，还有一件事使我终生受益，那就是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接触。

云南是我国西南的边境省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五、六十年代，这里是我国通往亚非许多国家的主要空中通道。周总理、陈外长出访，经常路过昆明，在昆明小憩数日，这使我有较多机会接受他们的言传身教。六十年代初，我也曾随他们出访过缅甸。

周总理一直是我心中最敬仰的人物之一。总理平易近人，工作作风严谨细致，我们对他敬而不畏，亲而不拘，通过多次直接接触，我对他的崇高品德更有了多方面的具体了解。

周总理办事极为认真。向他汇报工作，说“大概”、“可能”、“差不多”这些字眼，是注定要挨批评的。他要求汇报一定要准确、实在，决不能模棱两可。有时我们自以为准备得充分又充分了，可总理深入地从不同角度三问两问，又能把我们问倒，这时总理总是态度温和地说：汇报得很好，那几个问题你们再下去调查核实一下。

总理的记忆力和换算力是非凡的。和我们谈话时，一些全国性的经济数字，历史上哪个朝代距今有多少年，外国哪个国家大约有多大面积、多少人口、多少亩换算成多少公顷，多少市斤（当时是16两制）换算成多少公斤，他都是随口就能说出。最令我惊讶不止的是，在我国和缅甸关于领土所属问题的争议上，他竟能随口说出有争议的几

个村庄的名字和面积，这使我深感敬佩，深受教育。这是天份问题吗？不！我认为这反映出周总理看文件、材料极其认真，看过的东西都能印在脑子里。

周总理日理万机，到昆明后，来自北京的电报、电话仍日夜不断，但总理也忙里偷闲，找机会让自己轻松一下。他喜欢喝酒，但绝不多喝，吃饭时喝两三杯茅台，他喝着很高兴。他也喜欢交谊舞，看文艺节目。跳舞他花样不多，但舞姿极其优雅。跳舞时他边跳边和舞伴聊天，从中了解到不少普通干部、群众的思想、生活情况和具体困难。舞间休息时，他又抓紧时间和省里的领导干部谈问题。舞场，实际成了他的又一个办公室。总理喜欢唱革命歌曲，《歌唱

二郎山》、《社员都是向阳花》、《社会主义好》等许多歌他都会唱。记得有一次他来昆明时，正是电影《洪湖赤卫队》刚上映不久，可总理已经会唱“洪湖水，浪打浪……”和“手拿碟儿敲起来”这两首电影插曲了。舞会上，只要文工团员们演唱的歌他会唱，他就要走上去，边双手击拍边和他们一齐唱。一幅领袖与群众同乐的情景顿时生动地展现出来，全场为之活跃。看到周总理来到他们中间，青年们唱得更加起劲，脸上无不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周总理的文明礼貌也堪称世人楷模，他与人握手，总是两眼注视着对方，以示真诚和对对方的尊重。无论谁为他办了什么事，即便是服务员为他送来茶水，他都要轻轻说声“谢谢”。每次舞会，他都要主动邀请参加舞会的每一位女同志跳舞，从不遗漏谁。有时眼看时间来不及了，在奏最后几支舞曲时，一支舞曲他要先后邀请四五人跳。女孩子们当然希望多和总理跳舞，这时如果哪个跳过的还想“加塞”，都会被有着非凡记忆力的总理识破。总理会笑着拒绝说：“我和你已经跳过了。”总理每次离开昆明前，都要和住地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炊事人员有时来不及出来，他就要到厨房去向他们致谢，感动得大师傅们不知说什么好。

总理的礼貌待人，我认为绝不是小事，而是体现了政治家的教养、风度，体现了他对下级，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对劳动者的劳动的尊重，在这方面，我向总理学了不少。人们都说周总理富有魅力，我想，高度的文明修养应该是体现他魅力的一个方面。

我跟陈老总的接触，还是在解放郑州期间开始的，当时他是中原军区副司令，我的顶头上司。陈老总性格豪放直率，既有将帅风采，又有诗人激情，并且极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也是个好动的活跃分子，所以非常愿意跟陈老总在一起。老总也知道我爱玩，文体方面活跃，所以比较喜欢我。淮海战役期间，开会或战斗间隙相遇，有时老总就说：秦基伟，你唱一段。我就给他唱《借东风》，他给我打板，唱到高兴处，他还会扯起嗓门喝彩：不错，唱得好哇！

在五、六十年代，云南的交通还很不方便，来云南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较少。陈老总路过昆明时，省委常找机会请他给省里党政军领导干部作报告，一般陈老总都不会拒绝。陈老总的报告精彩极了。他从不念讲稿，报告中能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把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那一时期中央的方针政策阐述个透，报告中妙语连珠，幽默诙谐，挥洒自如，常常博得满堂笑声、掌声。许多听报告者都反映：听陈老总的这种高水平的报告，既能受到深刻教育，又简直是一种精神享受，只恨听这种报告的机会太少，每次听的时间太短。

陈老总坦荡直率，潇洒幽默，不拘小节，不讲客套，他的轶事、趣事挺多。

他爱吃肉，可因为体胖，保健医生和他夫人张茜在这方面一直多加限制，而他又总想摆脱这种限制。有时内部宴请时，他看见他爱吃的肉菜上来了，就找个借口把张茜支开，如说：“张茜，我的手绢在外间屋子的上衣口袋里，你去给我取来。”待张茜一走，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肉。陈老总是四川人，对川菜自然情有独钟。阎红彦同志家的四川籍厨师做得一手好川菜，特别是腌

腊肉，是绝活。周总理、陈老总去阎家吃过一顿饭后，陈老总赞不绝口。以后他再来昆，只要红彦同志没有发出邀请，他就会用有趣的外交语言说：“阎红彦，明天我去你家看你。”红彦同志当然能领会这句话的潜台词，赶忙让夫人安排，并且每次都让我作陪。这种家庭宴请其实很简单，就吃点腊肉、腊口条、腊耳朵等腊味和三四个四川家常菜，因为合口味，陈老总每次都吃得很高兴。我也有幸请周总理、陈老总到我家里吃过一顿饭。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朝鲜人民军一位高级领导人来昆明养病，军委责成我负责接待。不久，周总理、陈老总出国访问，路经昆明。他们去看望了朝鲜客人后提出要请他吃顿饭，并决定由我出面设家宴，他们两位领导人出席，这样气氛显得更亲切些。这样的宴会非同寻常，我们全家自然认真准备。不想宴席上最受陈老总称赞的菜肴竟是按我湖北老家的口味做的农家菜肉丁汤。说起农家菜，我又记起陈老总最喜欢吃的南方农家食品煮苞谷、烧苞谷。平常吃饭时，只要上了这种东西，他总是抓起就啃。那模样，在外交场合自然是看不到的，真让人感到他的可爱可亲。

老总爱看戏，有一回到昆明，在舞会上他咬着我的耳边嘀咕：“老兄，你不要光让我们跳舞，给我演两出小戏嘛！”

我问：“老总，你爱看什么戏呢？”

老总说：“这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考虑吧！”又说：“你被打倒了没关系，我要被打倒了影响大，你安排小戏给我看，责任你自己负。”

这下我明白了，老总是想看旧戏。当时正是戏剧革命时期，那些优秀的传统剧目被改得不伦不类，很煞风景。但是，旧戏都当封、资、修货色禁演了，演旧戏是要担风险的。

后来我同红彦同志商量，大着胆子安排了三个折子戏，一折新戏做掩护，两折老戏走过场，陈老总比较满意。

一九五五年春，总理和陈总在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后，回到昆明。总理和陈总这次远行，在外交史上取得了圆满成功。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

省里举行宴会为代表团接风。宴会上，群情热烈，我们向代表团敬酒，代表团也回敬我们，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

总理那天也放松了，满面春风，频频举杯。

陈老总更是穿梭于各桌之间，四处挑战。

代表团的同志都是外交官，见过洋世面，但喝酒还是没有多少资本。乔冠华、陈家康这两位著名的外交官那天都喝醉了。乔冠华走路都走不稳了还举着杯子，说：“为胜利而干杯！”

陈老总摇摇晃晃地拿过六个高脚酒杯，亲自把酒倒满，说：“秦基伟，你当我们四川人的女婿，我跟你干三杯！”

我头皮一硬，咣、咣、咣，三杯酒一仰脖子下去了，滴酒不剩。

当时周总理也在旁边，笑着看我们拼酒。

陈老总说：“总理，你不能坐山观虎斗，秦基伟倚仗年轻欺负我们，你再跟他干杯。”

总理虽然也喝了不少酒，但毫无醉意，言谈举止仍然从容自如，说：“好，秦基伟同志，感谢云南军区守好了西南大门，来，干一杯！”

总理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话说，端起酒杯，又干了一杯。当时我才四十岁刚过，饭量大，酒量大，胆子也大，一顿喝个斤把酒没有什么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周总理、陈老总率团访问亚非欧十四国，回国的第

一站仍然是昆明。这次出访历时七十二天，行程三万六千多哩，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总理一行的辛劳也是可想而知的。昆明军区特地举行宴会为他们洗尘接风。我在宴会开始前的即席致辞中说：“总理、陈老总这次出访国家之多，行程之长，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不想这一句话竟受到陈老总和当时的外交部长助理龚澎同志等人的称赞。过去，陈老总和夫人张茜就半开玩笑地说过我挺适合搞外交工作，将来可以调我去外交部。这次，陈老总又提起这事，我仍然以为这是他这位爱说笑的人在开玩笑。后来才知道他回北京后果然向军委提过，但因当时我被诊断为患有冠心病，军委照顾我，没同意我去。不去外交部，我没有任何遗憾。我是在部队里成长起来的，打了半辈子仗，文化也不高，还是搞军事工作最能发挥我的优势。

回首这些往事，不禁让人感慨万千。那时，上下级之间关系是多么亲密无间！在我心目中，周总理、陈老总既是首长，更是兄长，是亲人。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说不出的亲切，说不出的高兴。特别是陈老总，认识的时间长，接触的机会多，性格也相投，可以说和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一次我生病住院，他来昆明得知后，曾专程去医院看我。想不到这种领导关心部属的佳话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成了攻击他和我的炮弹。云南一名很熟悉陈老总的干部写大字报提出：陈毅元帅去医院看秦基伟，是什么意思？这真让我哭笑不得。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我是在湖南西湖农场监督劳动时从广播里得知陈老总病逝的噩耗的，我难过得一个星期没睡好觉。我为功勋卓著的一代元勋横遭迫害而义愤填膺，为中国失去一位才气极高，能文能武，能驾驭外交风云的元帅而痛心疾首。时间过得多快！陈老总辞世已经二十三年了，周总理离开我们也已经二十年。他们都没能亲眼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没能亲眼看到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全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含冤去世的贺龙元帅、彭德怀元帅也没能等到这一天，一想起这些，我就难过。我常想，如果陈老总能活到现在，国家的欣欣向荣，繁荣昌盛一定会让他才思泉涌，诗兴大发，他又会饱含激情写下许多歌颂祖国，歌颂改革开放的诗篇。周总理、陈老总，我想念你们！

第十七章新的考验

忠言相劝

一九六六年初夏，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北京等城市大乱，昆明因当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乱得晚些。

这年八月中旬，阎红彦同志去北京开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昆，我曾去他家看他，两人作了一次长谈。他谈了他在北京看到的一些他不理解、想不通的事。分别时他对我说：“你要当心，昆明军区有人要整你。”我当即拍拍胸脯说：“我不怕，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红彦同志说：“当然，我是很了解你的。不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家把材料都寄到上面去了，虽然那上面都是些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东西，你还是要提高警惕。”

红彦同志的话是语重心长，诚恳至极的。红彦同志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为人耿直正派，又十分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的政治水平很高，工作能力很强，来云南工作七年多里，深入实际调查，提出了不少新思路，工作上很有建树，深得群众拥戴。我们两人在工作上一直配合得很好，也很谈得来，相互间建立了较深的革命情谊，他显然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委婉地提醒我。但我这个人直来直去，在同志关系上就是从来不设防。我觉得，我这个人毛病不少，无论同级也好，下级也好，对我有意见，完全可以当面提出，也可以以负责的态度向上面反映。以似是而非的材料背地整人，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因此我毫无戒心，还是埋头抓工作。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要防也是防不住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汹涌的浊流中，要想打倒谁，整谁，只要稍稍推波助澜，就可以达到目的。

身陷重围保护阎红彦

这年八月下旬，昆明地区成立了造反派组织，造反派们和随着成昆铁路通车而大量涌入的外地红卫兵一起，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炮轰这里，火烧那里。省委自然是他们的攻击目标，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更是集中攻击的对象。当时我心急如焚，一是担心红彦同志的人身安全。他是省委的核心，如果他有三长两短，省委势必大乱，因此我把他接到军区来住，布置了力量保护他，但他感到这样不方便工作，几天后就回去了。我担心的第二件事是怕乱了部队。云南是边疆省份，如果部队受到造反派影响也乱起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军区党委为此采取了一些稳定部队的措施。

大概是十月间，根据林彪一伙的安排，军区机关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早就摩拳擦掌的军内造反派立即行动，我自然是攻击的首要目标。保护阎红彦，被列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大罪状，日常的工作作风问题、生活细节等问题都是被批斗的内容，我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因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是党委领导的，所以一开始，我还是把它当成过去经历过多次的政治运动一样对待，认为不管群众提什么，我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向群众诚恳地做检查就可以了。谁知军区党委这时已根本掌握不了运动的主动权。造反派想什么时候斗我，就什么时候斗。想斗多久，就斗多久。

他们还随时到军区领导成员的办公室和住宅来纠缠。为了避开他们，坚持正常工作，军区领导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东躲西藏地办公、开会。我被搞得心力交瘁，两次在批斗会上昏倒。一次亏得警卫员杨在伦反应敏捷，从家中取来氧气筒，我才得以很快苏醒。

那段时间，北京不断传来消息，说某某领导被打倒，某某领导被抄家，某某领导寻短自尽。随着这些消息的增多，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我心中的疑虑也越来越多：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几十年，是红是黑，毛主席、党中央还不清楚吗，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革命的对象？高级干部中真有那么多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历来重视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为什么现在允许无政府主义泛滥？这样乱下去，对部队有什么好处？对边疆有什么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但是，一想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又总是把种种疑虑强压下去。

即便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仍然关心着红彦同志的安全。当时云南地方的形势比军队更混乱，造反派到处揪斗领导干部，甚至抄家。我专门让云南省军区副司令王银山负责保护好红彦同志。我说：红彦同志是中央委员、军区第一政委，他出了问题，我无法向中央交待。后来王银山把红彦同志送到了昆明市郊小麦峪的一个部队驻地暂住。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地方造反派召开批斗大会，为找不到阎红彦冲击了军区机关，进而进驻军区大院。阎红彦同志得知后非常气愤，坚持要出面找造反派说理。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和我怕他出来发生意外，再三劝阻，他才勉强同意不出来。他向陈伯达打电话报告云南的情况，不想陈伯达恶言相逼，竟逼得红彦同志当夜气绝身亡。

周总理派来了飞机

红彦同志一死，昆明更是大乱，军区造反派对我的批斗也更加升级。北京传来贺龙元帅被打倒的消息后，我又被扣上了贺龙“黑干将”的帽子，造反派提出：不把我打倒，誓不罢休。很快，我家被抄。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无法工作，就连住在军区大院也不可能了。我带上几个参谋，到了市郊干海子的炮四师驻地暂住，工作靠打电话与在军区的领导同志联系。我爱人唐贤美是地方干部，也正在挨批斗，没有随我前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我考虑随我行动不方便，也把他们寄住在战友家。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春节刚过，周总理派来一架飞机接我去北京，我来不及通知爱人，也来不及去看望三个孩子，就由炮四师师长郭兴护送前往机场。后来听说，军区造反派也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风驰电掣般赶往机场拦截，但为时已晚，等他们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

晾在北京“靠边站”

到北京后，我被安置在京西宾馆。住在这里，固然没有了造反派的纠缠，生活显得很平静，但突然脱离工作岗位，我感到严重的失落，同时，我也惦着远在昆明的家人的安全。

一两天后，谢富治来看我。当时，他正红得发紫。很明显，他是代表组织来找我谈话的。但除了官冕堂皇地说了说要我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之类的话以外，他并没有指出我有什么问题需要靠边审查。不过我清楚，既然来了，就不会让我再回昆明了。

“文化大革命”中，京西宾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场所，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一些“文革”中握有实权的人经常在这里吃住，而同时，这里又住着相当一批靠边站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台上的和台下的都在一个饭厅吃饭。有的过去非常熟悉的人，现在在饭厅见面连招呼也不打，这让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干脆不在餐厅吃饭，而到宾馆的职工食堂与职工们一起排队买饭菜。

来北京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上面还通知我参加过一两次军委召开的会议，后来我就完全靠边了，看不到任何文件，听不到任何报告，成天无所事事，我感到非常苦闷。一次，肖华同志去看我。过去，肖华同志在担任总政副主任、主任期间，多次去云南检查指导工作，我和他很熟悉，在他面前讲话没有什么顾虑，这次便向他发牢骚说：“我并没有被免职，为什么不能看文件，我要求看我这个级别的干部应该看的文件材料。”肖华同志笑了笑。我哪里知道，那时肖华也已经处境不妙，很快他也被打倒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夏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派仗打得难分难解，许多造反派组织都要找一些领导干部以壮声势。住京西宾馆的靠边站的干部中，也有造反派找上门来的。对这个问题，我一开始就很明确：我的问题只有中央能够解决，中央迟早会搞清我是没有问题的。某派组织提出打倒我或支持我，那都无关紧要。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不介入任何派性斗争。后来，云南某派组织也派人两次找我，表示希望我站出来，公开表态打倒×××，说×××在“文革”中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我都明确地拒绝。

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春节，我爱人知道我想家，她来北京自然是不可能，便找了一个方便的机会，托人把三个孩子带到我身边。和孩子们在一起，这给我增添了许多温暖。

不久，北京又出现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在一片“打倒杨、余、傅”的声浪中，我们全体“靠边站”人员都让离开京西宾馆，其中的部队干部和宋任穷等同志被安置到了位于东城海运仓的总参第一招待所。后来昆明军区催我搬家，当时大儿子卫江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很能干，考虑到他能帮妈妈一把，便让他先行回家。在搬家中他蹬着三轮车一趟趟地搬运东西，成了搬家的主要劳力。搬完家后，小儿子秦天也回到昆明，只留下大女儿皖江陪伴我。

住在海运仓，除了读毛主席语录、看报外，仍然无所事事。眼看着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像走马灯似地被打倒，眼看着国内发生那么多背离党的传统，背离毛主席的教导的不正常现象，我心中的愤慨和疑虑也越来越多，但这些是跟谁也不能讲的，只能深藏在心底。

坐上了“喷气式”

在此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昆明军区某造反派有几个人来海运仓找我，逼我揭发军区副司令鲁瑞林的问题。我说，我和鲁瑞林同志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未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你谈他的历史问题。”来人喝道。我说：“他的历史归组织上审查，我不了解他的历史。”“你真不了解？”

“真不了解？”

“这里有毛主席像，你敢在毛主席像前发誓吗？”我一点也没有察觉造反派的伎俩，坦然地说：我当然敢。

结果，就在我刚站起来的时候，两个人从身后窜上来，一人扭住我的一只胳膊往下一压，再把我的头往上一抬，接着，有人紧按快门照像，这时，我才知道中了这伙人的计。那些人把照片放大后，带回昆明到处张贴，吹嘘他们在北京斗了秦基伟，让秦基伟坐了喷气式。造反派就靠搞歪门邪道、靠欺骗手段过日子，让我觉得可悲。

我曾就这件事向军委办事组写信，抗议安全得不到保障。当然，这封信是不会有结果的。

第十八章放逐湖南

深夜传来的“命令”

一九六九年秋天，林彪搞了个所谓的一号战备命令，在这个借口下，我们这些“靠边站”干部都被逐出北京。

九月下旬的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我们被分得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我、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张力雄和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这六个人被通知到广州军区。

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推醒了酣睡中的女儿告诉她上面有命令，让我们明天就离开北京。晁江被吓懵了，哭了起来。头天洗澡换下的脏衣服还堆在卫生间，她赶紧起床去洗衣服，边洗边擦泪，我对她说：孩子，不要哭，你要相信爸爸没问题，没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一切会搞清楚的。你要坚决相信。

说罢，我们就收拾行李。我的东西少，很快就收拾完毕。

同楼的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左齐是独臂将军。我与他在这两年的生活中结下了友谊。他全家都从乌市搬来北京，行李多，捆不及，我又主动去帮助他家捆绑行李。天亮了，开始有人上汽车了。先走的和待走的，车上的和车下的，大家依依不舍地含泪告别，都说不知何时能再相见。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去广州方向的六个人中，他们五人都是软卧票，唯独给我的是硬卧票，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我带着女儿，所以就把我的软卧票换成了两张硬卧票。我想，林彪的爪牙平时是不会珍惜国家钱财的，现在却在我的一张火车票上做文章，这让我十分气愤。

就这样，我在来不及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匆匆离开了北京。

在北京靠边两年又七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专案人员来找过我，要我交待问题。

落户西湖

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 8341 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我，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整晚就没合眼。这位青年是纯洁的，他是在忠实执行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我把他也看成受害者。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这种剥夺人的尊严的荒唐绝顶的事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能出现。

说是到广州军区，可车到长沙后就让我们下车。在省委招待所住了三天，来了一个人给我们介绍情况，他把洞庭湖吹得天花乱坠，最后宣布我们将被安排在洞庭湖边劳动。要去劳动，总得准备些劳动生活用品。但我们不能上街，而是交钱由别人代买来电筒、胶鞋、雨衣之类。很快，我们就被送往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六个人被分到六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来往。

西湖农场最早是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是在洞庭湖西面围湖造田建立起来的。房子是犯人们打坯盖的草房，简陋不堪，经过多年风雨的侵蚀，更是破败得不成样子。地面坑坑洼洼，加上南方多雨潮湿，用力踩几下，就会踩出水来。屋顶与房梁间是空的，顶上到处是洞。晴天，麻雀穿流不息地飞进来啄茅草上残存的稻谷。雨天，屋内屋外一齐下雨，地上泥泞一片。每个人的蚊帐顶部上都铺着遮雨的塑料布。雨大时，塑料布上可接上好几斤水。我刚去时，正是南方秋老虎逞威的季节，炎热难当，可班长只给我三块高低不平的木板当床，连床草席也不给，我就在光床板上睡了一段时间。一到冬天，四壁透风的营房又冷得要命，洗脸毛巾往铁丝上一搭，转眼间冻得硬邦邦的。我的抗寒能力当然不能同年轻战士比，晚上，我要把被子卷成筒状，用绳子捆住下面一头，再从另一头钻进去，裹得严严实实的，才能慢慢入睡。

在西湖农场劳动的部队是新组建的，底子薄，没积蓄，加上林彪一伙及其爪牙们把精力和钱财都用在争权夺利，整老干部上面，不可能关心战士的疾苦。因此连队伙食极差，几乎成月不沾油荤。

生活条件艰苦我不在乎。我就是从艰苦环境中走过来的，这样的生活，战士们能过，我有什么不能过的。但是对这样的不明不白地下放监督劳动，我感到愤懑。另一方面，我又很坦然，我知道自己没有问题的，坚信总有一天会还我清白。

种出了 37 斤重的大冬瓜

西湖农场的劳动量是很大的，我虽分在种菜班，但农忙时照样参加大田劳动，而且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的劳动任务一点不比战士们少。在菜地，有时我一天要挑三十几担大粪。双抢时，割了稻子又插秧，早上打着电筒出工，晚上打着电筒收工，再苦再累，我也坚持下来了。在劳动中，我还遭遇过一桩惊险事，一次收完稻后我赶牛犁田，天气炎热得让牛也受不了。因为是围湖造的田，田埂下一般都有水沟。牛一见水沟就不听牛鞭指挥了，径直往水沟奔，任我怎么拉也拉不回来。我知道，如果我一撒手，那么牛跳下沟时，牛身后的犁头就可能把牛戳伤，我甚至因此还可能被栽上有意破坏生产的罪名。于是我当机立断，紧拽住犁头，纵身随着牛一起跳下去，跳下后我的双脚深陷在烂泥里，拔出脚时连塑料凉鞋的鞋襻也拔断了。万幸的是，牛安然无恙，一到沟里就悠然自得地卧在水里休息。我也没受伤。

由于自幼就劳动，我在农场称得上是劳动的全把式。我会犁田，会双手拔秧，这些让战士们称奇不已。在种菜上，我也比他们高几着。我这人干事一向认真，菜种几时下地、几时出苗，菜苗几时移栽、几时施肥，这些我都有登记，并且不断琢磨，因此菜总是长得很好。种冬瓜，我事先施足底肥，花枯刚结瓜时，一株瓜蔓上我只留下一朵结瓜的花，精心照看，结果瓜长得又好又大，眼看瓜沉得要坠垮瓜架

了，我又自己用稻草搓成草绳编成网兜，把瓜兜住吊在树上，任其轻轻松松的疯长。谁经过那块菜地，都要惊呼：这

么大的瓜！待到瓜熟蒂落，一称，最大的一个竟有三十七斤。班长把它扛在肩上照了像，像片送到广州军区去参加展览。当然，解说词中不会说是我种的，而是把它作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例证。

在西湖的最初一段时间，我的女儿畹江虽然住在营部，但也曾一度跟我们一起劳动。有一次，班长故意把一挑大粪泼在菜地上，刚泼下就叫畹江去种菜，很明显，他是想看看畹江会是什么态度。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很难过。畹江还是十四、五岁的孩子，自小又没干过这类活，现在因为我而受连累，我感到对不起孩子，但我也相信，我的女儿不是软骨头，决不会临场退却。孩子真的争气，她毫不犹豫地走上去，刨开大粪就栽起菜来，而且栽得很好。班长见状无话可说，言不由衷地表扬了几句。我则在心底为女儿叫好。

“老秦，你真乐观”

在连队，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生活在一群年轻战士中间，当然是很突出的。战士们不知道我的底细，只知道我是个被打倒的大官，都喊我老秦。

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长了，战士们见我劳动出色，平时没有一点垂头丧气、消极悲观的样子，有的就问我：“老秦，你是个大官，来这里生活这样苦，劳动这样重，你为什么还这么乐观？”有的夸奖我：“老秦，你真乐观，这不简单。”我总是说：“我是劳动人民出身，从小就喜欢劳动，参加红军是为了穷人翻身求解放，不是为了当官，现在来劳动，有什么不乐观的。”的确，我讲的是真心话，我没有向战士们讲明的是，我乐观还因为我知道自己没问题，我相信当前这种形势总会改变，坏人自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是信这一条的。

有几名战士对我很友好。有的在路上与我相遇，一见周围没人，有时会急匆匆地往我衣服口袋里塞个水果或塞块糕点；有的会向我说几句宽慰我的话，有的还会悄悄告诉我一点消息，但只要上面发现谁对我好，谁就很快会被调走。

我也把战士们当成自己的小兄弟，有的战士不会缝被子，补衣服，我都主动帮他们做。有的战士用钱没计划，还不到发津贴的时候就没钱花了，要我买烟给他们抽，我也从不拒绝。有一名战士从小是孤儿，因他额上留有小时遭狼咬的伤疤，有些战士叫他“狼孩”。我很同情他，也可以说是疼爱他。一次他挑大粪时，扁担断了，粪便溅了他一身。收工后他可能是累极了，把脏衣服一脱，倒头便睡，我便悄悄帮他把衣服洗净。

现在回想起来，和战士们的那段情谊还是令人难忘的。

没有了公民权

在西湖，最让人憋气的是所谓的政治待遇。

我们几个人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完全被打入了另册。

我想订两份报纸，不行。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所以我从来只简单写几句，报个平安就行。家里来信，到我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

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值星排长一吹哨，宣布党员到一排，团员到二排，非党非团的战士到三排。我是党员，但不能到一排，二排也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该去的地方，我只能到三排，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在一起，听值星班长训话。

一九七一年的一天，全营集合选举四届全国人大的军队代表，班长让我也列队前往。当时我很高兴，但也觉得奇怪，怀疑是班长弄错了或上面疏忽了。果然，快到营部时，营里一名干部盯着我看了一下，然后跟连长咬了咬耳朵。连长当即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我受歧视，孩子也跟着遭殃。

畹江住在营部，有位副营长的爱人也住在那里，她有点文化，和畹江比较要好，可是有一天，她很神秘地约畹江到外面一个地方见面，沮丧地告诉畹江说：“今后我不能跟你来往了，组织上已经批评了我，说我跟你常在一起是立场有问题。”

畹江把这件事告诉我后，我心里比针扎还难受。我们到底成了什么人，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能正常地与人交往。事实上，畹江参加劳动从来都是积极的，战士们看在眼里，还在黑板报上表扬过她。

我担心这样的环境让孩子受刺激，同时，那时各地的中小学已经陆续恢复上课，畹江迫切要求上学，因此，后来她离开了农场，回到了昆明。昆明军区炮四师师长郭兴和他爱人黎斌，为人正直热情，“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我的三个孩子多有照顾，这次也亏得黎斌同志大力相助，畹江回昆明不久，就顺利地上了高中。

望断长空“雁”

从长沙到北京的民航线正好路过西湖农场上空。每天下午都有一架飞机自我们头顶飞过。每到这时，我总会仰望天空对着飞机遐想：“文化大革命”搞了四年多了，我没问题这一点中央该查清楚了吧，说不定哪一天毛主席、周总理会派飞机来接我回去。

一天天的盼望，终于盼来了一点转机。

一九七一年初冬的一天，平时对我较好，相互间已建立起情谊的营部卫生所医生陈王滚悄悄对我说：“老秦，告诉你一件事，你别吓着。林彪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阴谋刺杀毛主席。事情败露后他带着叶群、林立果坐飞机逃往苏联，结果飞机掉下来，他们都摔死了。”他说：这是上面传达的，绝对可靠。

他的话确实使我大大地吃了一惊，随即心上又好象掉了一块石头，有些疑虑也好象找到了答案。原来林彪是野心家，想篡党夺权，难怪把那么多的将帅整得那么惨。

十一月二十人日，团里的保卫股长把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送来给我看，要我看后表态。我讲了三条：一、林彪太善于伪装，太会表演，野心隐藏得很深，手段又十分毒辣，现在事情暴露，我感到吃惊。二、感到后怕。林彪居然敢谋害毛主席，要是他的阴谋得逞，后果不堪设想。三、毛主席英明，党中央英明，识破林彪诡计，斗争取得了胜利。我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处理决定。

这以后，林彪叛国叛党，摔死异国的事，我在心中又翻腾了好长时间，联想到很多问题。同时，我也预感到，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中国的政治形势将会有大的变化，说不定不久我们这些人就会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靠边站了这么长时间，我是多么渴望工作啊！“文化大革命”这几年，已经让我失去了多少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大好时光！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会复原职，我想，也许会让我到省军区担任副职，如果真是那样，那我就要主动提出由我分管农副业生产。这两年多的劳动实践，我积累了不少生产经验，我相信我能把这个工作搞好。

发脾气住进了医院

林彪虽然摔死了，但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农场的活依然很重，生活依然很苦。一天，我买了点小虾，煮熟后正端回宿舍，不想雨后路滑，我在进门时摔了一交，右胳膊狠狠地摔在地上。当时我就感到右肩疼痛，以后越疼越厉害，连穿衣都困难，我先后多次去营部卫生所看病，但丝毫不见好。营卫生所说他们条件有限，于是把我送到了师医院。师医院治了几次，仍然无效果，而我右肩的疼痛还在加剧。院里说这种病得转到长沙治疗。话是这么说了，可就是不见动静。我痛得忍无可忍，怒从中来，找到院领导理直气壮地拍着桌子喝道：“你们还有一点人道主义吗？解放军对受伤的俘虏还要治伤呢，你们对我这个伤病号是什么态度？把你们师政委找来，我要见他。”我一发脾气，他们反倒害怕了。结果很快把我送往长沙的解放军 163 医院。与我同去的还有我的班长，当然，他的任务是去监视我的。

从西湖农场乘吉普车去长沙，路程不算近，早上出发，下午才能到。中饭是在路边一家小饭馆吃的水饺，那一顿我竟一气吃下四十个饺子，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多的一顿。

到了 163 医院，条件好多了，但一个更严峻的考验在等待我，那就是配合医生治疗臂伤。

我右肩的肌肉在摔交时撕裂了，由于延误了时间，撕裂的肌肉间的粘液，形成了严重粘连，要治疗，就要把粘连的肌肉拉开，而这是疼痛无比的。每天，我坐在椅子上，医生站在一个小凳上把我的右胳膊一次又一次地往上抬。每抬一次我一身汗，疼得犹如万箭穿心。但不管怎么疼，我都咬着牙坚持下来。除配合医生治疗外，我还按医生要求，自己坚持锻炼。每天我把手靠在墙上，咬紧牙关一点一点往上蹭，今天蹭到一个地方，用铅笔划个记号，明天蹭时，再做记号，看是不是高了一点。就这样，靠医生推拿结合自己锻炼，三个月后我的伤竟完全痊愈了。医护人员们很佩服我治病的毅力。他们说因忍受不了疼痛而中断治疗的，当时医院就有几个。

一九七二年四月，我在 163 医院接到通知让我不再回农场，直接转到湖南宁乡的一所部队疗养院 364 医院休息。

监督劳动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在西湖劳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和在北京时一样，仍然没有任何专案人员来找我，要我交待问题。

团聚在灰汤

364 医院位于地名叫灰汤的农村。和我一起到西湖农场劳动的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张力雄、王蕴瑞五人也同时接到去灰汤休息的通知。我们六人被当作高干对待，每人在二楼住了一间带卫生间的住房，伙食也比在西湖时好多了，但政治上仍然受到歧视。我们的活动范围只限于灰汤附近。毛主席的韶山旧居离灰汤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但不能去参观。每个人仍然配有一名战士名为警卫，实际是负责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看不到任何文件，经一再要求，后来才由湖南省军区政治部每月送一次团级干部阅读的文件来给我们集中传看。这样，除了读毛选、看报外，一天没有什么事可做，当时也不可能随身带什么书。我就每天去野外散步，几乎爬遍了灰汤周围的所有的小山头，有时碰到农民插秧，我也脱下鞋袜下田和他们一起插起秧来。

渐渐地，政策放宽了，允许家人来同住。我们六人都先后经历了灰汤车站迎亲人的难忘时刻。我爱人是八月初等孩子们放暑假后带着他们来灰汤的。这是全家分散五年多后的第一次团聚，从这时起，我算又有了家庭生活。灰汤地处农村，一些需要的东西买不到，我从小学会的一些生活本领这时又派上了用场。我用木头、铁丝自制衣服架，用泥土捏插熏香的插座，用多余的馒头发酵后做酱，做成的黄酱成了这几家炒回锅肉、酱爆肉的好佐料。

随着家人的到来，我的生活也日见规律。每天下午，我扛着竹杆和我爱人去四周山坡上打松球，我打她捡，每次提回来一网兜，这固然是为了解决生煤炉的引火问题，但更多的是为了充分享受一种田野情趣。上午，我们则读书看报。当时新华书店来卖过几次书，我们买了一些。我的老秘书张维明也从四川给我寄了几本书来。我对他寄来的苏军元帅朱可夫写的《回忆与思考》一书最感兴趣，这本重点记录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作战情况的书，我对照地图读了两遍。因这书是秘书借来给我看的，我读后又寄还给了他，但内心很舍不得，一次出外散步时，我与同在灰汤疗养的工程兵某师政委谷善庆相遇，我们过去素不相识，但他对我很热情，显得很尊重，当在交谈中我称赞《回忆与思考》这部书不错时，他立即慷慨地说：“我这儿有一部，我送给你，首长。”在那个年月里，谷善庆同志能够这样做，是很不简单的，表明了他的不随波逐流和为人的正直，让我非常感动。

在灰汤，与我同去的五位同志都不时有专案人员前来向他们核实问题，而我，仍然没有任何人来找。当时在我们这些靠边站的干部看来，有无专案组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有无问题，都要靠专案人员查清。他们来找你，说明你的问题有人在过问。为没有专案组来找，我们全家还着急过好一阵，可直到离开 364 医院。也没把他们“盼”来。不过，我盼来了西湖农场的陈玉滚医生，他是关心我的境况，专程来灰汤看我的。后来，我和他之间的通信联系一直保持了好多年。

在灰汤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几个人发现国内形势渐渐出现了一些喜人的变化。这年五·一劳动节时，儿位“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高级干部的名字出现在了参加游园者的名单上。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出席者名单中这样的名字又多了几个。这让我们受到鼓舞，更盼着自己尽早获得解放。在切切期待中，迎来了一九七三年元旦。这是我们同来的六个人多年里第一次与家人共度新年，也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国内政治形势有了明显好转的一年。与以往相比，我们的心中少了些茫然，多了些希望。元旦那天，我们几家搞了次聚会，由各家做一荤一素两样菜，凑在一起聚餐。大家以水当酒，

频频碰杯，表达对彼此的祝愿。

四月，邓小平同志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一次国宴的消息赫然出现在十三日的报纸上，这使我们惊喜万分。看罢报纸，大家兴奋、激动，聚在一起谈了很久。我们认为，小平同志的重新工作标志着国内形势出现了非同寻常的变化，同时，有他协助周恩来总理，也让我们对国家的前途增加了信心，感到自己问题的解决也指日可待。

这月下旬，我们接到通知，说广州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要来看我们。对这件事，我们没怎么放在心上，以为是因为形势好转了，广州军区派员来做一次礼节性拜访。没想到那位副主任来后向我们传达的竟是军委的指示：我们六人近日内都将离开灰汤，我和李成芳，张力雄、王蕴瑞去北京，张子明、胡荣贵回云南。和我们谈完，那位副主任又召集负责监视我们的几名战士开会。会后，战士们对我们的称呼就变了，由称老秦、老张等一律改为称首长。也许是联想到自己半小时前还在执行监视任务，有的战士显得不大自然。其实，我们是充分理解这些年青战士的，他们都是在奉命行事，我们对他们毫无责怪之心。我在西湖劳动时的班长小苏一年前也来到灰汤，担任张子明同志的“警卫”。过去在西湖时，他对我多有过份之处，这次离开灰汤时，我也友好地和他告别。有意思的是，一九八五年我在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一天，我正在办公，营门传达室送进来一包海参、尤鱼之类的海产品，说这是一位姓苏的广东人送的，送物者说他不一定能见我，只要我收下东西他就很高兴。班长小苏正是广东人，我判断那包东西是他送的。我很遗憾他没留下在京地址，否则我是会派人找他并款待他的。

重新工作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们一行乘火车抵达北京，仍然住总参海运仓招待所。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五·一劳动节的游园请柬。

和几年前海运仓招待所集中住着一批靠边站的高级干部一样，这时，很多等待分配工作的高干又在这里相聚。大家互相看望，互道别情。五·一后，我的名字见诸报端，住在所外的一些老战友知道我被“解放”了，也主动来探望。一时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这些战友都是“文革”中受过摧残的，大家大难不死，还能相见，都感慨万千。

五月，中央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我和李成芳同志被通知前往参加。开会期间，周恩来总理曾召见我们，说现在国务院人手紧，特别是缺部长，问我们愿不愿意到国务院工作。我们两人都表示服从中央分配，但按自己愿望，仍希望继续留在部队。总理点了点头，当场没有表态。

不久，叶剑英同志又召见我。简短的谈话里，他说我还是显得朝气蓬勃，说明几年靠边没有白靠，同时他要我做好思想准备，重新工作。

七月二十八日，我和家人在青岛疗养时，接到了军委命令，我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很快，我就奔赴成都报到，开始了新的征程。

后 记

很早以前，我就想对自己投身革命的历程进行一次全面回顾，并把它记录下来，但由于工作忙，很难抽出充裕的时间，所以这件事只是断断续续地在进行。一九九三年，我从军队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工作担子相对轻了一些，这样，终于在青年作家徐贵祥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部回忆录的写作。

在写回忆录的日子里，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从眼前掠过。回忆的同时，我也在思索。从我参加革命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我犯过错误，有过失误，有的缺点到现在也没完全改过来。但我感到无愧和欣慰的是：我活着干，死了算，革命到底的革命初衷始终没有变，我不甘落后，积极进取的精神始终没有变。我总是相信，别人能做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一定能做到；别人能克服的艰难困苦，我咬咬牙也一定能克服。靠着这两点，我在革命道路上磕磕绊绊地走了半个多世纪，勉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几十年间，与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中，有的早在战争中就已为国捐躯，有的在解放后因病先我而去。写回忆录的过程中，这些战友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脑际，使我对他们更加怀念。我庆幸自己是幸存者，不仅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参与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而且看到了林彪一伙和“四人帮”的覆灭，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我虽然年事已高，不能像当年那样跨马征战了，但我坚信，我们几代人为之流血奋斗的事业会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建设得更加安定、团结、文明、富强。

由于回忆录的时间跨度大，我年老后，记忆力大不如以前，手头又缺乏能参考的资料，这本回忆录中难免有不准确或失误之处，我恳请读者原谅，知情者指正。

一九九五年九月

